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周恩来在国统区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引 子

那是六年前征集党史资料时，我认识了蒋泽民老人，以后又认识了他的战友袁超俊、朱友学、吴宗汉。

这是四位不寻常的老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们给周恩来当过副官、秘书、警卫。如今，岁月的风霜已染白了他们的须发，战斗的历程在脸上留下道道皱纹。他们最大的 83 岁，最小的 78 岁。

蒋泽民是他们当中的高龄者，离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他出生在辽宁省黑山县，“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1935 年末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两年后归国到延安。1938 年 7 月，他被调到武汉办事处担任交通班长，工作在周恩来身边。1939 年 2 月，他被调回延安，给毛泽东当保卫参谋。1942 年 1 月，他离开延安来到重庆办事处，给周恩来当副官。重庆谈判时，他被派去给毛泽东当副官，谈判结束后，他奔赴东北。在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新中国刚刚诞生，他奉中央军委之命，率领部队投入到援越抗法战争中。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又奉命从镇南关回到鸭绿江畔，是我军第一个过江的运输部长。在和平的岁月里，他任过沈阳军区后勤部车船部长、生产部长，1978 年 11 月调到总后勤部，1988 年 1 月脱去戎装，回到沈阳。

袁超俊离休前是国家旅游局第一副局长，并兼任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总经理。他出生在贵州省桐梓县，1930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国统区，他两次被捕，被投入国民党苏州监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多次提出释放政治犯的问题，经过多次交涉，许多政治犯走出监狱，他也恢复自由，经组织审查转为中共党员，并派往延安。在途中，他被博古和叶剑英留在南京办事处。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十年，任过副官和秘书。1947 年 3 月，他被周恩来派往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北京，在纺织工业部工作。1957 年成立中国国际旅行社时，他被周恩来点名调去当总经理，1983 年离休。

吴宗汉 81 岁，离休前是首都汽车公司党委书记兼第一副经理。他在江西省兴国县这个老革命根据地长大，13 岁参加儿童团，16 岁参加红军。他跟随红军部队长征后到达陕北，分到西北保卫局。1937 年 2 月，我党在西安成立红军联络处，周恩来要求从延安抽调十名忠实可靠机智灵活的青年干部，他被抽去，担任押运副官。1938 年 8 月，他又奉周恩来之命到武汉办事处。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八年，1946 年 10 月离开延安到济南军区。全国解放后，他调到北京，一直担任首都汽车公司领导工作，1983 年离休。

朱友学是四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他在周恩来身边时间最长，离休前是北京市公用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他出生在四川省南江县，15 岁参加红军。他跟随部队长征后到达陕北，分到中央军委警卫排。1938 年 8 月，他由延安调到武汉办事处，给周恩来当警卫，以后跟随周恩来转战到长沙、桂林、衡阳、重庆。重庆谈判时他被派到桂园负责保卫毛泽东的安全。1945 年 11 月，全国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他是中共代表团行政组副组长，以后作为副官跟随周恩来到南京、上海。1946 年 7 月他又受周恩来之命，作为中共代表团联络员派往烟台办事处，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工作。1948 年调到中央统战部。全国解放后，他被调到国务院，担任办公厅总务处长，1952 年

6月离开，先后担任北京市交通局、公用局领导工作。1982年9月，他当选中共十二大代表，1983年10月被选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离休。

这四位老人，在周恩来身边最短的三年多，最长的十四年。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跟随周恩来转战于炮火硝烟中；在中华民族处于历史转折关头，他们跟随周恩来战斗在虎穴龙潭里。他们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更耳闻目睹了一个伟人为国负重的伟大业绩。那峥嵘的岁月，难忘的情怀，在他们心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记忆。

为此，他们很早就有一个心愿，就是把这段历史讲出来，把所知道的有关周恩来的往事写出来，留给后人。随着年龄的增高，这个心愿越来越强烈……

他们把这个心愿告诉我，并委托我去完成。每个老人几乎都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们有幸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他亲手把我们培养起来。可是总理在世时，不让我们讲，更不让我们宣传他，这是纪律，我们只好执行。总理故去了，邓大姐也不让我们宣传总理，我们听大姐的。如今，大姐已随总理而去，我们也都七老八十的人了，总不能把这些珍贵的记忆也带走吧！那样，我们对不起总理和大姐的培养，也对不起全国人民。所以，趁着我们还活着，还清醒，赶紧把它讲出来，让文人实实在在地写出来，这就是我们几个老头子最大的心愿！

老人们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激起我对领袖深深的怀念；他们那强烈的心愿，更深深地震颤着我的心弦。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感到责任的重大，我要完成老人们的心愿，要把这段历史详实地再现出来。让冷静后的激情化为耕耘的耐力和韧性。

在那大雪飘飘的寒冬，在那骄阳似火的盛夏，我开始紧张地采访，埋头于资料堆中，又举起这重如千斤的笔……

老人们那满怀深情的回忆把我带到宏伟壮观的历史画卷下，伴着老人娓娓的述说，我仿佛看到了亿万人民敬仰的周总理正微笑着潇洒地向我们走来……

周恩来在国统区

第一部分 长江局的日日夜夜

1 新的使命

西北的12月已经很冷了，而1937年似乎更寒。怒号的西北风卷起的不仅是黄沙，还有许多烟尘，这仿佛是卢沟桥上的炮火散落的尘埃，或是淞沪之战弥漫过来的硝烟。天空中飘着的雪花也不像以前那样潇洒了，低垂着头无精打采地落下，这些雪花也不再那么晶莹洁白，上面那隐隐的斑斑暗红色，或许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水蒸发到空中凝结而成的吧。有的老人说，冤魂跑来避难啦，那是三十多万个冤魂啊！

在风雪中，从延安城急驶出一辆汽车，在广漠的黄土高原上奔驰。车里端坐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他眼帘微垂，凝神深思，眉宇间透着刚毅和智慧。周恩来旁边是他的夫人邓颖超，她眺望着窗外，目光深沉而坚定。同车而行的还有王明，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1月末才从莫斯科回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很怕冷，把脖子缩在厚厚的毛边前克衫里。他们刚刚接受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奉命南下。

车轮在飞转，雪地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车痕，蜿蜒蜒蜒，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又向东南……这深深的车痕仿佛是历史车轮的轨迹，把昨天和今天连在一起。一年前，这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创举，那是一段名垂千古的历史。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中日民族矛盾很快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组织全国革命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末，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民族统一战线，反蒋抗日。随即，党中央把工作重点放到争取联合与陕北苏区临近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上。

东北军是“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被迫开过来的，少帅张学良与日军有杀父之仇，与蒋介石也有矛盾。为了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我党采取上、下层统战工作并行的办法，派有丰富经验的党的地下干部刘鼎去西安做张学良的工作，帮助他树立联共抗日的信心；又派李克农去洛川，打开与东北军和谈大门。

周恩来亲去肤施与张学良长谈，向他阐明我党停止内战，全国不分红白军队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与他共同探讨救国之路。周恩来明确指出，要想收复东北，要想挽救中华，必须依靠广大民众。周恩来对时局的分析、坦诚与远见说服、感化了张学良，他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是爱国将领，1933年5月，他就率部下到川陕苏区，与红军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的密约。因此，经过我党工作，双方很快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这样，我党同东北军、西北军组成“三位一体”，建立了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于日军侵华，威胁了英美在华利益，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与英美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而抗日民主力量则不断加强。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采纳了英美派的意见，欲改善中苏关系，也想摸摸共产党的底，于是派武官邓文仪去莫斯科找王明，想与共产党谈判。

我党了解这一情况后，审时度势，认为蒋介石在联俄、亲日之间正举棋不定，随着民族战争的发展，蒋或许有抗日的可能。为了争取国民党大多数人抗战，我党决定采纳张学良的联蒋抗日意见，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

于是，“三位一体”共同努力，内劝外逼，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走上抗日道路。

惯用两面派伎俩的蒋介石，虽然伸出了联俄触角，但毫无实际行动。他于1936年10、12月两去西安，督战“剿共”，要求东北军、西北军向陕北红军进攻。张学良和杨虎城痛切陈词，苦苦相劝，希望委员长以国家为重，以抗日为急，不要打内战了。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要分割东北军、西北军，要下第六道“剿共”命令。他顽固地对张学良说：“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要剿共！”

被逼无路，为了中华民族，张、杨两将军铤而走险，于12月12日清晨4时举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向全国各地通电，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救国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此时的蒋介石，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中被擒的拿破仑，他实力尚在。如果西安与南京兵戎相见，那么在日军进逼下，中国将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因此，西安事变成了中国政局的旋涡，成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与国民党对立十年，被蒋介石五次“围剿”的中共中央，果断作出决定，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与蒋介石同朝共事的亲日派何应钦此时则大肆活动，主张出兵讨伐，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死地，取而代之。在南京政府里，主战派占了上风，中央军大举向西安进攻。

日本侵略者想渔翁得利，明目张胆地给何应钦撑腰打气。

在这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周恩来受党中央派遣奔赴西安，肩负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任。他首先与张、杨两将军商谈，就和平解决事变取得共识。他指出，事态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蒋接受我们的条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二是蒋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那么就要公审他。如果这样，必将引起大规模内战，给日本亡华创造条件。鉴于此，我们要说服蒋介石，劝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好的前途。随后，周恩来又与来到西安的宋子文、宋美龄长谈，告诉他们，我党的方针是和平解决，只要蒋先生能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让他回南京，希望宋氏兄妹劝蒋先生，改变政策，以民族利益为重。

已知何应钦包藏祸心毒计的宋氏兄妹，见共产党如此不记前仇而以国家大计为重，很受感动。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用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并劝蒋介石：“以后不要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西安斡旋，实在令人感激！”

恼羞成怒又焦躁不安的蒋介石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顽固到底，那样不仅回不了南京，而且要死在何应钦的毒计中；二是答应张、杨的条件，这样不仅可即刻恢复自由，而且还能当上抗日领袖。经过权衡，他终于答应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并于25日下午飞回南京。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中华之舟在这场惊涛骇浪中避免了被倾覆的危险。

然而，出尔反尔的蒋介石一到南京就背信弃义，扣留了护送他回府的张学良。随即，又派出五路大军37个师进逼西安，逼迫东北军、西北军撤出，分驻两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东北军的少壮派得知少帅被扣怒火中烧，也烧昏了

头脑，不仅要向中央军开战，还与以大局为重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元老派发生尖锐的冲突。在这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紧急形势下，周恩来如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极冷静地处理着这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与杨虎城、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商议，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揭露他背信弃义企图挑起内战的阴谋，要求释放张学良；他斡旋于少壮派、元老派之间，竭力劝阻少壮派，莫忘了西安事变的初衷，如果动了干戈，不仅少帅回不来，还会导致内战发生。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平息了少壮派与元老派的冲突，也稳住了西安事变后的局面。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随之就是国共两党谈判，其间更是一波三折，曲曲弯弯。

第一段是 1937 年 2 月的西安谈判，双方达成三项协议：（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狱中的中共党员，允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地改为陕甘宁行政区……（三）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个师……

第二段是 3 月末 4 月初的杭州谈判，蒋介石态度积极地邀请周恩来前去。在谈到合作问题时，蒋说，不要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与他本人合作。周恩来提议制订一个共同纲领，因为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蒋说，你们商量吧。问其有何意见，他说没有。在谈到红军整编及边区问题时，蒋说：“这是小节，容易解决。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参加了行政区要整个的，须由中共方面推荐南京方面的人来担任正职，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于，我们不来干涉。军队问题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

这次谈判似乎一帆风顺。之后，我党认真地制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纲领。

第三段是 6 月的庐山谈判。蒋介石变脸了，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但不提合作纲领，而且矢口否认上次谈判的诺言。原定红军整编后设司令部变成只设政训处；不提共产党公开问题，却提出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能以共产党名义出现，甚至无理要求毛泽东、朱德出洋。

由于蒋介石出尔反尔，无理至极，谈判陷入僵局。就在这时，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

翌日，党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9 日，彭德怀、贺龙等我党九名军事干部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授命力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接着，周恩来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合作宣言》送给在庐山的蒋介石，以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然而蒋介石态度冷漠，对红军整编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仍持顽固态度。

第四段是 8 月的南京谈判。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疯狂践踏下，北平、天津沦陷，上海失守，南京危在旦夕。战火已快烧到国民党政府的中心，蒋介石害怕了，为了调遣红军去前线杀敌，他不得不同意我党的要求。国共双方代表遂于 8 月 18 日达成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编三个师。改编后的八路军于 8 月下旬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在南京、西安、武汉、兰州等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设立了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办事处。我党由地下斗

争转为公开的合法化斗争。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就此宣言发表了谈话。至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统一战线的形成可谓九曲十八弯，曲曲有险，弯弯有难，而以后的巩固和发展则更加坎坷和艰难。

南京沦陷前，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为了进一步协商两党合作事宜，1937年11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并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及新四军党的工作。

12月18日，周恩来一行人抵达武汉，国统区的革命斗争也将随之掀开新的一页。

23日，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鉴于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方便，决定合并一起，由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对外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出现，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

会议还决定，长江局下设四个工作部门，即：秘书处，李克农任处长；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民运部，董必武任部长；组织部，博古任部长。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正式成立了，肩负起领导中国南部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抗日斗争及统战工作。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诗是20年前，周恩来临赴日本留学时写给母校师友的，表达了他的报国志向。如今，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他来到了这波涛滚滚的大江畔，宏图大志变成伟大的革命实践。从此，南国大地、大江两岸留下他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此时的周恩来年仅39岁，正是一个革命家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他的到来，给国统区的革命带来动力，给灾难深重的人民带来希望，因此，各阶层人民都欢迎他，尊敬他。同志们亲切地称他周副主席，朋友们热情地唤他周先生，那些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官员们也尊敬地叫他周副部长。

在那布满荆棘的国共合作道路上，周恩来怎样为国负重？以什么样的姿态领导这场举世瞩目的抗日战争？让我们听一听跟随他的副官们的回忆。

2 四副官相继到任

中共代表团抵达武汉时，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也随之迁往这个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经党中央同意，南京办事处与成立不久的武汉办事处合并，于1937年12月中旬正式建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即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由钱之光担任处长，下设总务、文书、运输等部门，还有一个警卫班。

武汉办事处归长江局领导，并与之合署办公，地址在原日本租界地的大石洋行，现汉口长春街57号。这是一幢四层楼房，一、楼是办事处，内设副官室。接待室和传达室；二、三、四层楼是长江局（中共代表团）的办公室，机要科和电台也设在这里。

办事处的警卫班负责长江局首长的安全，并负责这栋大楼的警卫。

武汉办事处成立后，急需各方面的干部。这样，袁超俊、朱友学，蒋泽民、吴宗汉四位副官相继调往武汉。

在武汉办事处，他们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首次见面和亲切的交谈，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四位副官中，最先来到武汉的是袁超俊。1937年8月，他被我党从国民党的苏州监狱营救出来后，经过一段学习，留在南京办事处。12月初，他又随同南京办事处撤到武汉。武汉办事处建立后，他担任副官长，负责内部保卫和文件收发等方面的工作。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12月18日，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王明、博古来到武汉办事处，李克农秘书长带着我们到门口迎接。

车刚停稳，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从车内敏捷地走出来。他穿着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比较旧了，但整洁利索；剃着平头，面庞清瘦，又粗又黑的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眉宇间透着英俊之气。他举止潇洒，气宇不凡。这位首长是谁呢？莫非就是周副主席？

正当我凝思之时，李克农同这位首长热烈握手后，指着我说：“周副主席，这是副官长，叫袁超俊。”然后又转身对我说：“小袁，这是周副主席！”

“啊！周副主席，这就是我天天盼夜夜想的周副主席！把我从狱中营救出来的恩人。”我急忙立正敬礼，用激动得有些发颤的声音说：“周副主席，您好！”

“袁超俊同志，您好！”周副主席一面说着一面伸过手来与我相握，他的手又大又暖，我顿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的眼睛湿润了，想告诉他，我就是您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营救出来的那批同志中的一个呀！可是由于过分激动，脸涨得通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周副主席见我这傻呵呵的样子，笑了，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头，和蔼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

他这轻轻一拍，缓解了我那激动而紧张的神经，我告诉他他是贵州人。

周副主席又把我介绍给王明、博古和邓大姐。

从此，我有幸工作在周副主席身边。

第二个调到武汉的是朱友学。1937年春天，朱友学在延安警卫排时就见过周恩来，虽未交谈过，但周恩来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脑海里。

一天深夜，朱友学和一个警卫员保卫周恩来出去。朱友学提着马灯在前，

周恩来在中间，那名警卫员跟在后面。由于灯芯拧得比较大，火苗较长。周恩来轻声说：“火苗小一点吧，看得见就行，节省油。”

就这么一句话，深深地刻在朱友学脑海里，至今回忆起还记忆犹新。

1938年7月，朱友学由延安调到武汉，分到警卫班，对外称副官。警卫班有十几个人，都是有一定保卫工作经验的机智灵活的小伙子。

朱友学与周恩来再次相见是在一次执勤中。

朱友学老人回忆说：

一天我值班，看见钱之光处长陪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客人走来。这位客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帽沿压得很低。我觉得他有点儿眼熟，但想不起是谁。按规定，任何外来人员进楼都必须登记，于是我就冲他说：“先生，请您登记再进楼。”

钱之光急忙说：“小朱呀，这是周副主席！”

“啊！周副主席，他是周副主席？我怎么没认出来呢？”我一下子愣住了。

周副主席抬起头，冲我亲切地笑了笑。

他这一抬头，我一下子认出那熟悉的浓眉和有神的大眼睛。哎呀，果真是周副主席！这下子我可傻眼了，站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心想这回非得受批评。

岂知周副主席不仅没有责备我，而且用赞许的口吻说：“小朱，你做得很对！尽职尽责，无论什么人都应该严守制度。”

第三个来到武汉的是蒋泽民，他于1933年7月末由延安调到武汉办事处，担任交通班长，对外是中尉副官，亦称押运副官。交通班有五位同志，还有十几个当地司机。交通班归运输科领导，科长是邱南章、龙飞虎。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1938年8月10日，是我到办事处的第十一天。下午，李克农秘书长把我找去谈话，刚刚谈完，我无意中向窗外望了一眼，看见一辆黑色小车驶到办事处门口停下，从车上下下来一位英俊潇洒的中年军官，后面跟着一位个头不高的年青军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军官在前，年青人在后，向楼内走来。“他们是谁呢？”我心里想。

一会儿门开了，那位军官步履轻盈地走了进来，看样子他三十多岁，颇长的身材穿一套黄呢子军装，肩章是中将军衔，腰扎皮带，足登马靴，佩带一把短剑。他仪表堂堂，浓黑的剑眉下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眸子又黑又亮，闪着智慧之光。啊！好一个威武英俊的将军，他的风采，他的气质，谁见了都会为之钦佩的。

李克农立即起身迎过去，高兴他说：“周副主席来了！”

“周副主席？他就是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那位让敌人既闻风丧胆而又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周副部长？”我急忙站起，睁大眼睛望着他。

李克农把我介绍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这是咱们刚从延安调来的交通班长，叫蒋泽民，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后来到苏联学习过。”

我赶紧立正敬礼，激动他说：“周副主席，您好！”

周副主席还礼，并把右手伸给我，我急忙握住他的手，激动的心怦怦直跳。

周副主席坐下，看样子要和李克农研究工作。为了不打扰他们，我准备

回去，于是用崇敬的目光望了周副主席一眼，便对李克农说：“李秘书长，我回去了。”说完就往外走。

“蒋泽民同志，先不要走嘛！”周副主席把我叫住了，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身边。

我有些拘谨地坐下。

周副主席亲切地问：“蒋泽民，你原来是东北哪个军的？”

我答：“东北抗联二军。”

“哦，什么时候参加抗联的？投身革命就到抗日联军了吗？”

“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1935年2月参加东北抗日联军。”

“你什么时间去苏联学习的？都学些什么？”

“1935年12月从抗联出发，途中艰难坎坷，1936年1月才到苏联。在苏联，我们除学习文化课外，还学习了各种轻武器的使用和保养，学习了汽车、大炮、坦克的操纵，还学习一些步兵、骑兵的战术。”

“学的不少呢，文武都有嘛！”周副主席说完朗声地笑

这朗朗的笑声仿佛一股甘露润进我心里，我不紧张了，也随着笑起来。

周副主席又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告诉他他是东北奉天人。

他眉毛扬了扬，高兴他说：“你是奉天人！咱俩是半个老乡呢，我小时候在奉天念过书，在铁岭也念过书。”接着他和我谈起奉天，他对奉天很熟悉，有的地方我都不知道，可他讲得清清楚楚。

听着他亲切的话语，望着他英俊慈祥的面容，我仿佛置身于兄长身旁。

周副主席又问交通班其他几位同志的情况，问他们是什么地方人。

我说：“他们也是从延安来的，松波和杨青山是山东人，大东和田学文是吉林人。”

“你们五个来自三个省，真是‘五湖四海，呢！你们在城市里生活过没有？”

“没有。”

“念过书没有？”

“大部分没念过，即使念过的也没学多少。”

“你们没有在城市中生活过，文化水平又很低，工作中会遇到许多困难的。”周副主席说到这里把话停下，用亲切的目光望着我。我想他可能要作指示，急忙坐好，侧耳聆听。

周副主席继续说：“武汉是国统区，又是大城市，什么人都有，你们要很好学习，学会识别各种各样的人。目前，我们交通工具少，任务重，有许多困难，你们要有计划地组织好，完成运输任务。”

“我们用的司机都是从旧社会中过来的，他们身上有许多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有责任教育他们，要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但是，他们的社会经验比你们丰富，这方面，你们要向他们学习。”

李克农在旁边插话说：“泽民他们几个虽然刚来，但是工作干得不错，踏踏实实，虚心学习。”

周副主席笑了，赞许地点点头，说：“蒋泽民同志，你这个交通班长挑的担子可不轻啊！既要领导好交通班，还要组织好司机完成任务。记住，对司机的工作方法一定要注意，既要团结他们，又要教育他们。”

然后，周副主席对李克农说：“办事处要定期开会研究运输工作，要帮助司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交通班的同

志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带领司机完成任务。”

事后，李克农秘书长告诉我，跟随周副主席来的那个年青人是副官，叫吴志坚。

回去后，我向交通班那几位同志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大家非常激动，信心百倍，表示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不辜负周副主席的期望。

从此，我们交通班在周副主席和办事处的领导下，带领司机们投入到紧张的运输工作之中。

1938年9月，周恩来给西安办事处去电报，要求调两名押运副官到武汉，并让他们跟从延安调来的那批干部同行。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西安办事处派出吴宗汉和王于荣。

他俩随同从延安来的同志一起出发，行到商县时，日军已经包围了武汉，于是他们通过罗炳辉处的电台与武汉办事处联系。

周恩来指示他们，不要来武汉了，直接去长沙。因武汉形势吃紧，办事处准备撤离。

这样，吴宗汉没有到武汉，而是去了长沙，他是在长沙见到周恩来的。

这几位副官工作在周恩来身边，耳闻目睹了周恩来的工作和生活。袁超俊老人回忆说：“周副主席非常繁忙。白天，他接待一个又一个客人，他们当中有我党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有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有民主进步人士，还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国际友人。周副主席还经常外出开会，演讲，广泛宣传，做统战工作。夜晚，他则伏案处理文件，起草电文，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通常到清晨四五点钟才离案休息。他的睡眠仅仅四五个小时。

“无论多么劳累，周副主席一般都在早上八九点钟起床，最晚不超过十点。他起床后有清嗓子的习惯，每当早上从楼上传来他清嗓子的声音，我就知道周副主席起床了，新的一天工作又开始了。

“根据统战工作需要，周副主席还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每周都要到政治部工作二三天。政治部设在武昌，当时从汉口去武昌没有桥，靠船来回摆渡。为安全和方便，周副主席去政治部时，我们的小车司机先把他拉到码头，再把车开到船上，然后摆渡过去。回来亦如此。

“周副主席的生活非常简朴。按规定，长江局的首长每月津贴费5元，副官长4.5元，副官4元，警卫人员和公务员3元。周副主席的伙食基本和我们一样，所谓首长小灶就是两菜一汤。周副主席常常忙得去不了食堂，公务员李玉春就用饭盒把饭菜打回来，送到他的办公室，他一边工作一边吃饭。有时候饭菜放凉了，他也顾不上吃一口，公务员只好先端下去，等他忙完了，再热好端上来。

“在武汉，周副主席经常穿一套藏青色西服，已经很旧了，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职后，又发给他一套黄呢子军装。他就这么两套衣服。去政治部时，他就穿这套军装，回到办事处再脱下，穿那套西服，偶尔来不及也就不换了。他的衬衣也是旧的，而且打着补丁，我有时看见邓大姐或公务员给他补衬衣。尽管外衣是旧的，衬衣打着补丁，但是穿在周副主席身上显得那么整洁合体，那么风度翩翩。”

南京沦陷后，骄横跋扈的日军又占领了徐州，继而兵进武汉，日军的飞机经常在武汉上空侵扰。每当日军飞机来临，武汉全城拉响警报，通知群众

防空。空袭警报一拉响，办事处警卫班的同志就急速组织车辆，把长江局的首长送走，确保他们的安全。

每逢此时，周恩来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朱友学老人回忆了这样一件往事：一天空袭警报又拉响了，我们立即组织长江局首长转移。王明、董老等几位首长已经送走了，可周副主席还在工作，我急忙去催他。

他却反问我：“空袭警报都拉响了，你们怎么还不撤离呢？”

我只好板起面孔说：“周副主席呀，这是我们的任务，你不走我们怎么能撤离呢？”

他又问：“其他同志都走了吗？”

我说：“都走了，就剩下你了。”他这才随我们撤离。

哎！对周副主席我们真没办法，空袭警报拉响后总要催他几遍，他才肯离去。他关心这个，惦记那个，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安危挂在心上。

3 中流砥柱

长江局的书记为王明，周恩来是副书记。王明当时刚从国外回来，宣传他的右倾投降路线。周恩来斗争经验丰富，对工作认真负责，在国内外又享有崇高的威望，各方人士都愿意找他。

周恩来抵达武汉第三天，就和王明、博古、叶剑英等人会见了蒋介石，这是中共代表团第一次和国民党政府谈判。

此时国共关系比较融洽，蒋介石唱的抗战调子也比较高。这次会谈就国共合作形式顺利地达成了协议，决定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由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

末了，蒋介石还满脸堆笑、假惺惺地表示：所谈极好，照此下去，前途定见好转。

然而，在实际操作时，蒋介石则变了面孔，定了的事情也拖着不办。当周恩来把认真写好的共同纲领草案拿出来讨论时，国民党代表却一拖再拖，直至搁浅。国民党根本没有诚意与共产党搞共同纲领。没有共同纲领，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就形同虚设了。

最后，国共两党合作形式只好采取临时协商的办法，主要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同蒋介石商谈。这种形式基本上贯穿于两党合作的始终。

谈判是一个既团结又斗争的过程。善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蒋介石，独裁之心勃勃，一有机会就蠢蠢欲动。

1938年2月初，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蒋介石抛出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动谬论。一时间，《扫荡报》、《武汉日报》、《抗战与文化》等报刊竞相宣传。

周恩来敏锐地观察到，这是融共的舆论，是明目张胆地向我们挑衅，破坏了团结，也破坏了抗战。他立即于2月10日会见了蒋介石和陈立夫，义正辞严地指出这种反动宣传的严重后果。

蒋介石虚假地表示：一、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二、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唯愿融成一体。不打自招，他的融共思想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蒋介石理屈，无奈地表示可以研究。为了推卸责任，他又说，《扫荡报》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意见。

陈立夫急忙捧场，说：蒋总裁已经批评《扫荡报》了，要各报以后不要刊登这类文章。

自此后，这类不得人心的宣传减少了，但是，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企图融共的路线一直存在。

在艰难曲折的谈判中，面对蒋介石的阳奉阴违，阴险奸诈，周恩来大智大勇，机变如神。他善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利用各种矛盾，抓住每个时机，逼蒋抗战，并达成一些有利于我党和人民的协议。

——创建了新四军。

抗战初期，在南方湘、粤、赣、鄂、豫、皖、闽、浙等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活跃着一万多人的红军游击队。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党同国民党政府商谈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也准备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此，1938年

8月11日，周恩来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谈话会时，同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此事进行了商谈。

何应钦表示同意，但是，军长不能由共产党人担任。这是在将周恩来的军，就是说，即使改编，军权也不能握在共产党人手里。

雕虫小计岂能难住周大将军？周恩来推举了叶挺。

叶挺是大革命时期的名将。他和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相识，并成为好朋友，在周恩来的启发下，他拥护共产党，并在黄埔军校组建了一支与共产党靠近的铁甲团，被后人称为铁军。周恩来相信他能担起此任。

周恩来电告党中央，党中央回电赞同。8月下旬，周恩来去上海请叶挺出面改编红军游击队，叶挺欣然应诺。

上海之战时，叶挺向蒋介石提出，要出面改编散在江南的游击队，集合成军，开赴抗日前线。蒋介石表示同意。于是，9月28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21日又宣布，南方各省边界地区的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

党中央得知后，把叶挺和我党在赣粤边区的负责人项英召到延安，进行会晤。党中央经过研究，同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意见，并拟提名项英为副军长，又拟定了新四军高级干部的名单，让叶挺带回交给蒋介石。

11月21日，叶挺从延安来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转交此名单。蒋介石阅后，表示不能照共产党的办法做，并问叶挺：这些名单都是共产党员，你又不是共产党员，能领导他们吗？

叶挺胸有成竹地回答：组织他们开赴前线打日军是当务之急。其它人事问题好解决。

蒋介石不同意。

叶挺气愤之下要辞去军长职务。

大敌当前，蒋介石怎么能失去这样一位良将呢？他不答应叶挺辞职。这样，由于双方意见僵持不下，新四军的编制和干部问题悬而未决。

中共代表团抵达武汉后，叶挺也于12月下旬来到武汉。周恩来和叶挺再次去找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商谈此事，经过努力工作，就编制和干部问题达成协议。决定新四军所辖四个支队，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一、二、三支队，集中到皖南地区；在鄂豫皖边区组建第四支队，开赴安徽；并确定新四军军部设在汉口。

12月25日，叶挺和项英在汉口召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宣布新四军军部成立。至此，我党领导的另一支部队——新四军建成，斗志昂扬地奔赴抗日前线。

——《新华日报》创刊。

党中央很早就想在国统区办报，但是，国民党政府负责宣传的陈立夫坚决不答应。因此当时我党对外只能散发油印宣传品。

统一战线形成时，邵力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温和。因此，9月下旬周恩来找他商谈时，他同意了我党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和博古指派刚出狱不久的潘梓年和章汉夫、钱之光等人筹备创刊《新华日报》。

周恩来到武汉后，在与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时又提出办报之事，蒋介石表示同意。长江局立即进行出版前的准备工作，成立党报委员会，由王明

任主席，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熊瑾玎任经理。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与此同时，理论刊物《群众》也出刊了。这是我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是我党的宣传阵地，有人把它们比喻成两把斩妖除害的利剑。

——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

长江局成立前，江南有的省尚未建立党组织，即使有的省建立了党组织也不健全。长江局成立后首先抓了这些地区的组织建设。

1938年1月，长江局将湖南省特委改为省工委，配备了书记和委员；3月改组了广西省工委；将原归中央直属的四川省工委改由长江局领导。接着，在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先后建立了省级党组织。这样，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南方十个游击区均成立了特委，长江局所辖各地全部建立了党组织。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统战工作。

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后，武汉成了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中外名人志士云集这里。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同志们与他们广交朋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使国民党统治的这个中心城市成为抗战的名城。

周恩来具有远见卓识，又博学多才，谦虚坦诚，深受各方人士的钦佩。因此，无论是国民党当权派还是贫民百姓，无论是国内各派学者还是金发碧眼的洋人，都愿意同他交谈，他那精辟的分析，耐人寻味的话语，启迪着人们的心灵。在团结抗线的旗帜下，人们的心在向一起靠拢。

为了促进国民党军队抗战，周恩来重点抓了上层统战工作。

他亲自拜访了被称为西北军领袖的冯玉祥，同他一起认真分析抗战形势和前途，阐明我党的主张和立场。冯玉祥非常佩服，写下“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的评语。

他把卢沟桥抗战的名将，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与其叙谈，称其道：“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何基沣深受感动和鼓舞。

他还与川军的邓锡侯、云南滇军的龙云以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何潜等人结为朋友。

在上层统战工作中，最显著的成绩还数当时名震中外的台儿庄战役。

1938年3月，日军沿津浦线向徐州进逼，蒋介石派白崇禧到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白崇禧早与周恩来相识，临行前在黄琪翔的建议下，把周恩来和叶剑英秘密邀到家中，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首先详细地分析了徐州战势，接着提出了战术上的意见。最后，他建议，李宗仁必须有统一指挥权，因为徐州战役由中央军和各系军队参加，只有统一指挥才能行动一致，协同作战。

深知蒋介石以牺牲杂牌军保存嫡系的白崇禧，对这个建议很重视，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时基本采纳了这个意见。

随后，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徐州拜见李宗仁，专程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指出，在北面有八路军的战略配合，新四军支队又可以在津浦线以游击战破坏交通，而广西军是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样，完全可以集中兵力在台儿庄一带打个大胜仗。

李宗仁听后连连点头。

台儿庄战斗的胜利，是国民党军队自抗战以来在正面战场上打的第一个

大胜仗，这场胜利是在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下取得的，也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统战工作的成果，是抗战初期一束绽开的统战之花。

在我党统战工作的推动下，许多抗日进步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国统区。从1937年至1938年一年间，抗敌教育研究会、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全国工人抗敌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团体相继成立，“民先”、“青救”、“蚁社”等青年组织也先后诞生。各界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形成滚滚的抗战洪流。

在国内统战工作打开局面的同时，长江局又开展了对外宣传，成立了国际宣传组，王炳南任组长。其间，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

他亲切会见了不远万里到中国参加抗战的由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由阿尔泰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以及前来捐献抗战物资的华侨代表。他热情地接见了外国作家、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贝特朗、爱泼斯坦、鹿地亘夫妇等人。他还看望了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并把他拍摄的《四万万人民》的电影拷贝和一部小型放映机送到延安。除此之外，周恩来还经常保持与苏、美、英驻华大使的联系，以求得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为加强国际宣传和对华侨运动的领导，长江局决定在香港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由廖承志负责，接受并转运华侨及国际友人捐献给我们的抗战物资，使香港成为“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区”。接着，在香港又成立了以宋庆龄为主席、廖承志为副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会。

在波澜壮阔的抗战洪流中，影响较大的是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1938年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经蒋介石和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的再三邀请，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于2月担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蒋介石在邀请周恩来的同时，也邀请了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三厅厅长，给他撑门面。

郭沫若是秘密中共党员，他不愿意卖这狗皮膏药。周恩来劝导他说，不要看轻宣传工作，应把宣传工作重点放到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上，从而抵消国民党反动派颠倒黑白的反动宣传。

在周恩来的启发下，郭沫若顿开茅塞，于1938年3月1日来到武汉，4月1日三厅成立。

三厅成立后招贤纳士，通过周恩来和郭沫若的积极工作，田汉、阳翰笙、胡愈之、洪深、洗星海、冯乃超、董维建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纷纷来到三厅，可谓群贤毕至。三厅被称为“名流内阁”。

经长江局批准，三厅又秘密成立了特别党支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国统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

三厅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举行抗战宣传周。接着，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时又组织了献金活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进入6月，日军兵分五路进攻武汉，国民党战场进行着紧张的保卫武汉战役。为了鼓舞军民斗志，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周恩来和三厅党组织进行研究，决定在抗战一周年之际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根据这一决定，郭沫若拟出了宣传计划，献金活动安排，然后面请蒋介石。

面临武汉之危，蒋介石需要群众支持，更想借这次纪念活动宣传自己，为他这个“抗战领袖”涂脂抹粉，于是，他批准了郭沫若拟定的计划，并破

例地批了 1.5 万元的特别经费。

郭沫若带着蒋介石的圣旨，开始筹备活动。但陈诚和武汉市长吴国桢比较消极，他们过低地估计了群众的觉悟，担心募捐失败下不了台，后经郭沫若做工作，陈诚答应政治部献出 1 万元，吴国桢也答应向武汉三业俱乐部（妓院、戏园、茶酒馆）征募 3 万元。

献金活动从 7 月 6 日开始，连续进行五天。在武汉三镇设了五座固定的献金台，其中汉口三座，武昌和汉阳各一座。每个献金台有一位要人的夫人做台主，吴国桢和黄琪翔的夫人都是台主。此外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放在卡车上。这八座献金台把武汉三镇搞得沸沸腾腾。从早到晚，献金的人川流不息，有的人把几百元乃至上千元的生意本钱拿出来，有的人把仅有的几元钱、几角钱的生活费献上，他们在献金的同时更献出了一腔爱国赤情。

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组成了献金团，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献金。据有关资料记载：党中央献出 1000 元党费；周恩来献出了在政治部的 7 月份薪金 240 元；董必武、邓颖超、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六位参政员，每人献出 7 月份薪金 350 元；毛泽东从延安致电，把他 7 月份参政员的薪金全部献上；李克农和叶剑英代表八路军办事处，献上伙食节余款 1000 元。此外，叶剑英、李克农、钱之光、边章武、章小鹏等人及工作人员、警卫人员，也把一个月的生活费全部献上，最多 5 元，最少 2.5 元。广大群众深受感动。

五天内，共有 55 万多人参加献金，总金额超过 100 万元。在这些献金者中，不仅有党、政、军、工商、文教界的名人，也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茶楼酒馆里的堂信，以及擦皮鞋的苦孩子。这场献金活动，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也把不同阶层的人联合在一起。

如果说西安事变促成了统一战线，那么，统战工作的局面则是从武汉打开的，其伟大的旗手是周恩来。

4 张国焘叛逃

正当长江局组织武汉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战运动时，发生了张国焘叛逃事件。

1938年清明节，右倾机会主义者张国焘，利用祭黄帝之机跑到西安，在国民党特务的安排下又跑到武汉。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把他截住，然后与王明、博古等长江局的领导一起对他多次忠告。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最后叛党。这是当时发生在武汉的一件大事。

张国焘是江西省萍乡县人，是我党一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委员。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又反对“八一”南昌起义。他先是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后又转为退却逃跑。

1935年6月中旬，在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经过艰难跋涉后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2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红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要求统一领导，并责成红军司令部作出计划。

参加会议的张国焘也同意这个决定，可是回到理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后，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7月1日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不同意党中央这个决定。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主张西渡黄河，向川康边境退却，开始走向分裂红军的道路。

以后，党中央分别在沙窝和毛尔盖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创建川陕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主张进行严肃批评。指出，他这是畏惧敌人、丧失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统一指挥，党中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右路军由党中央率领，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党中央又决定，左路军赶到班佑、巴西地区，与右路军会师，共同北上。

张国焘对党中央的多次批评置若罔闻，拒不执行，而且背道而驰，越走越远。他竟于9月9日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让他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封电报幸好落在叶剑英手里，他立即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见后感到情况严重，遂与洛甫、博古商议，一致认为等张国焘北上没有可能了，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于是，毛泽东马上到红三军驻地，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和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

果不出所料，红一、红三军刚刚出发，张国焘就派四方面军一部分人前来追赶，被周恩来率领的后梯队制止住。

9月12日，党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他的错误是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建新苏区的信心。并进一步指出，张国焘有新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

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不仅不听从党中央的警告，继续分裂红军，而且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冒天下之大不韪，

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开始走向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道路，并导致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敌人围攻下损失惨重。

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自立的“中央”，放弃一切反动倾向。并决定，把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对张国焘错误作出的决定，在党内公布，指出张国焘另立“中央”，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在党中央的责令下，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2月宣布撤消所立的“中央”。

1937年4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叛党行为作了系统清算和总结。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党中央尽一切努力帮助张国焘认识自己的错误，想办法挽救他，并给他工作机会，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可是，张国焘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表面上服从，背后又在搞鬼，准备最后叛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达成一项协议，即每年清明节，由国民党政府从西安派代表与延安陕甘宁边区的代表一同致祭黄帝。这也是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的一个象征。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一起来到黄陵县，向黄帝祭祀。

祭祀后，张国焘没有回延安，他让跟随人员先回去，自己带着警卫员钻进国民党准备好的汽车，直驶西安。在西安，他跑到胡宗南部，多次与国民党特务密谈。在胡宗南的安排下，他准备乘火车去武汉。

张国焘于4月7日临上火车前，才电话告诉在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林老进行劝阻，他不但不听，反而造谣污蔑，破坏党内团结。

林老立即电告党中央和长江局。党中央得知后马上给周恩来等人发报，要他们在武汉把张国焘截住。

4月8日清晨，周恩来分别收到党中央和林老发来的电报。他把电报交给王明、博古、凯丰等人看后，立即把李克农、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找来，让他们去火车站，想尽一切办法把张国焘接到办事处，并叮嘱他们，要以礼相待，说这是王明、周恩来等领导派他们前去接张副主席。

李克农、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接受任务后，首先打听准由西安开往武汉的火车，每天只有一次，在晚7时到。他们化好装，准时到火车站，然而一连三天都扑空，没有见到张国焘。

李克农他们每天回来都向周恩来汇报。大家非常着急，进行种种猜测，难道张国焘没有上火车，欺骗了林老？还是中途下了车？亦或他巧装后瞒过了我们的眼睛，已经到了武汉？

最着急的还是周恩来，他深知时间紧迫，国民党特务很快会把张国焘转移走的，那样就不好办了。他一面让李克农他们坚持按时接站，一面派人到胡宗南所属部队在武汉三镇的办事处去找，而且自己亲自出马。

袁超俊老人回忆此事时说：

听说张国焘偷偷跑到西安，又由西安往武汉跑，我们很气愤；又见李克农、童小鹏他们去火车站接，也没有把他接来，我们又很着急。

大概是第二天吧，我见周副主席紧闭双唇，两道眉峰蹙在一起。他与叶剑英参谋长商量，再抽出几位同志，到胡宗南部设在武汉的办事处去找，

一定要把张国焘找到。

随后，周副主席简单安排了一下工作，就带着龙飞虎等人乘车出去，亲自去找。我因有事没能跟随。

天渐渐地黑了，周副主席没有回来，玉兔东升，繁星满天，周副主席还没有回来。我为他的安全担忧。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的心也渐渐地悬了起来。虽说现在是统战时期，但武汉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一旦……

时针指向午夜 12 时，周副主席仍然没有回来，我急得团团转。大约 12 点半，龙飞虎打来电话，告诉我周副主席在武昌。我放下电话，立即驱车前往。

到武昌后，我按照龙飞虎说的地点，先找到周副主席的车，又见到随行人员，得知周副主席安然无恙，我那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待我把周副主席接回汉口办事处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

11 日晚饭后，李克农又带着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来到火车站。从西安开来的列车缓缓地停在了站台上，他们立即分段站好，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每个车厢的门口和窗户。旅客们一个个下了车，当下到一多半时，负责后段的邱南章从最后那节车厢的窗户里发现了张国焘，立即向李克农他们招手示意，随即，他们四人上了车。

坐在车厢里正盘算着躲过这一关下步怎么办的张国焘，忽然见李克农等人进来，吓得魂不附体，脸都变了色。

李克农微笑着走上前，很有礼貌他说：“张主席，您好！长江局的领导派我们前来接您。”说完，用余光扫视一下周围，发现除了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外，还有两个穿便衣的贼眉鼠眼的人，可能是随同的国民党特务。

张国焘见李克农等人面颜悦色，不像来抓他，稳了稳神，又想摆出他那副主席的架子。可是，当他望着站在李克农和童小鹏身旁的全副武装的邱南章、吴志坚时，又有些紧张，一句话也没说，低着头下了车。随后那两个穿便衣的特务也下了车。

李克农请张国焘坐车回办事处休息，张国焘执意不肯。于是李克农决定：让邱南章和吴志坚留下，他和童小鹏回长江局汇报。他望望不远处那两个鬼鬼祟祟的特务，语气双关地对邱南章和吴志坚说：“你们两个留下，负责保卫张副主席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

保卫工作出身的邱南章和吴志坚心领神会。他们陪着张国焘在江汉路找一个小旅店，安排他休息。不一会儿，那两个便衣特务也尾随而至，他俩更加提高警惕。

当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李克农等人来到这个旅店，同张国焘谈话。他们批评张国焘不报告党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劝他回办事处住，一切问题都可以商量解决。然而，张国焘不但不回办事处，作为边区副主席的他，竟污蔑红色边区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他投降国民党的思想明显暴露出来。

周恩来严肃地对他说，你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总该给党中央发个电报吧，承认自己的错误，向中央请示今后的工作。

张国焘被逼无奈，起草了电文，电文曰：“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周恩来接过电文对他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吧。”

临行前，周恩来又嘱咐吴志坚和邱南章，要求他们寸步不离张国焘，要随时用电话报告张国焘的活动情况。

12日，党中央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为表示仁至义尽，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

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遵照党中央的意见，翌日，周恩来亲自把这份电报交给张国焘，并详细介绍了抗战形势、统战工作的情况，又苦口婆心劝他回办事处住。可是，执迷不悟的张国焘对中央的电报、周恩来的劝说置若罔闻，就是不回办事处。

周恩来返回办事处，立即召集长江局会议。大家认为，张国焘已经下决心投靠国民党，挽回的希望不大了，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决定让他自己活动一天，以观动静，明晚再谈。

14日这一天，张国焘在邱南章、吴志坚的“保卫”下，不敢多活动，更不敢和特务联系。

当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再次来到旅店，继续做张国焘的工作，反复劝他回办事处。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善于同敌特作斗争的李克农，见文劝不行就捎带点“武”的，连说带拉，把张国焘推进了汽车。大家一起回到办事处。

张国焘虽住进办事处，但总想找借口出去。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面见蒋介石，向蒋汇报工作。

为了稳住张国焘，16日上午，周恩来陪他到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一见蒋介石，浑身骨头都软了，卑躬屈膝他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啊！”

周恩来非常气愤，立即针锋相对他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张国焘被顶了回去，只好语无伦次他说了几句鸡毛蒜皮的事。蒋介石见状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哼哈几声。

回到办事处后，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了张国焘对蒋介石的奴颜态度。

下午，张国焘又提出要上街修牙，李克农派吴志坚跟随。吴志坚在副官中年龄比较小，特别机灵，是有名的红小鬼。

一心想逃跑的张国焘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立即甩掉吴志坚，他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了。因此，一到街上他根本不去修牙，而是东窜西跑。吴志坚紧随左右。

太阳落山了，暮色茫茫。张国焘突然提出要过江去武昌见朋友。吴志坚劝他先回办事处休息，明天再去。他根本不听，径直向码头走去，吴志坚不好强行阻拦，只得紧紧跟随。

他们来到码头，一艘渡轮正停在岸边，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上船。狡猾的张国焘没有上前，而是躲在人群后面，窥伺时机。

船上渐渐上满了人，轮船鸣笛，就要起航了，张国焘冷不防跳到船上，机智灵活的吴志坚也一跃而起，冲过铁栅门跳到船上，他刚上船，铁栅门就关上了，好险啊！

他们到武昌时天已经全黑了，跑了一下午又饥又渴，尤其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张国焘累得呼呼直喘。吴志坚借机把他拉到一个小旅店休息。

为了防止张国焘跑掉，吴志坚把他安排在房间最里面的床上，自己在门

口“警卫”。他又趁张国焘不备时，把他们住的地址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求服务员给办事处挂电话。

此时，办事处的同志们正在四处寻找张国焘，接到这个电话后，李克农立即派邱南章带着警卫员前去接他们。

邱南章等人到后，劝张国焘回去，张国焘不肯，他们就把张国焘硬拉到码头，过江到了汉口。由于张国焘坚决不回办事处，因此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邱南章让吴志坚回去汇报，自己留下。

周恩来得到吴志坚的汇报后，当晚再次召开长江局领导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张国焘叛党决心已定，为了最后挽救他，决定明天上午与他公开谈判，提出三条意见任他选择。即：第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第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第三，公开声明脱党。

长江局把会议内容电告党中央，党中央回电同意。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来到太平洋饭店，与张国焘谈判，向他提出了这三条意见。张国焘当即表示，不愿回党工作，并胡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糟，暂愿意脱离政治生涯。

周恩来等人离去后，张国焘马上给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打电话，把他约来，表示公开投靠国民党。接着，他又打电话把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找来，研究下步行动。最后，他给周恩来写了封短信：“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晚上，国民党特务机关派车来到太平洋饭店，两个特务强行按住负责“警卫”的邱南章，另一人把张国焘接上车。

翌日清晨，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把张国焘脱党情况电告党中央，建议党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当天，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决定向全党公布。

4月20日，武汉办事处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作了报告，教育大家，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袁超俊老人参加了这个大会，他回忆说：

那天会议非常严肃，所有在家的党员全部参加，大家静静地听周副主席作报告。

周副主席首先介绍了张国焘逃跑的过程，然后宣布党中央的决定。周副主席气愤他说，张国焘这人是非常孤立的，连他的警卫员都不愿意和他一起走，最后我们把他老婆从延安接出来，送到武汉，与他团聚。我们对他仁至义尽了，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最后，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要永远保持坚定的革命立场，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

周副主席报告结束后，大家热烈讨论，一致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并表示革命到底，永远忠于党和人民，这次大会使我们每个党员都受到了深刻的党性教育。

5 武汉沦陷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后，又调集南北两个战场的兵力，虎视眈眈地沿陇海路西进，准备进攻中原和武汉。

这时，国民党战场开始进入保卫武汉的战斗。虽然蒋介石调集了陆海空重兵，又亲任总指挥，但是，由于实行片面抗战和消极防御的方针，国民党军队经过一段抵抗后还是节节败退。

6月5日，日军攻占开封，然后分兵进攻中牟，迂回新郑，准备攻取郑州，将平汉、津浦、陇海三线沟通，造成进攻武汉的有利条件。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日军进攻，竟不顾人民死活，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结果黄河泛滥，淹没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淹死数十万人。

黄河决堤并没有阻挡住日军的进犯，这只发了疯的野兽又继续调豫东军队南下，沿长江西上。6月15日，日军攻占安庆；26日占领马当要塞；7月5日，攻占了控制长江和鄱阳河水路的湖口；25日攻占九江；8月初，日军北面部队又攻占了宿松和黄梅。随后，日军在长江南北兵分五路向武汉三镇进攻。10月25日武汉沦陷。

武汉失守前，国民党绝大部分官员们知道武汉保不住了，忙乱不堪地把家眷、贵重之物运走，富商阔佬们也带着大小太太匆匆忙忙往外逃。人们处于惊恐、慌乱的逃难中。

在这危难之中，周恩来如中流砥柱，带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战斗到最后。

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没有开完党的六中全会就从延安急返武汉，与在家的长江局领导董必武、凯丰、叶剑英等人研究、部署武汉失守前的工作。决定董必武立即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并指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筹建工作；凯丰也去重庆，负责党报工作委员会，做好《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的准备工作；决定武汉的新华日报馆仅留少数精干人员坚持出完最后一张报纸，次日重庆接着出版。同时，周恩来又指示李克农和潘梓年，负责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转移工作。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办事处，把爱国进步人士和进步文艺团体转移到后方，或者送到新四军部队，保证他们安全。

10月上旬，武汉城已嗅到火药味，战火临近，人心惶惶。为坚定人们持久抗战的信心，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周恩来从百忙中挤出时间，亲自力《新华日报》撰写《论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社论。他在社论中写道：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抗战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地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即使武汉保不住，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候，国民党机关已经全部撤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开始进行撤离。

在此之前，根据李克农的安排，交通班的同志在蒋泽民的带领下，组织司机抢运物资，为了加快速度，办事处租用了“新生隆”号江轮。经过昼夜奋战，此时物资已经抢运得差不多了。

10月22日，武汉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危在旦夕，长江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最后一批同志开始撤离。李克农率

领办事处和长江局的同志数十人，潘梓年率领新华日报馆工作人员数十人，一起上了“新生隆”号船，同船而运的还有少部分难民以及印刷机和纸张等物资。周恩来带着副官吴志坚前来送行，叮嘱他们一路上注意安全，多加保重。

然而，这艘江轮航行到嘉鱼县燕子窝时被日军飞机炸沉了，25位同志遇难，幸存人员在李克农和潘梓年带领下，克服许多困难，前往长沙和重庆。

待周恩来与吴志坚乘车从码头回来时，国民党兵已经在办事处所在地大石洋行的楼内放了炸药，准备炸楼了，周恩来等人只好到郭沫若家中去。

兵临城下，武汉失守已迫在眉睫。周恩来仍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善后工作。他在汉口亲自部署了情报站，准备日军占领后收集动态情报，并把原办事处电台的两位同志派去，在情报站建立电台，与重庆办事处保持联络。

在武汉沦陷前几天，周恩来每天都从繁忙中挤出时间，到新华日报馆与坚守的同志一起研究报纸出版问题。

武汉的大小报刊于10月20日左右都停刊了，只有《新华日报》还在坚持，还在战斗，这是武汉人民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报纸。它如黎明前的一颗启明星，向人们昭示光明；它似寒夜中的一团火，给人温暖和力量。

10月24日，周恩来又送走了郭沫若、胡愈之，风尘仆仆地来到《新华日报》办公地，口述了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

当时，坚守的同志有：新华日报馆的章汉夫、朱世纶、林肖硖，办事处的蒋泽民，吴志坚，朱友学、祝华及几名警卫员和两名司机。

蒋泽民老人清晰地回忆了在周恩来领导下，在武汉战斗的最后三天三夜：

10月22日，李克农秘书长离开武汉，他临行前交待我两项任务：一是带领两名警卫员负责周副主席的保卫工作；二是带一台大车去新华日报馆，帮助印报纸。他语气很重他说：“泽民呀，你的任务可不轻啊！形势危急，你一定要保护好周副主席。切记！！”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带着两名警卫员，驾驶着新买的八缸福特汽车去新华日报馆。

我们去时，报馆的绝大部分同志已经撤走了，只留下三位同志，一位执笔写稿，一位排版，一位负责印刷。大的印刷机已由“新生隆”号船运走了。一家私人小印刷厂人员撤走时，将印刷机和房子留给我们，印刷机很小，手摇式的，只能印小报。房子临街，里外两间，里屋放着两个铅字架，一张板铺，外屋放着手摇印刷机。

我、司机和两个警卫员一共四个人，分成两班替换着摇印刷机。10月的武汉，天气还是很热的，摇几下就浑身冒汗，为了保证报纸按时出版，我们一边喝着凉水，一边不停地摇。

印刷厂门口围着一群可爱的报童。报纸印出后，我们立即分发给他们，他们拿着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穿过混乱的逃难人群跑向街头，边跑边喊，“卖报啦，《新华日报》！”人们呼的一下子将报童围住，急不可耐地把钱塞到报童手里，拿过报纸认真地看着，大声地读着。报纸很快就被一抢而光。有的人没有买到，着急地问报童：还有没有？有没有？

第二天中午，烈日炎炎，逃难的人们仍然潮水般地向外涌，只是穿戴华丽的贵妇人少了，大腹便便的绅士少了，汽车的喇叭声稀了。我们仍然摇着

印刷机，太热，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干。

突然门开了，进来的是周副主席！他头发上、身上落了一层土，额角上还滚着几粒汗珠。

“啊！周副主席，周副主席来了！”我们高兴地围了上去。

周副主席微笑着和我们打过招呼，然后走进里屋与报馆的三位同志研究《新华日报》的稿子。

研究完，周副主席来到外屋，他和蔼地问：“你们几个吃饭了没有？”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吃过了。”

“周副主席，您吃了吗？”

“我给您买大饼去。”

他没有回答我们，却问：“你们这两天都吃的什么？”

我说：“从街里买回大饼，就着凉水吃的。”

一个小一点儿的战士插话说：“大饼可香啦！”

“哈哈，不错嘛！”周副主席疼爱地看他一眼，朗声地笑了。

我们相互看看，擦了把汗水也笑了。

周副主席拿起一张刚印完的报纸，倚在墙上认真地看着，从文章的内容到版面的安排，从每行文字到油墨的深浅，都全面地仔细地检查着，最后满意地点点头。他指着报纸对我们说：“质量不错，油墨很均匀。”

重兵压境了，危在旦夕，可是周副主席却稳如泰山。他对工作是那样负责任，连每个文字、每个标点、每块墨迹的深浅都不放过；他时我们又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连吃什么饭都要问一问。这深深地感动着我们，鼓舞着我们，顿觉勇气倍增，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们双手不停地摇着，印刷机的齿轮飞快地转动。

1938年10月24日，是我们撤离武汉前的最后一天。

天气阴沉沉的，我们的心里也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得喘不过气来。大家抓紧时间默默地工作着。

傍晚，一辆小车急驶到门前停下，从车上下来周副主席和副官吴志坚。周副主席进来和我们打个招呼就直奔里屋。吴志坚对我说：“泽民，周副主席让做好准备，今夜撤离。”

根据李克农秘书长的交待，我们来后就开始着手撤离前的准备。我们把该带走的东西一件件捆好，又弄来两桶汽油，以备途中用。待吴志坚离去后，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到车上，并告诉司机做好准备。

黑沉沉的夜晚降临了，没有星光，没有月亮，这黑洞洞的夜空给混乱的武汉城罩上阴暗和恐怖。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并伴有机枪的哒哒声。近处街道上还有少数逃难人惊惶地奔跑着，吵嚷着：“快逃吧，小鬼子进城啦！”

我知道日军已逼近了，可是周副主席还在里屋没有出来。我刚才断断续续地听见他在口授文章，现在讲完了，也该出来了。他必须马上撤走！于是我两步跨到里屋门口，想催他走，然而我又怔住了。

周副主席正在踱着步，轻声说：“抓紧，撤离前把它印出来。”

那位执笔的同志已经放下笔，正在收拾材料。排版的同志正全神贯注地忙着。

我深知此时进去，不仅不能把周副主席劝走，还会影响他的工作。现在时间多紧啊，一分钟要当一个小时过，周副主席肯定不会走的。哎！我无可奈何地回到印刷机旁。

大概半夜时分，负责印刷的同志来到外屋，开始印报。我们迅速摇起印刷机，报纸一张接一张地印出来。

时间不长，军方来了通知，说日军已经打到城郊了，让迅速撤离。

周副主席让我们停下，准备撤走。我们把印出来的报纸收拾好，拿出一部分送给门口的几个报童，其余的放到汽车上，留作途中散发。报纸上醒目的社论标题是——《告别武汉父老兄弟》，这就是刚才周副主席口授的文章。

周副主席轻声问我：“泽民，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上车！”他有力地命令着。

我先让同志们上了车，然后拿起大铁锤把印刷机的齿轮砸碎，随后也上了车。

周副主席在里外屋转了一圈，仔细检查一遍，见印刷机的齿轮已被砸坏，微微点点头，走出房门。他见我们都上了车，用深沉的目光望了望远方，最后上了前面的小车。他回头叮嘱我们，要大车在后面跟好。

炮声隆隆，枪声阵阵，硝烟之味在武汉街道上弥漫着。天黑得像个锅底，要扣下来似的，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一辆车也没有了。在街道尽头，有十几个举着火把的爱国青年，我立即把《新华日报》扔给他们，他们拾起报纸向我们会意地挥挥手。

我们撤离几个小时后，武汉就沦陷了。

6 长沙大火

周恩来他们从汉口撤出后奔往长沙。途中赶上下雨，道路泥泞，而且沿途都是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和逃难的百姓，人多车多，行走困难。他们于 10 月 27 日上午才赶到长沙。

跟随周恩来的朱友学老人讲了途中发生的一件小事。

他说：“我们保卫着周副主席撤离武汉后，行走一段路天就下起了大雨，雨下个没完没了，我们冒雨前进。

汽车驶到一段坑坑洼洼的路面时，雨虽小些，但是路面上全是水，堵了几辆国民党军车。我们的车也被堵在了后面。司机下了车，周副主席和我们也下了车，他看看路面对司机说：“你进去加大油门，我们在后面推，把车推过去”。

按着周副主席指挥，司机进了驾驶室，把油门加大，汽车又突突地吼起来，周副主席和我们一起在后面推。天上的雨水淋湿了他的头发，地上的泥水没过了他的脚面，他全然不顾，奋力地推着。我们在周副主席的带领下，把车一点点地推走，推过这段泥泞坎坷之路。

旁边国民党军车的司机深受感动，相互议论着：“你看人家周副部长，那么大的官，都亲自蹚水推车，可咱们那个官，比芝麻粒大不多少，就坐在车里一动不动，要不就找个地方歇着，让我们在这儿受罪，一个个的，真他妈的会享福。”

末了，一个机灵鬼似的司机冲我苦笑着说：“你算走运了，跟着周副部长这么个好官、大官。”

周恩来来到长沙后住到八路军驻湘办事处。

办事处设在离车站较远的寿星街，在一个狭窄的胡同里，庭院不大，院门朝西，院门不远处就是湘江边。院中有一栋竹制的二层小楼。叶剑英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

周恩来来到办事处后，立即和叶剑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据几位了解情况的老人讲，“周副主席到长沙后忙得很呢，他和叶参谋长都住在二楼，他们屋内的灯光总是彻夜长明。”

日军占领武汉后，又沿着粤汉路进犯，于 11 月 10 日占领岳阳，企图渡过泪罗江侵占长沙。国民党官员们纷纷逃亡桂林和重庆。

11 月 12 日，长沙城人心慌慌，谣言纷纷。为了弄准敌情，周恩来让邱南章给国民党当局打电话，打听洞庭湖战况。国民党当局有关人士在电话中说，日军尚在洞庭湖一带，一切平安。

周恩来放心了，处理完一天的事务后，夜晚又照常灯下批阅文件。然而，就在这天深夜国民党放火烧了长沙城。

大约 11 月 12 日后半夜 1 点多，国民党指使一些暴徒，手持引火的汽油火把满城放火。人们在睡梦中惊醒，被熊熊燃烧的大火吓呆了，凄厉地哭叫着，惊恐地嘶喊着，跌跌撞撞地奔跑着，宁静的夜晚顿时像开了锅的水一般。

办事处的同志被外面的呼喊声惊醒，跳下床往外跑，到屋外一看，到处是浓烟烈火，把天空都映红了。邱南章他们以为敌机来轰炸了，可是没有嗡嗡的飞机声；又以为日军进城了，却没有枪声和炮声。于是他们跑到大门口，只见满街都是惊慌失措的逃难人。邱南章喊住一位中年人，问是怎么回事？

中年人见他稳稳当当地站着，惊奇地免：“军队放火烧城了，你们还不快跑，站在这里等死！”

邱南章立即跑回楼上，急切地报告给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他们收拾完文件下楼后，大火已经烧到办事处，火焰冲进院内，大门被火舌封住，出不去了！他们只好顶着滚滚浓烟从还没有着火的篱笆中冲了出来。待他们走出狭窄的胡同来到街上，回头一望，办事处的小楼已被大火吞没。

周恩来、叶剑英带着邱南章、钱之光和几个警卫员，沿着湘江边的小路步行出城。江边上、沙滩上挤满密密麻麻的逃难人群，为了让这些人走干一点儿的沙滩，周恩来他们一行人紧靠江边艰难而行。

这时候，押运物资的蒋泽民开着空车从湘潭返回。他远远望见周恩来，立即奔过去，把周恩来他们接出城。

蒋泽民老人回忆了这件往事，回忆了12日夜他经历的一切

他说：12日，我们交通班在邱南章的领导下，把长沙办事处剩余物资全部运到湘潭，再由湘潭运过江。我们从晚六时开始抢运，往返两次，回来时已近子夜。

喧闹一天的长沙城安静了，大街小巷空空荡荡，只有几处昏暗的路灯闪着鬼火似的光亮，家家户户都已熄灯安歇，劳累、饥饿、挣扎一天的人们带着痛苦和困惑进入了梦乡，或许从梦中寻找到一块自由乐土。

在这黑沉沉的夜里，只有办事处小楼上还亮着灯光，那是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的房间。我远远望见这亮着灯光的窗户，心弦止不住地一颤，“敬爱的周副主席，您太累了，自从武汉撤出后您就没有睡过一夜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能吃得消吗？”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我们动手装货，装完已快一点了。黄文杰的爱人周慧莲特意为我们几个人炖了一只小鸡，叫我们上去吃。正在吃饭时听见院内有吵嚷之声，我们立即放下饭碗跑了出去，见大门洞已经着火，火苗呼呼窜着。叶参谋长双手叉腰站在院中，正愤怒地大声呵斥着，四五个鬼鬼祟祟的家伙逃出了大门。

我们迅速把火扑灭。

我走到叶参谋长跟前问：“参谋长，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几个歹徒，我下来小便时，看见他们正在放火，遂将她们赶跑了。”叶参谋长说完，望望黑洞洞的夜空叮嘱道：“泽民研，抓紧抢运，路上可要多加小心！”

“是！”我答应着，第三次押运物资去湘潭。

大家都以为是几个坏蛋放火寻事，没太引起注意，各忙各的去了。是的，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国民党当局干的！现在回忆起来真有些后怕，那天夜晚，如果叶参谋长不下来小便呢，放火的歹徒肯定得逞，其后果……

我押车来到湘潭，卸完物资往回返。

东方天边露出了鱼肚白，鱼肚白渐渐散去，一道霞光射了出来。我坐在颠簸的汽车上隐隐约约看到了长沙城的轮廓，轮廓越来越清晰，然而可怕的情景出现了。长沙城被浓烟烈火吞噬着，滚滚的浓烟将长沙城紧紧地包裹着，一团又一团的大火球夹杂着燃烧物在浓烟中飞舞，一些受伤的士兵和老百姓相互挽扶着从大火中逃了出来。燃烧物的僻啪响声，人们的呼救声，哭喊声混杂在一起，一阵阵袭来。

见到这一惨景，我的心立刻悬了起来，办事处烧着没有？周副主席和叶

参谋长撤出来没有？同志们怎么样？

我瞪大眼睛四处寻觅着，忽然看见西处田地里有几个人，其中似乎还有背箱子的，但看不清他们模样。我们的车与他们相距大约二三百米远吧。我让司机沈学贵把车停下，我从车厢下来站到驾驶楼上看，隐隐约约看见前面走的是叶参谋长，后面是周副主席拎着他的公文包，背箱子的像警卫员，旁边似乎还有钱之光和邱南章。我立刻跳下车向他们奔去。

叶参谋长远处看见我，高兴他说：“这回好了，老蒋来了，有车啦！”

周副主席没有吱声，紧绷着脸，两道浓黑的眉毛紧皱着。他一边走一边回头注视着长沙城。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沉痛的，愤懑的，我从没见过他有这种表情，心里也像压了铅沉甸甸的。

我们走到汽车旁，我先打开大厢板，让警卫员把箱子放进去。我一抬头，看见周副主席、叶参谋长、钱之光、邱南章和四个警卫员的脸上、身上布满了灰土和烟尘，有个警卫员的衣服上还有两个人烧的小洞，他们的裤角和鞋都湿漉漉的。他们是怎样从大火中冲出来的啊？这是经过怎样一番搏斗的呢？他们肯定是贴着江边走来的，把道路让给逃难的人，否则鞋和裤子不会湿成这样。我想问，但是时间不允许，必须马上把他们送走。

我立即说：“周副主席、叶参谋长，请你们到驾驶楼里坐吧。”

他们摇摇头，没有说话，也没有进驾驶室，而是上了刚卸完货的脏乎乎的大车厢。钱之光、邱南章和我随即也上去。

这时候，六七个国民党伤兵相互挽扶着哼哼唧唧地来到汽车跟前，什么也不说，硬往车上爬。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我和警卫员把他们往车下推。

周副主席低声对我说：“泽民，不要推了，他们负伤走不动，也够难的了，能坐几个就上几个吧。”

这几个伤兵呻吟着爬上了车。一个年纪较大的伤兵用感激的目光望着周副主席，声音颤抖他说：“长官，谢谢您啦，俺给你磕头。”说着就要跪下去，被周副主席一把挽住了，那伤兵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滚出一串泪水。

为了保证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的安全，我和四个警卫员站在中间，把他们和伤兵隔开。车前是邱南章、钱之光，然后是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后面是我和警卫员，伤兵在最后。

我们驱车来到湘潭渡口，大家下了车。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准备由此过江。岸上站满了等船的人，看样子船暂时来不了，我惦记着交通班，准备回去，于是对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说：“周副主席、叶参谋长，我还得回长沙去，你们多保重！”

叶参谋长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老蒋，我们先走了，你路上可多留神啊！”

周副主席握着我的手，深情地望了望，什么也没说。他手搭凉棚向长沙方向望去，重重地长叹一声。这一声长叹是从他肺腑中发出来的，他是为受难的长沙人民悲叹啊！

周恩来和叶剑英过江后，兵分两路，周恩来去了下摄司，叶剑英到了湘乡，分别坐镇指挥。

周恩来到下摄司后，与李涛等人住在小土地庙里，这就是他的指挥所。13日深夜，担任湘乡办事处处长的袁超俊，心急如焚地赶到这里，看望周恩来。他目睹了当时的情景。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大约是11月13日，就是长沙大火第二天，叶参谋长带着人从长沙撤到湘乡，这时我才知道大火烧了长沙城。我惦着周副主席，跟着运物资的卡车到了长沙。美丽的长沙城已经一片火海，房倒屋塌，到处是死尸，烧得又焦又黑，蜷曲成一团，辨不清是人尸还是动物尸，惨不忍睹。

“周副主席在哪儿呢？”我找不着，急得团团转。后来碰见一位熟人，他告诉我，周副主席在下摄司两河口那儿指挥撤退。我立即赶往。

已过子夜，天黑得像个锅底，要扣下来似的。下摄司冷冷清清，热乎乎的空气夹杂着烧焦东西的怪味，让人闻着恶心。湘江水滚滚流着，发出呜呜咽咽之声，仿佛苍老的妇人哭诉她那被大火夺去生命的儿女，火灾后的土地是这样凄凉悲怆。在这茫茫的黑夜里，只有一个小土地庙里闪着昏昏暗暗的灯光，这是唯一的一点儿光明。

我向小庙奔去，庙门前有几个人，他们竟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我喜出望外，向他们打听，他们说周副主席正在庙内研究工作。

我急忙进入庙内，看见昏暗的油灯前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周副主席，旁边那位是长江局的高级参谋李涛。我急忙奔过去，“周副主席，您没事儿吧？”

“是超俊呀！”周副主席起身握住我的手，轻轻地笑了，说：“你看，这不挺好吗？”

他笑得那么坦然，说得那么轻松，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然而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他身上布满了尘土，裤角上沾满了泥巴。“周副主席，您是怎样从大火中冲出来的啊？”我想问，但见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又把话咽下了。

周副主席让我坐下，关切地询问湘乡情况。

我见他正和李参谋研究事，此时肯定事关重大，为了节省时间，只是扼要地汇报了一下。

周副主席又给我做了指示，我立即返回。

这场大火足足烧了三天三夜，一座美丽的长沙城烧毁三分之二，几乎成了废墟。在这场大火中，有两万多人丧生，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五万多栋民房变成瓦砾堆。

这场大火震惊中外，千千万万个人为之悲愤，这是谁放的火？主谋是谁？

周恩来更是万箭钻心，他的心都快要疼碎了。他一面指挥人们迅速撤离，逃离大火的劫难，一面迅速查明了原因。

那是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在长沙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

11月12日上午9时，在岳阳的日军还没有进攻长沙时，蒋介石就吓得迫不急待地让他的侍从室主任林蔚给张治中打电话，传达他的命令，“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紧接着，蒋介石又发来急电，电文是，“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先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电话、电报后，不敢怠慢，立即召集警备司令部和保安处的头头开会，进行部署，规定：待国民党军队从汨罗撤退后，再下令放火，而且一定要先放空袭警报，让老百姓逃避。这一点是张治中强调的。

然而，这些腐败的官吏们贪生怕死，闻风后纷纷逃命。12日中午，长沙市的许多警察都逃走了，到了晚上，警察局连门都关了，电话线也断了，各方失去了联系。张治中还没有下命令时，这帮家伙连防空警报也不拉，就擅自放了火，正在酣睡的人们毫无准备，长沙城一片火海，一片混乱。

弄清原因后，周恩来的肺都要气炸了。他严厉地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这惨无人道的行径，并与之交涉，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求国民党政府拨款救灾；第二，调集民工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第三，惩办放火凶犯。

11月16日，周恩来在衡阳召开的由八路军办事处干部和第三厅人员参加会议，向大家介绍了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的情况，决定抗敌演出队、抗敌宣传队立即赶回长沙，参加救灾工作。

翌日，周恩来也急速返回长沙，亲自指挥救灾，安抚那些在大火中失去亲人和无家可归的难民。

在指挥救灾中，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及时发表文章，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当局的罪行，要求惩办凶手。2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论坚壁清野》的社论，指出，“这置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顾，将长沙付之一炬的‘火焚’办法，是无人心的残忍与麻木。决不是坚壁清野。”

在我党的积极斗争下，在群众“严惩凶手”的呼声中，蒋介石不得不找了三个替死鬼，把长沙警备司令酆梯、警备三团团团长徐昆、公安局长文重孚枪毙。

7 一步高棋

1938年8月，日军已完成进攻武汉的部署，作为主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了。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审时度势，他与长江局一些领导分析：武汉失守已大势所趋，而且骄横残暴的日军还会继续进犯，向长沙一带进攻。如果武汉失守，长沙也难保住。形势发展需要战略撤退，进而转入抗战的相持阶段。这样，撤退时必须有个落脚之地。

为此，8月中旬，周恩来决定在湘乡建立临时办事处，先把家属、重要文件和物资，以及需要撤离的同志转移过去。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袁超俊。

袁超俊老人回忆了他接受任务时的情景。他说：“8月中旬，我开车到鄂豫皖地区黄安七里坪把董老接回后，周副主席把我叫去。

他简单地问了几句途中情况后，郑重地说：“袁超俊同志，交给你个任务，你带入到湘乡建个临时办事处，先把家属和重要文件转移过去，这也是我们的转运站。”

顿了顿，他语气和缓地说：“日军已逼进武汉，形势吃紧，我们要做撤退的准备，撤退时得有个落脚之地。我已和李克农商量过，具体转移人员，你和李克农研究决定。”

周副主席讲完，深沉地望我几眼又重复道：“这个办事处一定要建好，要立足，这可是我们撤退时的落脚处啊！”说完，他那明亮的大眼睛静静地望着我，从他的目光中，我深感此任务的重要。

袁超俊接受任务后，请示李克农，经过研究，决定30多人转移，他们当中有管理员、报务员、译电员、医护人员和招待所人员，还有几个警卫员。转移的家属，有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被大家称为周老太爷；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人们称她邓老太太；还有王明、李克农等人的家属；其中也有一些孩子。

周恩来和李克农又决定派史维然和陈家康去，给袁超俊当助手，并决定他们带一部电台，随时与长江局联系。

人员确定之后。袁超俊他们积极准备，于8月末启程。临行前，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相送。

袁超俊老人回忆了送别场面，他说：

“临行前，周副主席来了，邓大姐来了，其他几位首长也来了。

周副主席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他说：“超俊啊，家属中多是老人和孩子，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到湘乡后安顿好他们。”

邓大姐指着周老太爷和邓老太太，微笑着对我说：“这两位老人交给你们了，让你们操心啦！”

望着和蔼善良的大姐和敬爱的周副主席，我心里热乎乎的，想说几句告别话，让他们放心，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使劲地点着头，眼睛湿润了。

这时候，王明的老婆孟庆树跑来了，向家属唠唠叨叨，还哭哭啼啼。

卡车开动了，车轮后掀起阵阵尘土。我回首望去，周副主席他们还站在那里。我挥动着胳膊向他们大声说：“首长们，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你们的亲人照顾好！”

袁超俊一行人，从汉口乘火车来到长沙，又改乘小木船过了湘江，到达

湘乡。

袁超俊他们先把家属安置在郊外的茅塘，这里比较偏僻，敌机不易轰炸，比较安全；又把办事处机关设在履嘉瓦房。履嘉瓦房离茅塘不太远，便于及时联系。

湘乡办事处建成后，陈家康和史维然返回武汉，向周恩来汇报。袁超俊主持工作。

武汉办事处的物资一车车运到这里。至武汉沦陷前，办事处的物资除运往重庆之外，大部分运到了湘乡。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是我八路军办事处的物资没有受到损失。俗语道：水不来先叠坝，这个“坝”叠得多及时啊！

武汉沦陷后，周恩来急速赶往长沙，运筹帷幄，没能挤出时间到湘乡办事处看看大家，看看自己的父亲。然而，袁超俊系挂着周恩来的安危，亲自驾车去长沙。在长沙他接受指示。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我听说，周副主席在武汉沦陷前几个小时才出城的，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太危险了！我放心不下，布置完工作就开车去了长沙。

我来到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小竹楼上，轻轻推门一看，周副主席正在看文件，情不自禁地喊：“周副主席！”

“啊！超俊。”周副主席见是我，高兴地让我进去。

我急忙跑过去，敬个礼，说：“周副主席，您好啊！”

周副主席起身握住我的手，笑着说：“这不挺好吗？日军占了我们的武汉，我们还要把它夺回来！”

我握着周副主席的手，浑身充满了力量，心想，一定把武汉夺回来，把日军占领的城市全都夺回来！

我默默地注视着周副主席，他还是那么潇洒，那么英俊，然而仅两月之隔又瘦了，眼白上还有许多血丝，明显睡眠不足，他太操劳啦！

我心疼地说，“周副主席，您可得注意身体啊！注意休息。”

周副主席笑着说：“你看，这身体不挺好吗？”接着他又询问办事处情况，询问每位同志情况。

我一一作了汇报，最后说：“周者太爷和邓老太太很好，您和大姐放心吧。”

周副主席笑了，说：“你们辛苦了，我和小超谢谢你们！”

当我汇报办事处具体工作时，周副主席用略带责备的口吻说：“超俊呀，你管着电台，怎么不多给我们发两份电报呢？以免我们惦着。”

这句话提醒了我，是的，从八月末离开武汉至今快两个月了，我们仅给周副主席他们发过两封电报，主要是节约。然而眼睛也不能光盯在钱上啊，尤其在这战乱之时，首长们多惦记呀！

我憨憨地笑笑，说：“是的，以后多与首长联系。”

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我，“武汉的物资运到了湘乡，长沙的物资也往湘乡运，这些物资来之不易，一定要放好、文件要保存好。你们一定要把湘乡办事处建设好，这是我们此时的落脚处啊！”

袁超俊及时返回湘乡，立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

十几天后，长沙着了大火。这之前，长沙的物资绝大部分转运到了湘乡，长沙大火后，办事处一部分人员也撤退到这里，湘乡办事处成了中心转运站。

长沙大火的第二天，袁超俊赶到下摄司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再下指示，让他立即返回湘乡，把文件、物资转运到衡阳，把家属组织好，也转移到衡阳。要抓紧时间，越快越好！以免日军飞机轰炸，或者国民党当局再度纵火。

袁超俊带着周恩来的指示，急速赶回湘乡，向在这里指挥转移的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果断他说：“照周副主席指示办，立即转移，转运。”

袁超俊马上组织人员行动。他们先把家属组织好，用卡车运走。这些家属比较遵守纪律，说走就走，没有婆婆妈妈的。尤其昆周老太爷和邓老太太，更是身先示范，主动照顾那些年龄大的老人和不懂事的孩子，在家属中起骨干作用。

家属转移到衡阳后，袁超俊他们抢运物资。

武汉和长沙两个办事处的物资大部分集中在湘乡，夸张点说，堆积如山。而湘乡办事处仅有两台卡车、三个司机，在短时间内运走这些物资是不可能的。于是袁超俊作了安排，他让有丰富驾驶经验的沈学贵开一台车，沈师傅不仅技术娴熟，而且责任心强，但大心细，他原是武汉办事处的司机，大家亲热地称他沈胖子；袁留俊自己开一台车。另两位司机分别做他和沈师傅的助手。袁超俊规定，昼夜兼程，车轮一刻也不能停。

他们投入到紧张的抢运中，一车又一车的物资连续不断地运到衡阳。只见车轮转，不见他们眼睛闭一闭，实在困乏了，为了民证行车安全，袁超俊和沈学贵就让助手换一换，自己坐在旁边打个盹儿。饿了，咬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方向盘紧紧地握在他们手中。

他们着急上火，因为日军正往长沙一带进攻，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突然情况发生。尤其是目睹了长沙大火惨状的袁超俊，更是心急如焚，谁能预料，残忍之极的国民党当局会不会再来一把火呢？车上这些物资，有的是爱国侨胞们节衣缩食捐献给祖国的，押运的同志从万里之遥运来的；有的是地下党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买来的，上面或许还沾有这些同志的血迹呢。这些物资来之不易啊！就是拼出命来也要安全运走。

他们就是这样拼搏了三天三夜，把家属和物资全部安全地运到了衡阳。等到运完最后一车货时，车轮都快磨飞了，他们握方向盘的手磨出了血泡，有的血泡磨破，滴着血水。由于那一直紧张的神经松弛了，人也一下子瘫软了，浑身几乎散架了，半天下不了驾驶室。

至此，湘乡办事处完成了历史使命。

由于建立了这个转运站，武汉沦陷前，我们把家属、文件、物资运到这里，解除了后顾之忧；长沙大火之前，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物资也运到这里，免受大火的焚烧；长沙大火后，由于有了这个落脚点，我们办事处的同志及时撤退到这里。

由于先下这一步棋，使我们免受许多损失。尤其是从长沙撤退时多了一条路，两路并行，一条从下摄司沿公路到衡阳，一条则从湘乡到衡阳。

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就要逊色多了。虽然他们撤得早，跑得快，但大部分是盲目的。从长沙撤退仅一路而行，那就是途经下摄司这条路，路窄人多，车翻人亡，损失很大。

袁超俊老人讲：“从下摄司到衡阳这条路本来就不宽，国民党下撤的军队都聚集在这条路上。国民党当官的最惜命，开着车不顾一切地逃，这样，前车堵后车，后车撞前车，常常车翻人亡，有的国民党官兵没有战死在沙场上，却殉难于车轮底下，道路两旁经常可以看到撞翻的国民党的兵车、小车，

也可以看到车轮下面的尸体。”

然而，我们的同志大部分从湘乡那条路安全地转移到衡阳。
湘乡办事处的建立，真是周恩来下的一步高棋啊！

8 西南运输线

1938年是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的一年，也是国民党主战场全面崩溃的一年。这一年，国民党的中心城市随着溃退不断由华东迁向西南，南京—武汉—重庆。这样，作为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中共代表团（长江局）也要随之转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我党为了联络友军，开展统战工作，继南京、西安、武汉办事处后，又在长沙、韶阳、桂林、贵阳、重庆等城市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向西南转移时，长江局以这些办事处为依托，建起西南运输线转运物资，转送人员。

西南运输线，不仅承担着长江局的转运、转送任务，而且还承担着我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秘密购买的军用物资、医疗器械和药品的转运；承担着爱国华侨、港澳同胞捐献给祖国抗战物资的运送。这是运输线上最繁重的任务。

1939年，日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从国内通往海外的运输线，仅有从香港经越南到广西的镇南关，再运到内地这一条，其余的全被日军炸了。因此，这是一条跨过千山万水的运输线，其间，要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要受到国民党各个检查站的百般刁难和盘查，迂回曲折，困难重重，这又是艰难坎坷的运输线。

奋战在西南运输线上的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押运副官和一大批司机。司机当中，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有当地工人，还有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他们齐心协力，在长江局的领导下英勇奋战。

周恩来对运输工作非常重视，经常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部署，亲自检查，亲自指挥。当年的押运副官们回忆起无不感慨万端。

被周恩来从西安办事处调往武汉的押运副官吴宗汉和王子荣，途中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来到长沙。吴宗汉是在长沙见到周恩来的，也是在这里接受一项紧急任务。

周恩来从武汉撤到长沙后，鉴于日军要侵占长沙的势态，组织人员迅速转运物资。其中有一台大的印刷机，需要交给工作能力强认真负责的押运副官，于是他想到了吴宗汉，问办事处的同志，西安的押运副官谁来了？

办事处的同志告诉他，吴宗汉和王子荣来了。

周恩来立即说：“快，把吴宗汉叫来。”

这样，吴宗汉前来接受任务。

吴宗汉老人回忆说：

大约11月9日上午，我刚执行任务回来，听说周副主席叫我去，我可真激动啊！要知道，从西安到长沙，我有根长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了，常常想念他，于是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来到周副主席门前。我顾不上敲门，兴冲冲地推门而入，大声说：“周副主席，您好！”

“啊！是小吴，快进来坐。”周副主席说着起身迎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

坐下后，我用崇敬的目光打量着周副主席，一年多不见他有点儿变了。在西安时他剃着平头，现在头发全长出来了，又黑又密，英俊多了，然而最大的变化是他明显地瘦了，眼睛显得更大了，有点凹进去，还布满了血丝。他这是操劳的啊！是呀，南京失守，武汉沦陷，这一个接一个的危急的人心

呀，他怎么能不瘦呢？我心里难受，鼻子发酸。

周副主席和蔼地望我两眼，说：“你们从西安来到长沙，一路辛苦了，路上情况怎么样？国民党检查站找麻烦没有？”

我答：“谢谢周副主席的关心，路上情况还可以，没碰上什么大麻烦。”

“哦，这就好。”周副主席认真地点点头，又问：“来了几部车？”

“两部，一部尼桑，一部美国道奇。”

“车况怎么样？”

“美国道奇质量好，一般情况不会出毛病；尼桑不行，途中容易抛锚。”

周副主席听完，明亮的大眼睛转了转，果断地命令道：“给你个紧急任务，挑两名技术好的能吃苦的司机，用这辆道奇车把《挺进报》的大印刷机运走。这台印刷机已由武汉运到长沙，现在你们再把它运到湖南沅陵县。敌人进攻长沙，首先要占领常德、益阳，这两地是到沅陵的必经之处，你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

顿了顿，他又说：“印刷机是我们的宣传工具，一定要保护好，到了沅陵交给当地负责人。如果敌人把常德或者益阳占了，你们回不来，把车也交给当地，你们步行到衡阳或者桂林，哪方便去哪儿，找八路军办事处。要多带点几路费，以备途中用。”

周副主席交待得很细。交待完，他又亲自写了一封信交给我，让带好，面交沅陵负责人。

我接受任务后，马上选了段廷英、姚进全两位思想好技术硬的司机，向他们传达了周副主席指示。他俩表示，一定完成任务，既要把印刷机安全送到，又要把车开回来。我们动手把印刷机伪装好，装上车，做好一切准备。

当天深夜我们就出发了，翌日下午三点左右已经跑出三分之二的路程，然而，此时遇到了麻烦。

前面有几个国民党散兵拦车。我命令司机，“不要管他们，冲过去！”

车子刚冲过去，一个国民党兵在后面开枪了。我立即让司机停车。我跳下车，掏出了盒子枪，来到他们面前，大声责问：“你们是哪部分的？谁带队？”

一位副排长站出来介绍了自己身份和部队番号，并说这部分人是他带的。”

我又问他排长呢？他说牺牲了。

按当时规定，押运副官有权处理这样事。于是我理直气壮地让他集合队伍验枪，找出放枪者，他只好执行。

队伍集合后，一个鬼头鬼脑的士兵装模作样他说：“长官，我没放枪，不信你验验我的枪。”

“好吧，就验你的枪。”我顺手把他的枪下了，见他脸有点变色，立即拉开了枪栓，一股火药味冒了出来。我气愤地说：“这枪就是你放的！”

他没有唬住我，软下来了，说自己不小心枪走了火。

这时候，驻在附近的国民党防守部队听见枪声后，一个副连长带着一个排赶来。

我向他讲了刚才发生的事，对他说：“我们押运着抗战物资，任务紧急不能停留，这个放枪的士兵交给你们处理吧！”说完，我们驱车而行。

当天夜晚我们赶到沅陵，翌日早上找到当地负责人，我把周副主席的信和印刷机交给他。此时日军尚未占领常德和益阳，我们谢绝了当地同志们的

招待，抓紧往回赶。

沿途几乎处处都有国民党军队逃跑时翻在路边的车，我猜想，长沙方面可能出事了，也就更加快行车速度。

11月13日我们赶到常德，得知长沙着了大火，回不去了，只好奔向衡阳。我们心急如焚，惦记着周副主席和办事处同志们的安危，大家沉默无语，谁也吃不下一口饭，只是双手紧握方向盘，一刻不停地往前赶。

经过两天两夜急驶，我们赶到了衡阳，刚下车，周副主席的车也到了，他是从下摄司赶来的。

路旁堆了许多物资，都是我们办事处转运过来的。周副主席着急地对旁边两位武汉办事处的同志说：“你们怎么还不快把这些东西搬走呢？来了敌机怎么办？”

一位同志说：“没有人呀，他们都运东西去了。”

周副主席生气地指着我们三个说：“没有人，他们三个是干什么的？”

“他们是西安的。”

“什么武汉的，西安的，还不都是我领导的，快动手搬，别愣着！”周副主席说完，立即哈下腰去搬东西。

我们三个也不声不响地干起来。

大家紧张地忙了一阵，把这些物资搬走了，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周副主席和我们一样，汗流满面。

待大家离去后，我向周副主席汇报运送印刷机的情况。然后有些委曲他说：“周副主席，我们也是刚到的，他们也没让我们干呀，好像我们不听从安排似的。”

周副主席歉意地笑了，温和地说：“小吴呀，这事怪我，我没有调查，批评的不对，向你们道歉，也请你转告那两位司机，我也向他们道歉。”

在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周恩来就是这样扎扎实实地抓运输工作，从物资的转运到存放，都亲自部署，亲自动手去干。若工作中出现矛盾，他首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向同志们，乃至向汽车司机道歉、检讨。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多么令人钦佩啊！我党的三大作风既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又是他们率先垂范认真执行的。

1938年的秋天是战乱之秋。武汉沦陷后的两个多月，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同志们是在转战中度过的，从武汉到长沙、衡阳、桂林……一直到重庆。在这艰难的转战中，周恩来始终把运输工作挂在心上，经常挤出时间亲临物资转运站、物资仓库检查指导。

长沙大火后，为转运物资，交通班在衡阳乡下建个临时露天仓库，由蒋泽民负责。

蒋泽民作了分工，他带着田学文和松波负责把这些物资运往桂林；杨青山带着两个战士负责看守。没有苫布，他们就用稻草把物资盖好苫严。

周恩来去岳阳开会途中，特意来到衡阳乡下，检查这个仅有三人的小仓库。正逢蒋泽民来此装货。

蒋泽民老人眼含热泪讲述了这件事，他说：

周副主席来到我们这个乡下小仓库，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大家激动地围上去，亲热地招呼着：“周副主席好！周副主席来啦！”

“同志们辛苦啦！”周副主席亲切地和我们每一个人握手。当他握住我

的手时疼爱地看了我一眼，问：“泽民，你也来了？”

“嗯，来装货。”

“运走多少了？”

“已经运走一多半了。”

他赞许地点点头，说：“一定要抓紧，把这些物资尽快运走。”说完席地而坐，和我们几个聊了起来。

周副主席眨动着和善的大眼睛，关切地问：“这里挺偏僻，你们怎么解决吃饭问题？”

杨青山答，“我们用小锅做着吃。”

“哈哈，开小灶了，你们都是成手的厨师啦！”周副主席说完笑了。我们也笑了，有个战士竟笑出了眼泪。

周副主席收敛了笑容，亲切的目光从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掠过，认真他说：“物资一定要用稻草盖严，千万不能让敌机发现目标。你们人少很辛苦，更要提高警惕，要防止敌人放火烧物资，也要防止物资发霉或生虫，一定要看管好。”说到这儿他把话停住了，转过脸问我，“泽民，这些你们做到了没有？”

“差不多吧。”我脱口而出。

“差不多不行，一定要提高警惕，既要防止敌人破坏，更要防止敌人空袭。”

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

周副主席话锋一转，又问：“这里群众知道有八路军吗？”

我们回答：“知道。”

周副主席说：“这很好。你们要随时随地做群众工作，借东西要还，买东西要付钱，和群众搞好关系。”

我们将之一一记下。

周副主席从地上站起，带着我们绕着物资堆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检查着，发现有的地方稻草盖的薄，就拿起旁边的稻草又苫一层，一边苫一边说：“敌人飞机狡猾得很，发现一点疑迹就扔炸弹。你们工作一定要过细啊！”

这一言一行深深地教育着我们，周副主席对工作真是一丝不苟啊！我们几个相互看了一眼，一阵红晕从脸上掠过，深深的敬意从心底涌起。

周副主席要去开会了，不能久留，我们恋恋不舍地把他送走。有位战士拉着他的衣襟，眼里噙着泪说：“周副主席，您还能来吗？”

“能来，有时间就来看你们，好好工作。”周副主席说完，和我们大家握手告别。

周恩来离去后，蒋泽民、杨青山他们立即改进工作，把物资盖好苫严，不留任何蛛丝马迹，并严加看守。

七八天后，日军出动四十多架飞机轰炸衡阳，顷刻间房倒屋塌，尚未修完的火车站都给炸平了，郊外水泡子里的十几斤重的大鱼也被炸出了水面。然而，这个露天仓库竟生存下来，完好无损。

待敌机离去后，仓库的同志们哭了。有的同志边哭边说：“这多亏周副主席呀！是他及时指示我们工作过细，严防敌人空袭，我们照他的指示去办，才使这个仓库没有暴露目标啊！”

为了把海外物资运往国内，长江局在广西河池建立一个兵站。这是从海

外往国内运输的第一个转运站。兵站不大，有六七个人，先后有三任站长，第一任是方正；第二任是杨汉章；第三任是朱友学。

1939年冬天，周恩来不顾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亲临河池兵站。此时朱友学刚刚上任，他是1939年10月去的。

朱友学老人回忆了这件事，他说：

1939年秋冬之时，日军向西南进犯的铁蹄踏得更狂了，形势一天比一天吃紧，我们转运站更忙了。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周副主席能千里迢迢地来到兵站。我们每一个人深受感动。

周副主席到兵站后，首先看望大家，亲切地问寒问暖，像大哥哥关心小弟弟似的，嘱咐我们注意防空，注意安全，又疼爱地告诉我们，工作再忙再累也要把饭吃好，注意身体。他的问候和关怀似春风化雨润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大家心里甜滋滋的。

周副主席当夜就宿在我们兵站。晚饭后，我来到他的房间，他热情地让我坐下，然后认真询问站里工作情况，每一个人的思想情况，又问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一一作了汇报，最后讲：“周副主席，说实话，困难能没有吗？但是，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站里的同志个个都能吃苦。”

周副主席满意地笑了。他认真地说：“河池兵站是我们的南大门，从海外运来的物资首先要转运到这里，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抗战，也要先经过这里。这里是我们第一个落脚点，非常重要。来往的人员多，转运的物资多，你们的任务重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把工作做好。”

夜幕悄悄降临了，月亮慢慢爬上了树梢，银色的月光射入屋内，给周副主席和我的谈话又添了几分柔情。谈完工作后，周副主席轻轻地问我，“友学，你老家还有什么人吗？父母身体怎样？有弟弟妹妹吗？”

“我只有一个母亲，没有别的亲人。”

周副主席的问候，使我想起遥远的故乡，想起孤独可怜的妈妈，她老人家可好吗？刹时，念母思乡之情漫过心头，我默默无语。

良久，周副主席轻轻地拍拍我的肩头，柔声他说：“想妈妈了，等革命成功了，把老母亲接来，那时一切都好啦！”

“嗯，周副主席，我一定为这一天的到来奋斗到底！”

月上中天了，为了让周副主席早点儿休息，我起身告辞。这是我最幸福的一个夜晚。

有的人说，爱心是美好的化身，她能使人心里感到温暖，贫穷的人在情感上富有。然而，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的爱，则是力量的源泉。

周恩来的亲切关怀，给运输将士以伟大的力量；他的严格教诲，给他们以无穷的智慧。他们舍生忘死，奋战在西南运输线上。

蒋泽民、朱友学、吴宗汉三位老人，都当过押运副官，曾经战斗在西南运输线上。其中，蒋泽民老人还有“汽车大王”的绰号，这是叶剑英给起的，这里面有个小故事。

那是长沙大火后，蒋泽民带领交通班往衡阳转运物资。一次在返回途中，他远远看见一辆小车停在路旁，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正围着小车转。这个人有些眼熟，于是就走了过去，近前一看竟是叶剑英。

叶剑英焦急地说：“老蒋来了，快看看我这车吧，又趴窝了。”

这时华侨司机阿林从小车底下钻出来，两手黑乎乎的，对蒋泽民说：“毛

病出在刹车上。”

蒋泽民立即检查刹车系统，原来是刹车油管坏了。他和阿林找来胶皮和铁丝，把坏油管绑扎好。然而油管里的油已经漏光了，刹不了车，蒋泽民想起沈学贵师傅用水代替油的办法，于是又和阿林去找水，可是，他们走出很远也没看见一户人家，路旁小沟里也没有水。望着趴在路旁的小车和焦急的叶剑英，他俩急得团团转。

蒋泽民突然急中生智，想出用尿代替水，于是就往刹车油管里撒了一泡尿。果然可行！他让阿林回去后把油管冲洗干净。

小车又突突地发动起来了，叶剑英高兴地夸蒋泽民是“汽车大王”。

1939年，蒋泽民调到延安给毛泽东当保卫参谋。一天他去王家坪给王稼祥送材料，朱德和叶剑英也在那里。叶剑英高兴地说：“老蒋来了，这可是我们的‘汽车大王’啊！”接着他讲了这件事，末了他还幽默地说：“咱们的老蒋可不是蒋介石那个老蒋啊！”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从此，“汽车大王”这个绰号被一些同志传开了，而“老蒋”更被大家叫开了。其实蒋泽民当时才二十几岁。

朱友学、吴宗汉、蒋泽民三位老人很谦虚，不讲自己的成绩，却介绍了不少司机，其中最为感人的是华侨司机。

1939年5月，我党通过各种关系在海外采购回一批物资，爱国华侨又捐献一批，数量很多，有汽油、汽车、广播通讯器材、医疗器材、医药等，都囤积在镇南关。这时，气势汹汹的日军正加紧向南宁进犯，妄图切断我们这最后一条通向海外的运输线。为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物资尽快运回内地。

时间紧，任务重，为此，专门成立了一支特别运输队，由殷承桢、邱南章、龙飞虎带队，吴宗汉、翁士福、何玉海、彭务华、钟隆秋、李泽纯、张兴礼等副官负责押运。

在这支特别运输队里，有二十几位华侨司机，其中还有共产党员。为了抗战，他们告别亲人，跋山涉水回到祖国，在艰苦的运输中不畏艰险。其赤子之心爱国之举感人肺腑。

吴宗汉老人介绍了其中两位司机。

有一位姓陈的华侨司机，是共产党员。他腋下长个大疔子，疼痛难忍。西南的夏季，流火的天气，腋窝处又是汗腺集中的地方，疔子红肿，越长越大。他的胳膊也肿得放不下来，只能平举着。他就是带着这个大疔子用一只手握方向盘，从不叫一声苦。

当第一批物资运到时，大家就不让他干了，让他休息。可是他坚决不肯，不仅要随车队而行，而且还要为车队开路。然而，胳膊肿成这个样子，怎么能开车呢？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就去请求随队而行的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让他给自己做手术。

马海德为难了，没有麻醉药，也没有手术刀，这手术怎么做呢？他耸耸肩，无奈地摇摇头。

老陈流着泪说：“马大夫，您是一个外国人，还不远万里来到我们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我是一个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啊！这点儿小毛病怎么能掉队呢？希望您能理解我，帮助我。”

马海德被他伟大的爱国情操感动了，默默点头应允。他把水果刀消了毒，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给老陈作手术。

不太锋利的水果刀刺破皮肤，扎进肉里，那一剜一割，疼得老陈大汗淋漓，汗水把背心都湿透了，但是他紧咬牙关，一声不哼。手术后，马海德竖起大拇指，夸奖道：“真是一条硬汉啊！”

术后第二天，老陈就吊着一只胳膊开车上路了。

还有一位叫林国清的华侨司机，也是共产党员，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任劳任怨，从不讲一句成绩。

在一次运输途中，车队因处理一些事，耽误了吃饭时间。一位华侨司机不高兴，要开车先走。押运副官们做工作他也听不进去。

林国清把他叫到一边，严肃地批评道：“我们运的这些物资都是侨胞们节衣缩食捐献的，我们来工作是代表他们的心愿，你这样不服从指挥，擅自行动，岂不辜负了父老兄弟们的期望！”

一席话说得这位司机羞愧万分，立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在行车路上，林国清患了急性肾炎，高烧40多度。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隐瞒了病情，照样开车无误，照样有说有笑，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大家。他就是这样坚持着，坚持着！一直把物资运到重庆，完成了任务。

到重庆后他再也支持不住了，被送进医院，然而晚了，他的两个肾全衰竭了，不久病故。

像林国清这样的司机还有许多，他们的热血和汗水洒在运输线上，他们的躯体捐于抗战之中，他们是运输线上的铺路石。

9 贵阳交通站

贵阳交通站是我党在西南地区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关。

1938年12月初，周恩来和叶剑英由衡阳来到桂林。为了转运物资，接待往来人员，联系贵州地下党，周恩来决定在贵阳成立八路军交通站，任命袁超俊为站长。

此时，袁超俊已经带着家属和有关人员从衡阳来到桂林。周恩来找他谈话，交待任务。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12月上旬末，周副主席把我叫到他那儿，李克农秘书长也在。周副主席先和蔼地询问我到桂林后的工作情况，然后交待任务。

他讲：“我们决定在贵阳成立我党公开办事机关，定名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组织决定派你去当站长。

“你是贵阳人，那里有些老关系，你先去贵阳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国民党当局对我们在那里设办事机构持什么态度，回来再具体商定。我走后，你与李克农秘书长商量研究。”

周副主席讲完，把脸转向李克农，说：“克农，这个交通站任务很重，我们要把它建起来，而且要建好。”

袁超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于12月23日带着副官陈远绍、李泽纯来到贵阳，找到达德学校创办人黄齐生老先生。

袁超俊在贵阳念书时，他家和黄齐生家是近邻。黄齐生是达德学校的校长，又是王若飞的姐夫。达德学校是王若飞的母校，也是袁超俊的母校。学生时代的袁超俊常到黄齐生家玩，黄老先生有时给他讲王若飞是怎样刻苦学习的，怎样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又是怎样投身革命的，夸奖王若飞是胸有大志的学生。王若飞成了袁超俊心中崇拜的偶像。参加革命后，袁超俊与王若飞在武汉见了面，偶像成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袁超俊特别高兴，多年的仰慕之情全倾泻出来。

袁超俊对黄老先生很敬重，叙别之后，告诉他八路军要在贵阳建交通站，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黄老先生非常支持，把达德学校的一些进步教师介绍给袁超俊。他们经过研究，决定趁学校放寒假，把靠近独狮街那部分校舍腾出来，交给办事处用。

袁超俊返回桂林，向李克农作了全面汇报。经过进一步研究，正式确定在贵阳设立交通站。1939年1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贵阳交通站宣告成立。

周恩来对交通站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指出，交通站不仅承担转运物资、转送人员任务，还要联系贵州地下党，做好统战工作。他特别强调了防空问题。

博古又把中共贵州省工委关系介绍给袁超俊，以便取得地方党组织的支持。

贵阳交通站虽然宣告成立，但白手起家，一无所有，暂寄住于达德校舍，学校开学后还是要倒出来的。因此，目前当务之急是建立驻地。

袁超俊首先去找省工委，请他们帮忙。然而贵州省工委已于1938年2

月遭到敌人破坏。袁超俊又根据博古提供的线索，总算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上了联系，得到他们支持。

根据周恩来要注意防空的指示，袁超俊他们把交通站的基地设在城边儿的威清门外，远离闹市区，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他把所有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平掉了这里的大垃圾堆，建起停车坪、车库、物资仓库和修理车间，又通过关系租了住在附近的宋先生的房子，作为交通站在郊外的办事处和招待所。威清门外是交通站的重要驻地。

经过一番努力，交通站终于建成，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我党在西南的一个战斗堡垒。

这期间，袁超俊他们首先把那批家属从桂林接来，暂时安置在达德学校。

袁超俊怕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初到贵阳，人地两生，生活上有困难，就把周老先生接到自己家中，让父亲陪伴；把邓颖超的母亲送到地下党员丁毅家，由丁毅母亲相陪。

然而，不足一个月，1939年2月4日清晨，日军派出三十多架飞机轰炸了贵阳，这是桂林、衡阳、贵阳三个城市遭受敌机轰炸的最惨的一次。

2月3日夜晚，贵阳搞全城防空演习，人们很晚才安歇。翌日清晨，当防空警报阵阵拉响时，疲乏的人们还以为是防空演习呢，没有在意，有些人坐起来看看又钻进被窝。当无情的炸弹投下时，街道上房倒屋塌，血肉横飞，高大的房屋变成了瓦砾堆，炸死炸伤的人倒在血泊里，被炸断的电线在空中摇曳着，上面挂着死者滴血的肠子，惨不忍睹。

在这场大轰炸中，刚建立的贵阳交通站怎样？家属们怎样？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又怎样？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2月4日清晨，我正在郊外给母亲上坟，母亲病故刚三天。忽然听见嗡嗡的飞机声，我抬头一看，只见黑压压的飞机向贵阳城飞来。我道情况不好，担心交通站和家属，拔腿就往城内跑，边跑边见一架架飞机由高空往下俯冲，投下一枚枚炸弹，顿时火光冲天，一片爆炸声。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周老先生和家属们怎样啊？

我不顾一切往回跑，首先跑到最近的中山路我家那儿，远远望去，房盖已被炸弹掀掉了，房子起了火。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周老先生他……

我跑到近前一看，几位同志正在救火，父亲傻傻地站在外面。我迫不及待地问：“爸，周老先生呢？周老先生呢？”

“周老先生没事，他被接走了。”听了父亲这句话，我松了一口气，又往在达德学校的交通站跑，交通站免遭敌机轰炸，邓颖超的母亲已被同志们从丁毅家接回，安然无恙。家属们也都平安无事。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我那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只觉得心脏打鼓般的狂跳，两腿发软，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半天缓不过劲儿。

这多亏周副主席指示啊！我们一开始就注意防空，把汽车、物资放在威清门外，才免受损失。

大轰炸后，袁超俊带人立即在郊外青岩找了房子，把家属们接过去，并定期派人看望，送钱送东西，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40年秋又把他们送到重庆。

从武汉撤退开始，这批老幼病弱的家属就跟着袁超俊转移，连转多处，

湘乡、衡阳、桂林、贵阳，重庆，饱受战争之苦。然而，无论转移到哪里，是风餐露宿还是昼夜兼程，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始终严以律己，处处以一个普通群众身分出现，给家属和周围群众留下了很好印象。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周老先生年逾七十，满面红光，胡须花白，有些拔顶，个头儿与周副主席差不多。

周老先生很文明，喜欢和群众交谈，没有一点儿架子。他懂医道，曾经拿出珍藏多年的藏青果和藏香，治好一位老人的哮喘病，藏青果和藏香都是名贵的藏药。周老先生有时也把自己舍不得花的钱拿出来，救济贫苦百姓。

邓颖超的母亲六十左右年纪，身材瘦小，头发乌黑，眉清目秀。她衣着朴素，爱穿中式短衣，颜色基本是蓝色或灰色，非常整洁。她爱干净，看见别人不卫生就善意批评。

邓老太太会中医，经常免费给群众看病。无论是衣服邋遢的庄稼人，还是流着鼻涕的孩子，她都热情相待，认真诊治。当地有个男孩把腿烫伤了，而且感染化脓，全家人一愁莫展，都认为这条腿保不住了。邓老太太得知，亲自上门诊治，把自己调配的中药给他敷上。经过多次治疗，终于使患处去瘀生肌，恢复健康。

周老先生和邓老太太从来不提及自己的儿女，当地群众都不知道他们的身分，甚至连被治愈的病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批家属中有善良可亲又会治病的老大爷、老大妈。

有的人知道他们是八路军家属时，就说：“我们看到他们就看到他们的儿女了，八路军是天底下的好人啊！”

转运物资是交通站的硬任务。贵阳交通站建立时，正是长江局撤消南方局成立之际，周恩来他们已经转移到重庆。这样，从武汉、长沙、衡阳、桂林等地转运来的文件、物资，都要认真清理，然后运往重庆或延安。

时间紧，任务重，交通站的同志在袁超俊的带领下，夜以继日地清仓，归类，一车车运走。

与此同时，我党从外地购买的军需物资，爱国华侨捐献给祖国的抗战物资，也都相继运到贵阳，由交通站转运到重庆，再由重庆运走。

运量大，路途远，司机少。交通站就把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司机留下一部分，参加转运。这些华侨司机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柔佛士乃等地，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交通站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转送往来于新四军、重庆、延安之间的人员。这期间，他们接待、转送过新四军的指挥员，秘密接送过地下党员、进步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干部家属。1940年秋，叶挺带一批人由重庆回新四军总部，途经贵阳交通站。叶挺目睹了交通站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除此之外，交通站还接待了越南共产党的负责人胡志明和一些越南共产党人。胡志明当时化名胡光。他曾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救亡室主任，在桂林办事处就与袁超俊相识。因此，胡志明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时，都到贵阳交通站间歇。袁超俊把他安排在威清门外招待所的小楼上，既安全又清静，便于工作和休息。胡志明甚为满意。

据袁超俊老人回忆，胡志明当时四五十岁，留着长胡须，也穿着八路军灰粗布军装。他实于精神很强，无论旅途多么劳累，下车后洗洗脸就工作，

有时候还亲自动手打印材料。

由于接触多了，相互熟悉，也就相互信任了。胡志明常常把一些事情委托交通站去办，并介绍一些越共人士，请交通站帮助他们解决去昆明、重庆、桂林等地的交通问题，解决汇款、取款问题。

尽管我们处于艰难的抗战时期，交通站随时都有被日军轰炸或被敌人查封的可能，但是，对胡志明他们交办的事情，交通站的同志部想方设法完成。我党是竭尽全力支援越南人民革命的。

交通站是我党在贵州省公开设立的办事机关，许多青年人跑到这里来了解延安，了解共产党。特别是蒋泽民把徐特立从桂林接到贵阳交通站后，许多人慕名而来，看望徐老，提出许多疑难，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抗战能打多久。

交通站根据群众的思想动向，广泛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方式灵活，因地制宜。

交通班的同志在蒋泽民的带领下，在运送物资途中，每到一地就组织群众学习。书少人多，他们就采取一人念书大家抄书的办法，让每一个人都能及时学到这篇文章。

袁超俊还专程到摆郎乡下，向转移到这里的达德学校教职员工作形势报告，讲解《论持久战》。广大教职工专心致志地听，认真领会文章精神。

通过宣传，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要求到延安去，到抗战前线去。通过地下党组织的认真考察，交通站把一些思想进步意志坚定的青年和医务工作者秘密送往延安，给革命队伍增加了新鲜血液。

在贵阳交通站，袁超俊除主持日常工作外，还肩负着联系贵州地下党的重任。这是周恩来和南方局亲自交给他的特殊任务。

由于贵州省工委在 1935 年至 1938 年期间接连遭到敌人破坏，损失很大，待贵阳交通站成立后，南方局就把贵州一些地下党员关系交给袁超俊，由他单线联系，直接领导。这些地下党员都有自己固定的社会职业作掩护，如，当时贵州读新书店的黄洛峰、沈静芷，生活书店的徐雪寒等。

在领导这些秘密党员同时，袁超俊还兼管中国红十字会党支部。这是周恩来亲自交待给他的任务。

中国红十字会党支部是一个秘密党支部，归长江局领导。长沙大火后，中国红十字会撤退到贵州，其党支部与长江局失去了联系。

贵阳交通站一成立，他们就是通过读新书店地下党员沈静芷，到达德学校找袁超俊联系，要求恢复党的关系。与此同时，红十字会的黄豪、孟燕堂也分别找到交通站，讲明自己原是新四军的，并入了党，“皖南事变”突围时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要求恢复。

袁超俊立即写出报告，并附上他们三人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报告，派人急送南方局。

几天后，袁超俊去南方局汇报工作，周恩来把红十字会党支部交给袁超俊领导。

据袁超俊老人回忆，周恩来当时是这样指示的。

“中国红十字会党支部是有战斗力的党支部，从南京到湖南一直归长江局领导，现在由你直接负责联系，任务很重，要领导好。红十字会知识分子多，爱国华侨多，要做好统战工作。

关于黄豪和孟燕堂的组织关系，南方局正在查找，有结果就通知你。”

袁超俊带着周恩来的指示返回贵阳交通站，不久接到博古的通知，“南方局已打电报给新四军，新四军查到了黄豪的组织关系，可以恢复，但不编入红十字会党支部，由你直接领导；孟燕堂的组织关系没有查到，暂不能恢复。”

这样，中国红十字会党支部就由袁超俊秘密领导。

袁超俊老人回忆了这段工作，这是比较有价值的资料，他说：

从我接管这项工作至1941年初离开贵阳，期间，中国红十字会三任党支部书记。第一任书记是毛华强，第二任是郭绍兴，第三任是章宏道（后调南方局，由章文晋接任）。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是林可胜，是爱国华侨的中间人士。他不问党派，既不知道红十字会内部有共产党的组织，也反对国民党插手红十字会。

1939年，国民党想把手伸进红十字会，要在红十字会内成立特别党部，遭到林可胜的反对。国民党见手难往里伸，就设法往外抽人，要抽毛华强等人到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

我得知，立即向南方局请示。南方局答复是：为了巩固职业可以去受训，受训中如果要求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可以参加。这样，党支部书记毛华强就被抽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果不出南方局所料，毛华强去后，国民党当局就让他参加三青团。

毛华强回到贵阳汇报。我根据南方局的指示，表示同意，并让他好好潜伏，巩固自己的职业。此时，毛华强仍担任党支部书记。

然而，国民党当局得寸进尺，还要在红十字会内建立特别党部，吸收毛华强到特别党部。

我得到毛华强的汇报，当即表示不行。为避免国民党当局继续纠缠他，经请示南方局同意把他撤回来，秘密送走。由于毛华强离去，国民党要在红十字会内设特别党部的打算也就成为泡影。

毛华强离任后，由郭绍兴接任党支部书记，1940年下半年郭绍兴调往汉中，由章宏道接任。

红十字会驻在贵阳图云关。为防止特务跟踪，我与党支部联系都是极其秘密的，或者我骑自行车去图云关，按约定地点，与支部同志秘密接头；或者他们单人绕小路到威清门外办事处找我。无论我去还是他们来，都特别注意周围环境，抓紧时间，谈完就走。由于处处小心谨慎，期间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也就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

根据周副主席关于做好统战工作的指示，我着重做了林可胜的工作。

我与林可胜在武汉相识。他由于在国外生活已久，一句汉语也不会讲，与他交谈都得用翻译。

在武汉，他曾几次到办事处找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一般情况，凡是外来客人会见首长，都要经过我们副官处，这样，林可胜同我及叶参谋长的副官吴志坚接触较多。我们这些年青副官给他留下良好印象，他对八路军也有一定感情。这次我们在贵阳相逢，感情自然又加几分。

这时候，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小姐也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我与她也是在武汉办事处相识的。周副主席接待过她。她是一个有正义感性格开朗的女士，三十多岁，梳着短发，穿着西装裙。史沫特莱和林可胜比较熟悉，我就通过史沫特莱帮忙，做林可胜的工作。

经过我们的工作，林可胜不仅反对国民党插手红十字会，而且帮助我们做了一些事。

1939年底，八路军急需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我求助林可胜，林可胜同意从红十字会拨出一部分给我们。然而，这些东西怎样才能躲过国民党检查站的眼睛运到延安呢？于是我又想到红十字会，他们有车队，又是国际组织，国民党的检查站不会搜查和刁难，用他们的车运输比较安全。

我再找林可胜，求他派车帮助把这些东西送到延安。他思考再三，还是答应了，派车把这些药品、医疗器械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虽然没有直接送到延安，但是安全地运到陕北，帮了我们的忙。

在贵阳交通站期间，袁超俊还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与关押在敌人监狱中的同志保持联系，为营救他们做了许多工作。

这些同志有原贵州省工委的黄大陆、王轼、李策、严金牲，还有地下党员张益民、凌毓俊等人。

袁超俊首先通过贵州省地下党指派的丁玉和严金萱（袁超俊的妹妹），与狱中的黄大陆等人取得了联系。他俩是狱中同志的家属，通过探监秘密传递信息，通过他们，保持着地下党组织与狱中同志的联络。

南方局领导对狱中同志非常关心，想办法营救。1939年五六月期间，叶剑英从桂林到重庆，中途来到贵阳。他带着袁超俊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找书记黄宇人进行交涉，要求释放这些同志。

黄宇人摆出伪君子的面孔，佯装不知道。

叶剑英晓之以理进行劝说，他还是假惺惺地说不管这件事。

叶剑英又急又气，训斥了他几句，他则耍起了无赖，问三不知。叶剑英怒发冲冠，气得直拍桌子，怒斥他和国民党当局的专制、残忍。

黄宇人理屈词穷，耷拉着脑袋，无言以对，但就是死活也不放人。叶剑英只好带着袁超俊愤怒地离去。

这次营救没有成功，叶剑英回到重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此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又多次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国民党当局始终不放人。

“皖南事变”后，这些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了。

以上这些，只是贵阳交通站的几个工作侧面，也可谓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小小缩影。

在那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我党分布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关，似一个个岗哨、尖兵，用那明亮的眼睛洞察着敌情，为党中央搜集了一份份及时可靠的情报；是一支支打不垮炸不烂的运输队，秘密接送南来北往的共产党人，艰难地转运着大江南北、海峡两岸的抗战物资；还是一个连个连心锁，把千千万万个炎黄子孙的心连在一起；他们更是伟大的普罗米修斯，把革命烈火、抗日烈火，点燃在黑暗的国统区。

第二部分 南方局的峥嵘岁月

10 红岩小楼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撤消长江局，成立南方局、中原局、华东局，并决定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由周恩来任书记。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由延安辗转转到桂林，在桂林办事处检查部署完工作后，于12月中旬到达重庆。在重庆，他与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凯丰等人，商议了有关成立南方局的事，并报给党中央。

1939年1月5日，中央书记处提议将南方局改名为西南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董必武、高文华十三人组成，书记仍是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中央书记处电报后，与博古、凯丰等人商量，认为还是叫南方局名符其实，而这13名委员不能经常在一地，研究工作不方便，建议由周恩来、博古、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吴克坚六人组成常委会。并把这个意见于1月7日电告中央书记处。

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回电同意。

这样，1939年1月16日，中共南方局正式宣告成立。局址设在重庆。书记是周恩来。下设部门有：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叶剑英，并由周恩来总负责；党报工作委员会，由凯丰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邓颖超负责；青年工作委员会，后调蒋南翔负责；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兼管；组织部，部长是博古，1940年11月以后由孔原接任；宣传部，部长是凯丰；社会部，先由博古兼任部长，后由吴克坚负责；国际问题研究室，由章汉夫负责；华侨工作组，由叶剑英负责；以后又成立了秘书处，童小鹏为秘书长。

中共南方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在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下，是不可能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合法存在并公开活动的，只能像在武汉时那样，以八路军办事处为掩护，为此成立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早在武汉沦陷前，周恩来就派钱之光、周怡去重庆，筹建办事处。他俩以合法身份找了机房街70号的房子，在此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通讯处。1939年1月，通讯处改为办事处，由钱之光任处长，并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备案，这是我军公开设立的办事机关。

南方局成立后，与办事处合署办公，对外只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办事处归南方局领导。

办事处不仅承担着掩护南方局的任务，而且直接和国民党军事当局打交道，交换军事情况，联系军需供给，同时还为我党我军筹集经费，转运人员和物资，任务繁重。

办事处开展工作后，工作人员增多，原机房街70号的房子已不够用了，而且此地处于闹市区，来往办事人员络绎不绝，不利于秘密工作，也不利于防空。为此，周恩来指示钱之光，在近郊另寻地址。

钱之光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怡。

周怡在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的帮助下，找到了爱国进步人士饶国模。

饶国模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妹妹，她的两个儿子都是中共党员。她家住在城外化龙桥红岩村，亦称红岩嘴 13 号。这里有她的一个农场，取名大有。农场坐落在半山坡，周围没有几户人家，有 200 多亩地，种了许多果树。饶国模的丈夫姓刘，曾当过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县长，这个农场是他置办的，以后纳妾离开这里，农场留给前妻。因此，人们称饶国模为刘太太，称农场为刘家农场，或刘家果园。

周怡和钱之光察看了这个农场，认为地势不错，既便于防空又利于我党的秘密工作，遂选择了此地。他俩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决定在这里建办事处。

办事处征得饶国模同意后，把组织建房任务交给了蒋泽民。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我接受任务后，由桂林来到重庆，办事处的廖似光把我送到刘家果园，介绍给刘太太。这是一位善良而又精明的妇人，她热情而有礼貌地接待了我，并领我四处转转，了解周围情况。

果园很大，种了许多果树，几个工人正在树下干活。园内除了刘太太自家住的一栋二层小楼外，还有几栋茅草房，这是雇工们住的。在果园我竟意外地遇见董老的爱人何莲芝，她带着孩子也住在这里。在这陌生之地遇见自己的同志，心里可高兴了，信心又增加了不少，决心把房子盖好。

我从办事处带四名战士来到红岩嘴，暂住在彭大娘家里，进行筹建。果园周围有六七户贫困人家，我们主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得到他们的好感和支持，为在这里建办事处打下了群众基础。

为防空袭，办事处把一些药品和通讯器材由城内运到这里，放到彭大娘家门前，用苫布盖严。在旁边，我们用木箱搭个小棚，作为栖身之处。这样，我们又从彭大娘家搬出，夜间都宿在这儿，轮流值班，看管物资。白天，我跑出去筹建房子，他们负责看守。

盖房子这活，对我来说是门外汉，加之人生地不熟，困难很多，我主要依靠刘太太。她自家盖过房子，有经验，又是当地人，办事方便。因此，从买工具到采购材料，从找工人到组织施工，全是刘太太出面张罗，跑前跑后。

我先把办事处画好的图纸交给刘太太。她看过后领我到山坡上，根据图纸要求确定了实际面积。然后她又找来工人，组织挖地基。

挖地基首先要把果树连根刨掉，再把树底下的石头挖出来，劳动量很大。尤其是刨树根这活，主根挖出，还有不少须根，都得一根根抠出来，特别费劲儿。但是，工人们听说给八路军办事处盖房子没有怨言，干劲十足，几天功夫就把地基挖好。

她基挖好后，由刘太太联系，备料盖房。

建筑材料，有的要到山下去买，大部分则要过嘉陵江去采购。重庆多是山路，刘太太年龄大了，人又发胖，来回都坐滑杆，速度较快。无论上山还是下山，我都跟在后面紧跑，累得气喘吁吁。她坐在颤悠悠的滑竿上，常常回过头大声喊：“慢点，小伙子，慢点……”

如今回想起挺有意思。经过多方努力，砖、瓦、灰、木料等一一备全。

这些材料要从嘉陵江运过来，再雇挑夫挑到红岩山上。虽然刘太太雇了几个挑夫，但江两岸的物资都要人照管。我从早到晚奔忙在码头和红岩村之间，有时很晚才能回来。

这期间，何莲芝和工人黄大爷、李大爷等人给了我许多帮助，里里外外

帮助照管。经过大家努力，很快把材料运回。

1939年2月，我离开重庆去延安时，这栋小楼已盖完一层了。这段时间，刘太太起了重要作用。她对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大家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1939年5月3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办事处所在地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的房子全被炸毁。办事处的同志们撤到了红岩嘴。此时小楼还没建成，一部分同志先住到雇工们的茅屋中和放工具的草房里，一部分安排在饶国模腾出的房子里。同时又在后面江边以几家居民房子为依托，搭了竹棚，作为临时办公室。

为了早日建成小楼，南方局的领导和办事处的同志都抽出时间参加劳动，大家起早贪黑，这年秋天小楼就竣工了。小楼一共三层，办事处设在一楼，南方局设在二楼，机要科设在三楼。为了掩护电台，三楼的窗户开在屋顶上，此楼又称二楼一底。这就是名震中外的红岩小楼。

南方局成立后，曾家岩五十号被租下来，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以及南方局部分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因周恩来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所以，曾家岩五十号对外称周公馆。

武汉沦陷之前，新华日报社的大部分同志撤到了重庆，安排在苍坪街和西三街。武汉沦陷第二天，他们在此出版了第一张报纸，接武汉《新华日报》继续战斗。日军轰炸重庆，苍坪街和西三街的房子也被炸毁，新华日报社迁到虎头岩。

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周公馆、虎头岩新华日报社，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国统区活动的中心，被大家称为“三岩”。这著名的“三岩”如三颗璀璨的珍珠，屹立在雾都，光芒四射。

11 第一次反共逆流

武汉沦陷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已经认识到，它的劲敌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于是改变侵华方针，对国民党由军事进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此时，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住自己在亚洲的殖民利益，便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去拉拢日本，促使日本进攻苏联，妄图把中国变成捷克，实现其远东慕尼黑阴谋。这样，英、美大使多次和蒋介石密谈，劝他与日本讲和。

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下，国民党内部发生破裂，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伪政权。蒋介石集团也开始妥协动摇，反共反人民。

1938年末，国民党政府退却到重庆，并以重庆为陪都。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由来已久的溶共思想变成国民党的反共方针。

12月6日，尚在桂林的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要求并党。他说：中共既然信仰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然后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是否可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立即明确回答：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是抗战的出路，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与国民党的想法、目的不同。国共终究是两个党，要求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

蒋介石碰了钉子，大失所望，但他并不死心。

12月12日，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来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蒋介石会见了他们，又提出并党要求。他恶狠狠他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也不甘心，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他的溶共思想真比花岗岩还顽固。在遭到我党代表反对后，他又厚颜去拉拢，他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严辞拒绝，并指出蒋介石的恶意。

1939年1月20日，就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又提出并党之事，并询问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意见。

周恩来语气坚定地说：此事还未得我中央的电告，但是，要将我党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大党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又历数了几个月来国民党制造的反共事端，要求蒋介石作出解释。

蒋介石避而不答，却让周恩来电告延安，希望中共能在五中全会期间给个答复。

22日，党中央致电周恩来，这份党中央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五中全会的电报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主、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而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可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党。

24、25日，周恩来分别把党中央的电报抄送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五中全会。

在我党坚定的拒绝下，蒋介石并党的美梦彻底破产了，于是，他由融共转向反共。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并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

五中全会是国民党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国民党从片面抗战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枪口不是对准侵略者，而是转向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了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竹沟等一系列惨案。一时，华北、华中上空乌云滚滚。

刚刚成立的南方局，面临的是这股带着血腥味的反共逆流。

周恩来以政治家独具的慧眼洞察着这变幻的风云。逆流刚刚涌动，他就和南方局常委们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并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他在写给中央的《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中指出：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虽然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还是要团结的，但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和行动在发展，这是逆流，是日本、汪精卫之流可以利用的基础，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

面对国民党制造的惨案，周恩来挺身而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与国民党军事当局进行交涉，展开有勇有谋的合法斗争。

1939年6月11日，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桐率领5000多人，袭击了八路军驻冀中深县吕正操部，杀害八路军指战员400多人。吕正操被迫率领部队反击，经过一天奋战，消灭、俘虏了大部分国民党军，张荫桐带着十几个残兵败将仓皇而逃。这就是深县惨案。

周恩来得知后，首先估计到恶人先告状，张荫桐回去后定要颠倒黑白，嫁祸于人，于是，他给朱德、彭德怀发电，让他们把张荫桐进攻冀中的详细情况报告给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等人，说明不得已自卫的原因，说明责任不在我方而在张荫桐。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张荫桐逃回后，马上致电蒋介石，不讲他溃不成军，却胡说冀中八路军制造了这个事件。真是杀了人又喊冤。

张荫桐的诬告给蒋介石反共找到了借口，于是，陈诚代表国民党军事当局致电周恩来，提出抗议。

周恩来立即回电，指出：河北深县、冀县间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据朱德从前方来电称，确由于张荫桐包围在深县刘家庄八路军吕正操部而起，致发生激战。现朱德已致电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会同派员彻查真相以便处理，请电鹿速即派员，并令部属勿再故生是非，致使事态扩大。

这样，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派人调查，结果真相大白，而张荫桐的惨败更丢尽了蒋介石的面子，不久就被免职。

深县惨案的第二天又发生了平江惨案。国民党27集团军杨森部包围了湖南平江嘉义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长、新四军上校涂正坤等10人。

血案发生后，周恩来致电陈诚，提出强烈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事未平南事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人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心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

周恩来在电报中又请陈诚转告蒋介石，要求严令查明此案真相，对死难者务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务请严予惩治，并责令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然而，蒋介石为了掩饰事件真相，拖着不查。于是，周恩来再电陈诚、何应钦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揭露国民党制造平江事件的阴谋，要求严惩肇事者。

为了让广大群众了解事件真相，周恩来又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布平江惨案的经过，重申我党的严正立场，蒋介石反共阴谋也昭然于天下。

深县、平江两地惨案发生后，周恩来担心再突发更大的反共事件，为保护国统区党组织，立即召开了南方局会议。周恩来指出：目前时局急剧转坏，很可能有突然的大的反共事件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好转，但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发生。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转变。

根据他的指示，南方局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保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

为挽救时局，制止反共逆流，维护统一战线，党中央于7月3日、6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个宣言是动员全国人民反对日本诱降和国民党中投降妥协倾向的有力武器。

接着，党中央于8月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了八次发言。他认真总结了两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并从理论上对统一战线问题作了初步总结。他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这三方面的特点是不平衡的。又因为蒋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动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周恩来精辟的论述阐明了统一战线的性质，为我党今后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我党采取一切积极措施维护统一战线，然而，国民党政府还是沿着反动的歧途越走越远。特别是1939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猖狂进攻助长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气焰，“摩擦”很快发展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队侵占了我关中分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并集结重兵要进攻延安；在山西，阎锡山部队突然袭击了我决死队；在太行山区，国民党朱怀冰部队在日军配合下，向太行山进犯，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间，国民党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各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给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回击。在陕甘宁边区，三五九旅由华北调回，协同留守部队打退了胡宗南部队的进攻，驱逐了国民党在绥德分区五县的官吏，使50万人民获得解放。在山西，抗日决死队粉碎了阎锡山部队的围攻，转入到晋西北和太岳区，编入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驻守的八路军部队一举歼灭了朱怀冰部的三个师。我党有力地击退了这股来势凶猛的反共逆流，巩固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党粉碎后，蒋介石反共独裁之心不死，继续蠢蠢欲动，把反共重心由华北移向华中，又由华中移向江南。反共阴风从1940年刮起，一直刮到秋天，随着寒冬到来，江南上空已乌云密布。为此，南方局决定贵阳交通站精减人员。1940年秋，袁超俊先把那批家属送到重庆，接着交通站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转移到重庆或延安。至1940年末，交通站只剩下袁超俊、会计李配之、炊事员鲍启文、保管员张德彪、公务员李玉生和警卫员刘文均，一共六个人。

1941年1月5日深夜，喧闹一天的重庆市安静下来，千家万户窗前的灯光渐渐熄灭了，只有酒楼、舞厅门前还闪着霓虹灯，从里面不时传出靡靡音乐、喝酒划拳声和女人的浪笑声。在远离市区的红岩村，红岩小楼上还有几个窗户亮着灯光，其中一个就是周恩来的房间。

他处理完所有电报、文件，轻轻舒了一口气，喝了几口水，拿起新华日报社送来的清样，忽然想起了什么，把工作人员叫来，让他立即给袁超俊挂电话……

夜，西南贵阳的深夜，比重庆萧条冷清，也比重庆寂静阴暗。在威清门外的八路军交通站，同志们都安歇了，处理完一天工作的袁超俊也准备躺下，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这是谁打来的呢？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我立即起身接电话，电话是从重庆办事处打来的。对方声音急促地说：“胡公要你立即回重庆。”

“胡公”指周副主席，我到他身边工作时就有这个绰号。据兑西安事变前，周副主席留着长胡子，又黑又密，很漂亮，最先叫的是邓大姐，有时亲昵地称胡公，有时开玩笑干脆叫胡子。我们这些副官也跟着叫起来。在国统区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胡公”就成为周副主席的代称，今夜亦如此。

深更半夜，周副主席叫我回重庆有什么大事吗？我不解地问：“去重庆有什么事？”

“你来了就知道啦！”

“好吧，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就动身。”

“不行，马上来！”

从对方简短急促的话语中，我感到周副主席急令我回去肯定有要事，也是急事，不容半点耽搁。

翌日清早，我搭上一个可靠社会关系开的卡车离开了贵阳。为防止途中国民党检查站盘查，临行前带了十八集团军总部的护照，一路还算顺利，于7日到达重庆。

我急急忙忙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副主席就问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周副主席脸色严峻，仅甩给我一句话，“住下来等着吧！”然后匆匆离去，看样子他特别忙。

按照周副主席指示，我住下待命。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又过去了！可是周副主席没有找我谈话，急得我心烦意乱，盼望周副主席翌日能找我。然而第四天又快过去了，周副主席仍旧没有找我。他急令我来，来了又不交待任务，这究竟为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11日晚上，我才知道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

次反共高潮，形势相当严峻。办事处的同志也知道了，大家在周副主席的领导下，紧张地做应急准备。

我惦记着贵阳交通站那几位同志的安危，国民党当局会不会对我们公开办事机关下毒手呢？于是我请示周副主席，要求回贵阳，把同志们撤下来。

周副主席沉吟片刻，眉头皱了皱说：“不行！国民党顽固派什么事都办得出来，你是两次入狱的人，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上肯定有你的名字，如果……”

他摇了摇头说：“你不能回去，先留在办事处，交通站的同志，我们再想办法。”

这样，我留在重庆，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应急准备工作中去。

果不出周副主席所料，国民党顽固派阴险毒辣，“皖南事变”后接连查封了我们在各地的办事处。1月21日，贵州国民党当局查封了贵阳交通站，抓走会计李配之、警卫员刘文钧、炊事员鲍启文、仓库保管员张德彪、公务员李玉生和华侨司机李德富。

23日消息传到重庆办事处，我闻之悲愤交加，这六位同志何时能出狱呢？我们用汗水和鲜血建起的交通站，就这样被国民党顽固派们毁于一旦吗？我心如刀扎。

1941年8月，在周副主席、叶参谋长同国民党贵州当局交涉下，我们这六位同志才被释放。

回忆到此，袁超俊老人热泪盈眶，他哽咽着说：“现在细细想来，当年周副主席急调我回重庆，是事先保护我啊！他洞察恶化的形势，要撤退交通站已经不可能了，故先把我这个站长调回重庆。我是两次进过国民党大牢的人，一旦被捕难以释放，而其他那几位同志大部分是群众，即使捕去也好营救。这样，我又一次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周副主席第二次救我啊！”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查封了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关，而且秘密杀害了彼押在狱中的大批共产党员。1月下旬，贵州国民党当局指使狱吏，在地下室秘密杀害了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黄大陆、李策、王拭、严金牲等几位共产党员。其中，严金牲是袁超俊的五弟，牺牲时才17岁。

南方局从地下党的情报中得知后，周恩来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袁超俊。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1月25日清晨，周副主席把我叫到曾家岩五十号他的办公室，亲切地让我坐下，和蔼地问我几句近日情况，然后声音有些哽咽地说：“超俊，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内部情报得知，被关押在国民党贵阳监狱的黄大陆、李策、王拭等同志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了，其中还有你的弟弟严金牲，这是一位不屈服敌人的小同志。”

“啊？金牲被杀害啦？”我重复一句，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水夺眶而出。透过泪水，我仿佛又看到聪明可爱又有些天真的小弟，他是那样活泼，那样讨人喜欢，自参加革命后又又是那样无畏无惧，踏踏实实，我常常为有这样的小弟而自豪。然而，他15岁那年就被国民党抓去，投进了大牢。这两年，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想方设法营救他们，我几乎天天都在盼望，盼望有那么一天，小弟从狱中走出，我们兄弟相见……

然而，这一天没有了，小弟永远也回不来了！他被敌人那黑洞洞的枪口

夺去了生命。要知道，他才 17 岁呀，还是个孩子啊！

周副主席见我默默无语只是流泪，掏出手帕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柔声说：“超俊同志，不要太过难过，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金牲他们是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他们是党的好同志！我们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说完，他的眼睛也有些湿润了。

停了片刻，他略微提高了声音说：“国民党当局杀害我们的同志，查封我们的办事处，我们一定要击退他们的反共逆流。黑暗是暂时的，光明就在前头！”说完，他转向窗外，眺望远方。

我也向窗外望去，在那重重叠叠的山峰中间，一轮红日正冲过云雾冉冉升起，红日周围是火红的朝霞。我长吁一口气，望着周副主席那坚定刚毅的目光点点头。

周副主席轻轻拍了我一下肩头，说：“南方局研究了，决定你留在重庆办事处工作，就在我身边做秘书吧。”

从此，我在周副主席身边开始新的战斗。

1940年是德国法西斯势力最猖狂的一年，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非常嚣张之时。

这年秋天，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国条约，结为轴心，规定在争霸世界的战争中相互支援。这样，日本为了早日腾出手来配合德、意在欧洲的攻势，南取南洋，北攻苏联，也想急于结束中日战争。因此，它在向解放区猖狂进攻时，一边对国民党实行军事压力，一边又对蒋介石加紧诱降。而急于想把日本拉入欧洲战场的德国，也帮助日本劝蒋介石投降。

此时，面临日军南进威胁的美国和英国已结为盟国，为了保存自己，他们想利用中国这个大战场拖住日本，于是拉拢蒋介石，扶植国民党政府。

在这两大法西斯集团的拉拢下，一心想当独裁大总统的蒋介石踌躇满志，消灭异己之心更加膨胀，加紧反共部署。国民党内部的顽固分子也更加动摇，竟提出投降法西斯，他们和亲日派遥相呼应，反对共产党，镇压抗日运动。于是乎，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高潮”之前的逆流在华中。蒋介石的反共计划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然而在苏北战场上他失败了，“黄桥”一战，他的两个师被我军歼灭。据有关资料记载，蒋介石捏住鼻子气得半天没有说话，他是要复仇的。苏北之战结束后，他就派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

蒋介石把反共重心由华中移向江南。

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发出“皓电”，致朱德、彭德怀和叶挺，捏造种种罪名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并用最后通牒形式，限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这个“皓电”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皓电”发出后，蒋介石又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布置包围皖南的新四军，蒋介石已杀机毕露了。

与此同时，国民党指使宣传部门制造反共舆论，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并在各地捕杀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一时反共阴风四起。

在这风紧云沉时，延安和重庆电报频传，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断交换着对形势分析、判断的意见，及时作出指示。

10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叶剑英，指出，“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存自己，软所以给他面子，硬所以给他恐怖。”

实践证明，这个方针非常正确，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根据这个方针，11月9日，党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对国民党发出的“皓电”作公开答复。“皓电”一方面驳斥“皓电”中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申明长江以北的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将江南的正规部队移至江北。

面对这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党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紧急指示，号召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命令皖南的新四军迅速向江北转移。然而，项英不愿意离开云岭，坚持新四军留在江南。为此，党中央再次强调，皖南新四军若再不转移，就有被吃掉的危险。可是，项英对蒋介石的进攻毫无警惕，继续拖着不走。最后在党中央的催促下，他才考

虑部队转移问题。

此时，新四军北移路线有三条：第一条由驻地云岭往北，从铜陵、繁昌之间直接北渡长江；第二条是由驻地往北再往东，经宣城、郎溪、溧阳转苏南，然后北渡长江；第三条是由驻地往南，经过泾县茂林、族德、宁国、广德到苏南，再渡江北上。

这三条路线，前两条都经过新四军活动区，情况熟，路程近，便于渡江。第三条则通过国民党部队防区。在蒋介石阴谋要消灭江南新四军情况下，走第三条路线极为不利。为此，党中央一再指示项英，选择第一条路线或者第二条路线渡江，并指示江北游击队和苏南部队，积极接应皖南新四军北移。这样，项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做了走前两条路线的准备。

善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蒋介石一面假惺惺地表示，要国民党军队“沿途放行，掩护过江”；一面又于12月30日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要对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并命令江北安徽的李品仙三个师开到江北的卢江、无为一带，控制江岸各渡口。更为阴险的是，国民党电台故意广播新四军北移的消息，向日军告密。这样，日军马上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

此时从表面看，走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都要北上，通过沦陷区，过长江时肯定要遭到日军堵截，困难大；走第三条路线则南下，通过国民党“友军”的防区，似乎比较安全。因此，项英出于对日军的恐惧和对国民党的麻痹，改变了主张，决定走第三条路线。然而他尚不知，这里早已布下埋伏，一场血战即在眼前。

党中央为了尽快使皖南部队转移，摆脱国民党部队围歼的险恶环境，最后也只得同意了项英的意见。

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多人由驻地向南转移。

1月6日，他们行到泾县茂林山区时，突然遭到泾县国民党军队阻击。接着，顾祝同从浙江、江西上饶和景德镇等地调来七个师约七万人的兵力，围攻新四军。新四军被迫迎战，遂发生了激烈战斗。

在叶挺带领下，新四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与顽军血战七昼夜，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后卫队的六七百人在傅秋涛的率领下，向北转移，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防线，以后又收容了后出发的一部分同志，共千余人，在荻港一带渡江脱险。

叶挺军长为挽救全军，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与顾祝同谈判，当下就被扣留。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部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党中央从延安给南方局发来急电，告之新四军在皖南被国民党重兵包围，情况紧急。

周恩来接到电报，心如油煎，立即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张冲急报蒋介石，速令包围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马上撤围，让路。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分别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德、顾祝同、刘为章等人直接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果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和袭击，国共关系破裂，将由国民党负全部责任！”

张冲、刘为章分别向周恩来和叶剑英转告蒋介石的答复，蒋介石虚假地表示，国民党军队在茂林方面已不继续进攻，他已让贺耀组下了命令，新四军北进绝不留难，望继续北上。

这纯粹是一派胡言，是虚假的欺骗！实际上国民党军队还在继续围攻，

而且更为凶残，我新四军将士还在流血，还在艰难地向外突围。

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当晚，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的领导和办事处人员都到虎头岩报社，参加庆祝活动。刚到重庆的袁超俊也去了。

正当周恩来在庆祝大会上讲话时，突然机要科的同志从红岩办事处气喘吁吁跑来，送一份从延安发来的十万火急的电报。

周恩来接过电报，脸色刷的变了，双眉紧皱，拿电报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他的表情震动了会场的人，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他的脸上，集中在他手拿的电报上。

当即周恩来站在讲台上宣布了“皖南事变”的爆发：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多人奉命北上，在进入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已经六天了，突不出去，叶挺将军出面谈判，竟被国民党军队扣留。

接着，周恩来愤怒地斥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

会场鸦雀无声。大家从近期来的紧张局势，已经看出急变的风云，听到周恩来宣布“皖南事变”的消息后，更加震惊、愤慨。而就在这时电灯熄灭了，人们不免有些紧张，下意识地握紧拳头，准备应付突然袭击。

周恩来依旧稳重地站在那里，他那宏亮的声音在会场中回荡，在人们心中回荡，“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能到来！”

一会儿电灯亮了，周恩来继续讲：“有革命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必然被冲破的。”

最后，周恩来坚定他说：“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所吓倒，要坚决反对他们的进攻，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上，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同志，翌日就把他的发言发表出去，把国民党派重兵包围新四军的消息透露出去。

第二天，即1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上述讲话。

会后，周恩来赶回红岩办事处，连夜主持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广泛深入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和社会各方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罪行。

散会后已夜阑人静，斗转星移，周恩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又伏案给蒋介石写亲笔信，要求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立即撤围，给北上新四军让出通路。他在信中最后写道：“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出去，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

13日，周恩来面告刘为章，请蒋介石、何应钦电令顾祝同撤围，让出去苏南的道路，否则被围部队势将被迫分散。

叶剑英和钱之光也分别打电话给顾祝同，要求他停止这场血腥暴行。

“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黑云压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人们忧心如焚，时刻注视着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新四军。红岩小楼处于异常紧张的繁忙中，办事处的同志夜以继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机要科的同志更是时刻不能松懈，因为每个电波送来的信息可能来自战场，来自延安，带来意想不到的情况，或者党中央的紧急指示。

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他们，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奋力抵抗这股逆流。周恩来已经三天三夜头没挨枕了，他既要出面和国民党当局交涉、抗议，制止国民党军队继续围攻新四军，又带领大家做一切应急准备。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又以一个军事家的才能，从容指挥，力挽狂澜。

人们在焦急地关注着，在紧张地战斗着，日历一张接一张地带着历史的血腥沉重地翻过，翻到了1月17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10天了。

17日这一天，是让人恨入骨髓痛断肝肠的日子。干了这桩血腥罪行的蒋介石竟颠倒是非，反咬一口，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悍然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还要将叶挺军长交军事法庭审判，并决定在18日公布。至此，蒋介石集团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

周恩来得到情报，立即打电话给何应钦，怒斥道：“你们如此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说完，他愤怒地摔下电话，随即带着警卫员驱车去国民党代表张冲住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

形势越来越严峻，蒋介石大有把共产党斩尽杀绝的势头，国共两党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红岩小楼处于惊涛骇浪之中。

17日晚，在红岩办事处二楼走廊里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干部大会，周恩来作了重要指示。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九点多，周副主席在警卫员彭海贵的保卫下，由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那里来到会场。他站在走廊中间，沉痛地向大家讲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分析了目前局势，指明目前斗争的方向。

他深刻地分析道：“国民党又向我们动手了，局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由于亲日派的反动，国共合作可能完全破裂；第二种可能是，我们还有几万新四军，几十万八路军，我们还有力量，蒋介石要完全破裂投降日寇，他还要考虑。而且英美派的资产阶级和亲日派的资产阶级还有矛盾，英美派们不会同意。这样，国民党有可能不敢全面破裂。经过我们的斗争，可能两党还继续维持合作的局面。我们要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但是，蒋介石是个流氓，也可能全面破裂，就是不全面破裂，我们也应做最坏的打算，要准备应付反动派的袭击！”

周副主席顿了顿，略微提高了声音说：“反动派袭击我们，并不在于我们这几个人，主要是搞我党的机密、密码、文件、地下党员的名单等。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不是直接用松杆子同国民党打，而是要我们在国民党的心脏里起哨兵、尖兵作用，了解敌情，宣传和组织群众。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保守党的秘密。如果反动派突然袭击，我们就进行适当的抵抗，争取时间将机密文件销毁，然后就准备去坐牢。”

讲到此，周副主席用深沉的目光环视大家，语句放缓，语气坚定地说：“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我要出面交涉，我是蒋介石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介石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国民党把我们全抓起来，我们就一起坐牢。他们要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男同志要承认是共产党，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党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党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如果再问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若再要问，就说不知道，我们让他们去问书记周恩来。”

“我们在牢里，只要坚持斗争，不泄露党的机密，保重身体，国民党也可能不杀我们，因为我们大家还有几十万军队。

“我们要争取最好的结果，但也要做最坏的打算，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也要准备在可能情况下突围出去，上山打游击。”

接着，周副主席满怀深情地讲述了陈铁军和周文雍烈士的故事，念了叶剑英为纪念方志敏烈士写的诗。号召大家向这些革命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最后，周副主席指出，现在我们工作更困难了，我们当共产党员的就要不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就要坚持工作。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要疏散一些同志，应留的要坚决留下，应走的坚决走。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努力工作，疏散出去的，无论到哪里都要服从组织安排。

周副主席的报告长达两个多小时，这既是特殊情况下的形势任务报告，又是一堂生动深刻的党性教育。大家听后热血沸腾，纷纷站起来表态，坚决要求留下，跟周副主席战斗到最后，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讨伐，首先是舆论反击，把“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出去，以昭天下。

17日晚的大会结束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新华日报社，明日报纸绝不能刊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动“通令”和发言人谈话，要坚持正常出版，要争取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的报导及社论。

报社同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迅速行动。

18日凌晨，报社同志前来向周恩来报告，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全被国民党新闻检查署扣压了，禁止刊登。即使这样，他们还不放心，又派人坐在报社监视，等着看第二天的报纸。

周恩来听完，沉吟片刻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检扣的两处先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先送去检查。我要另写东西，放在这两处，不要送检，而且要大量印发。”

接着，周恩来对报社工作作了指示，鉴于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封锁，我们要在快字上作文章，题写要快，送稿要快，制版要快，印刷要快，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躲过检查官的耳目，要把“皖南事变”真相昭告国人，公布于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

安排完这些事，周恩来挥笔为《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并赋诗一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他把对殉难的新四军壮士的哀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感全部凝于这二十五个字中。

然后，他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周恩来”三个字，落笔时间为1月17日夜。

周恩来写完掷笔，交给秘书童小鹏，让他派人急送报社，交给章汉夫。题词和诗要明天见报。

童小鹏立即叫起副官岳仁和，把装有题词和诗的信交给他，让他速送虎头岩报社。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岳仁和将信揣好，抄近路，从办事处对面山上招待所那条小道经庞家

岩到报社，面交章汉夫。章汉夫接过后马上交给技术最好的刻版师傅，照手迹刻好。然后又按照周副主席指示，将诗和题词的刻版排在被扣稿件的空白处。打纸版和浇版工人争分夺秒，所浇铅版尚未冷却还烫手时，他们就伸手取出，上机开印。

“与此同时，报社同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快字上做文章。他们先在扣检处补上别的消息，拿去送检，以此蒙住国民党检查人员的眼睛。然后，一面抓紧印刷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一面组织力量发行。”

翌日清晨，在重庆各大小报刊尚未上市发行之时，我们的《新华日报》就发在报童手中。这些机灵的孩子穿过浓雾，在大街小巷里清脆地喊着：“卖报啦，《新华日报》！最新消息，快看啊，周恩来为新四军死难者题词！”

人们纷纷涌来，抢购《新华日报》。

国民党当局发现时，这张刊有周恩来题词和诗的报纸已经传遍重庆山城，嘉陵江两岸。这期《新华日报》销量猛增，从平时一千多份增加到五千多份，而且一上午就卖完，最后每份报纸涨到五角钱还难买到。

1月18日的《新华日报》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特别是周恩来那二十五个字的诗，字字千斤。它如明灯照亮了人们的眼睛，人们从“皖南事变”的真相看清了蒋介石反共投降的嘴脸；也似烈火点燃人们心中的愤懑。山城群众起来了，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责问，谴责他们这种残杀异己的罪行。

在群众的谴责下，国民党政府虽然气急败坏，但又奈何不得，因为民心不是靠法西斯手段能改变的。据有关资料记载，蒋介石得知后拍案而起，大骂手下无能。

1月18日以后，重庆国民党当局更加紧新闻封锁。国民党中央特种会议对《新华日报》作出“只准印，不准卖”的无理规定。新华日报社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仅2月4日至16日这13天中，被国民党军、警、宪、特拘捕殴打的报童就有35人次，被无理没收的报纸达几千份。

2月6日，曾家岩的宪兵连在两路口处扣留一板车当天的《新华日报》，竟诬称是汉奸报纸，并拘捕了拉车工人，还要把报纸运到连部，企图焚毁。

周恩来得知非常气愤，向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然后亲自到国民党宪兵局进行交涉。春寒料峭，冷风嗖嗖，周恩来站在寒风中与他们斗争长达两个多小时。

张冲良心受谴，前来劝说，让周恩来先回去休息，别在寒风中冻坏了。

周恩来执意不肯，继续和他们斗争。

最后，宪兵连不得不将所扣留的报纸送还，把拘捕的工人释放。周恩来当着张冲的面，理直气壮地把一部分报纸分发给周围的群众，把其余的报纸送给报社工人。报社工人把报纸分给报童。报童群情激昂，山城里又响起他们那清脆的卖报声：《新华日报》，最新最真实的消息！……

关于在“皖南事变”中周恩来亲自上街卖报之说，大概就是指2月6日这件事。

据老同志们回忆，原定是周恩来要带领大家上街卖报的，后来斗争胜利了，就取消了这个计划。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2月6日那天早上，周副主席得知报纸被扣，送报人被抓，非常气愤，准备带领办事处和报社的一部分同志上街卖报。这样，我和一些同志被叫到曾家岩，准备发给每人一些报纸上街去卖。后来周副主席亲自出面斗争，报

纸被送回，人也被释放了，他回到曾家岩就取消了这个计划。

在“皖南事变”的惊涛骇浪中，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周恩来巍然屹立，以稳托泰山之手挽住了这股反共狂澜，使惊涛骇浪中的“红岩小船”稳住了舵。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这只是刚刚开始。

蒋介石集团制造了“皖南事变”，又举起滴血的屠刀砍向我党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关。

1941年1月21日，国民党贵阳警备司令部派宪兵包围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捕去工作人员，没收枪支弹药，又查封了交通站。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又查封了桂林办事处和韶关办事处。1月23日，国民党西安当局非法搜查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仓库、兵站和汽车队，捕走人员，收缴武器。我党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关绝大部分被搜捕、查封。

在这反共逆流里，国民党反动派更把重庆“三岩”当成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拔掉不可。据地下党可靠情报，在何白“皓电”发出后，蒋介石就密令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周恩来和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

“皖南事变”的大屠杀还没有开始，蒋介石就先“关照”起周恩来和叶剑英。魔爪，一只只阴毒的魔爪伸向南方局，伸向八路军办事处，伸向新华日报社。“三岩”处于腥风血雨中。

面对这腥风血雨，周恩来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运筹于红岩小楼，带领大家冲破这暂时的黑暗。

1月17日夜晩，重庆办事处全体干部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在他房间召集南方局领导紧急会议，分析目前局势，研究应变对策，做出三点决定。第一，紧缩机构，疏散人员，建立应付突然事变的秘密交通线，这项工作由周恩来负责；第二，准备在国民党搞全面破裂时，争取在最坏条件下，把南方局、办事处和报社的同志突围出去，转移到川陕边境，上山打游击，创建根据地，为此，在重庆附近山区建立武装。这项工作由董必武和叶剑英负责；第三，成立保密工作委员会，制定一套应付突然袭击的制度和措施，并制定一套保证外出同志安全的纪律。这项工作由周恩来领导，具体交给童小鹏、袁超俊和龙潜承办。

紧急会议后，周恩来立即把童小鹏、袁超俊、龙潜找去，交待任务。据袁超俊老人回忆，此时已经凌晨一点半多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清晨，童小鹏、袁超俊、龙潜召集人员，成立保密工作委员会。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这是六人会议，除了我和童小鹏、龙潜外，另外三位同志分别是办事处、周公馆和报社派来的代表，我们组成保密工作委员会。

我们用两天时间制定了保密工作条例，比较详细，有对内部文件保管使用的规定，有工作人员外出行动的纪律，还有工作人员在外应付突发事件的措施。

条例写好后，我送给周副主席审阅。

周副主席一条条审定，然后批准。他让我把条例复写一份，向下传达，切记保密。

我遵照执行，为防失密，最后把复写纸也烧掉。

这个条例，当时在南方局、办事处和报社工作的同志都知道，以后成为我们在国统区对敌斗争、应付突然袭击及保卫、保密工作的守则。有些规定，解放后在外交部驻外使馆中一直沿用，如外出必须二三人同行等。

为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我们又采取四条紧急应变措施。

一是要求各部门认真清理机密文件材料。有些重要文件材料，要连日连夜用密电由电台发往延安，发完之后，文件材料和电稿都要烧毁。一般机密文件和材料，要求记在脑子里，不保存，记下也毁掉。非保存不可的，如密码、每个人所联系的重要关系和地址、接头暗语等，用极小的字把它抄在很薄的纸上，将之放在随手可取的隐蔽地方。要求每人备有火柴，遇到突然情况马上焚掉，然后用水一泼灰渣，字迹皆无。当时每个房间都备用一盆水。三楼有电台，随时都有收发的电稿，专门备了一个烧文件的铁炉子。

二是每层楼安一个电铃，电铃按钮装在传达室。一旦有情况，值班人员拉响警铃，各个部门立即做应急处理。并在二楼、三楼的楼梯口处装上结实的门，在窗台上放有石灰和沙包，万一事变发生能抵挡一阵，抢出时间销毁密件。

三是加强警卫，传达室增加人员，二楼加哨，与在楼下的同志昼夜值班。放哨同志又分成一线、二线。并喂了一条狗，取名“汪精卫”，它也帮助我们警卫。

四是加强纪律，工作人员有事外出必须二三人同行。住在办事处的同志，如果外出夜间不能赶回来，必须电话报告。

这个保密条例和紧急措施很快落实，大家迅速行动，做好一切准备。

朱友学老人当时在办事处传达室，负责警卫。他回忆说：

紧急措施传达后，我们迅速行动。在各层楼装上了电铃，把电铃的按钮安装在我办公桌底下桌腿内侧，很保密，不容易发现。只要有情况，我腿一碰按钮，各层楼电铃立即拉响。

电铃装好后，周副主席亲自组织我们演习一次。他逐项检查，先看看我是怎样不露声色用腿去碰按钮，然后又到各层楼转转，检查电铃拉响后大家的行动。一切运转良好，他放心了。周副主席总是这样，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事必躬亲。

当年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也有这样一段回忆：

保密条例下达后，我们每人发了一支德国造的二十响手枪，一旦遇到敌人突然袭击，我们就抵抗一阵，争取时间销毁文件。如果来的人少，就不打，找几个人和他们谈，拖住他们，其他人处理文件。我们抵抗不是拼命，而是保守我们的机密。

在这严峻形势下，党中央非常关心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同志以及党外进步人士的安危。

1月18日，党中央来电，指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国民党已准备破裂，你们在重庆环境日险，应即离渝返延。渝办和《新华日报》干部尽量减少，减下的同志分批回延。党外同情人士，也应立即通知他们分批转移到南洋、香港，并助其旅费。

1月20日，党中央再次来电催促，要求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及办事处、报社的重要干部于最短期内离渝。

周恩来接到这两份电报，深感觉党中央对自己及同志们、朋友们的关怀，然而，他不是像往日那样立即执行，而是把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召集在自己屋中，共同商讨，是留还是走？

大家对战局发展作了全面分析，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内战全面爆发；二是国民党尚有顾虑，不敢贸然全面反共，国共两党继

续维持合作。从目前看，在我党的工作下，及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中，国民党政府已由“皖南事变”时的攻势转为被动辩护的守势。这样，第二种可能性较大。如果这时我们撤回，将在政治上失去一个重要阵地。另外，我党在国统区的力量尚没有转移疏散完，一旦全面破裂，那我们损失就更大。

通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此时难以离开。

周恩来当即果断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

这样，决定周恩来等少数人留在重庆，其余同志撤回延安。周恩来复电党中央：周恩来在这种时刻难以离开，要坚持到最后。并在电报中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即他捕、杀、讨、扣，毫无所惧。”

党中央接到电报后，仍旧担心周恩来等人的安危，还是来电催其速返。然而周恩来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留下。最后，党中央同意他的意见，决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少数人留下，其他人撤回延安，此时，南方局常委委员博古、凯丰早已回到延安。

周恩来坚持留在重庆的决定，使我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枢——中共南方局得以保存下来，也就保存了国共合作的主渠道，对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南方局全部撤回，国共关系也就全面破裂了，那样就是兵戎相见，我们外要抵抗凶残的日军，内要对付数十万的蒋军，腹背受敌，那将何等艰难啊！革命将会曲折迂回几年……难以预料。历史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

周恩来组织干部疏散转移。他首先与南方局的有关领导分头向各单位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紧缩机构，疏散人员，要求各单位立即执行。做到该走的坚决走，服从组织分配；该留的坚决留下，坚持斗争。

然后，他又与主管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疏散方案。确定疏散人员，有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党员干部，有非党人士，还有进步作家、学者、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根据他们实际情况，决定逐步分批撤离，有的回延安，有的转移到南洋、香港，也有的隐蔽在国内一些大城市。

1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复电，同意南方局关于办事处人员逐步撤离的方案，并指示留下的同志要作最坏打算。

1月下旬，南方局派叶剑英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经过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国民党当局才同意派一架飞机送行。这样，叶剑英等人于2月2日乘机离渝。临行前，周恩来把南方局干部名单托叶剑英带回，交给组织部长陈云，并附致中央书记处一封信，简述人员精减情况。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川东特委，在紧急时期加紧巩固党的组织，迅速疏散暴露的党员。

川东特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组织进行了清理，对党员进行了审查，分别情况，有的继续联系，有的保留关系，有的暂时割断关系。大多数干部转入地下活动，只留少数干部单线联系。

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中，疏散转移干部非常困难，风险很大，稍有疏忽就会出问题。为此，周恩来亲自抓干部疏散工作，他不是原则指导，而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皖南事变”后，周副主席特别忙，白天出去活动，晚上伏案工作。通常是上半夜处理文件，拟电文，写文章；下半夜逐个审查撤退人员的上报材

料。

审查材料时，周副主席手拿一支红蓝铅笔，逐人逐条审阅。弄清弄准每一个人的经历、特长，拟疏散到何处，可利用的社会关系，用何职业掩护，沿途如何应付国民党军、警、宪的盘查，证件是否完备等。如果这些情况都落实了，他认为没有批漏，就用红笔在这个撤退人员名单旁边打个对号，再审查下一个。如果有疑点，他就用蓝笔在旁边划个记号，询问他的秘书或有关部门，乃至本人。

他常常忙到天亮，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陪他熬通宵。

新华日报社有位戈宝权，南方局决定他转移到香港。为防止途中被国民党特务认出，周副主席指示他化妆。戈宝权化完装后，周副主席又把他叫来，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一番后说：“不行，这个眼镜是你的一个特征，把它摘掉。”

戈宝权立即取下镜子。

周副主席又把他打量一番，放心地点点头说：“这回可以走了，路上多加注意。”

疏散那些党外人士，周副主席也是同样认真负责。他就是这样把每一位同志、每一位朋友从身边送走。

1941年10月，重庆撤走最后一批干部。这批人很多，大约有200多人，有办事处撤下来的人员，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还有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及干部家属。这是人员疏散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分乘六辆卡车，组成一个车队由廖似光大姐带队。

为了确保这些人员途中安全，周副主席认真检查准备工作，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审查。他决定每个人都改名换姓，确定新的简历，并让办事处给每人发一套八路军的军装、军帽、军衔和臂章。为应付国民党军警宪的盘查，又统一编了一套口供。周副主席还为他们制定了纪律，规定途中停车时不许单人行动，一切行动听指挥。

出发那天早上，周副主席前来送行。他紧握廖似光大姐的手，说：“回延安，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

廖大姐热泪盈眶，硬咽着说：“一定遵嘱办理，请周副主席多多保重！”

在周恩来的精心组织安排下，撤离疏散工作圆满结束，疏散出去的人员都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在新的环境中开辟新的岗位，继续为党工作。

为应付“皖南事变”后的恶化形势，在疏散转移干部同时，南方局又抓了武装力量。

1941年1月18日，党中央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示，派同志去川东、川北、川陕北、湘西、云南等五地秘密准备武装根据地，每处设一部电台，以备将来使用。

党中央的指示与1月17日深夜南方局紧急会议精神是一致的。根据分工，董必武和叶剑英抓了这项工作，首先在重庆附近山区掌握武装力量。

1月末，董老和叶剑英把秘密党员孙友余、周建南等人召集到曾家岩周公馆，研究建立武装之事。通过商议，决定做思想开明有爱国思想的地方实力者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武装。决定派熊扬、雍文远等人到华莹山一带，做土匪糜伯熙、李道远等人的工作；派周建南、张兴富等人到广安做郑启和的工作。

以后由于某种原因，糜伯熙、李道远的工作没有做通，遂放弃了这个地区。

郑启和原是四川省地方实力派熊克武部下一个师长，在广安、邻水一带建了煤窑和秘密军工厂，有武装力量千余人，在那一带形成了小的割据局面。

鉴于此，董老和叶剑英决定派懂技术有文化的同志前去开展工作，以帮助开发建设为由，郑启和便于接受。这样地下党员，也是青年科技人员周建南、张兴富等人奔赴广安。

郑启和见他们都是大学生非常高兴，表示欢迎。周建南他们被留下，”逐步站稳脚跟。

他们把这里情况秘密汇报给董老。董老又将邓黎、李斌之、刘为瑞等进步青年派去。经过他们努力工作，逐步掌握了这支武装力量。

国民党当局得知后，岂能容忍陪都附近有这样的地方势力？遂想铲除。

国民党当局先施以诱降，以四川省名誉主席为诱饵，拉拢郑启和。郑启和不受其惑。随即，国民党当局施以暴力，于7月下旬派重兵“围剿”。郑启和率领部队奋力抵抗，但终因敌众我寡，最后失败，郑启和壮烈牺牲。周建南他们几个虽然冲出了重围，但张兴富、江济业、孔繁德在途中又被国民党军队捕去，以后被保释出狱。

周建南等人回到红岩办事处，向周恩来作了全面汇报。此时，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已被击退，形势开始缓和，周恩来决定放弃这个地区。

广安地区的武装建设只是当时建立武装根据地的一部分，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当时当地影响甚大。

15 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党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月18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向全党说明事件的真相，及我党采取的方针。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8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宣告成立。九万多人的新四军重振军威。

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勾结日伪实行联合“剿共”的全部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着事变的发展，准备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

针对目前时局，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十二条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十二条是：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7日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让其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军法审判。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的这十二条，成为我党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攻势的强有力的武器。

1月25日，周恩来把这十二条交给国民党代表张冲，请他转交国民党中央。这着棋大大将了蒋介石的军，他既不能同意这十二条，又提不出理由加以拒绝，使他在政治上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于国统区展开了强有力的舆论攻势。

在坚持《新华日报》这块阵地的基础上，周恩来指示办事处和报社的同志，把“皖南事变”真相迅速印成传单和小册子，秘密散发到各地。

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中，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山城，散发材料非常危险，既要应付军、警、宪的明查，还要躲过特务的跟踪，随时随地都有被捕入狱的危险。办事处和报社同志将生死置之度外，化好装，走街串巷，把周恩来亲自修定的材料秘密送到民主人士手里，乃至国民党左派人士家中。

当年在办事处工作过的陈舜瑶，在1982年11月西南四省党史资料征集会议上有这样一段回忆发言。

“送传单需要化装，我没有，就从龚澎那里借来花旗袍穿在外面。到民主人士家里，如果本人不在，我就把装好的传单留给他家里人，说这东西是给××先生，请转交，然后转身就走。他家里人不免拆开看，见是共产党的传单吓了一跳，转身看我，我已走远。”

“皖南事变”的真相不仅让国人了解，还要让国际知道。为此，周恩来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斗争。

他组织力量准备外文材料，让记者将之带到南洋、香港、美国等地发表。他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人访问所认识的外交官、外国记者，向他们宣传国民党军队残杀新四军的事件。他致函已回纽约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在重庆了解到的有关新四军的情况及国民党搞摩擦造事端的材料。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亲自出面，做外国使馆官员工作。

他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家中，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惨案。卡尔听后很气愤，电告英国政府，让其对蒋施加压力。

他多次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向他们讲述国民党军队袭击、残杀新四军的血案。

潘友新质问何应钦、白崇禧，并敬告蒋介石，“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周恩来还拜见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交给他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指出，如果蒋介石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使日军南进计划得逞。

居里表示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他随后就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关系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美中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这对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很大打击。

在我们广泛宣传下，“皖南事变”真相昭然于天下，国内外一片谴责声。

国统区的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纷纷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消灭异己、破坏抗战的罪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在联名通电中，严厉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香港大学教授等 400 多人也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

正义的呼声，舆论的压力，如暴风骤雨向蒋介石袭来，而苏美英对华政策的一些改变，更似一颗炸弹在蒋介石脚下爆炸。他的嚣张气焰被炸没了，冲跑了，只能被动地辩护。

掀起反共高潮的蒋介石，原以为他调重兵围歼新四军时，日军会坐山观虎斗，使他消灭异己的阴谋得逞。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日军不但没有坐山观望，而且借机调动七个师的兵力于 1 月 24 日向河南进攻，把国民党汤恩伯军 15 万人包围在平汉路以东，战况紧急。这对蒋介石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处于内外夹困中。他把反共浪潮推向峰巅，同时也把自己推向深渊。这样，阴险奸诈的蒋介石悄悄地息鼓收兵。

2 月 7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介石的“剿共”计划被打破了，他的军事反共事实上已终结，要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毛泽东在电报中分析，依我观察，他们非找个妥协办法不可。参政会又要开了，不想个妥协办法，更加对他们不利。并问周恩来此种估计是否得当？

周恩来回电，表示赞同。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原定于 1941 年 3 月 1 日召开。参政员名单早在“皖南事变”前 1940 年 12 月 23 日就公布了，中共方面有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秦邦宪等七人。此时，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必须有中共参政员出席。国际舆论也在注视着这届参政会。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也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开幕。

进退维谷、焦灼的不安的蒋介石，决定利用参政会下台阶，于是他又披

上和平外衣，急于把共产党代表拉进参政会，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责难。

历史果真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伟人预料的那样发展。蒋介石又准备妥协了。

然而，我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意见尚未答复，殉难的新四军将士的尸骨未寒，叶挺将军及我党的干部尚在国民党大牢中，这个参政会怎么能参加呢？

于是，围绕着共产党的参政员能否出席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一场政治斗争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了。

为了阐明我们的主张，取得各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做了大量工作。

2月10日，周恩来和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黄炎培、张君勱等人，在重庆市的玉皇观商谈出席第二届参政会的问题。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共不出席参政会的理由。

沈钧儒他们表示谅解，并建议共产党，以七参政员名义，把中共提出的善后办法十二条提交到参政会上去，要求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

周恩来认为这个建议很好，立即电告党中央。

2月14日，党中央给周恩来复电，接受沈钧儒等人的建议，以此作为我党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我们不出席本届参政会。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2月18日，周恩来和董必武把以中共七参政员名义写给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交给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公函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十二条”未得到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

这份公函同时也抄送给国共两党以外的二十多位参政员。

王世杰接到公函后非常紧张，立刻找张冲商量，认为这是中共决裂的表示。张冲也很着急，接连几次会晤周恩来，要求周恩来把这份公函暂时收回去，他好以谈判代表身份在中间奔走，请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

周恩来严词拒绝，指出，近日来政治迫害事件频繁，诸如逮捕报童，恐吓读者，扣压邮件，封闭报馆，撕毁广告等，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见蒋也不会有结果，还不是过黄河那一套？

张冲劝道：蒋是吃软不吃硬的，送去这十二条，结果必致翻脸。

周恩来驳斥：翻脸已半翻了，现在所差的只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至于见蒋，必然不能得结果。

20日，周恩来电告党中央，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见蒋不会有结果。要击退顽方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员调解是必要的。如果能由各党派委员会在会外从政治上讨论党派纠纷及十二条，则不直接把十二条提交参政会，也是可以的。如能这样，可拉住中间党派，争取民主，以此为难国民党。

2月23日，党中央复电周恩来，同意他在电报中关于国共关系的根本立场。并指示，不应拒绝谈判，致国民党参政会的公函不能撤回，还须广为散发，如国民党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方面当可暂时不讨论，由两党在会外谈判自可。然而，在未获满意之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

我们公函广为散发后，国共两党以外的党派纷纷活动，希望中共代表出席参政会，还要求周恩来参加主席团。一些中间党派的代表去找王世杰，说时局严重，必须设法解决。

直至 25 日，离会期只有 4 天了，国共双方仍僵持不下。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可是又不能承认中共的十二条，于是想尽办法让共产党撤回公函。

2 月 25 日早晨，张冲又来到曾家岩周公馆，与周恩来商谈。张冲一开始就要求撤回中共七参政员的公函，他说，共产党提的十二条，要取消“一·一七命令”等问题，实在不可能解决，一朝中总有秦桧和岳飞，希望共产党收回公函。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党七参政员的公函不能撤回。

张冲苦苦哀求，甚至说只要公函撤回，他跪下来都可以。

周恩来严肃他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我党继续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已无让步的可能。

张冲提出，让周恩来见蒋介石。

周恩来果断他说：目前见蒋无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张冲急了，只好把国民党提的三条意见拿出来。

这三条意见是：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的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游击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另外，还我一个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归还叶挺及其干部。边区及晋察冀政权照前议。二、参政会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另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讨论党派问题，以蒋介石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三、目前军事进攻已停止，政治压迫总要解决，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最后，张冲请周恩来把这三点意见转给延安，次日早晨给他答复。

显而易见，国民党走投无路，开始软下来了，往后退了。周恩来表面不为所动，答复是，不拒绝谈判，具体条件可以电告延安请示，但参政会的公函绝对不能撤回。

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将我党中央的答复和叶剑英 23 日的电报给张冲看。

党中央的答复也是三点：一、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意见及一切悬案；（丙）派飞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叶剑英致张冲的电报是：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圆满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能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将无补于实际。

张冲看后，哭丧着脸说：“电报所提的等于破裂”。

周恩来立即指出，责任在国民党，我党为挽救破裂，才提出这十二条。

张冲又提到具体条件问题。

周恩来说，中央要我回去讨论。

张冲说：你回去，他们（指国民党）又要说你们破裂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

张冲问：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的公函也撤回，董（必武）、邓（颖超）两位可出席参政会？

周恩来坚定回答：万万做不到，那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岂不是侮辱我们？

董、邓如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张冲话中带有威胁之意。

周恩来气愤他说：我在此等你们逮捕。

张冲马上缓和口气，用商量的口吻说：即使董、邓只出席一人也好。

周恩来讽刺他说：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

最后，他再次坚定他说：出席参政会是不可能的！

为了顾全大局，教育群众，进行深入的斗争。党中央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临时办法，也是十二条，亦称新十二条。

这第二个十二条意见是：一、立即停止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五、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七、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其应辖有六个军；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九、释放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退还皖南所有被捕人员和枪支；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2月28日，党中央把这十二条电告周恩来，让他向张冲口头提出。党中央又在电报中指出，如果彼方同意这十二条，即可由周恩来偕张冲至延安谈判，参政会延后两星期开。

周恩来接到电报，及时向张冲口头提出，然而遭到国民党的拒绝。

3月1日，周恩来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现在一切谈判均无保证，且未具体化，如出席，太便宜蒋。但僵局必须打开。现在办法有两个：一是直接见蒋介石，把我党所提的条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问题约张冲到延商谈；另一个是坚持硬到底（我们也准备了），一切中间办法已没有用。待中央立即指示。

党中央立即复电，在我临时办法十二条无结果无明令保证，绝对不能出席。但仍可告诉国民党及中间派，只要同意我之临时解决办法，并有明令保证时，我党参政员即可报到出席。

接着，党中央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认为，我们不出席，完全是理直气壮的，而蒋介石国民党亦无可奈何。因为：一、“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们不出席表示抗议，并未错；二、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三、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为，其曲更在彼；四、国际形势已到与彼不利时；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因此，尽管在当前政治斗争空前尖锐的情况下，有的中间党派人士一时有些动摇，但只是一时的，过一会儿就会起变化。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主动出击，他写信给张冲，并转交蒋介石，书面提出我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并谓：“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

张冲收到信后，表示时间过急，等于哀的美敦书，将信函及十二条退回。

周恩来又将此信及十二条重新送去，并附一信说明，如果退回原信就等于破裂。

与此同时，董必武、邓颖超亦致信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附上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又联名写信给中间派人士，再次阐明我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改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具体见参政会公函中。并申明：此等办法，我党实已委曲求全，倘若政府能接受，并有明确保证，必武、颖超必亲往参政会报到。如果这样的要求又遭到拒绝，造成时局恶化，也问心无愧。

通过周恩来等人的工作，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一步了解了我们党顾全大局的诚意，问题更加公开化了，当然大家也就更关注这届参政会了。

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各方人士都在等待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消息。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国民党当权者焦头烂额。蒋介石的侍从室，从夜间到清晨电话不断，都是打听中共代表能否出席参政会的事。

3月1日，参政会开幕的那天清晨，张冲等人还奉蒋介石之命到周公馆请董必武和邓颖超出席。均遭到拒绝。

参政会开幕式冷冷清清，由于我党参政员没有到会，人们不免交头接耳，相互打听议论。这种气氛给到会的国民党执政者心头又加了一层寒霜。

蒋介石也无精打彩，发表了色厉内在的讲话，虽然唱着反共的调子，表示国共总要分裂的，但底气不足了，承认现在政治上不允许。他在讲话中不得不表示，保证以后无剿共的军事，希望中共参政员能在参政会上欢聚一堂。

在董必武拒绝入会的情况下，参政会仍将他推选为驻会委员。

我党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没有被国民党接受，我方参政员亦没有出席参政会，但把问题全部公开化了。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及中间势力进一步了解了我们党，被我们党为国为民的坚定立场和气度深深感动了，给予同情和支持，我们赢得了中间力量。在这强大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收敛反共行动。

国民参政会以后，国共关系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舆论揭穿，政治攻势，历时半年之久，终于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当局以军事进攻开始，政治失败告终。

16 秘密交通线

“皖南事变”后，为配合疏散干部，南方局决定重建秘密交通线，同时也是准备一旦国共关系破裂，能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把我们工作人员全部突围转移出去。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袁超俊，并由他直接领导。

“皖南事变”前，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归组织部领导，由廖似光具体负责。秘密交通工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半公开的，即以我党在各地公开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为掩护，交通员穿上军装，化装成八路军人员，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军车，往返各地，完成传递文件、护送人员的任务。另一种是秘密的，交通人员化名、化装，通过秘密途径完成任务。

“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中，秘密交通工作更重要，也更加艰巨和隐蔽了，交通员都有固定职业为掩护。

1941年1月下旬，周恩来决定把原由孙友余领导的交通线交给袁超俊领导，并指示他再建一条与孙友余的交通线平行的复线，先疏散一批同志出去。

袁超俊接受任务后，很快建起这条复线，并把一些疏散的干部安排在各站。

这两条交通线都是从嘉陵江北上到川北的。

“皖南事变”后，由重庆撤退到延安的人员，大部分是经过这两条交通线转移出去的。

除上述这两条特殊的交通线外，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还把一些秘密交通点交给袁超俊由他单线联系，把一些撤退下来的党员干部也交给他，由他布置去建立新的交通点，以备特殊情况时启用。

秘密交通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工作。如果把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组织系统比喻成人体，那么，这秘密交通线就是一条条血管。通过这一条条秘密之线，安全地护送了各地方党组织派往重庆南方局和延安的人员，同时也把南方局或延安方面人员送往各地，使心脏永远和各个器官紧密而又协调地联系在一起。

分布在各地的交通点是我们安插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雷达与哨兵，日夜监视着敌情或国民党顽固派的动态，把获取的情报通过秘密交通线迅速送给南方局，送给党中央。使我党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或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做出英明决策。

这些秘密交通线、交通点组成强大的交通网。它南到香港，东到上海，西至西康，北与陕北沟通。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就是靠这个交通网去运行，其总指挥是周恩来。

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是机密性、政策性、纪律性很强的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党性强、素质好，胆大心细而又机智灵活。为此，周恩来首先抓了党性教育，气节教育。他经常教育大家“要像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这句话已成为每个秘密交通员的座右铭。

“皖南事变”后，从南方局疏散出去的干部，有一些人就隐蔽在重庆附近，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其中有许多人以教师职业为掩护。鉴于他们的职业特点，周恩来每年都利用寒暑假或适当时机，把他们秘密召回红岩办事处，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组织他们学习。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这些同志被召回办事处后，周副主席亲自我他们谈话，作指示，常常谈

到凌晨，有时通宵达旦。如果周副主席实在太忙抽不开身，他就让董老或者孔原找他们谈话。

为了使他们集中精力学习，同时更为了保密他们的身份，他们到办事处后基本“与世隔绝”。这是周副主席的要求。

每逢他们到来时，我就在办事处一楼或者二楼单独开房间，安排他们住，不让他们住招待所，也不让他们和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见面。

他们的房间外人不得进入。为了防止有人发现他们，也不让他们去食堂吃饭，他们的饮食都是由指定的公务员送进去。即使周副主席和董老找他们谈话，部署工作，也都是亲自到他们房间去。总之就是让他们关起门来学习。

这样安排，既是对他们的爱护，也是保密工作的需要。周副主席考虑得如此周密，使他们深受感动，有的同志讲：我们回家就进“保险箱”啦！也有的同志幽默他说：上山“关禁闭”了，闭门而思过。

在周恩来亲自培养教育下，从事秘密交通工作的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工作任劳任怨，无论是大雪纷飞的寒夜，还是倾盆大雨的黎明，他们都准时无误地到车站、码头等人，接人；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敌占区，他们竭尽全力把护送的同志安全送到目的地。

他们耐住清贫，耐住寂寞，有时也要耐住自己同志不理解的白眼。他们随时随地都要做出献身的准备，早晨离开家门，就有可能永远不再回来；此时向亲人或同志道声再见，就有可能是最后的永别！

轰动 60 年代的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其主人公李侠，就是南方局安排在上海的秘密机要交通员，他原名叫李白，当时也归袁超俊领导。他被捕牺牲后，为防止更大损失，周恩来指示上海机要交通暂停，红色电波暂时消失。像李侠这样的优秀交通员还有许多，他们用热血和生命去开辟和捍卫那一条条秘密交通线，那纵横交错的交通网就是他们用脊梁架起的。

秘密交通人员都是以固定职业作掩护，按照职业的要求扮演各种社会角色，而且时间很长，有的几年，乃至十几年，其间不能有任何一点儿破绽。为此，周恩来严格要求，秘密交通人员要扮什么像什么，言谈、气质、行为、服饰、发型，甚至一举一动都要与扮演的角色相符合。

扮演角色需要化妆。秘密交通员的化妆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从内到外都要按职业身份的要求改变自己。如有的同志扮作哥老会的人，首先要学会哥老会的语言，这样，才能与哥老会的人接头会晤。有的女同志扮作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在化妆上不仅仅是穿上高跟鞋，涂上红嘴唇，而是一举一动都要流露出“娇骄”二气。

在这方面，周恩来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周副主席曾经多次指示秘密交通工作人员，无论是化妆还是保留原装，服装一定要整洁，皮鞋要擦净，头发要梳好，避免蓄长发，头发蓬乱，衣服邋遢，皮鞋不擦。因为在 30 年代，有的地下工作者不太注意这些细节，虽然扮作商人、官员，西装革履，但衣服皱皱巴巴，还是像个农民，有时候被特务识破。叛徒顾顺章写的《特务工作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在论述如何识别共产党人时就举了这些细节。

袁超俊老人回忆起这些小事时，感慨地说：“周副主席考虑得太全面太细致了，在我们交通员化妆上，他是世界上最有水平的‘导演’，他那双眼

睛就是‘高功能的显微镜’，不放过你身上任何一点疏忽。”

正是由于这种严格要求，“皖南事变”后，我们的秘密交通人员基本上没有露过什么破绽。

除此之外，从延安或南方局派往国统区的人员也要化装。虽然他们化装是暂时的，但也同样要求扮什么像什么。

袁超俊老人说，他们化装的衣服主要来自两条渠道。一是来自内部，一些学生、知识分子及他们的家属去延安时，都将自身穿的西装、旗袍、长衫等脱下来，换上八路军军装，这些换下来的衣服保存好，需要时再从中选用；另一个来自外部，到秘密交通员朱晓云所在的拍卖行去买。

为使秘密交通工作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周恩来又抓了技术工作。

周恩来让办事处在三楼腾出一间屋子，作为袁超俊的秘密工作室，又把《特务工作理论和实际》的书给他，这是大叛徒顾顺章叛变后专为培训国民党特务所写。周恩来指示袁超俊把这本书读透，全面了解敌特对付我们的种种办法，针对此提高我们的隐蔽方法，改进我们的保密伪装技术。

袁超俊认真执行周恩来交给的任务。他首先把《特务工作理论和实际》这本书研究透彻，弄通弄准国民党特务对付我们的招术，然后有的放矢，改进我们的保密技术。

为了能顺利通过国民党在各地设置的检查站，以及能进入国民党的官府衙门，袁超俊他们巧妙地制造了各种证件。

为了保证机密文件的安全，袁超俊他们想了许多办法。

通常情况下，这些信件由袁超俊用极小的字写在极薄的纸上，然后将之包卷好，用蜡封上，其大小不得超过花生米粒。根据国民党搜查的规律，将之藏到他们不太注意的地方，如自来水笔的笔管里、牙膏筒内、皮箱缝内，或者隐藏在衣服的边角里。由于隐藏得好，没有出过什么事。

据袁超俊老人讲，仅有一回出了点儿小毛病。他把一个文件卷好，用蜡封上，放入牙膏筒里，由于密封不严，浸入了液体，把字迹弄模糊了，不过尚能看清。

为防止国民党军、警、宪、特搜查往来传递的信件，袁超俊他们又采用密写和暗语等方法。

通常密写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米汤书写，用碘酒涂了显影；另一种是用明矾水写，放到水面上显字。这两种办法容易被国民党有关人员检查出来，袁超俊他们不用，改为用黄血盐水书写，用绿矾溶水涂了显字；或者用绿矾溶水书写，黄血盐水显字。为了不弄错，以邮票为记号，邮票正贴表示什么，邮票倒贴又表示什么。

有时候在邮递信件时不用密写，改用事先约好的暗语写公开信，这种暗语基本是反语。如：通知接头时间、地点，可写我4月5日不能去看姑妈，实意就是约定4月5日接头。又如：通知到达重庆的时间，公开信可写，因车票难买，我1月10日不能赶到重庆，这就是说于1月10日抵达重庆。

南方局是我党在国统区的领导中枢，也是秘密交通工作的指挥中心。因此，经常有我党在各地的交通员前来面送重要情报；有打入敌人内部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前来面见周恩来；也有各省市党的负责同志，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前来请示汇报工作。对于他们的安全，周恩来非常重视，一再叮嘱袁超俊，一定保证他们来去的安全，保密他们的身份。

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大大小小的特务遍布山城，而红岩办事处则处于

特务的包围中。办事处西边山上是宋子文的公馆，有全套的特务机构；山下是国民参政会的大楼，王世杰公馆在那儿，也有装备完善的特务。从办事处大门口至公路这段 500 多米长的路，布满了特务流动哨。从公路进入红岩村的路口有个小屋，安置了一伙特务，为首的叫汪炳清。凡是来办事处的人，他们都注意辨认，甚至照相；从办事处出去的人，他们派特务跟踪盯梢。

通往办事处这条小路虽然不长，但是步步有艰险。那么，袁超俊他们是怎样把这些同志秘密迎进来又安全送走的呢？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来办事处的同志，如果能事先约好在市内某个地方等候，那么，我们就开车去把他们接来。有时我们也与要来的同志约定，在黎明前或者黄昏后他们自己上山，我们在半山坡上等候，把他们接到办事处。因为这时候朦朦胧胧，特务看不太清，也无法照相。

把他们接到办事处，一般安排到招待所住下。特别重要人员，不让其住招待所，单独安排在办事处的一个特别房间，外人不得进入。

他们离去时，我们负责安全送走。

党内比较重要的同志，我们都用汽车送进城。从办事处去外地的同志，自己能解决车、船票的，我们只发给路费。重要人物，我们委托城内的秘密交通点帮助解决，并进行掩护。这时候就按一般秘密工作原则，为双方安排好约会时间、地点、标志、接头暗语等，必要时密写介绍信。有时候，我也护送他们到某个交通点或社会关系处，委托他们代办旅行之事，并让其在此处的掩护下暂住一两天再走，这样更安全些。

在周副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小心谨慎，来去办事处的同志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在国统区的险恶环境里，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每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都要历尽艰难，几经曲折，其间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袁超俊老人讲述了由重庆到鄂豫皖解放区的交通线建立的过程，这条交通线由三位同志历经半年才建成。

1944 年下半年的湘桂大战，是国民党战场上第二次大溃败，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独山，大片国土沦丧。蒋管区人心惶惶，蒋介石甚至想龟缩到川康边境去。

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派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直插鄂湘，扩大解放区。

南方局也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建立一条联系鄂豫皖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将一些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群众运动的骨干分子及进步学生送到解放区，既转移了人员，又为解放区输送了力量。

南方局主管秘密交通工作的组织部长刘少文，派王智、杨宗鸣、丁坤庭三人去完成这项任务。

他们三人于 1944 年 12 月由重庆出发，乘轮船来到三斗坪。为了保持与重庆办事处的联系，丁坤庭暂留在三斗坪，王智和杨宗鸣继续前行。他俩利用国民党四十五军军部二科科长（四十五军是川军，这个科长是我们的统战对象），过了长江，然后北进。

他俩越过荆山，经过分乡、洋坪，走了七八天才到达襄樊。他们顾不上休息，又继续前进，经过随县双河，在坪坝过了封锁线，进入沦陷区。如果说蒋管区是虎口，那么沦陷区则是虎穴。“虎口”毕竟有躲闪的余地，一路

还顺利，如同虎穴的沦陷区则一片茫然，为防止意外，他俩分路而行，经过许多周折分别到达了沦陷区的安陆、云梦。

1945年1月底，王智终于到达鄂豫皖解放区，与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接上了头。王智和解放区的领导共同研究，确定了建立交通站的地址、输送干部的路线和方法等。然后他返回三斗坪，与杨宗鸣一起回到南方局，向刘少文作了汇报。

刘少文决定由孙友余负责建立鄂湘地区交通线。这样，孙友余又派杨宗鸣两下三斗坪。

经过艰难曲折，1945年5月，这条秘密交通线终于建成。以后通过这条交通线，往鄂豫皖解放区输送去200多名学生。

建立交通站、交通线难，巩固更难，稍有疏忽就会站毁线断。

袁超俊老人回忆了这样一件事，他说：

1940年冬，国民党的反共气焰甚嚣尘上。南方局预料到形势会进一步恶化，决定桂林交通联系工作转入地下。为此，李克农派谭宝连潜伏下来，建立秘密交通站。

重庆办事处给谭宝连拨了一笔款，让他作为流动资金，又从桂林办事处在城外路莫村的仓库里拨出一些日用品作为货源，让他开设一个商店，以店老板身份掩护。办事处把张剑秋调来，作他的“夫人”；把炊事员王××调来，作他的“伙计”。李克农又把桂林一个小冶炼厂的徐承志工程师介绍给谭宝连，作他的朋友。有了这些社会关系，交通站建成，商店开业，取名成昌。

与此同时，李克农又派秘密交通员王凯在桂林近郊马路旁开个杂货店，作为掩护，这个“杂货店”是同上级联系的机关。同时还派一位姓朱的地下党员开了一个刻字铺，此铺是王凯与谭宝连的秘密联系点。

“皖南事变”后，这个秘密交通站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1941年8月却出了问题。

王凯杂货店的一个“伙计”，违犯了秘密工作纪律，擅自同湖南亲属通信，被国民党当局从邮检中查出了问题，因而暴露了王凯这个联络点。国民党特务立即把王凯夫妇逮捕入狱，查封了杂货店。

为营救王凯夫妇，谭宝连出面作保，于是也暴露了成昌商店。

桂林地下党组织果断决定，立即隔断谭宝连同徐承志工程师、刻字的朱师傅的关系，以免牵涉更多人。

王凯夫妇保释出狱后，立即回到重庆南方局。不久南方局决定“成昌”这个秘密交通站结束，将谭宝连调回重庆。

由于南方局和桂林地下党组织及时采取了措施，才免受更多损失，然而，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交通站就这样痛心地失去了。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大家深深地吸取了这个教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秘密交通工作的同志不仅有很高的党性，还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他们忠于职守，一丝不苟。唐亚子夫妇就是这众多的优秀交通员中的一例。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前面已述，从鄂西特委撤退下来的唐亚子夫妇，在重庆市小梁子闹市区摆烟摊。这个特殊的联络点是周副主席亲自布置的，由我去交办，除我以外谁也不知道。

唐亚子夫妇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以卖香烟、肥皂的小摊贩身份隐蔽起来，从事秘密联络工作。

1943年，我跟随周副主席回延安，唐亚子这个联络点就交给了列少文领导。1944年我从延安回来又归我联系。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时，这个交通点没有撤，我调离重庆时交给了四川省委的张友渔。然而，1947年3月四川省委撤退时，唐亚子夫妇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作为一名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就如同孩子失去了亲娘，孤独、寂寞、无奈、痛苦、危险交织在一起。唐亚子夫妇知道周副主席就在南京，他们完全可以跑去，但是他们没有动一动；他们也知道一些秘密党员的关系，可以想办法去找，但是他们没有去找。他们只是天天不误地摆烟摊，因为他们的岗位在这里。

他们就是这样等着，盼着，盼着党组织派人和他们联系。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他们盼来了全国解放。

全国解放后，他们才离开了那个烟摊，回到党的怀抱。他们整整等待了两年多，这期间要忍受多少痛苦和磨难啊！又需要多么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来约束自己啊！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所领导的秘密交通关系全部由袁超俊联系，秘密交通员的名单、地址、通讯联络方法、接头暗语等，都由他掌握。这是党的重要的绝密材料，也是千千万万个同志的生命线。

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为应付恶变发生，袁超俊把这些材料用极小的字写在极薄的纸上，装订成两寸长一寸宽的小本，与一盒火柴放在一起，昼夜不离身。一旦突然事变发生，立即焚之。

在那白色恐怖中，他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这份党的机密。

1943年6月底，袁超俊跟随周恩来回延安前，把这些关系交给了南方局组织部长刘少文。1945年底袁超俊由延安回到重庆，刘少文又将其中大部分关系交给了他。1946年11月，袁超俊由重庆调往上海时，将所管的秘密交通关系交给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

17 虎穴龙潭里的斗争

反共独裁的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封建的法西斯统治，推行全党特务化，在全国增设了许多特务机构，增加大量特务经费，在各地布下了特务网，建立了集中营，刺探、逮捕、囚禁、暗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活动更加猖獗。

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也是特务机构的中枢，大大小小的特务如蜘蛛网一般遍布山城，而共产党的对外办公机关——红岩办事处、曾家岩周公馆、虎头岩新华日报社，则更是他们监视的中心。

当年工作在南方局的几位老人介绍了“三岩”的环境。

坐落在红岩山上的八路军办事处被国民党特务据点包围着，有的人称这里是“文明监狱”。红岩山东面的半山坡上生长着一棵多年的黄桷树，这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树，南方人也称为榕树，现在已被重庆市民命名为市树。这棵黄桷树把道路分成两个岔道，从它右边向上走，是八路军办事处，这里是充满民主自由的小解放区；从它左侧向前走则是国民党参政会办公大楼，这里是专制独裁的机关。因此，有的人把这棵黄桷树称为“阴阳界”。

从办事处大门出来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这条路不足十里，其间布满了特务岗哨。有的老同志讲，仅军统特务就有八十多个。

在这条路上有个上清寺，离曾家岩五十号有一百多米远，是进出周公馆的必经之路。它又是一条狭窄的胡同，车子进不去，需要步行。这条胡同是特务重点监视的地方，胡同两侧开设的一家茶馆全是特务的据点，喝茶的卖茶的都是化了装的特务，那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死死盯着来来往去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旁边不远处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

周公馆是三层小楼，南方局的同志仅住一层和三层，二层住着一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一个国民党银行的官员。楼外的传达室仅有一半是我们的，另一半是国民党特务的，里面有个女人，从早到晚监视着每一个进出楼的人。

虎头岩的新华日报社也处于特务严密监视中。

这就是中共南方局所处的环境，这是龙潭虎穴。在这里，周恩来领导大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0年5月4日，党中央在《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文件中，提出了党在国统区的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方针。

为了全面贯彻这十六字方针，周恩来在总结国统区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又将之系统化，于1941年末在总结南方局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七个条件和十六字方针。

七个条件是：第一，要使五千名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第二，要在群众聚集的单位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保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第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的领导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在每一项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第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第五，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

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第六，做到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和进步方针；第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联系和党内联系相配合。

十六字方针是：党员要“勤业、勤学、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周恩来不仅作出这些具体指示，而且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时，在作报告中，经常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

蒋泽民老人清晰地回忆了周恩来的一次报告，他说：

一次周副主席给我们讲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地下工作方针。他首先说：“这么大的社会，这么多的人口，想什么的都有。干什么的都有，什么困难都会碰到，广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见到我们共产党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怎样解答呢？哪些问题能解决，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原因是什么，怎样想办法去解决，我们心中应该有个数，向群众讲出个道理。”

接着，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实事。

武汉、广州沦陷后，重庆市人口速增，衣食住行都有困难，连掌鞋的材料也成了问题，有钉子没有皮子，巧女难为无米之炊呀。

我们警卫班有一位同志去掌鞋，见掌鞋师傅为难，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向师傅建议，用汽车或手推车的轮胎代替皮子。掌鞋师傅信了他的话，用这种方法试着给别人掌了几双，果真可行，而且鞋底既结实又轻快，很受欢迎。以后这种方法迅速推广。“这位掌鞋师傅逢人便夸，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办法多啊！”

周副主席讲完后，深情地注视着我们说：“这位战士做得好，我们要向他学习，和群众广交朋友，要勤业、勤学、勤交友，为国为民。”

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制定的一系列工作方针，结合“皖南事变”后重庆的形势，南方局又为办事处等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制定了工作制度。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外来人找谁，谁去接见，别人不能代见；二是工作任务布置给谁，谁去完成，别人不能代办；三是在路上和公开场合，绝对不允许和地下工作人员打招呼；四是不和无关人员见面，对外来办事的同志不准问姓名和住址；五是单人不准外出，必须三两人同行，遇到可疑情况一定及时汇报，不得错过时间；六是不做工作日记。

按照这些方针政策及具体规定，“三岩”同志们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穿插于敌人明岗暗哨之中，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当年工作在南方局的老同志，回首昔日岁月时都非常激动，尽管往事逝去近半个世纪了，但是，当时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般。

当过副官的蒋泽民老人回忆了一个工作侧面。他说：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陪首长出去，都是临行前才通知司机去哪儿，以防泄密。而走哪条路线，途经何处，什么时间回来，都要事先决定好，一定保

证首长安全。如果我们自己出去，行前也要拟出个计划，先办什么事，后办什么事，走哪条路线，并要告诉领导，有重要事情去办，一定要汇报给周副主席。一旦我们出现意外，领导知道我们去向，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营救。

有时我们为了混淆敌人的视线，遇到稍有点儿认识的特务，也主动上前大声地向他们打招呼，显出非常亲热的样子，如同老朋友重逢一般，引起周围特务的注意、猜疑，造成他们内部之间的矛盾，从而减少他们对我们的注意力。

有时候为了转送文件，发表文章，难以从正常渠道送出去，我们就特意到敌人集中监视的新华日报社，生活书店等地，大摇大摆进去，装成买书买报闲逛的样子，趁周围人不备迅速把材料交给我们同志，然后急速离去，在敌人眼皮底下完成任务。

有时我们进城找某位同志联系事情，为了躲开特务跟踪，专走繁华街道，趁他们眼花缭乱之时钻进一个小胡同，左拐右拐，突然闪到要去的那间屋子里。接头之后，简单明了谈完情况，立即从后门出去，消失在人流中。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相比之下，我们从事秘密交通工作的同志，与特务们打交道更多，周旋的也更频繁，有时是想尽一切办法甩掉特务的跟踪，而有时又直接面对面地与警察、宪兵们打交道。我就亲身历险一次。

那是 1942 年的一天夜晚，我受命带着大叠美钞到棉花街秘密交通点接头，临行前化好装，扮做一个商人，把钱装在密码箱里，西装革履，很有气派。为防意外，我不用司机，亲自驾车前往。

按事先约定的地点，我来到这个交通点的楼口，一步步踏上楼梯，尚未到交通点这位同志家时，从楼上下来一个国民党官员，冷冷地看了我两眼，我也不卑不亢地打量他两眼，他突然问我：“你找谁？”我一下子怔住了，因为很快就到交通点门口，莫非出了事？我的心悬了起来，我不能实说，而又要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就在我愣神的一刹那，他突然冲上前揪住我的衣服，不容分说又推又扭地把我往楼下拽。

我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他竟说我是小偷。听了这句话，我那悬着的心悄悄落下，证明交通点没有出事。这样，我被野蛮地拽到楼外旁边的警察局。

怎样摆脱他们的纠缠呢？既要保护好随身带的美金，又要按时完成任务。我灵机一动，利用自己扮演的角色掩护，与他们明斗，想办法镇唬住他们。于是我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说我是贼，真是开国际玩笑，凭我这堂堂的商人，怎么能去当贼？”我一边说着一边指指自己的西装革履。

那个军官没有被镇住，气哼哼地说：“看衣服就说不是小偷，没那么容易。前几天我们就抓住一个小偷，穿的也是这么阔气，说不定你是个穷光蛋呢！”

我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美钞，在他和警察局的人面前晃了晃说：“看看，大爷有钱！”

然而，他们还是不放过我，无奈只好亮出最后王牌——徐恩曾。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而且周副主席今晚也在那里。于是我轻蔑地看了他们两眼，很神气地说：“既然你们不相信，那么，好吧，就请跟我走一趟吧，咱们到徐恩曾府上说话，在这儿犯不上跟你们磨嘴皮子。到那儿，你们就知道大爷我是谁了。”

这几个家伙有些被镇住了，但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硬着头皮跟我走。

我开车把他们拉到徐恩曾宅院门口。我气哼哼地说：“到了，请下车吧，我进去汇报，你们稍候。”说完我进了屋，跟保卫周副主席来的龙飞虎说了。

龙飞虎随即走了出来，把他们臭骂一顿。这下子他们老实了，像霜打似的，耷拉着脑袋回去了。

类似这样的事，秘密交通人员经常遇到，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以职业为掩护，化险为夷。由此可见，周副主席提的“勤业、勤学、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十六字方针多么正确啊！

吴宗汉于 1939 年末调到重庆办事处，先担任仓库主任，1941 年后接任总务科长，并兼任交通科长。虽然不担任押运副官了，但是还离不开运输工作。他回忆几个运输线上巧妙对付国民党军、警、宪、特的事。

吴宗汉老人讲：

一次，南方局的李涛化名去延安，途中经过国民党一个检查站，尽管他已巧装改扮，但还是被一个认识他的而且眼毒的国民党军官认出来。他看看护照，又打量一会儿李涛，冷笑道：“这个护照是假的，你叫李涛，我听过你的课。”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几个国民党兵蜂拥而上，要扣押李涛。

李涛在长江局时确实给他们上过课。随行的押运副官见他已被认出，急中生智走过去，对那个国民党军官说：“不错，他是李涛教官。护照上的那个人因为临时有事去不了，而李教官也正好有急事外出，重新上报领护照来不及了，就移花接木借用了这个护照。既然李教官教过你，你们许多长官又是李教官的朋友，那么，这点面子还不给吗？”

然而，这个国民党军官不讲情面，就是不放行。最后，重庆办事处派人出面交涉，才算把李涛放过去。

有时候，遇到刁滑的国民党检查人员更是鸡蛋里头挑骨头，百般刁难。

记得一次执行任务，我们在广西河池一家旅馆住宿。夜半三更，闯进来三个国民党宪兵进行检查。查看我们护照时，发现印章有点模糊，顿生疑心。一个宪兵从口袋里掏出尺子左量右侧，量了半天，阴沉着脸说：“你们护照的印章是假的。”说着就要扣留护照。

我一急，从衣袋里掏出两张空白护照，这是临行前李克农交给的，以备应急用。我指着护照上的印章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这印章都是你们统一制发的，怎么能有假？只不过是盖章时印泥多了点吧，这几个护照都一样！”

岂知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另外两个宪兵过来就要抢，大声吵吵：“好哇，连我们军长外出都不许带空白护照，这说明你们有名堂！”

我急速把护照收起揣好，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军长许不许带空白护照，我管不着，但我们必须带！因为我们车队从桂林到重庆要走十几天，假若汽车抛锚或途中遇到特殊情况，拖过了护照期限我们怎么走，不带空白护照行吗？要是怀疑，你们打电话查好了！”

这三个宪兵想找茬寻事，就往宪兵值班室挂电话。值班的军官又往重庆办事处挂电话查问。

重庆办事处告之确有此事，让他们不要小题大作，故意寻事制造矛盾。这样，这个值班的军官讨了个没趣，而且把睡意也搅没了。他一肚子气没处撒，在电话里就把这几个宪兵臭骂一顿。

这时候，隔壁的群众被吵醒，来到我们房间，见他们无事生非很气愤，你一言我一语地指责他们。

这三个宪兵折腾半天，不但什么也没捞着，而且碰了一鼻子灰，最后骂骂咧咧地溜走了。

对于盘查的国民党军、警、宪尚且好对付，最狡猾的还是那些化了装的特务，他们个个像毒蛇一样刁滑。在重庆办事处工作时，我就碰上这样一件事。

那时我在仓库工作。仓库设在土湾 61 号，周围都是国民党暗哨。有几名女青年经过地下党组织介绍去延安，党组织通知我在仓库接应，她们今夜必到。

已经深夜 11 点多了，这几个女青年没有来，我在屋内焦急地来回踱着，眼睛紧紧盯着窗外。街道上早已灯昏人稀，只有院门口那个摆烟摊的老太婆还站在黑夜里。这个老太婆是国民党的老牌特务，烟摊是特务的据点，她那双贼溜溜的眼睛不时地打量着过往行人，伸长耳朵听我们楼上的动静。

突然，一位年青姑娘气喘吁吁向这里走来。老太婆急忙上前问：“姑娘，你找谁？”

“大娘，这里是土湾 61 号吗？我找吴宗汉。”姑娘着急地打听。

这个老特务故意说这不是土湾 61 号，又贼眉鼠眼地把姑娘打量一番，别有用心地问：“吴宗汉是你什么人啊？”

姑娘急中生智，大声说：“他是我先生！”

我隐隐约约听见楼外的对话，判断可能是来的女青年，但怎么只有一个人呢？情况紧急不容多想，立即下楼，推开院门对姑娘说：“你怎么才来呢？快进去！”说完把姑娘拉进院里。

上楼后，姑娘着急地向我汇报发生的情况，原来他们在途中遇到了意外，大家走散了，只有她一人赶来。

这时候，女特务也尾随而至，趴在门口偷听。我急忙把话叉开，吁寒问暖。女特务没听到什么可疑情况，丧气地离去。待她把烟摊收起后，我立即派人把这位女青年送到办事处招待所。

翌日早上，这个女特务来到我房间，发现昨晚那个姑娘不在了，故作惊讶地问：“夫人哪里去了？怎么刚来就走？”

“夫人？我哪儿有夫人？”我故作不解地问。

“昨晚来的姑娘，不是称你先生吗？不是夫人又是谁呢？”

“哈哈，你误解了，她是我学生呀，不称先生称什么？”

这个刁滑的老特务没探出什么油水，便鸭子似的一步三晃地走开了。

在重庆这个国民党统治的阎王殿里，当年工作在南方局的老同志，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段历险记，有一二个感人的故事。然而在他们眼里，最最感人的还是周恩来巧斗顽敌，他是大智大勇的化身。

袁超俊和吴宗汉老人分别讲述了周恩来两过青木关的事。

青木关离重庆市较近，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一个检查站，安置了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他们一个个诡计多端又心狠手毒。这是进出重庆第一关，也是最难过的一关，被群众称为鬼门关。有的群众讲，进出鬼门关，不扔下脑袋也扒层皮。一些胆小的人一听说鬼门关，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1943年6月，我跟随周副主席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随同周副主席一起走的有邓大姐、林彪、方方、伍云甫、孔原等，一共有一百多人，分乘五卡车。

我们一行人来到青木关。许多军警、特务拦住了车队，要检查。

随车副官出示了护照和有关证件，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我们周副主席和林师长有急事要回延安，请你们放行。”

敌特们不放，非检查不可。

周副主席跳下车，来到跟前，亲自交涉，请他们放行。但是他们不答应，仍坚持要检查。周副主席火了，生气地说：“要检查就检查吧，我们也没什么东西。”说完，命人打开几个装文件的箱子让他们看。

敌特们七手八脚地翻找起来，当发现有国民党的文件时，如获至宝，大声嚷嚷着：“你们为什么带这个？为什么带？”气焰十分嚣张。

周副主席眉峰一扬，轻蔑地一笑，说：“你们看清楚没有，这是你们参政会发给邓颖超的文件。邓颖超是参政员，文件发给她就属于她的了，她带回延安有什么不可以？”

然而，这些狂妄已极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们硬是不放行。

周副主席向前迈一步，理直气壮地问：“你们有没有电话？有电话，给你们蒋委员长挂个电话，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敌特们听说要找蒋介石，知道事情惹大了，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蔫蔫地缩了回去。我们车队过关而行。

这次多亏周副主席机智周旋，杀了他们的威风，否则我们车队非被扣下不可。

吴宗汉老人回忆说：

一次，周副主席带几个人回延安，远远就看见一群国民党兵荷枪实弹地站在那里。

车刚停稳，随行副官走上前有礼貌地和一个国民党军官交涉，“我们是十八集团军的，有紧急任务回延安，请放我们通过。”

这个国民党军官蛮横地把手一挥，说：“不行，照章办事，统统检查。”

周副主席下了车，对副官说：“让他们检查好了！”

这些家伙东翻西找，忙乎半天没发现什么，很扫兴。这个国民党军官眼睛又盯到周副主席手里拎着的黑色公文包，说：“把这个打开看看！”

副官急忙上前拦住他，说：“这是周副部长，不得无礼！”

这个国民党军官傲慢地说：“对不起，兄弟也是奉上司命令，不管是谁都要检查！”

周副主席满面怒容，大声说：“你们这是故意刁难，我问问何应钦，这是谁的规定？”说完就向装电话的岗楼走去。

这个军官一看不好，急忙跑到周副主席面前，点头哈腰地说：“周部长，是卑职对长官的不敬，请多包涵，多包涵，马上放行，马上放行！”

周副主席带着大家闯过这一关。

俗语道，明枪好躲，暗箭难防，这些国民党布置的明岗暗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

1942年，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遭到国民党

顽固派的破坏。这是继“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制造的又一次反共事件。

南委破坏前因来自江西。

1941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省委书记谢育才被捕,省委电台台长林云生叛变,电台遂被特务控制,这样,江西省委与上级组织南方委员会失去了联系。

这期间,国民党特务一方面对江西省地下党组织进行大搜捕,另一方面又强行命令原江西省电台人员,继续和南委电台联系,询问延安电台的呼号,准备进行更大的破坏。

南委电台值班人员警惕性很高,对江西台的询问有所怀疑,没有告之,使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这样,江西电台与南委电台中断联系。

1942年2月,被特务控制的江西电台再次向南委电台呼叫,要求恢复关系。

此时,南委尚不知道江西省委遭到敌人如此严重的破坏,只是对其电台中断联系产生怀疑。于是,南委负责人方方让江西说明与南委电台中断联系的原因,中断后这几个月情况,为防止意外,又决定暂时不给江西任何指示。

根据南委意见,江西台发来一些假情报作解释。南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及有关人员进行分析,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为了彻底查明原因,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到江西检查工作。并给谢育才发去一封明文暗语的信,要求谢育才于5月份到曲江与郭潜见面。

这封信落到国民党特务手中,但他们破译不出来。为了钓大鱼,他们把谢育才夫妻及未满月的孩子从监狱中放出,软禁起来,询问这封信的暗语。

谢育才从特务的询问中,得知郭潜要来,感到事态严重,于是趁看守疏忽,他和妻子丢下出生不久的孩子逃了出来。他找到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张全福,说明江西省委被破坏,让张速与南委联系。

5月26日,方方得到张全福的报告,立即电告郭潜,让他迅速撤离。然而,郭潜没有马上翻译电报,他很快就被捕了,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他就带着特务逮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破坏了粤北省委。

周恩来得知,急电南委,指示即告正在曲江的廖承志,要他立即到重庆,如走不了,应和他母亲何香凝住在一起。

然而,南委尚未与廖承志联系上,郭潜就在5月30日带着特务逮捕了廖承志。接着,郭潜和国民党特务直扑南委机关驻地广东大埔,6月6日在大埔高陂镇先后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

6月8日,周恩来获悉廖承志被捕,心急如焚,为避免更大损失,立即电告方方,作出六点指示:一是南委与江西、粤北断绝一切往来,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二是南委与廖承志和香港归来的一切公开关系完全断绝,他们的关系,南方局另设法联络;三是停止派人去桂林取款,以免波及;四是立即斩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五是南委直接管辖的下级党部暂作静止,不动声色,不做任何活动;六是立即停止与江西电台联络。周恩来要求他们立即按这六点执行,切勿犹豫,还要将执行情况电告南方局。

然而,遗憾的是,南委电台受到袭击,方方未能收到此电,但是他还是根据急剧恶化的形势及南方局的其它指示精神,采取了一定的疏散隐蔽措施,使部分同志免遭逮捕。

7月9日,郭潜这条毒蛇又带着特务窜到桂林,破坏了中共广西省工委

机关，逮捕了广西省工委书记苏曼等三十多人。

为了使南委党组织免遭更大破坏，8月，周恩来致电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指示南委地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一律转移，其余干部应利用职业隐蔽起来，执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要求尹林平迅速传达到他所知道的党组织。

与此同时，周恩来和孔原还向来重庆汇报工作的潮梅特委张克作了同样指示，再次强调南委和潮梅特委要坚决执行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一切以安全第一；防止事件继续扩大；同时要求方方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撤回重庆。

12月，南方局作出“南委领导取消，工作停止”的决定。至此，中共南方委员会工作结束。

据有的老人讲，这段时间，周恩来特别繁忙，有时候不亚于“皖南事变”后那一段日子，当他得知廖承志被捕，急得脸色都变了。这时候，他一面采取紧急措施，指示南委及所属地方党组织隐蔽转移，一面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被捕的同志。他还挤出点滴时间教育身边同志，对大家进行党性教育、气节教育。

蒋泽民老人回忆了这样一件事。他说：

当时，重庆市有一对夫妻，都是共产党员。因叛徒告密，国民党军警派人前去抓这个男的，他不在，就把他的妻子抓去了。

地下党组织得知后，为防止敌人再来搜捕，立即通知这位同志，不让他回家，让他搬到办事处。

几天后，这位妻子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叛变了。敌人得知她了解的东西不多，她丈夫是共产党的骨干分子，价值大，于是决定以她为诱饵，让她回去找到丈夫，表白自己对革命忠诚，骗取丈夫信任，从丈夫嘴里继续得到新的情况。

这个女叛徒按照特务的交代开始演戏了。她找到丈夫，哭哭啼啼诉说着离别之情。

丈夫问她：“敌人拷打你没有？你挺住了吗？”

她头一昂，胸脯一挺，慷慨激昂地说：“你想，敌人能放过我吗？无论怎样酷刑拷打，我都咬紧牙关，只说自己是家庭妇女，什么也不知道。”

丈夫疼爱地说：“真是这样吗？那你可受苦啦！”

“你还不相信我这个共产党员吗？”她说着就投进丈夫怀里，千娇百媚。

妻子的谎话蒙骗了丈夫，他相信了妻子的话，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地下党组织立即去信指示：“你的妻子已经叛变，你要与她明确划清界限，与她离婚。”然而，这位丈夫丧失了立场，感情代替了原则。

我们知道后，马上汇报给周副主席和邓大姐。

周副主席认真地对我们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对地下党员的教育还存在问题，应该教育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在没有被敌人抓去时，是为党工作的，是我们的同志；如果他被敌人抓去了，宁死也不叛变，那么，他是坚强不屈的好同志；如果叛变了，那他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很清楚的，敌我应当分明。敌人用叛徒、特务抓人是一种方式，用金钱美女收买我们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也是一种方式。可要提高警惕啊！”说完，他那明亮温和的目光从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慢慢掠过，告诫着我们，要经得起各种各样的

考验！

事后，周副主席找这位同志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把其妻叛变的事实详细告诉他，揭穿敌人的诡计，启发他的觉悟，让他辨明是非，站稳立场，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他痛哭失声，事实终于使他醒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妻子划清了界限。为了进一步教育他，周副主席又批准他到延安党校学习。

这件事对大家教育很深。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周副主席教导我们的每一句话和他的表情。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尽管叛徒接二连三地出卖，每个人随时都有被捕入狱的可能；尽管国民党特务恶狼般地围在身边，刽子手的屠刀随时都可以架在脖子上。但是，战斗在虎穴龙潭里的南方局的同志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对党和革命事业赤胆忠心，无论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把生死置之度外。

老同志们回忆这段工作，无不感慨万端。在蒋泽民、袁超俊、吴宗汉、朱友学几位老人的回忆中，几乎都提到了司机段廷英，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

蒋泽民老人较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事迹：

段廷英是重庆办事处的小车司机，给周副主席和董老开过车。

在国统区，我党的地方组织和党员不能公开。南方局召集地方领导前来汇报和部署工作，需要司机秘密接送；有些直接归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员到周公馆或办事处汇报工作，需要司机接送；统一战线中的友人前来商谈国事，也需要司机接送。这些工作大部分落在段廷英身上。他任劳任怨，尽职尽责，从未出过差错。大家亲热地称他老段。

段廷英是山西忻县人，中等身材，没多少文化，平时沉默寡言，从不表现自己。当他完成任务风尘仆仆归来时，有的同志欢喜地问他，“老段，辛苦了，今天又‘遇狗’了吗？”他总是憨厚地笑笑，从不讲一句战绩。

重庆是山城，有雾都之称，早上经常浓雾笼罩，对面不见人。这时候，大多数司机是不敢艇而走险的，可是，老段却开着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奔跑如飞，什么样的天气都难不倒他。无论是狂风大作之时，还是倾盆大雨之夜，他都准时出车。无论行驶在繁华街道还是盘行在崎岖山路，他的车又快又稳，坐他的车既安全又舒服。

老段不仅技术娴熟，而且对敌斗争老练。每当他去车库取车时，特务们的小车、吉普车、摩托车也就相继发动了，在路旁远远地等着，监视着。

老段不以为然，大大方方地把车开出去，吸引这帮“狗”，把车开向大道。明明知道在各个交叉路口都会有特务跟踪，可是，老段把车偏往交叉路口上开。他从倒车镜中看见特务的车子跟上来了，猛踩油门，把车子开到交叉路口上，本应向东拐，他却把车子向西开去，急速跑一段后，见前面车多又突然慢下来，敌车想靠前又不敢，趁这个机会，老段又突然把车开快，拐几个弯就上了大道。他从倒车镜中见敌车没有跟上来，便急速地向东边目的地开去。

等老段回来一段时间后，特务们才开着车垂头丧气地回来，天知道他们跟到什么地方。

当在繁华街道行驶时，老段从倒车镜中看见特务开车跟上来，就把车子

开得飞一样快，朝十字路口驶去，眼见交通岗绿灯变红灯的一刹那间，他猛踩油门，车子箭一般地冲过去，拐进小胡同。

红灯亮了，特务的车隔在了后面。等特务开车过了交通岗，老段的车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在这茫茫人海中，寻找一辆车大难了，特务们就像瞎眼的狗，开着车四处乱闯。

有时候，老段把车刚刚停在路旁，特务们就开车围过来，在附近监视着，看他去什么地方接人。

在这种情况下，老段稳如泰山，索性将车子熄火，躺在车里“睡大觉”，一会就响起均匀的鼾声。特务们见他短时间内醒不了，等得不耐烦了，就到附近茶棚喝茶，或者到饭馆喝酒。老段见特务离去后，立即把车子发动起来，急速开走。等特务们酒足饭饱回来时，这里连个车影都没有了。

老段非常遵守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守口如瓶。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形势紧张。一天晚上，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袭击办事处。为防止意外，办事处领导决定在二楼悬挂一盏信号灯，派两名同志在山上守望，并派老段在红岩村至周公馆的路上隐蔽。约定如果特务袭来，熄灯为令，守望的同志立即去新华日报社送信，然后乘老段车去周公馆报告。

那天夜晚狂风暴雨，信号灯突然熄灭了。守望的同志立即顶着滂沱大雨去报社送信。为了弄清通讯线路是否被敌人切断，报社同志给办事处挂电话，结果弄清敌人并没有偷袭，是灯泡里的丝断了。

老段在这大雨中警惕地巡逻了一夜，等到他得到消息开车回来时，天已破晓。同志们见他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关切地问他昨夜发生了什么事。他仍然憨厚地笑笑，什么也不讲，照常工作。

七个酷暑，七个寒冬，在两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在虎穴龙潭中，段廷英就是这样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他究竟秘密送走多少位首长和同志，传送过多少份密件，我们算不清，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全国解放后，段廷英继续给董老开车。1958年，党号召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段廷英这位对革命有功之臣，主动报名响应，带着全家老小离开京城，下放到山西运城盐场。1986年，他病故了，当年的老战友都来吊唁，陈舜瑶同志写了《金色的方向盘》一文，以示纪念。

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军事上掀起反共商潮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对共产党进行封锁，从1940年起，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在这种经济封锁下，南方局为解决活动经费，开始地下经商，开展秘密经济工作。

南方局的活动经费大致有四个方面支出：一是南方局、新华日报社的经费和特别开支；二是为延安党中央办事的开支；三是所属各地方党组织及海外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四是资助统战对象、民主人士、群众团体。

这些经费来源于四个渠道：一是国际援助，二是英国援华总会的资助，通过宋庆龄中转；三是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和各地华侨的捐款；四是南方局广开门路，秘密经商，自筹资金。“皖南事变”后，第四条渠道成为南方局的主要经费来源。

这些经费均属秘密经费，其收支归属秘密财务，不与重庆办事处混在一起。重庆办事处另设公开财务部门，负责管理公开经费。

南方局的秘密工作筹备于1940年夏，正式开展在“皖南事变”后，由秘密经济机构和秘密财务两部分组成，由周恩来统一领导。

秘密经济机构就是地下经济实体，负责为南方局秘密筹集资金，于1940年夏开始筹建，主体是广大华行，总经理是卢绪章。

秘密财务当时称为特别会计，是南方局下设的分管经济工作的部门，由袁超俊负责。1946年6月袁超俊去延安，由刘少文接替。

秘密经济工作从起步到发展，从经商管理到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尤其是广大华行，更是在他亲自关怀和领导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广大华行最早是个皮包公司，1933年6月在上海由田鸣皋发起，卢绪章、郑栋林、杨延修、张平等五位进步职业青年集资而成，资金仅有200元法币，经营一点儿西药、医疗器械、邮政业务等。

经过四年努力，至抗战前夕，广大华行的邮政业务已有一定基础。这期间，地下党组织利用这个场所组织青年学习，探讨抗日救国问题，是进步青年活动的一个阵地。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广大华行的业务难以经营，田鸣皋、郑栋林等人带着部分业务关系去了香港、昆明，在昆明建立了分行。卢绪章、程恩树、舒自清、张平、杨延修、张先成等人，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们以职业为掩护，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到1940年春，广大华行已成为我党的一个秘密经贸部门。

1940年夏，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已被粉碎，形势有所缓和。为解决南方局经费问题，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研究，决定建立经济机构；派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在上海选拔经济干部。

刘晓经过调查了解，物色了上海广大华行的卢绪章等人，报请南方局。南方局决定把卢绪章连同上海的广大华行调入重庆。

1940年7月、10月，卢绪章和舒自清分别调到重庆，并把广大华行的业务关系也带来。然而此时形势急变，蒋介石集团正加紧反共活动，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这阴风四起的气候不是开展经济工作的季节。为此，南方局决定先把广大华行作为党的交通、情报机关，即是党的第三线机关，不与

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直接归南方局领导。这第三线机关平时不用，一旦国民党政府彻底撕毁国共合作协议，南方局被迫撤退，党的第一线、第二线机关遭到破坏时，就靠这第三线机关发挥作用。

南方局决定之后，周恩来亲自找卢绪章谈话，指示他认真领会执行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建国后前面加了“隐蔽精干”，成为十六字方针），广交各方面的朋友，包括国民党要人，做到完全社会化、职业化，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掩护，经营好广大华行，一定争取在重庆扎下根。

周恩来的精辟指示给卢绪章指明了方向，他认真照办，一点点把脚跟站稳。

南方局为加强对广大华行的领导，把孔原派去，隐蔽到广大华行，就近领导，并将从延安来的严朴夫妇也安排到广大华行。

1940年末，南方局从地下情报得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有陈铁铮的名字，这是孔原的化名，立即把孔原调回南方局。此时，南方局的组织部长博古调回延安，南方局决定由孔原接任。此后，严朴夫妇也因工作关系调回南方局。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决定把广大华行关系交给袁超俊，由他单线联系。

1941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已被我党击退，形势趋于缓和，而卢绪章他们在重庆已经站住脚，广大华行的业务也有所发展，时机基本成熟。于是，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决定把广大华行卢绪章系统正式作为南方局的秘密经济机构，承担南方局的经济任务。

此后，党组织又派程恩树、张先成分别到衡阳、贵阳，在这两地建立了广大华行分支机构。

1941年冬，作为总经理的田鸣皋不愿意把重点业务投放到重庆，故退出广大华行。这样，广大华行总理由卢绪章担任，广大华行总管理处也就正式在重庆成立，下设昆明、衡阳、贵阳、成都等分支机构。

尚在1940年夏，张平从上海途经香港到重庆时，与国民党欧亚航空公司飞行电报员、电讯股长等人联系，在香港设立了新华贸易行，张平任经理。新华贸易行也于1942年并入广大华行。

此时，广大华行已今非昔比了，是一个横跨数省的集团公司。

为加强党的领导，南方局在广大华行和它的分支机构都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

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华行的生意越做越红火。1942年，杨延修与云南国民党官僚、政客、工商界名流联合，在昆明办了中和药厂。1943年，卢绪章同四川的卢作孚及云南实业界人士，在重庆合办了保安保险公司。

随着广大华行业务的发展，生意的兴隆，也就越来越多地为南方局提供资金，成为南方局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从1941年下半年起，周副主席曾多次将一笔笔美钞交给我，派我送到卢绪章那里，由卢绪章做生意或者放利息。我每年都定期或者不定期地从卢绪章那里提回法币，每次总能提回满满一提包钞票，总有二三十斤，有时候比这还多，交给会计入帐。

有的人说，我们共产党人原来都是土八路，不会做生意，都是以后跟洋人学的。此话错矣！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人不仅会做生意，而且做起来很精明，周恩来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还是出色的经济学家。

广大华行系统除担负南方局经济任务外，同时还是党的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的据点。其间，周恩来倾注关心爱护之情，对卢绪章这位经济干部进行辛勤培养。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周副主席关心经济工作，更注重经济干部的培养，卢绪章就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

周副主席经常派我下山把卢绪章接来，而且特意叮嘱，一定保密。我理解周副主席的意图，卢绪章在重庆接触人多，熟悉他的人也多，一旦有人发现他到红岩办事处，并且张扬出去，那就不仅仅是暴露身份的问题了。因此，为慎重起见，每次我都不用司机，亲自开车把他接来。

卢绪章到办事处后，周副主席和他彻夜长谈，指示他在做好经济工作的同时做好情报工作，要寓情报与统战中，为此要广交朋友。周副主席还多次讲，地下工作者要作红心萝卜，外皮是白的，内心是红的。

在这情融融意深深的交谈中，周副主席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传授给他，如润物的春雨，悄悄地滋润着卢绪章的心田，启发他的悟性，使他渐渐成熟。

周副主席和卢绪章谈完话后，我又开车秘密把他送回。

为了帮助卢绪章他们迅速掌握收集情报的方法，周副主席又派我下山传授经验。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我秘密来到卢绪章那里，把所知道的技术和操作方法全部告诉他们。他们很快掌握，而且在实际中能创造性地运用。

1942年下半年，龚饮冰和王一知奉命调到了重庆。周副主席先派他们在广大华行斜对面开个绸料店，以此为掩护，然后把卢绪章交给他们领导，而我只和龚饮冰联系。

周副主席这一安排安全多了。我住在山上办事处，上山下山次数多了，容易暴露卢绪章的身份。龚饮冰他们就住在广大华行对面，以生意人身份可以随时随地同卢绪章联系。这样，不仅保密，而且便于就近领导。周副主席考虑得多周密啊！他的每一步安排都是从保护干部、培养干部出发。

在周恩来亲自关怀和领导下，卢绪章他们在努力做好生意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情报工作和秘密交通工作。卢绪章以职业为掩护，与国民党军政商界的一些要人打交道，巧周旋，从中为我党获取许多重要情报。与此同时，又利用这些关系，逐步打通了从重庆到一些地方的公路，航空方面的关卡，为我党建立了一条极秘密的交通线。有特别重要的地下党同志往来，周恩来就决定利用这条交通线，由卢绪章他们掩护。如：他们曾掩护过刘长胜从沦陷区到大后方，掩护了马纯古在昆明和重庆活动，还为刘宁一在广大华行安排一职务，作为掩护。

从广大华行的形成到发展，反映了南方局秘密经济工作的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周恩来对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才能。

为了使叙述之事完整，这里再交待一下广大华行以后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从重庆迁到上海。1946年在上海成立了广大药房。同年民孚企业公司也在沪建成，与广大华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原广大

华行与美国签定的进出口业务划归民孚企业公司经营，卢绪章兼任总经理。此时广大华行进入它的鼎盛阶段。

1948年，广大华行把大部分资金转到香港，同年6月，华行的党员干部也撤到香港。1948年秋，党中央决定结束广大华行在国内外各地机构，只保留香港的广大华行，交给由党中央直属的香港特别机构华润公司，由钱之光、袁超俊领导。1949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密电香港，决定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至此，广大华行完成使命。

广大华行从1933年成立至1949年与华润公司合并，这期间资金不断翻番，1933年仅有法币200元，1942年资金达到法币20万元，1944年有30万美金，而1949年与华润合并时有资金200多万元美金。全国解放后，这些资产连同华润公司的资产一并交给国家外贸部。

在南方局的经济机构中，除广大华行外，据袁超俊老人回忆，还有以下几个经济据点。

在重庆民生公司给卢作孚作秘书的肖本仁，是我党的一个经济干部，原由钱之光领导，“皖南事变”后交由袁超俊单线联系。袁超俊多次把美金交给肖本仁，存放利息或者经营买卖。袁超俊再定期从肖处提回法币。

在重庆林森路开中药行的老张，也是我党经济干部，南方局曾交给他一笔资金，做中草药批发生意，并在衡阳设了分行，赚的钱上缴南方局。除此之外，他每年都跑广东、湖南、贵州等地，收购和销售中草药，赚的钱也交给南方局。

孙友余的工业原料公司是南方局的一个秘密经济据点，除孙友余外，党组织培养的经济干部还有张哲民。

在广安、北碚的大华炼油厂也是秘密经济据点。南方局投了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进行桐油提炼汽油的试验，把技术引进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解决一部分地区汽油供应问题，如能赚钱也是南方局的收入。

上述这些经济据点除了承担经济任务外，也承担情报和秘密交通任务，与广大华行一样直属南方局，归周恩来领导。

周恩来除领导上述经济机构外，还亲自抓了秘密财务工作。他不仅听汇报做指示，而且亲自动手操作。他那一丝不苟的精神教育着每一个同志。

作为秘密财务的特别会计部门，除袁超俊外，还有刘昂和王辉两位女同志，负责管理帐目和现金。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形势虽然趋于平稳，但是，我们工作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事变。为此，周副主席指示我们，安全第一，保密第一。

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我们在帐目上采取安全措施。帐本都是用极薄的纸做成，而且很小，大约有10元人民币的3/5大。这样小帐本不显眼，平时锁到保险柜里，遇到紧急情况几秒钟就毁掉了。放之方便，毁之容易，敌人不易搜去。

为了保密，每笔帐目都用代号记下。有的代号由周副主席亲自定，有的代号我们自己起。这样一本莫名其妙的“天书”，即使万一不幸被敌人搜去，敌人绞尽脑汁也破译不出来。

特别会计每月收支帐目，由刘昂制成小小的明细表，由我和童小鹏初审，审查完各自签上字，然后呈送到周副主席那里终审。

大约每月初，周副主席审查帐目，把我和刘昂、王辉都叫去。

周副主席非常认真，他面前放个算盘，他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算，一笔笔审查。他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只见算盘珠上下跳动，一会儿就算出来。当然，任何一点儿差错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如果遇到代号是我们起的，周副主席不知道，就问我们。如果遇到不明处，他也问我们，和我们一起弄明弄准。如果数字核不准，他更不放过，反复核算，直到完完全全核对为止。最后，他在帐本上签上周恩来三个字。

周副主席审查完，把帐本交给我，我再把它锁到保险柜里。

1943年6月，我随周副主席回延安时，把历年的帐本也带回延安。到延安后，按照周副主席指示，一本本整理清楚，最后送到中央办公厅，交给赖祖烈。

周副主席这种极端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教育着我们，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至今我回忆起，那种责任感还重重地留在心头。

在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下，特别会计部门的三位同志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为了记清帐目，理好现金，刘昂和王辉每记一笔帐，每起一个代号，都慎之又慎。她们把那小小的帐本、一笔笔现金，当作自己的生命去保护。

负责提款、送款的袁超俊更是出生入死。他要通过国民党军、警、宪的一道道检查，要躲过特务那一双双阴险的眼睛，还要防止小偷扒手的盗窃，每一步都与危险结伴。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高度的责任感，勇敢机智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每次我下山提款、送款都特别小心，先化好装，西装革履，拎着装钱的手提皮箱，一副商人派头，然后上车。小车并不直接奔仓着装钱的手提皮箱，一副商人派头，然后上车。小车并不直接奔要去的地方，而是七拐八拐，甩掉跟踪的特务，开到离目的地很近的地方停车。

我下车后先环顾一个四周，看看有没有可疑迹象。一切正常，我就立即奔向目的地，抓紧完成任务，然后急速绕道上车，以免被特务发现此处，暴露目标。我上车后，汽车加大速度直奔办事处。

说实在的，尽管没有出过一次差错，但是每次出去，心里都像揣个小兔子似的怦怦跳，很紧张，完成任务回来，有时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因为，我手里提回来的不仅仅是钞票，那是党的活动经费，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筹措来的啊！

有一次，周副主席交给我很大一笔美金，让我伪装好。

我接过美金，想了许多办法。先把它放在皮箱底的夹层里，太厚，不行；把厚厚的大字典从中取出一大部分，把美金嵌进去，从外形看和字典一样，但是还不妥，一旦被特务搜查，不是又暴露了吗？想来想去，我只好把这些钞票用胶水粘在一起，外面糊上纸，变成一块厚纸板，放在箱子底下。

当时的国统区通货膨胀，一个月只有三四元钱生活费的我党工作人员，生活非常清苦。尽管经济据点的同志掌握着资金，特别会计部门的同志管理着现金，可是谁也不动一分，连想都没想过。有时候他们饿着肚子去执行任务，手中的钞票都捏出了汗，也一分不少地如数入帐。

南方局的秘密经济工作，是抗战时期我党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解决了南方局的经费问题，更为党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经济干部，

是我党经济工作的一个光辉篇章。

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国内形势也明显好转，经过大生产和整风运动，我们战胜了极端严重的困难，解放区军民经过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收复了大片根据地，这一切为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面对这大好形势，蒋介石既盼望欧战结束，日本侵略者垮台，好乘机窃取抗战果实；然而他又从心里害怕日益强大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权衡一番后，他想再较量一次，掀起反共逆流，削弱共产党。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先作了舆论准备，唆使汉奸陶西圣写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于1943年3月以蒋介石名义发表。全书篡改历史，宣扬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其实质就是要强化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维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蒋介石这一招一式怎能瞒得过周恩来的眼睛呢？这本书的出笼就是蒋介石集团准备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只不过现在的政治气候还不适宜他轻举妄动，故先造些舆论而已。为此，1943年4月，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明目前蒋的政策是向各方施行各种突然袭击和压迫，企图挽救其危机。所以，我们的政策，似宜非常灵活机动，不拘一式，以揭破其阴谋。

同年5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鉴于各国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形势，在此形势下各国共产党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与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鉴于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统一领导各国革命，遂决定解散共产国际。以便使各国共产党更好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相结合，独立地领导本国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征求了许多共产党的意见，其中包括作为它的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

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提议。

当天，毛泽东就致电周恩来，告知党中央的决定，并转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季米特洛夫的电文。毛泽东指出，待收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正式提议后，就发表党中央这个决定。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是有深刻了解的，共产国际解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将起一个推进作用。然而，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件大事，由此可能引起各方面的反映。因此，当他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更加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5月22日晚，就是《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发布的当天，那些敏感的外国记者就采访了周恩来，让他表态。

周恩来以政治家的敏捷思维，答复三点：一、共产国际解散是共产国际七大以来的“自然发展”，并非意外；二、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后对本国问题一向自主决定，并自己解决本身问题；三、中共中央将发表决定。

周恩来回答得入情入理，分寸得当，外国记者无不佩服。

此时，阴险狡诈的蒋介石正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寻找土壤，因此，《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一发表，他就乘机而上，急急忙忙召集心腹大臣进行密谋。决定利用这个国际政治气候，对中共施加压力，办法有二：一是要求共产党交出军权，这样中共组织才可以合法化；二是要求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

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从国民党民主派张治中将军那里及时得到这

个情况。张治中还告诉周恩来，国民党政府将在三天之内就共产国际解散之事发表宣言。

情况紧急，周恩来立即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党中央立即发表决定，以免国民党抢先。

当日，即5月26日，党中央就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指出，共产国际过去对于中国人民是尽了一切可能来给予援助的。但由于种种理由，在现在的条件下，共产国际的解散比继续存在更有利。因此，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

蒋介石没有钻进这个空子，他的阴谋破产了。然而，他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又指使一些人，叫嚣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一时反共言论四起。

远见卓识的周恩来洞察着国际、国内这一系列的变化，根据国民党顽固派们连日来的表演，及蒋介石抛出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造的舆论，蒋介石肯定会利用这个政治气候再次掀起反共恶浪，而且很快付之军事行动。于是，他于5月30日致电毛泽东，指出，共产国际解散后，蒋有幻想，可能对我们采取组织上的溶共政策。

与此同时，周恩来召集南方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国民党政府可能对共产党采取的方针，并作出相应对策。将研究的意见于6月4日电告党中央。

报告指出，南方局估计，国民党将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加强政治攻势，同时施以军事压迫，强迫我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达到他们所谓的解决之目的。

我们的对策主要应是：向各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多谈边区有关问题，分比顽固分子，争取广泛同情；在民主运动方面，着重研究民主合作的道路及实施政策，以教育民主分子；在宣传方面，用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战和建设成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辅之以揭发敌伪的某些阴谋与当局政策的矛盾，且宣传要特别注意民族化；加紧我们的外事活动，与英美自由主义者加强实际联系。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的第十天，6月12日，蒋介石唆使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的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借“民众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发出电文，胡说“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边区，向共产党下了“讨伐令”。

蒋介石集团很快付之行动。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了反动军事会议。6月末，蒋介石下令把国民党驻守在黄河的两个军调来，会同原来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总共五十万人，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并于7月7日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准确汇报，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号召解放区军民起来自卫，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严惩进犯边区的国民党军队。

共产国际解散决定公布后，党中央就来电让周恩来回去，共商有关事宜，然而国民党政府借故拖延，不提供交通工具，以致迟迟不能返延。6月党中央再次来电，要求周恩来回延安参加筹备七大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这时国民党才同意放行。

周恩来和邓颖超、林彪、孔原等100多人于6月28日起程，行到宝鸡时，接到西安办事处派人送来的急电。

电报是毛泽东于7月3日、4日连发给西安办事处的，让他们转交周恩来。胡宗南部队已侵入边区地境，正在修筑工事，毛泽东让周恩来和胡宗南交涉。

跟随周恩来同行的袁超俊老人回忆了这个历史片断。他说：

大约1943年7月9日，我们跟随周副主席到了宝鸡，正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已派重兵袭击边区了，形势很紧，火药味很浓，从宝鸡到西安途中，到处是国民党荷枪实弹的部队。

西安办事处已派人等候，我们车队一到，他们立即把电报交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阅后脸色严峻，把电报收起，命令车队暂停在宝鸡等候，他和邓大姐、林彪、孔原等人立即乘火车去西安，同胡宗南交涉。

大约7月13日，胡宗南派专车把周副主席他们送回宝鸡。此时，形势略微有点缓和，周副主席交涉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又上路前进，7月16日赶到延安。

在这国共两党即将兵戎相见的紧张之时，毛泽东电告途中的周恩来，同时又于7月4日致电重庆的董必武，告之，蒋介石正增兵包围我陕甘宁边区，内战可能爆发，请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来，呼吁制止内战。同时，对张治中、刘为章及各国驻重庆使馆说明，我们正在讨论解决国共关系的办法，以赢得同情和制止内战的时间。

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朱德总司令于7月4日和6日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纷纷起辛，以不同形式反对内战，要求团结。其势如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7月9日，延安三万军民集会，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在绥德和三边地区也召开了万人大会，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内战。紧接着，各解放区也纷纷集会，声援边区，以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

7月20日，毛泽东又电告董必武，指出，为彻底揭穿蒋介石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的阴谋，除已发之通电和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为驳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世界舆论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介石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体系。指示南方局：一、收到此文后，立即印成中英文的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二、搜集各方面反响，报告党中央；三、“新华”、“群众”用其他迂回方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行。

周恩来去延安后，南方局暂由董必武负责。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南方局、办事处、报社及地下党的同志，秘密用中英文印发了各种有关材料，向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和加强法西斯统治的阴谋，展开舆论大反击。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连续发表文章，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怎么办》、《法西斯丧钟敲响了》、《彻底扑灭法西斯毒害》等，谴责中国法西斯分子的罪行。

蒋泽民老人回忆了这段斗争过程。他说：

在董老的领导下，我们展开宣传攻势。

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的新闻检查制度，控制《新华日报》发行，我们

就采取灵活方式与他们巧妙斗争。他们上午控制检查，我们下午卖报；他们在大街上搜查，我们就让报童到胡同里卖。我们的文章不让发表，就印成小册子，夹在报纸中卖，甚至装在信封里挨家挨户地送，千方百计发出去。

我们还把这些材料汇集成小册子，发往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翻译成英文，送给在重庆的外国使馆、使团和新闻记者。

我们办事处又召开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座谈会，散发宣传材料。通过座谈讨论，大家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蒋介石的反共独裁罪行。

由于我党在事前的揭露，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使蒋介石无隙可钻，不敢轻举妄动；又由于我党开展宣传攻势，充分发动了群众，大大地孤立了顽固派。在人民群众的谴责和声讨中，蒋介石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来得及成为大规模军事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了。这是党中央充分发动群众的结果，充分显示了人民的力量。

然而，这次胜利与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是分不开的。是他通过可靠的情报，了解到国民党政府的企图、动向，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使党中央知己又知彼，心中有数；是他洞察了这变幻的形势，做出正确判断，汇报给党中央，使党中央及早做出全局性的部署；又是他在途中与胡宗南交涉，使胡宗南暂缓军事行动，使我们赢得了时间。总之，这个胜利，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配合党中央共同取得的。

美国《新时代》杂志社的记者白修德，曾称赞周恩来是“塔中侦察机”。对于领导国统区斗争的周恩来，这个称呼是很恰如其分的。

这里顺便交待一下，周恩来他们到延安后，立即投入到正在深入发展的整风运动。

此时，把持中央社会部的康生夸大党内和边区内部敌情，认为特务多如牛毛，处处皆是，提出抢救失足者。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各单位开展了“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许多干部无端受疑，尤其是地下党员普遍是怀疑的对象。一时延安人人自危，非常紧张。

这时候，作为领导地下党组织斗争的周恩来，处境也比较困难，但是他襟怀坦荡，竭尽全力保护了一些同志。

袁超俊老人回忆了下面的往事。

16日那天，我们回延安的车队停在杨家岭大礼堂旁边。大家都下车休息，周副主席带着我爬到山上，来到毛主席的窑洞。

周副主席先把我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起身和我握手，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周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我就离开那里，信步走到山下。这时我听见从大礼堂传出一阵阵口号声，顿觉奇怪，就问旁边的一位同志，他说里面正在开抢救大会。

我好奇地来到门口，看见屋子前面站着一个小姑娘，也就有十六七岁，四川口音，她正在坦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特务，还是汪精卫的特务。我好困惑呀，她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可能呢？

晚上，大家都安顿下来休息了，周副主席还没有回来。我坐在灯前等着他。

一会儿，周副主席回来了，亲切地对我说：“超俊呀，你别搬走了，就住在我这里，先好好休息休息，再把带回来的南方局特别会计帐目整理出

来。”

这样，我就留在周副主席身边，与他同住一个院儿。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个抢救运动是康生搞的。这时我恍然大悟，周副主席为什么把我留在身边，他这是在保护我啊！我这个一直在白区工作的人，康生他们能放过我吗？不仅会把我打成特务，而且说不定把我揪出去斗争成什么样子呢！想到此，深深的感激之情从心底涌起，周副主席这是第三次救我啊！

康生一伙搞的这种极左的“抢救运动”，很快被毛泽东制止了，立即纠正，并给受冤枉的同志平反，使整风运动走入正轨。

如果按美国记者白修德所喻，周恩来是“塔中战斗机”，那么南方局就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庞大机群，那些工作在国统区的同志就是一架架小的战斗僚机，他们在长机周恩来的带领下，冲云霄，破迷雾，一往直前。如果遇到电闪雷鸣，周恩来这架长机无论自己怎样困难，也总要竭尽全力照顾他的“僚机”，像保护自己的“羽翼”那样去保护他们，即使自己受到伤害也在所不惜。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啊！

南方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这种形势下，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力排万难，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使我党的统战工作继长江局之后更发展，更深入，开创了历史新篇章。

——广泛团结科学文化界人士，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统区文化界在抗战初期擎起的抗日救国旗帜已改为抗日民主，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倒退。通过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深入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这面旗帜下，组成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这个战线组成的基础是三个文化团体组织。

一是文化工作委员会。武汉沦陷后，原来的三厅撤到了重庆，进行艰苦的抗日宣传工作。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蒋介石要求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并下了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

三厅中共党组织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找到张治中，先将了他一军，说：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派的文化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了，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去延安。

张治中感到事情严重，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想把这些人留下，又想划个圈子把他们圈起来，束缚他们抗战的手脚，于是就把郭沫若等人找去，要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内再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

郭沫若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灵机一动，将计就计地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40年10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它的成员除了三厅人员外，还有其它各界名人，有著名作家、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记者、诗人等。

为进行合法斗争，周恩来又进一步布置了斗争策略，他说：国民党当局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但我们可以通过政治部所属机构的合法地位进行工作，不受他们的束缚，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进行活动。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给我们地盘站住了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在国内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大家坐下来深入研究，用研究成果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占领阵地，并同顽固派的封建法西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推动抗战民主事业。

文工会人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跳出圈子走向社会，举办各种讲座会、座谈会、报告会，以学术活动方式联系群众，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与此同时，他们又认真从事本专业研究，历史、哲学、文艺理论、文学创作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有价值的成果。郭沫若创作的名剧《屈原》在重庆公演后轰动山城，舞台上，“屈原”那愤慨的呐喊，句句喊出了国统区人民的心声，“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将一切沉睡在黑暗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吧！”

第二个是自然科学座谈会。1939年春，新华社的潘梓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少数党员联系自然科学界的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1940年初，自然科学会又在《新华日报》上创办了《自然科学》副刊，宣传

科普知识。

1944年，随着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周恩来指示潘梓年，要求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团结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建立公开进步的科技团体。为了取得自然科学界上层人士的支持，周恩来又亲自拜见了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和他们亲切交谈。经过努力，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于1945年7月1日正式成立。理事长竺可桢，监事长李四光，正副秘书长均是中共党员。

中国科协的章程明确要求：科学工作者要团结起来，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共同奋斗，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要改革贪污腐化、不民主的情况，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第三个是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也是在周恩来帮助下成立的。它的宗旨是：继承“五四”精神，争民主，争自由，反对独裁统治，要求团结抗日。此后，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民主科学社”，抗战胜利后又改为“九三”学社。

这三大文化团体，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人士充分组织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文化大军，把抗日民主运动推向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对之又气又怕，于是在掀起反共高潮时又对这些进步文化人士进行迫害。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带领国统区人民采取巧妙灵活的方式进行营救斗争。其中为马寅初先生祝寿之事就是生动一例。

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是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目睹了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的丑行，公开发表演讲进行抨击，并直言不讳地指向蒋介石：“有人说蒋介石是抗战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称得上是家族英雄。”

国民党顽固派虽然想迫害马寅初，但碍于他在国内外名望甚高，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于是就以国民党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之职进行拉拢，然而，刚直不阿的马寅初对此嗤之以鼻，严词拒绝。国民党顽固派见软的不行就换硬的，指派特务寄去恐吓信，马寅初无所畏惧，照样敢怒敢言。1940年10月，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下令把马寅初逮捕，投入监狱。

周恩来和南方局得知后，立即组织重庆各界人士设法营救，并通过《新华日报》，用迂回方式把马寅初被捕入狱的消息公布于众，立即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

1941年3月30日是马寅初的60岁生日，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重庆大学进步师生准备在这一天举行遥祝马寅初先生寿辰大会，然而启事刚在《大公报》、《新晚报》上刊出来，国民党当局就下令撤版停止刊载。于是，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在3月24日把这个消息刊登出去。这样，重庆各界人士知道了为马寅初祝寿的事，纷纷准备前来参加。

尽管蒋介石下了严禁召开祝寿会的手谕，但是，重庆师生和爱国进步人士毅然冲破种种阻拦，准时来到寿堂。寿堂内挂满了各界知名人士送来的寿联、寿幛，其中，最醒目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的写在红绸子上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这首寿联寓意深刻，给人一种凄凉悲愤的意境，如果细细品味，又给人以希望和力量。执教三十多年的马寅初先生桃李满天下，今日大家前来为他祝寿，然而，寿堂内竟不见这位老寿公。此时的他正囚禁在异处，身边无亲无友，只能以琴书为伴。但是“支床有龟（归）”，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马老先生一定能归来。

翌日，重庆各大报纸准备刊登庆祝马寅初寿辰的报导，然而均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下。于是，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登出一个加框的重要声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两篇，奉命令免登”。这样，既从侧面报导了祝寿会如期举行，又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卑劣行为。

祝寿会后，社会舆论一片呼声，强烈要求释放马寅初。迫于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1942年8月将马寅初释放出狱，然而却又将他软禁在家中，一不准任公职，二不准去各大学教书，三不准发表文章和演讲。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南方局宣传部的许涤新，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

许涤新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让新华社派一名记者去马寅初家采访、约稿。当这位记者把马寅初写好的稿子拿回后，周恩来亲自过目，连称好文章，并嘱咐报社付给最高稿酬，用这种办法给马寅初以经济上的帮助和政治上的支持。马寅初深受感动。

此后，周恩来继续组织各方人士相助，终于使马寅初先生真正恢复自由。
——争取中间势力，中国民主同盟成立。

1939年10月，即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结束后，一些主张团结抗战的代表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统治很不满。于是，沈钧儒、邹韬奋、张澜、黄炎培等人在董必武的支持下，把这些代表组织起来，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是一个松散型的组织。

翌年5月，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听到汇报后非常高兴，并在南方局的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加强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此后，他多次找这些中间人士交谈，争取他们与共产党一起坚持抗战，制止顽固派的分裂活动。

“皖南事变”后，一些中间派和无党派人士处境更困难，他们深感要争取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要抗战，要民主，必须团结起来，与共产党合作。而“统一建国同志会”已经适应不了这个要求，于是黄炎培他们多次密谈，准备将建国同志会改为民主政团同盟。他们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非常支持，鼓励他们把中间力量团结起来，开展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重庆正式成立，参加的团体主要是三党两派，即青年党、第三党、国社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几个月后救国会也加入，变成三党三派。黄炎培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此后不久，黄炎培辞去主席，由无党派人士张澜继任。张澜在无党派和中间派中享有很高威望，因此许多无党派人士纷纷参加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这期间，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一直与同盟会的发起人、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为他们排忧解难，彼此结下友谊。因此，中国民盟从它创立开始就与共产党在政治上合作，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有很大影响力的党派。

——争取地方实力派，筑起后方堡垒。

抗战时期，西南地方实力派力量比较强大，有军队又有地盘。蒋介石对他们既打又拉，想方设法要吞并他们。实力派和蒋介石矛盾重重。为此，周恩来和南方局决定利用矛盾，把他们争取过来。

龙云是西南地方实力派中势力最大的人物，既握有重兵，又是云南省主席，但是他与蒋介石积怨很深，因此，南方局成立时周恩来就指示：“要充

分利用龙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决定由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李群杰做龙云等上层人物的工作。

在我党的努力工作下，龙云态度明朗，表示：“敌人图谋加紧挑拨离间，全国应该加紧团结，抗战到底。”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到云南策动反共浪潮。康泽一到昆明，就把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交给龙云，要他进行大搜捕。

龙云把这份名单拿在手里，深知它的分量，这是上百个共产党人的生命，他想起共产党对自己的以诚相待，也想起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险，于是心中天平的法码放好了位置。他理直气壮地告诉康泽，没有证据可认定这些人是共产党，一个也不能逮捕！

由于龙云的拒绝，保护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使蒋介石的阴谋破产了。然而这也激怒了蒋介石，7月他又派何应钦到昆明，催促龙云成立党政军汇报会，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次龙云没有理由推倭，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为了抵制国民党中央的控制，他亲自挂帅，便于随机应变。而担任汇报会秘书的正是我党以前派去的李群杰，他负责会议记录，及时把情况汇报给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立即采取应急措施。这样，国民党当局大搜捕的计划落了空，蒋介石的阴谋最终没能得逞。

1940年10月10日，在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昆明6000多人集会纪念双十节，号召保卫大西南。为防意外，龙云派警察到会场保护。由于有龙云这个地方实力派的保护，昆明的爱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大后方的堡垒。

抗战胜利后，龙云对蒋介石放松了警惕，遂被软禁。此后，国民党当局对昆明的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

——努力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工作，把“对手”、“冤家”也团结过来。

国共商党合作期间，周恩来一直比较注重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尽管国民党是蒋介石把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但内部成分复杂，虽然有追随蒋介石的顽固分子，但仍有一部分人始终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真心实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妥协投降。在上层人物中，有与我党长期合作，并对我党我军抗战事业给予大力支持的宋庆龄、何香凝，有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逆流时，与中共南方局建立和衷共济的合作共事关系的李济深，还有直言不讳怒斥蒋介石反革命行为的冯玉祥。他们是与我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朋友。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善于团结其他国民党上层人物，甚至团结曾经陷害过自己的冤家对头。

抗战前期，张冲是国民党的主要谈判代表，1936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就派他同共产党谈判。他同周恩来从西安谈到武汉，又从武汉谈到重庆，长达五年之久。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担任过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是策划陷害周恩来的所谓“伍豪启事”的主谋者，可谓冤家对头。因此，张冲初来谈判时不免心有疑虑，担心周恩来旧事在心，对自己有成见，然而，事实给了他最好的回答。

周恩来虚怀若谷，又坦坦荡荡，从不把个人恩怨放在心上。谈判桌上，他以国家大计、民族利益为重；谈判桌下，他是坦诚第一、谦逊第一、他人第一。由于谈判需要，他们有时候在一地起居，周恩来与张冲谈笑风声，并

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他，照顾他，待他如朋友。

张冲被周恩来的气度和真诚深深感动了，从内心深处钦佩周恩来的为人。在周恩来的感召下，他也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偏见，谈判中能及时地把我党意见向蒋介石反映，为沟通两党关系起了积极作用，“皖南事变”后，张冲对蒋介石反共的卑鄙行为非常气愤，对别人说：“这使我没脸见人了。”

张冲病故后，周恩来送去挽联，上书：“甘苦谁与共；安危忆同舟。”并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文中写道：“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返，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这是周恩来给与自己在谈判桌上斗了五年的对手的评价，这是最公正的也是最高的评价，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啊！这样的胸怀能容得下高山，也容得下冰川；容得下春天的温暖，夏日的热情，也容得下秋风的萧瑟，严冬的残酷。

抗战后期，张治中是国民党的重要谈判代表，他是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向委以重任，但是，他却始终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

张治中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相识。张治中非常钦佩周恩来渊博的学识、超群的才华，以及精明干练的作风；周恩来也很赞赏张治中能身体力行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共、亲共。他们的友谊就从这里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两人又走到一起。

长沙大火发生后，张治中又惊又怕，他没想到尚没有自己命令时，那帮贪生怕死的警察就放火烧城，更没想到一个好端端的长沙城毁于这场大火中。而此时一些别有用心心的国民党官员又落井下石，不分青红皂白，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向张治中头上。

正当张治中一筹莫展时，周恩来来到他的身边，先对他温言劝慰，又指出他的责任所在，并让他“赶快善后，收拾人心”。这暖语明言如同雪中送炭，安定了张治中惊恐的心，又给他力量和希望。张治中把拟好的以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的稿子，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字斟句酌，认真修改，首先批评国民党政府“焦土抗战”方针的错误，又对起火原因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张治中深受感动。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处在困境中的张治中深深感到，还是老朋友恩来有真情啊！从此他更加敬重周恩来，只要周恩来委托的事他一定照办。

1945年10月，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刚刚签字，蒋介石就派张治中去新疆处理伊犁和塔城的事。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想到尚关押在迪化（乌鲁木齐）国民党监狱中的那批同志。

尚在抗战初期，新疆的盛世才比较开明，亲苏也比较靠近共产党，于是在盛世才的要求下，党中央派出毛泽民、陈潭秋等一大批得力干部前去新疆，帮助他开展工作。这样，迪化就成了我党去苏联的中转站，凡是去苏联或归国的同志都要经过这里，蒋泽民老人从苏联学习回来就在迪化停留过。

然而苏德战争爆发后，当德军包围莫斯科时，盛世才错估了形势，他认为苏联将被德国吞并，于是在政治上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亲苏变为反共，于1942、1943年两次把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全部逮捕入狱。

张治中临行时，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来到桂园张府，把营救这批同志的事委托给他。周恩来诚恳地说：我们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

明，释放政治犯的事已写入《双十协定》，你到新疆后请设法把他们放出来。新疆情况很复杂，回内地路途遥远，请你派人把他们送回延安。

张治中慨言应诺。他一到迪化立即派屈武去狱中探望这些共产党员，并送去钱，然而狱中同志疑心国民党耍花招，拒不收钱。屈武就向他们解释，说钱是张治中将军送来的，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同志们听说周恩来的老朋友到了新疆，心里升起希望，也比较放心地把钱收下。

张治中把周恩来委托的事一直挂在心上。1946年3月，他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到迪化一上任，立即批示：改善狱中伙食；准许在狱中自由活动；每日供给报纸并代购书刊；准许与配偶会见。与此同时，他又先后三次致电蒋介石，措词恳切，要求执行《双十协定》，释放这批中共人员。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张治中马上派人到狱中宣布这个消息。

饱受牢狱之苦的同志们听说获释欣喜若狂，然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又使他们产生疑虑，为免上国民党特务的当，他们要求出狱后，先在迪化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再走，并要求在报纸上刊登消息。

张治中觉得不妥，首先不能登报，那无疑是向特务机关报告，而蒋介石又是出尔反尔的人，今天定的事情明天就能推翻，所以必须立即把这批共产党人送走，于是，他请狱中同志派代表来商谈。这样，狱中同志派杨之华等六人为代表。张治中秘密接见了他们，恳切地说：“你们不要多心，释放并护送你们到延安是真的，这不但是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时提出的要求，也是周恩来先生谆谆嘱托。恩来先生从大革命起就和我好朋友，我从重庆来新疆前，他们夫妇亲自到我家再三嘱托。你们一出狱就走，不能停留，更不能见报，否则有危险。”

代表们认为张治中的话情真意切，决定遵他意见办。

张治中把护送的事交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峙岳把这个任务交给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刘亚哲根据陶的交待，详细拟定了护送计划，并报请张治中审批。

临行前，张治中特意把刘亚哲找去进行叮嘱，告诉他这是护送而不是押送，要注意礼貌。你把他们送到兰州，将有人接替你。从迪化到兰州的路既远又不平静，尽管你带着武装人员，但也要十分警惕，保证他们的安全，沿途要和驻军取得联系，必要时请他们协助。每到一地要来电话或电报，有困难随时请示，只要遵照我的指示办事，一切由我负责。

队伍出发前，张治中分别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省主席祝绍周、陕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发去电报，强调这批中共人员是经蒋委员长批准释放的，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他们沿途放行并妥善接待。同时，张治中又把这件事和他们动身日期简明扼要地电告周恩来。

在张治中的周密部署下，从狱中出来的131位同志历尽坎坷于1946年7月8日到达延安。有关这方面的回忆录已很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全国内战已经爆发，如果张治中对周恩来委托的事不及时去办，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接待美军观察组，开展国际统一战线。

1941年12月，继苏德战争之后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欧洲、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宣布对日作战，扩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又与世界人民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美、英两国与中国在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联盟。

周恩来高瞻远瞩，洞察着这瞬息万变的形势，透彻地分析着美国执政者和蒋介石的心理。

美国要想在太平洋战争中取胜，必须依靠中国这个战场，以此牵制日军。蒋介石也十分清楚，要想消灭共产党，独吞抗战成果，必须依靠美国，依靠美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援助。在这些基本利益上，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是一致的。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又有着分歧，尤其是蒋介石和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有矛盾。

为此，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决定抓住时机，利用矛盾，开展外交斗争。

美国政府为了减少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对中国采取了灵活的现实主义政策，特别是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一再退败，而共产党又逐渐强大，于是准备同共产党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到中国，代表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出，美军要派观察组去延安。

蒋介石大为吃醋，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依靠美国军事援助的他又不得不答应。

当史迪威征求周恩来的意见时，周恩来当即表示欢迎。

周恩来马上给延安发报，向党中央汇报。党中央复电同意。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亦称迪克西使团一行18人，在团长包瑞德上校带领下，由美国乘专机飞到重庆。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去机场迎接。

这是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那么，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又是怎样接待的呢？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周副主席指示办事处做好准备工作。

首先是接待工作。由周副主席和龚鹏负责接待观察组的上层人物；陈家康、乔冠华带人接待观察组的下层人物。周副主席要求大家了解清楚每个组员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出生地、家庭住址、父母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和毕业的学校，每个人的特点和生活习惯，甚至他们喜欢吃什么都要了解清楚，做到心中有数，便于会谈时能很快打开因国籍、种族不同而带来的拘谨局面。

另外，要准备好文字材料，并译成英文。

周副主席考虑得非常周到，每一件小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美军观察组到了。他们是带着对共产党的蔑视和敌意来的，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会受到以周副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热情而有礼貌的接待。尤其是英俊潇洒的周副主席，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对人坦诚，又深谙国事，他们在吃惊之中不免产生钦佩。

在周副主席的邀请下，他们到中国菜馆就餐。周副主席看看桌上的菜，又亲自下厨房，根据美国人的口味亲自动手烧了一个菜。

他笑容满面地把菜端到桌上。有人用叉子扎了一块放进嘴里，咂咂嘴，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人看看菜，又望望周副主席，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故意、防备、拘谨、尴尬的气氛很快消失了，大家谈笑风声。

在和谐的气氛中，周副主席向他们介绍了国统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贫困的真实情况，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这热情友好的接待，耳闻目睹的一切，不能不使观察组成员深思，心里产生对国民党执政者的怀疑，也就更想到延安去亲自看一看。

1944年8月7日，美军观察组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乘飞机去延安。

在延安，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见。

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美军观察组深入各地了解调查，所见所闻使他们耳目一新。被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包围、封锁下的延安，是一个土地贫瘠的山沟，然而，这里的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荒种地，竟奇迹般地解决了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人们生活安定，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这里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到普通士兵都是供给制，几乎都穿着青一色的灰军装，人人都在艰苦奋斗。军队纪律严明，官兵平等。机关办事效率高，工作人员朴素、和气、坦诚。这一切都和国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又良好的印象。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同包瑞德、谢伟思等人谈话，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谈到未来时，周恩来告诉他们，我们希望实现联合政府，只要蒋介石承认中共为平等的伙伴就行。“美国人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两国可以和睦相处。”

毛泽东想得更远一些，他说，虽然中共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提供援助，剧烈的社会改革可以推迟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向美国人描绘着一个宏伟的蓝图。在这两位东方伟人的描绘下，包瑞德他们似乎看到了未来的新中国，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富强的中国。

美军观察组不负此行，他们把观察到的情况汇报给美国当局，促使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有所转变，更趋向现实主义，我党的外交工作初见成果。

1944年8月18日，党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把这次接待美军观察组看作是我党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党外交工作的开始。

与此同时，一向独裁的蒋介石则被激怒了，也被气坏了。据《南方局大事记》记载，1944年10月12日，董必武致电党中央。报告当前美蒋关系，说，从6日蒋介石约孙科等人谈话中透露，中美商谈濒于破裂，蒋认为史迪威袒共，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还说美国的压迫已超过限度。

我党成功地接待了美军观察组，掀开我党统战工作的新篇章。而在接待过程中，周恩来那超众的才华，谦逊的态度，宽阔的胸怀，潇洒的风度，给观察组每个成员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周恩来的：“我简直就完全相信他是极其超群出众的人，但如果那时我事先还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听到他的回答之后，也就完全知道他的聪明机智了。他不仅诚实可嘉，而且还胸有成竹地要求自己对于一位忠于他祖国的美国人的可能冒犯缩小到最小程度。”

21 老半天是多少

在国统区复杂险恶的环境下，南方局的工作很艰巨，要求每个工作人员不仅有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为此，周恩来对大家严格要求，耐心教育。

几位老人回忆说：我们初到周副主席身边，他给我们的印象比较严肃，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严格要求我们。因此，我们不敢有一点儿马虎，似乎又有点儿怕他，尤其怕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那敏锐的目光仿佛能一下子看到你的心里。

袁超俊老人举例说：吴志坚是我们副官中年龄最小的，才 16 岁，既聪明又调皮。他最早是叶剑英参谋长的副官，叶参谋长比较喜欢他，他有时候也和叶参谋长开玩笑。在武汉办事处时，一次叶参谋长送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琪翔，走到楼梯上，吴志坚从后面跳起来去摸叶参谋长的脸，和他开玩笑。叶参谋长疼爱地责怪：“小鬼，调皮！”

就是这个无拘无束的吴志坚，在周副主席面前也规规矩矩，站有站样，坐有坐相。

老人们又说：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对周副主席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不仅严格要求我们，更耐心教育我们，他严中有爱，严得一丝不苟，又严得亲切感人，是循循善诱的恩师。

吴宗汉老人讲了这样几件小事。

周副主席对我们要求很严，无论工作还是回答问题，都要求做到准确无误，为此，他总是从日常小事中教育我们。

一次，周副主席让我派人送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很急，我立即去办。

过了一会儿，周副主席过来问我：“小吴，你派的人走了没有？”

“走了。”

“走了多长时间？”

“老半天啦！”

“老半天是多少？一天有几个老半天？你不看看时间随便说，没有准确性。”

我无言可答，面红耳赤，是呀，“老半天”这三个字我不知说过多少回，可它到底是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

周副主席莞尔一笑，语气温和地说：“时间的概念很重要，尤其是在战场上，一分一秒都不能差。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亦如此，无论说话还是办事都要有准确性。”说完，又亲切地望了我两眼。

周副主席这亲切的目光扫去了我的尴尬，我被他批评得心里热乎乎的。

我和周副主席一个党支部，也就是南方局党支部，大约有 100 多人。每次支部活动，周副主席都准时参加。

1945 年，我既担任办事处的交通科长，又兼任总务科长。支部改选时，有的同志提我为候选人。我一听急了，忙说：“不行！我没有经验，行政工作太多，不能提我。”

周副主席在一旁搭腔：“不能提我，这句话能说吗？共产党员不担任党的工作，算什么共产党员？现在是提候选人，你先就把门封上了！忙，谁不忙？要靠自己安排，要靠自己挤时间。”

几句话说得我脸红心跳，羞愧地低下了头，是呀，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

不去承担党的工作呢？不仅要承担起来，而且要干好。

经过大家表决，我真被选上了，担任组织委员，书记是袁超俊。

会后，周副主席抽出时间找我谈话，指出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教给我工作方法，并鼓励我把这项工作干好。

重庆谈判时，毛主席曾给一位知名人士发寿电。

周副主席把毛主席拟好的电文，交给办事处的一位同志承办。这位同志文化水平较低，电文中有两个字看不懂，就擅自抹掉了。他发完电报从邮局回来，向周副主席做了汇报。

周副主席一听急了，大声说：“毛主席的文章，我都没有权力改，你竟抹掉两个字！看不明白可以问别人嘛，赶快再重发一份。”

他立即去办，然而邮局不同意，最后只好在电报的后面加上抄稿人有误，以挽回影响。

事后，周副主席以此事教育我们，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文章要认真负责，对党的文件亦应如此。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每项政策、每个策略又是通过文件形式传达的，如果文件中有一字之差，那将给党的事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我们在起草或传达文件时，不准许有一字遗漏。

周副主席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不但亲自给我们作报告，别人作报告时他也经常去听，一边听报告一边看报纸。报告结束时，他就问身边的同志，今天报告讲了几个问题？每个问题要点是什么？

一次，周副主席又问身边的一个同志。

这个同志听报告时思想溜号了，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

周副主席批评他：“你做统战工作的，不听报告行吗？不掌握好政策，怎么去做统战工作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顿了顿，他环顾一下我们，微笑着说：“我也是来听报告的，你们别看我坐在这里看报纸，报告的内容我全听进去了。”说完，他把报告的内容一点也不漏地重复一遍。

我们在场的人深受教育，以后学习时谁也不敢溜号了。

周副主席不仅在工作上、学习上严格要求我们，而且也非常注意培养我们的仪表和作风。

周副主席很庄重仪表，无论何时，他的衣服扣子都系得整整齐齐，鞋擦得干干净净。他走路轻而有力，总是那么精神。

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严格培养我们。如果有人走路慌慌张张，他就笑着问：“谁在后面追你，怎么这么慌张？”如果有人走路无精打采，他又故作不解地问：“怎么了？今天有心事啊？”幽默的话里含着善意的批评。

周副主席耐心告诉我们：我们是代表共产党和八路军工作在国统区的，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不仅要注意一言一行，也要注意一举一动。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周副主席很喜欢孩子，他和邓大姐收养了许多烈士遗孤，在海南岛牺牲的李硕勋烈士的儿子李鹏，“皖南事变”中遇难的项英的女儿项淑云等，都是周副主席和大姐收养的。他们工作忙，就把这些孩子交给我带，再三叮嘱我，既要注意他们的身体，也要注意他们的思想和学习。

这些孩子聪明活泼，非常可爱。周副主席一有空闲就来看他们，抱着小的，领着大的，亲亲热热如一家人。

1942年夏，在重庆的陶行知先生来到办事处，向周副主席汇报，他办的育才中学面临困境，一是经济困难，二是国民党当局刁难，宪兵警察经常到学校找麻烦，要取缔这所学校。因此，他请办事处把一部分孩子送往延安。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办的工读学校，在离办事处大约二三十公里处的草街子。学生大部分是抗战时期失去亲人的孤儿。他们有的学绘画，有的学音乐，是一所培养新型人才的学校。

周副主席听后很着急，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因为我曾经在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念过书，是他的学生。

我接受任务后来到了育才学校，与陶行知、方毅等人商量研究，决定从在校学生中选出二十几名在大后方没有亲人的孩子，送他们去延安，跟着去延安的车队走，并让他们提前几天到办事处报到，做临行前的准备。

几天后，这二十几个孩子来了，我把他们安排在办事处招待所，然后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

周副主席亲自去看望他们，又逐一审查他们的档案，经过认真查阅，从中查出学音乐的社鸣欣和学绘画的伍必端在大后方还有亲属，因此决定不让他俩去延安。

周副主席让我把这两个孩子叫来，当面通知。

这两个孩子听说不让他们去延安，立时又哭又闹，鼻涕一把泪一把。

周副主席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更何况是孩子的泪水呢？但是，决定了的事情就要严格执行，不能破例。于是他又哄又劝，可是他俩听不进去，非要跟着去延安。

这可怎么办呢？对孩子又不能下命令。周副主席对我说：“超俊，你先把他俩带在身边，慢慢开导，做思想工作，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把他们送回学校。”

周副主席给这两个孩子擦干眼泪和鼻涕，拍拍他们的肩膀，疼爱他说：“别哭了，先跟你袁叔叔玩去吧。”

我把这两个小家伙带在身边，慢慢劝说，直至最后他俩想通了，我才把他们高高兴兴地送回育才学校。

22 恋爱座谈会

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而且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

重庆办事处年青人多，未婚的小伙子也多，差不多都到了结婚的年龄，然而，由于国统区条件限制，不太好找对象，有的人不安心，有的想回延安。

年青人内心深处的这点秘密很快被周恩来发现了，他由他们的婚事想到在国统区青年人的择偶条件、标准、方法……于是，他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召集这些年青人开恋爱座谈会。

吴宗汉老人回忆说：

听说周副主席要给我们这帮单身汉开恋爱座谈会，我们既高兴又有点好奇，座谈会怎么个谈法呢？是让那几个已有女朋友的人汇报恋爱情况？还是让我们这些尚未得到姑娘爱慕的傻小子提出找对象的条件呢？大家悄悄地猜测着，但心里都甜丝丝的，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走进会场。

周副主席准时进来，笑容满面地坐在我们身旁。他环顾一下大家，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们差不多都到了结婚年龄，急着找对象了吧？”

“不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一片笑声，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周副主席接着说：这是终身大事，怎么能不急呢？但关键是找一个什么样的，怎样去找，今天座谈会就谈谈这个问题。

顿了顿，他又说：我是过来人，就先发个言吧。你们都说我和小超是模范夫妻，那么，我和小超是怎样走到一起来的呢？当年，我认识小超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呢，我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一个男子汉是不可能想去和一个小姑娘谈恋爱的。

说实话，在认识小超以前，我有一个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可是接触一段时间后，发现她革命意志比较薄弱，只是革命的同情者，不是革命的战士。因此，我和她只能作朋友，不能作夫妻。然而，我和小超接触一段时间后则不同了，她有理想，有抱负，革命意志坚定，我们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这样逐步建立了感情，以后就走到一起了。

接着，周副主席又像老大哥似的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你们都到了结婚年龄，该处朋友找对象了，但是要注意，不要光看表面，要多了解人品，要多考虑，要慎重，首先要从思想上衡量，她能不能作你的妻子。要相互了解，也要考验一段时间，起码也得半年一载，从好朋友发展到夫妻。

听了周副主席的发言，我们脸红了，心热了，眼睛湿润了。

为帮助我们这些年青人找到理想的伴侣，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又出面作了“红娘”，为我们牵线搭桥。我们在南方局工作的同志，有的就是经过周副主席和邓大姐作媒而成的。

袁超俊和钟可玉两位老人，就是在南方局相识相爱的，他们是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怀下结为伉俪的。

钟可玉是在印度尼西亚长大的华侨。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东北三省，海外爱国侨胞纷纷支援祖国抗战。年仅15岁的可玉正在念书，爱国激情冲撞着胸膛，她毅然弃学，冲破家庭阻拦，千里迢迢回到祖国。

她来到上海，一面继续求学，一面参加抗日活动。能歌善舞的她参加了青年歌咏队，这歌咏队有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启发下，她的觉悟不断提高，认识有了飞跃，从单纯的救国思想上升为解救普天下的劳苦大众。1937年

“八·一三”事变后，她随歌咏队来到江西，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化名李丹去延安，考取鲁迅艺术学院。

1941年底，她患了心脏病。由于当地医疗条件较差，党组织让她回印尼，一面在家养病，一面做统战工作，搞募捐。临行前，叶剑英考虑到沿途敌人搜查盘问，就让钟可玉以他侄女身份出现，改名阿叶。

钟可玉和由延安去重庆的同志一起出发了。然而途中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她回不去印尼，就和其他同志一齐来到重庆。

南方局决定把钟可玉留在办事处工作。在红岩办事处，钟可玉和袁超俊相识了，并默默相爱，其间得到周恩来、邓颖超无微不至的关怀。

钟可玉老人回忆说：

1942年初，我来到重庆办事处，正患病，原来就单薄的身子这下子就更弱不禁风了。周副主席知道后，非常关心，亲自把我找到周公馆谈话。他热情地鼓励我，表扬我不远万里投身祖国抗战的革命行动。然后安慰我，不要着急，慢慢养病。

他亲切地说：“我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地方养病。夏衍在北碚温泉处租了个房子，他正好走了，你先去住吧，洗洗温泉澡，有利于治疗。”

周副主席说完，拿起桌上电话，告诉钱之光处长：“阿叶身体不好，准备到北碚疗养一段时间，你给她批点钱。”

在周副主席的关怀下，我住进夏衍的房子，由于条件好，身体很快康复，于是又回到红岩办事处。在办事处我认识了老袁，并有了好感。

听老袁讲，我们经费很紧张，再看看同志们的艰苦生活，我的心弦震颤了，想到周副主席为我养病找房子、批钱的事，眼睛湿润了。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我与可玉相爱是秘密的，然而周副主席看出来，处处给予关心照顾。

1943年6月，我准备跟周副主席回延安，这时可玉的身体还很差，患有风湿病和心脏病。

临行前，周副主席对我说：“阿叶身体不好，你走后又没人照顾她，把她送到桂林吧。”

这样，我离开重庆时，可玉被送到桂林一个地下工作的秘密点。她临行前，周副主席考虑到瞬息万变的形势，于是又向可玉交待：“如果桂林发生意外，你速去贵阳找王新元。他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工作和生活，他都能负责安排。”

我跟随周副主席到延安不久，桂林就被日军占领，贵阳又危在旦夕。于是，周副主席又对我说：“兵荒马乱的，阿叶一个女同志东奔西跑不容易，你给刘少文去封信。让少文通知阿叶回重庆，在咱们办事处安全。”

听了周副主席的交待，一股暖流从我心底涌起，周副主席想得多么全面啊！这样，刘少文通过地下交通，给在贵阳的可玉送信，可玉在地下交通同志的帮助下又回到重庆。

说心里话，跟可玉分别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思念她。待可玉到重庆后，我就向周副主席请示，是否把可玉调到延安？

周副主席冲我笑了笑，点头答应了。

可玉到延安后，我们决定结婚。

我去请示周副主席。周副主席高兴地说：“我没有意见，你报告给中央组织部吧。”

那时，像我们这样的人结婚需要中央组织部批准。

经过中组部批准，1945年“三·八”节那天，我和可玉在延安结婚了。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及许多首长、同志前来祝贺，邓大姐高兴地说：“你们两个是办事处年青人中结婚最晚的，也是最好的一对！”

钟可玉老人说：

婚后我怀孕了，竟怀了双胞胎，本来就差的这下更糟了。行动都不便。邓大姐经常安慰我，说生下孩子就好了。

有位朋友送给周副主席一瓶维生素，他舍不得吃，派人送给我。哎，在那艰苦的年代，多亏这瓶维生素了，否则，我这个病身子说不定要早产呢！

1946年2月，我终于分娩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得知后非常高兴，一起来看我。大姐逗着刚出世的孩子，深情地对我说：“可玉呀，你把这两个孩子带大了就是对祖国的贡献啊！他们是祖国的未来。”

叶参谋长也来看望我这个“侄女”，幽默地说：“你这个小母鸡下大蛋呢！”

袁超俊老人补充说：

可玉生孩子时还有个小插曲呢，当时我们在重庆，由于没有生活经验，可玉临产时折腾了一夜，生下一个男孩，但是胎盘迟迟下不来，而且肚子又鼓起一个大包，痛得她直呻吟。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慌慌张张地把办事处的毕大夫找来。

毕大夫是荷兰华侨，他检查后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产妇肚中还有一个女孩，但她太弱了。”说完就跑回宿舍取来自己的咖啡，让可玉喝下。不多一会儿，在他的助产下，可玉果真又生下一个女娃。

毕大夫是1945年初从延安来的，他长得黑黑的，医术高明，办事认真，又平易近人，我们办事处的同志都很喜欢他。

大约是七八月份，日本侵略者临近投降前夕，南方局决定派毕大夫回荷兰，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继续为党工作。

毕大夫是个急性人，得到通知后恨不得马上启程。但是，他的出国护照尚没有办下来，而且由于战乱，交通堵塞，出境很困难。他急得天天找我，催我快点儿办。我也急，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请示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更着急，但是他考虑到目前动乱的形势，没有批准。他一再叮嘱我：“对这些华侨，我们一定要负责，特别是他们的安全，要慎之又慎，不能出任何差错，找不到可靠的社会关系，决不能让毕大夫走。他心情不好，你多陪陪他，向他多做解释，让他不要急，慢慢等嘛，着急能急坏身子的。”

我把周副主席的话传达给毕大夫，他深受感动，眼含热泪说：“谢谢共产党和周恩来！”

直到1946年春天，我们找到了安全可靠的社会关系，周副主席才批准毕大夫走。

45年后的冬天，就是邓颖超临终的前一年，袁超俊夫妇带着这个在重庆办事处出生的女儿双双，来到西花厅，看望病榻中的邓大姐。他们忆起这段往事时，邓大姐拉着钟可玉的手说：“当年你和超俊结婚时，我和恩来既同意又担心，那时你那么瘦弱，我真担心你生不了孩子呢，没想到女儿都这么大了，你是有功的妈妈！”

周恩来不仅关心年青人的婚事，还挤出时间去管那清官难断的家事。

在南方局，有的同志夫妻感情不和。周恩来得知后，就和邓颖超一起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找男方谈心，邓颖超劝慰女方，情同兄长，亲如姐妹。为了帮助他们，更为了教育大家，周恩来又在党内生活会上“现身说法”。

吴宗汉老人回忆说：

为了帮助夫妻感情不太好的同志，在一次党员生活会上，周副主席竟抖落开自家之事。

周副主席幽默地说：“你们大家都说我和小超感情好，其实也有矛盾，只不过是家丑不外扬罢了，今天，当着你们大家的面，我也扬扬，我们也吵过架！”

“一次我感冒发烧，冷得要命，可是小超竟故意气我，她起来后把窗户全打开了。我发起脾气，有气无力地吵：‘怎么，你要冻死我呀！’”

“然而，小超一声不吱，关上门走了。我无可奈何地把被子紧紧裹在身上，加之刚才生气，出了一身透汗，似乎觉得浑身轻松些，迷迷糊糊地睡去。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小超回来了，把手伸进被窝摸摸，轻声说：‘怎么样，出汗了吧，出汗感冒就好啦！怎么，还生气呢？’

“你知道吗，我刚才打开窗户就是故意气你的，你肯定生气，再把被子捂严，非出汗不可，这一出汗病就没啦！”

“我觉得小超的话有理，气也就消了，还有点儿感激她呢。”

周副主席讲完，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夫妻之间有矛盾是正常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处理好，善意的矛盾有时候还能促进感情的加深呢！”

周副主席的发言不仅教育了那些有家室的人，也启示了我这个单身汉，心想，将来成家，可一定处理好夫妻关系。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帮助下，闹矛盾的夫妻终于和好如初。南方局这个大家庭更加和和睦睦了。

从1939年1月南方局成立到1945年12月改为重庆局，大致经历7个春秋，这是南方局在艰险恶劣的环境下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7年。这期间，周恩来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呢？

几位老人回忆起这段峥嵘岁月时，首先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周副主席是一个忘我工作的人！他工作起来就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不知疲倦地干着，拼着……他总是那样精力充沛，那样废寝忘食。他那种忘我工作的热情就像一团火，能燃亮周围每一个人的心。

蒋泽民老人粗线条地回忆了周恩来在重庆时的起居和工作规律。他说：

周副主席精力充沛，工作和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清晨，他起得比较早，站在不大的庭院中等着我们出来做早操。周公馆有二十几个人，除了王梓木因伤残不能出操外，大家都按时上操，由陈家康领操。周副主席做操很认真，动作准确有力，而且潇洒大力，颇似一个健美运动员，在他后面的我常常被他优美动作吸引，由衷赞叹，周副主席是个天才，干什么像什么，而又那么出色。

下操后，大家洗漱、吃饭，开始一天紧张的工作。

周副主席非常忙，既要领导国统区人民抗日斗争，又要抓统战工作。他几乎每天早饭后都出去，临行前告诉我们副官去哪里，什么时间回来。

我们有规定，无论谁出去，都在收发室写好假条，交给值班员。周副主席每次出去，都带头执行这项规定，而且一丝不苟。有时候他亲自动笔写，有时候让我们去写，如果我们写，他总要关照一句，一定写明中午能否回来吃饭，以免回不来时，让食堂人员等着。这些琐碎小事不太引起人们注意，可是周副主席考虑得很周密，他总是替别人着想，而且细致入微。

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首先要问值班的同志，有客人没有？都谁来过？如果客人没走，他立即去会客。来的这些客人基本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民主人士、爱国人士，也有国民党官员。

通常情况，下午如果有客人来访，他先会客；没有客人，他在自己屋里看报纸。根据周副主席习惯，每天来的报纸，公务员刘林兴都将之一一放在桌子上摆好，使他看报方便。各种报纸他都要通览一遍，重要的文章，认真反复看，有的还裁剪下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看完报纸后挤出两个小时读书。周副主席博览群书，除了马列著作外，还有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之类的书。

晚饭后，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周副主席和公务员或其他同志在楼下打半个小时乒乓球。这时候的周副主席很活跃，在案前跑来跑去。

“球战”结束后，周副主席上楼工作，处理所有的电报和文件，一直工作到深夜，一般情况下要工作到后半夜二三点钟。翌日早上照常出操。

晚上，周副主席有时乘车去红岩办事处开会，写材料，研究工作。有时候太晚了就不回来。如果第二天是学习日或党小组活动，他必定赶回，风雨不误。

周副主席的组织观念非常强。他不仅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学习，而且经常深入浅出地给我们作报告，谈体会。周副主席才华横溢，他讲话基本不用讲稿，但语义深刻，层次清晰，而且富有文采，语调也抑扬顿挫，有时还打着手势，很有感染力，听他的报告是一种享受。

斗争紧张时，周副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当东方晨曦透过窗棂时，他还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工作。

朱友学老人回忆说：

周副主席太忙了，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几乎夜夜熬通宵。

每天晚上，他处理完所有的电报、文件后，要审阅新华社送来的报纸清样，逐段逐句修改。他还常常亲自动笔为报纸写社论和重要文章。当时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对我们的报纸严加控制，有时我们不得不开“天窗”。这时候，周副主席常坐在灯下反复琢磨，“天窗”开不开，能产生什么影响等，特别慎重。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皖南事变”后那一阶段，形势非常紧张，周副主席和董老他们连夜地开会，研究问题。周副主席连续几天头不挨枕头，实在太困乏了，就用手搓搓脸，揉揉太阳穴，再继续工作。

在那漫漫长夜里，我们工作人员根据各自分工陪在周副主席身边，处理自己分担的那份工作。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精神头足着呢，可是到了后半夜天快亮时，也有些挺不住了，一阵困乏袭来，常常打哈欠。然而40多岁的周副主席依然那么全神贯注，那样孜孜不倦地工作。

我们这些年青人也顶不上他一个人的精力啊！他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

在雾都山城，奔波一天的太阳慢慢地走下了山，劳累饥饿的贫民们蜷缩着瘦弱的身躯回到那低矮的破屋，大腹便便的阔佬们拥着妖艳的女人来到了酒吧、舞厅，一个个醉生梦死。

在红岩办事处、曾家岩周公馆的小楼上，周恩来又坐到了桌前，挥笔撰文。

大街上的星星睁开了明亮的眼睛，周恩来桌前的台灯也仰起桔红的笑脸，伴着她的主人处理一个又一个文件、电稿、文章。

星星从天街的东边走到了西边，台灯伴着她的主人从昨天忙到今天。星星走累了，一个个闭上美丽的眼睛，可是台灯还没有完成使命。这时候，从天街到山城，只有这小小的台灯还在骄傲地闪烁着，陪着她辛勤的主人。

不知倦意、始终如一的钟表尚需要给发条上劲，那么，血肉之躯的周恩来有没有闲暇？有没有休息时间？

吴宗汉老人讲，“周副主席的休息时间只有那么半个小时。”

他回忆说：

在重庆办事处，我负责仓库工作。一般情况下，周副主席午饭后来这里，对我说：“小吴，我在你这儿休息一会儿，就半个小时。”

我看看表说：“睡吧，周副主席，到时候我叫醒你。”

他摇摇头说：“不用，到时候我就醒啦。”说完斜侧着身子躺在我那简陋的木板床上。

我让他把鞋脱了，他说不用，脱了鞋反而睡不着。

半小时后他准醒，用手搓搓脸就去工作。

我知道这半个小时，是周副主席一天中仅有的这么一点儿休息时间，是难得的两刻钟啊！所以每当此时，我就轻轻地把门关上，在门口坐着，给他

站岗。如果有人找周副主席，不是特急的事，我就让他先等一会儿。以后有些同志知道此时周副主席休息，也就没人找了，大家从心里盼望周副主席能静静地躺一会儿，哪怕多一分钟也好啊！

在危机四伏的国统区，在险风恶浪的政治斗争中，周恩来为党的事业、民族的利益如此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日理万机地操劳着。“吃的是草，挤出去的是奶和血。”

吴宗汉老人回忆说：

周副主席生活非常简朴，从吃到穿和我们大家一样，没有一点儿特殊化。

长江局时，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还比较融洽。由于统战工作需要，周副主席经常外出参加各种会议，参加各方面应酬。为此，办事处给他做了一套毛料西服。

周副主席知道后坚决不要，生气地说：“你们一个月才几元钱的生活费，为什么给我做料子服？”

有的同志劝道：“已经做好了，您就把它收下吧，这也是工作需要嘛。”

周副主席指指自己身上的旧西服说：“这不也是西服吗？穿着它不是也可以出席各种会议吗？为什么要做新的呢？这不是一种浪费吗？”

顿了顿，他放缓语气说：“既然做了，那就送给别的同志吧！”

周副主席最终也没有收这套毛料西服。

1942年夏，周副主席住院做了手术。党中央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补助100元钱。周副主席说什么也不要，最终把这100元送回。

食堂的同志见周副主席术后虚弱，与大家一样吃那没有油水的菜，怕他身体垮了，就偷偷地给他加了一个菜。

吃饭时，周副主席见比平时多了一个菜，就问我们为什么加菜？我们骗他，说今天改善伙食，其他同志也都增加一个菜。

他不相信，亲自到食堂，见到大家餐桌上饭菜如往，根本没加菜，回来后就把我们批评了一顿。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眼睛光盯着我，光考虑我，应该多想想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多想想在敌占区惨遭敌人欺压的百姓。战争年代，我们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啊！”

钟可玉老人回忆说：

我在重庆办事处时，周副主席的外衣都是旧的，而且褪了色，衬衣也打着补丁，但很整洁。

每逢办事处开会或听报告时，我们几个女同志爱坐在一起。有时候，邓大姐拿着周副主席的黑色袜子补，一边听一边飞针走线，补得密密实实。

我第一次见到时既惊讶又难过，惊讶的是，周副主席还穿带补丁的袜子。想到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废寝忘食地操劳，心里又像猫抓似的难受，以后见过多次，心里也总是酸酸的。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在重庆，由于物价飞涨，我们生活很清苦，一个月也吃不上一顿肉，常年的菜就是带管状的空叶菜，也称雍菜，我们称它“无缝钢管”。

周副主席和我们大家一样吃这样的饭菜，所不同的是，公务员把饭端到他的办公室。他常常通宵工作，既没有夜餐，又没有充饥的干粮，只有一杯

白开水。望着周副主席这操劳的样子，我们真替他的健康担心啊！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东迁南京，我和杨汉章、牟爱牧留下，处理办事处的房产。这样，钱之光让我和可玉搬到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房子住。

房子不大，质量较差，不保温，冬天寒冷，夏季炎热。里外套间，外屋是书房兼会客室，里屋是卧室，有一个纱布做的蚊帐，很旧了。还打着补丁。

我长期在周副主席身边，这些已经司空见惯了，但可玉却不解地问：“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就用这么破旧的蚊帐？”

我点点头。

她生气地质问我：“你们工作人员怎么搞的？为什么不给换换？”

“不是我们不给换，是周副主席不让我们换！不仅不让换，他还把办事处发的蚊帐送给延安。”

可玉听完落泪了。

尽管周恩来在生活上如此克俭自己，但是，他和邓大姐却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别人，尽心尽意地帮助别人，哪怕碗里仅有一匙羹，也要分给大家。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在重庆办事处时，我们经常早饭后跟周副主席出去，有时候事情多，一上午也处理不完，中午赶不回来吃饭。这时候，周副主席就看看我，幽默地对司机段廷英说：“廷英呀，先把车子放好，去你们山西面馆吃拉面。”

“好嘞！”段廷英高兴地答应着。

我知道段廷英是山西人，当然愿意吃这家乡风味了，我这个东北人也喜欢吃拉面。可是，周副主席是南方人，他会愿意吃拉面吗？再说一碗面条也没什么营养，于是我脱口而出：“周副主席，到那儿吃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前方将士打仗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我们能吃上拉面就很不错了，别忘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啊！”说完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我们吃完饭，周副主席擦擦嘴，笑着对我们说：“这不挺好嘛，又经济又实惠。”

我在他身边工作那段时间，凡是在外面吃饭，他总是这样，既考虑我们工作人员的口味，又要经济实惠，却从来不考虑自己。

在重庆，一个深秋的夜晚，我病了，感冒发烧，一会儿热得满面通红，一会儿又冷得瑟瑟发抖，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夜。清晨时，我觉得浑身像散了架子似的，迷迷糊糊地睡去。

朦胧之中，我觉得门开了，进来一个人。我想坐起来，却觉得身重千斤，抬不起身，只是费力地从被窝中伸出一支胳膊，又迷迷糊糊地睡去。一会儿，我觉得有人把我的胳膊轻轻放进被窝，又有一只手柔柔地放在我的额头上。这是谁的手呢？是父亲的？不是！父亲的手像干树枝，又粗又硬，可这手多么温柔啊！是母亲的？也不是！母亲的手像棉花团，可这手大而有一股力量。我使劲儿睁开了眼睛，“啊！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正望着我，目光既亲切又焦急。我急忙要坐起来，被他按住了。

他抽回放在我额头上的手，坐在床边，微笑着说：“你不要动，感冒挺厉害，看样子烧了一夜，现在头不那么热了，不过恐怕还没有退烧，一会儿坐车去医院看看。来，先把这药吃了。”说完，他把两片药放在我手里，又把半碗水放在床头。

我顺从地端起碗把药吃了，水不凉不热。我又环视四周，发现我昨晚乱

扔的衣裤已经被周副主席收拾好放在一边。

周副主席柔声说：“泽民，你想吃点啥？让小超给你买去。”

我摇摇头，洒下一串泪水。

周副主席给我掖好被角，亲切地说：“你好好休息，我还得出去。”说完，他轻轻地离去。

周副主席走后，我睡了一觉，醒后觉得浑身轻松多了，头也不那么疼了，只是身上无力。我穿好衣服躺在床上，明亮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这时突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咚、咚……

“请进！”

邓大姐来了，手里还拎着沉甸甸的一兜鲜桔，鬓角上渗着细密的汗珠。

“大姐！”我呼的一下子坐起，要下地。

大姐急走几步拦住了，说：“不要动！”然后她坐到小方凳上，仔细打量我的脸色，关切地问：“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上午吃点啥没有？”

“好多了，吃了点面条，大姐，您别惦着。”

大姐微笑着点点头，掏出手帕擦去鬓角上的汗，说：“恩来告诉我你病了，我上午出去办事，顺便买了点儿桔子。”说完，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大桔子，剥去皮，送到我面前。

我双手接过这金灿灿水灵灵的桔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桔子，而是大姐和周副主席对我的一片情谊啊！

“别愣着了，快吃吧！”大姐温和地催促着。

我的眼睛湿润了，喉咙硬塞了，喃喃地说：“谢谢大姐！”

在重庆办事处，周副主席不仅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如此般关怀。邓大姐是国民参政会的会员，参政会发给她的薪金，她大部分用来帮助同志了，刚才那鲜桔就是用这钱买的。

第三部分 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

伟大的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战前的六大帝国主义强国被打垮了三个，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世界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强大，形成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赢得卫国战争胜利的苏联，出兵东北，宣布对日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立即转入全面大反攻。

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8月10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大反攻的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并向日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遇反抗，即坚决予以歼灭。

各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下，紧急动员，速集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日军发起全面大反攻。

在中国践踏了十四年之久的日本侵略者，在我军的进攻下带着二战的伤痕很快就气息奄奄了。8月10日，日本政府接受了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无功、大地有罪的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峨嵋山猛扑下来，伸出长长的爪子下山“摘桃”，抢夺胜利果实。8月11日，即日军宣布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求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要求伪军维持治安，日军不得向国民党以外的军队投降；三是要求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以能原地驻防，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

此时，国民党军队尚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远离日伪占领区。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又大肆收编伪军，五十多万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先遣军。

即使这样，蒋介石还是不放心，担心这些比饭桶强不了多少的伪军不堪一击，竟然勾结起日军。8月23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令，日军在原地作有效防卫，已经被人民军队解放的地区，应由日军再收回来。

想称霸世界把中国变成附庸的美国，也趁机烧火，扶蒋反共。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调集中印境内所有飞机、军舰，把远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运到华北、东北，帮助蒋介石调兵遣将。美国军队也赤膊上阵，在中国主要港口登陆，帮助蒋介石抢占战略要地和铁路交通。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又给蒋介石输血打气，作他的军火后盾。

为抢夺胜利果实，美蒋勾结，日伪合流，磨刀霍霍，向我人民军队扑来。外寇尚未全部赶走，内战之火又迫在眉睫。中闰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中日民族矛盾急速转为阶级矛盾，即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苦难的中国又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选择。

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及时指出了新的斗争方向。8月11日，党中央在《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中

明确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激烈的。我党任务，在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扩大解放区；在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大举向我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深刻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充分估计了内战的严重性，指出了限制内战的可能性，并根据美蒋已定的方针，提出了我们的方针，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

与此同时，延安总部的朱德和彭德怀两位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11日发出的命令，指出这个命令是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

朱德又给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请他们转达其政府，严正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接受被我军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敌国投降事宜；也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会议。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解放区军民一面擦亮眼睛，严阵以待；一面继续收复失地。据统计，从8月11日大反攻开始至9月2日，我军收复县级以上城市146座，解放了大批人民群众。

9月2日，日本天皇及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历经八年的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了。

破碎的山河需要休养生息，饱受战争煎熬的人民需要安定。蒋介石倒行逆施的做法违背人心，天理难容。国内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发表言论，谴责蒋介石的内战行为。

蒋介石开始觉得这个“桃子”太难摘了，共产党不答应，老百姓也不答应。而且内战部署不充分，他感到压力重重。于是在美国政府“融共政策”的唆使下，他又披上和平外衣，戴上和平面具，使出惯用的两面派手法，开始“和平”协商，企图以此遏制共产党，争取一段“和平时期”，进行内战部署。阴险狡诈的蒋介石从8月14日至23日的9天中，给在延安的毛泽东连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蒋介石在电报中说得冠冕堂皇，内心却藏着诡计：如果毛泽东来了，就逼他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不交就拖延时间，扩充军备；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把破坏和平、民主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

策划中的蒋介石有些得意忘形了，他相信，与自己打了十几年仗的毛泽东是不会来的，也不敢来，那样内战就能打赢，这可爱的“大桃子”就到手了。他几乎飘飘然了。

在延安的党中央早已洞察了蒋介石这种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针对他的三封电报，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那几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屋里，灯光彻夜通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在紧张地运筹着。

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与会领导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大家认为，从目前看，美苏两国都不愿意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因中苏条约限制，不能公开支持共产党；美国虽然竭力扶植蒋介石集团，但目前碍于“和平”面具，也不便公开支持蒋介石。而蒋介石军队又分散于西南、西北，不能马上调集到东北、华北。鉴于此，争取和平还是有可能的。

经过讨论，党中央决定先由周恩来去重庆谈判，毛泽东何时去重庆由政

治局和书记处定。

会议还决定，将周恩来起草的《目前紧急要求》中的十四项改为六项，名为《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决定今后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篇文章于8月27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以后被称为新时期的路标。

周恩来接受这一重任，后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党中央决定我去重庆，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主要是看蒋介石开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不能失掉立场。实现和平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打边谈，或者打打谈谈。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总任务没有变。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我们要做好准备。

周恩来在发言中已经预见到谈判时的情况，事实证明，这个预见是正确的。

会后，周恩来立即进行谈判准备。

翌日，即24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发去复电：“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但就在这一天，党中央又接到蒋介石于23日发来的第三封邀请电。25日又接到美军司令魏得迈的邀请电。看来，在美蒋合演的这出“和平”戏中，蒋介石这个“和平使者”的角色还想扮下去。

25日晚，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认真研究，党中央最后作出决定，由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陪同，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谈判，目的是击破国民党诬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并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阻止和推迟内战的发生，在斗争中揭露美蒋勾结的阴谋，团结教育人民。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决策！

26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位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有可能被挫折下去。……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

《通知》还指出：“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意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其势汹汹所吓倒。”

《通知》发出后，得到全党同志的拥护，同时也牵动了大家的心，许多同志为毛泽东的安危担忧。有的同志讲，蒋介石是不讲信义的，毛主席不要成为第二个张学良。有的老同志感情深沉地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离开过我们一步，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主席始终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根据地和自己的部队。如今，他要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怎能不让人牵肠挂肚呢？”

尽管延安和解放区的一些同志劝阻，但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

毛泽东还是亲身赴渝，会见蒋介石。

25 全面周密的部署

夏夜静悄悄，1945年8月25日的夜晚又罩上一层历史的光环，连天上的星星也格外明亮夺目。在陕北延安的枣园，几个屋子里的灯光通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们正在这里商议着一个伟大的决定。

会议刚刚结束，周恩来就起身离去，给重庆办事处钱之光处长发去一份长电，告诉他，毛泽东主席即将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要求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特别是保卫工作，而且要保密。

周恩来在电报中作了详细部署，从毛泽东到重庆后的住处、饮食、交通、警卫以及每个生活细节都作了一一交代。他指示，办事处要把二楼东侧房间腾出来，作为毛泽东和随员的宿舍与办公室，指示刘昂负责照顾毛泽东，李泽纯为毛泽东做饭，甚至连给毛泽东准备的衣服、鞋子、脸盆都提到了。

如此周密的安排，恐怕最认真负责的管家也难以做到。这并非一般迎接党的领袖的安排，其中还蕴含着患难与共的战友之情。

钱之光接到电报后，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毛主席就要来重庆了，通过谈判制止内战的发生。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啊！然而，钱之光更多的是紧张，手中的电报好似千斤重。这里是国民党的陪都，是龙潭虎穴，作为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他深知蒋介石集团的阴毒，也更了解国民党特务的卑鄙，他深感任务重大而艰巨。

他放下电报，根据周恩来的部署，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迅速、认真而又秘密的准备。

准备工作重点是保卫工作。

保卫工作分为内勤和外勤两部分。

外勤，主要是给毛泽东安排四名随从副官，跟随毛泽东左右，直接和国民党有关人员打交道。这四名副官是陈龙、蒋泽民、龙飞虎和颜泰龙。他们都是经过中央有关部门严格审查，并报请周恩来批准的。这四人除了陈龙是延安干部外，其余三人都是南方局的。

陈龙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参谋长，后调延安枣园担任保卫科长，是在对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有保卫工作经验。

龙飞虎是他们当中跟随周恩来时间最长的，在武汉办事处时他就是运输科长，有文化，也有统战工作经验。

颜泰龙是他们四人中最年轻的，比较聪明，又有熟练的汽车驾驶技术。

蒋泽民就是本书中的蒋老。

他们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认真负责，一个个机智勇敢。

内勤，主要指红岩办事处和桂园张治中公馆的保卫工作。谈判期间的保卫工作，由我党和国民党联合负责，因此有明确界限。

红岩办事处以距离办事处大门约二十多米远的一棵黄桷树为界（即阴阳树），以内归我们管，以外归国民党负责；桂园以院墙为界，院墙以内归我方负责，院墙以外归国民党负责。

红岩办事处是谈判期间的要地，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等来后都住在这里，这里是我们的司令部。保卫工作由钱之光负责，工作人员有何谦、贺清华、吴宗汉、郭正等若干人。

为保证安全，办事处设三道岗哨。第一道设在黄桷树附近；第二道是大门门卫；第三道设在楼房外。这三道岗哨都是昼夜值班。除此之外，毛泽东

来后，在毛泽东住的二楼楼梯口增加岗哨，并有一名干部通宵值班，流动检查。

从办事处大门到山下有一段较陡的山路，铺设了一百多级台阶，台阶是用石板铺成的，石板下面有空隙，把石板撬开里面能放东西。这段路是特务最容易搞手脚的地方，也是保卫工作的重要环节。

毛泽东到来之前，钱之光带领办事处的同志，把每个台阶下面的空隙全部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设立了便衣流动哨，昼夜巡逻检查。

桂园，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的公馆。为了这次谈判，张治中把公馆腾了出来，留给毛泽东会客或办公用。

张公馆在上清寺北边，进门左侧是传达室，右侧是车库，主楼靠右，楼下左边是餐厅，右边是会客室，楼上的房子准备做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办公室、休息室。院内有一个小屋，是警卫人员的房间，坐在里面能看清桂园的全貌。

桂园是我方对外办公点，这里安排了朱友学、伍全奎、宋福生、王东森等人，保卫工作由朱友学负责。

钱之光按照周恩来的部署，逐一谈话，下达命令。

他把朱友学找去，把负责桂园保卫的工作交待给他，语重心长地说：“小朱呀，你是老警卫了，在武汉办事处时就保卫周副主席，以后从武汉撤出，你就跟着周副主席到长沙、衡阳，一直到重庆，做警卫工作是行家里手啦。可是，今天交给你的任务可不寻常啊！”

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世界瞩目，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他，而国民党特务也在暗中监视着他。尤其是桂园，那是国民党眼皮底下的地方，你可要处处留神啊！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这是周副主席交给你的任务，也是党交给你的任务，更是解放区人民交给你的任务。”

听了钱之光的交待，朱友学仿佛觉得有千斤重担压在肩上。沉默寡言的他此时感到热血沸腾，有满腔肺腑之言要讲，他感谢组织的信任，更有决心把这副重担挑起，让周副主席放心，让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放心。他的手心都擦出了汗，坚定地说：“保证完成任务！”

钱之光又向蒋泽民下达了任务。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那是8月26日晚上，我由土湾回到红岩办事处，在门前碰上了祝华。他告诉我：“钱之光处长找你事。”

我急忙走进钱之光办公室，他热情地让我坐下，微笑着说：“泽民同志，又有新任务了。”说完把话停住，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

“什么任务？”

“这任务又光荣又艰巨。”

“是回延安还是去东北？”

“都不是。”

“那是……”

钱处长收敛了笑容，郑重地说：“咱们毛主席要来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组织决定，派你去给毛主席当副官。”

“啊？毛主席来重庆，安全吗？这里可是国民党的陪都啊！”我一下子站起来，连珠炮似地说完这两句话后，半张着嘴巴吃惊地望着他。

“别紧张，听我慢慢说。”

钱处长摆手让我坐下，然后把党中央关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决定，以

及周副主席对保卫工作的指示，简单扼要地讲了一遍。

停了一会儿，他慢慢站起，双手重重地放在我的肩膀上，凝视着我的脸说：“泽民，这个任务可不轻啊！你过去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对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让周副主席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他的目光里充满了信任和期待。

钱之光，这位跟随周副主席多年的八路军办事处的老处长，1938年在武汉时我就认识了他，在他身边工作过，可是从来没见过他有这种表情。此时，我深感他每句话的份量，他放在我肩上的两只大手那么沉重，似两副重担压在上面。

望着他，我慢慢站起，斩钉截铁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翌日上午，我先到曾家岩周公馆报到，然后到桂园。这时，张治中全家刚刚搬走，朱友学正领着几个人打扫卫生，累得满头大汗。我和他们一起干了起来，把桂园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毛主席的到来。

钱之光一个人一个人地交待任务，大家受令后立即分头行动。

在我们紧张准备时，国民党方面也开始了行动，一个个明保暗监的特务上岗到位了。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派来一个警卫班，有十几个人，开来三辆三轮摩托车。他们名义上是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当“警卫”的，实际上是蒋介石派来监视共产党领导人的特务，是谈判期间安置在这里的“监视器”。

谈判还没开始，先安置了“监视器”，蒋介石考虑得可谓周到；毛泽东还没有到来，先安排了“警卫员”，蒋介石“关怀”得多么备至。

此时此刻，无论是我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渴求和平的人民，还是反革命特务，大家都在盼望着，准备着，迎接一个伟大“使者”的到来！

26 毛泽东来到重庆

蒋介石给毛泽东连发三封邀请电后，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了。他做着一个个又一个美梦。然而，延安方面的回电把他惊醒了，也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决定来重庆。毛泽东竟有如此的胆量和气魄！！这太出乎意料了，真是弄假成真，弄巧成拙。蒋介石乱了方寸，慌乱之中，忙召集高参研究：毛泽东来了怎么办？

蒋介石一伙经过密谋之后，拟定出六条措施。一是应付谈判，拖延时间，装备部队，做好充分内战准备；二是按照外交礼节，各部、各院都要热情招待；三是重庆各家报纸不能多宣传毛泽东来重庆的重要性，特别是《中央日报》更不能多登；四是给参加谈判的人员定下调子，逼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如果实现不了，就用军令政令统一的办法，压共产党把军队缩编；五是把毛泽东拖在重庆，不让他回延安；六是两手打算，谈判桌上谈，战场上打，边打边谈。

商定之后，国民党派张治中前去延安接毛泽东。这时候，想捞取政治资本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粉墨登场，亲自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张治中和赫尔利于8月27日乘飞机来到了红都延安。

日历翻到了1945年8月28日。这一天，对于刚刚结束日寇蹂躏而又面临着内战危机的中国人民是多么不寻常的一天啊！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

延安。早饭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侨儿沟飞机场。

前一天，当毛泽东要和前来的张治中、赫尔利一起去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出后，人们的心都被揪了一把。他们深深理解，毛泽东去重庆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他是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去的。但是他们也十分清楚，毛泽东去的地方不是圣洁的乐园，而是龙潭虎穴。这一夜，许多人彻夜未眠，有的老奶奶竟相信起神灵，跪在地上给神灵磕头，求神灵保佑毛主席一路平安。

在机场，大家表情严肃，静静地站着，有的人眼里还含着晶莹的泪花。当那辆熟悉的救护车开过来时，人们都睁大了眼睛，毛泽东从车上走下来，他破例地换上了一身新衣。

毛泽东慈祥地望着送行的人们，亲切的目光从每一个人脸上掠过，向人们点头微笑。他从容地伸出大手紧紧地握住站在前边的每一个领导人的手，然后，右手用力一挥，向飞机走去。

他一步步走向飞机，一级级踏上飞机舷梯，站到了机舱门口。他右手摘下了帽子，然后把帽子缓缓举起，像举着沉重的东西，举过头顶，最后猛力一挥停在了空中。这一举一挥，表达了在这瞬息万变的形势下，一个领袖思维的全过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被后人传为佳话的“挥手之间”。

飞机起飞了，载着延安人民的心飞向蓝天，飞向重庆。

重庆。启明星落去，天边出现了一抹绚丽的朝霞。一会儿，又圆又红的太阳从朝霞中跳了出来，金光万道，驱散了满天云雾，一扫往日的阴霾。望着这难得的好天气，红岩办事处的同志们轻轻舒了一口气，吉人天相啊！

上午，忙碌的人们各就各位，进行最后的准备。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早饭后我又来到桂园，董老也来了，进行最后一遍检查，迎接我党谈判代表的到来，董老吩咐我：“泽民，你把去机场的车辆认真检查一遍，千万

保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他们的安全啊！”

上午，蒋介石派来一辆车号是 2823 的小卧车，假仁假意地给毛主席用。我和有关人员检查了一遍车体，保养得很好，也很干净，又重点检查了方向盘、拉杆和刹车油泵，都没有问题。然后，我把司机请进屋内休息，询问一些情况。他姓陈，二十八岁，是国民党少校军官，已有六年开车历史，给蒋介石开过车，对重庆道路很熟悉，虽然沉默寡言，却很精明。这又是蒋介石派来的一个得力暗探。

我又来到“警卫”班，检查了准备去机场的三辆三轮摩托车，并简单询问了一下跟车的九个宪兵。他们非常谨慎，立正回答问题，不多说一句，看样子他们的上司早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他们都有三年以上的驾车历史，技术也不错。

这样，去机场的车共有三辆三轮摩托车，四辆小车。小车包括：周副主席的车，仍由段廷英开；郭沫若的一辆车，由熊国华开；从美军司令部借来一辆吉普和蒋介石送来的卧车。同时，办事处又出动两辆大车，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用。

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怀着不同的心情奔向九龙坡机场。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周公馆的同志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赶往飞机场；国民党的官员们也一个个来到机场。大家翘首仰望，迎接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

蒋泽民老人兴奋地回忆了他们去机场迎接中共代表的情景：

将近中午，我们出发了，驶向九龙坡机场。沿途之中，我看见许多人往机场奔，有的拦车而行，本来能装四五个人的小车，一下子竟挤进七八个人，一边往里挤，一边催促司机：“快，快奔机场。”有的步行而去，在炎热的中午走得满头大汗，可是看看手表又跑了起来，边跑边说：“毛先生来了！毛先生来了！”

当日上午，《新华日报》发了号外，报导了毛主席今日来渝的消息。这些赶往机场的人是刚刚获悉的，他们唯恐来晚了见不着毛主席，那将是终生的遗憾。

12 时，我们到了机场，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也赶到了。休息室大厅已等候着一些人，而更多的人们正从四面八方涌来。

午后 1 点 30 分左右，机场的休息室里站满了人。其中有民主人士、爱国知识分子、各界名人和国民党元老，其中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等人非常惹人注目。还有许多中外记者，其中，外国记者远远多于中国记者。国民党政府也派来三位官员：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和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平素宽敞的休息室一下子被挤满了，有些人只好到外面等候，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相互议论着：“毛先生来了就好了，毛先生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

播音室的小姐告诉人们：“毛先生和他的随员已经于 12 时在延安乘机起飞，现正在飞行中。”

“啊！毛先生上飞机了。毛先生快到了！”

机场上一阵喧哗，一片欢笑，一派喜气洋洋。

飞机在机场上频频起落，一架、二架、三架……人们不断地张望着、等待着，等待着“和平天使”的到来。

时间随着人们那激烈跳动的心一分一秒地过去，指针指向3点30分，一架草绿色三引擎巨型飞机由远处飞来，在空中盘旋两圈后徐徐下降，机身上的一颗大红五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飞机还没有落地，人们就潮水般地涌过去，欢呼着：“毛主席来了！毛先生来了！”宪兵和警察们赶紧维持秩序，用他们那彪悍的身躯阻挡着欢腾的人流。

飞机稳稳地停在了跑道上。机舱门打开了，周副主席迅速扫视一下机场，站到舱内门旁，毛主席微笑着站到机舱门口的舷梯上。他改变了以往的装束，脱去了那套打补丁的灰粗布军装，换上一身新做的蓝布中山装，衣服有些宽大，头戴灰色的拿破仑帽，脚穿黑色牛皮鞋。他神采奕奕，目光炯炯，他用右手摘下头上的帽子，举过头顶，在空中有力地挥舞着，向人们频频致意。

机场上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似海涛呼啸，似春雷滚荡，整个机场沸腾了！

毛主席挥舞的手臂那么坚定有力，他的目光那么亲切、慈祥，似和煦的春风，拂走了这几天来罩在我们心头中的阴影。我们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们悬着的心落了下来，浑身增添了力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一步步走下飞机，他身后是周副主席，穿的还是那套旧的洗得干干净净的浅蓝布中山装，整洁合身，透着英俊。第三位是一个瘦高个美国人，由于上衣很短，显得两条腿又细又长，他就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他后面是一位威武的将军，个头儿比毛主席略矮，这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他们后面的是王若飞、胡乔木、陈龙、贺清华等人。

中外记者们蜂拥而上，把毛主席团团围住，镁光灯一阵闪亮，照相机“咔、咔”直响，他们争先恐后地把这珍贵的历史镜头抢拍下来。站在毛主席、周副主席身边的赫尔利说：“这就像是好莱坞！”

毛主席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与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王炳南跟在后面，遇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不熟悉的人帮助介绍，我和陈龙跟在他们后面。

人们围在毛主席身边，争着与他握手，向他问好。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握住毛主席的手时，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眼里滚动着泪珠，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在一旁的周副主席替她做了回答。那场面真是感人啊！

由于年轻力壮的记者们抢先一步，把毛主席紧紧围住，使那些年龄较大、体质较差的民主党派代表们被挤在人墙之外。体质瘦弱的沈钧儒老先生挤在人缝中，大声喊着：“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

这一情景被周副主席发现了，他马上把腋下夹着的一个大纸包高高举起，大声说：“新闻记者们，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里来拿吧！”这几句话一下子把记者们吸引过去，那些民主人士才挤上前，和毛主席亲切握手，热情问候。

周副主席打开纸包，把“礼品”一一分给记者们。原来是已印刷好的毛主席的书面讲话材料，对于记者们来说，这确实是他们最需要的。那些工作效率较高的外国记者们，拿到讲话材料后，立即飞身跳上车，狂奔城内，抢先往国内发新闻稿。

在人们的热烈掌声中，毛主席做了简短而精彩的讲话。他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

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和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讲话结束后，在人们的掌声中，毛主席快步走到小车前，我用激动得有些发抖的手轻轻地拉开车门，满含深情地望着他。他的目光一下子投向我，目光里有惊喜，有慈爱，有鼓舞，更有一股力量。

“主席，您好！”我兴奋得声音有些发颤。

毛主席紧走两步，慈爱地拍拍我的肩头，亲切地说：“泽民，你也来了！你们家乡解放了，想不想回家呀？想不想家乡的大豆高粱？”

分别三年了，我的家乡在哪儿主席都记得清清楚楚，一股幸福的暖流从我心底涌出，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在那儿傻呼呼地笑。待毛主席坐进车里后，我才醒悟过来，想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主席，我想回家。”可是已经晚了，我也立即飞身上车。

车队缓缓地离开九龙坡机场。前面是三辆三轮摩托车开道，其后的第一辆车里是周副主席，第二辆是毛主席，第三辆是王若飞和董必武，最后那辆吉普车是警卫人员。胡乔木等人坐上了办事处的车。当天晚上8时30分，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山洞林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方面的人员。前来参加宴会的还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国民党官员有张治中、陈诚、邵力子、王世杰、张群、周至柔、蒋经国等人。在这里，相互对立打了十几年仗的国共两党领导人相见了，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

跟随毛泽东去林园参加宴会的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毛主席首先落落大方地走上前去，微笑着说：“蒋先生身体好吗？”

身穿黑色西服、已经秃顶的蒋介石，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一下，略带笑容地迎过去，说：“毛先生也不错吧？”

“哦，不错。”毛主席略微提高了点儿声音，幽默地说：“咱们打了十几年了，都有经验了，也都锻炼出来了。咱们共同把日本打败了，我来了，商量共同建设国家。”

在场的一些人被毛主席豁达的胸怀和微言大义的话语所打动，频频点头，赫尔利和魏德迈的脸上也堆起了笑容。心怀叵测的蒋介石没有想到毛主席如此大度，他有些尴尬，也只好点着头，随声附和着：“好！”这时，我发现他光秃秃的额头上微微露出了青筋。

寒暄之后，双方把参加谈判的代表名单确定下来，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张治中、邵力子、张群。

随后，宴会开始了。宴会厅里一片谈笑声。然而，在这觥筹交错之中，正孕育着一场刀光剑影、唇枪舌剑的战斗。在这“谈谈笑笑”之中，谈判拉开了序幕。

27 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历史上，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舆论总是先行。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亦如此，具体表现在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之间的论战。

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去第一封邀请电后，又授意给中央日报社，说毛泽东是不会来重庆的，要借此发动宣传攻势，把不愿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加在共产党头上。于是，中央日报社的胡健中、陶希圣等人密谋后，导演出一幕假戏真做的闹剧。

8月16日，《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以三栏篇幅，用大字标题刊出了《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事》的新闻，并公布了电文，摆出一副渴求和平的样子。

8月21日，《中央日报》又以同样的手法刊登了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

为了揭穿《中央日报》的骗局，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也于同日在二版短栏刊出蒋介石的电文，并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蒋先生寄电书后》的社论，对蒋介石玩弄的假谈真打的阴谋进行了揭露，对所谓盟军总部作出对日受降办法的无理规定进行了驳斥，揭穿了他们玩弄的反革命两面派做法。

真相被揭穿，国民党反动派们图穷匕首见，竟下令新闻检查机关扣压这篇社论。《新华日报》为此开了天窗，国民党反动派们搞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也因此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舆论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8月24日，即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去第三封邀请电的第二天，《新华日报》以三栏版面用大字标题刊出“延安特讯”：《中共力谋团结，毛主席电蒋委员长，派周恩来来渝》。

这一条消息如春雷在新闻界震响，中央日报社一阵骚动。胡健中感到势头下好，垂头丧气地说：这次搞得不好，弄假成真，我们陷入被动，下一步难办了。

陶希圣等人则不以为然，大概是太相信蒋介石的判断了，认为《新华日报》的特讯不足为证，虽然周恩来来重庆，但毛泽东本人是不会来的。于是经过商定，还是按原来方针办。当天夜里，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中又报道了蒋介石第三封邀请毛泽东的电文。然而，事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8月28日，毛泽东亲自乘飞机来到重庆。当天上午，《新华日报》就发了号外，把这振奋人心的喜讯提前告诉山城人民。那些工作效率高的外国记者们当天夜里就竞相发回电文，把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迅速传向世界。国内各大报纸也竞相刊出消息，发表社论，称毛泽东来重庆是“中国的一大喜事”。

假戏真做的《中央日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陷入十分难堪的处境，只好采用中央通讯社编写的几十个字的新闻稿，用两栏孤零零地排在国内要闻版中间，版面冷冷清清。这是舆论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在舆论斗争进入高峰时，周恩来直接领导了《新华日报》的工作。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做好新闻报道，制定具体的斗争策略。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8月29日，就是毛主席到重庆的第二天晚上，周副主席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把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召集到桂园开会，毛主席和他的秘书胡乔木也参加了会议，共同研究谈判期间的新闻报导问题。

周副主席指示说，现在是我们新闻工作的关键时刻。我们的记者要和各报的记者交朋友，广泛团结他们，把毛主席的活动情况和我们的主张及时地报导出去。要防止敌人扣压稿件，把问题考虑周到。我们的主张是一定要讲，但言语不要生硬，要讲究方法，不要刺激对方。他们的报纸不登，我们不管，我们一定要登，要快些，要登好。毛主席的到来，是一次好机会，各民主党派都要说话的，国民党不想让他们说，这是没有好处的。

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行动，把一条又一条的新闻刊登出去，发表了一篇篇社论，让人们知道谈判，关心谈判，了解谈判。

《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生活书店这些在平时不太惹人注意的地方，在那几天挤满了人，各方人士云集这里，打听谈判消息。他们感情真挚地说：“欢迎毛先生来！毛先生和蒋委员长谈判一定能够成功！我们拥护和平建国方针。”

作为国民党宣传喉舌的《中央日报》，谈判期间不仅不写专访稿件，不发表社论，而且于起特务的勾当。国民党 CC 系头子陈立夫派了一名特务，充当“记者”，四处刺探有关我党谈判的情报。《中央日报》要一意孤行到底。

然而人心难违。尽管国民党反动派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段，但他们左右不了形势，更捆不住人们争取和平、民主的手脚。

1945年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在黄家垭口会所举行酒会，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参加。

《中央日报》社址也在黄家垭口，与协会会所仅一街之隔。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酒会之前，特意到报社看望职工。

跟随前去的蒋泽民老人回忆说：“我们的车还没有到报社，有的人远远看见，立即传播消息。须臾之间，职工们跑步涌向报社大门，有的人身上沾着纸屑，有的人嘴里嚼着饭，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欢呼着。那个场面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广大群众不断觉悟，对国民党政府在谈判期间封锁消息、继续执行新闻检查制度非常愤慨。9月8日，成都等16个新闻、文化团体自动拒检，各地纷纷响应。

在人民的反抗下，蒋介石退却了，只好让国民党宣传部长于9月12日向中外记者宣布，从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这是舆论斗争的第三个回合。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舆论斗争与谈判桌上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到重庆第二天，就开始和蒋介石会晤。从8月30日至9月2日这五天中，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张群、邵力子等人进行了初步的原则性的商谈，就军事、政治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从9月2日起转入实质性谈判，随着具体问题的深入，斗争越来越尖锐，时而陷入僵局，谈谈停停，可谓波折迭起。在这一个多月的十二轮商谈中，周恩来一直唱主角，他在毛泽东领导下，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9月3日，周恩来和王若飞把我党拟定的有关两党谈判的方案（即周恩来在延安草拟的十一条）交给国民党代表，请他们转交蒋介石。

在这个方案中，我党首先提出了和平建国方针，即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为了尽可能争取和平，我党在方案中作了一定让步。一是国民党不同意建立联合政府，方案没有提及；二是方案中在第

二条就提出了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三是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也作了一定让步。

国民党代表把我党方案转交蒋介石后，蒋介石给他们定了调子。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他晚年所著的《七十回忆录》第六章第三节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9月4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我们四个人，其全文如下：

中共代表昨（三）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尚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即不应提出。……

一、军队问题：关于中共军队之编组，去年张（文白）王（雪艇）两氏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谈时，已允予整编为八个师至十个师，嗣后余因顾念事实，于去年冬国民参政会议席上，允予编组为十个至十二个师。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不相同，但余之诺言仍为有效，不过此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允许之最高限度。

二、解放区问题，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

蒋介石在这里已经明明白白道出，一要否定解放区这个既成事实，二要大大削弱乃至吞并人民武装，归根到底就是要夺取人民军队和政权。根据这个调子，国民党代表虽然不得不承认我方案有所让步，但是对方案百般挑剔，横加指责，大部分实质问题给以全盘否定。

9月4日这一天，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晚上，周恩来、王若飞又和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长谈三个多小时，唇干舌燥，却仍毫无结果。最后周恩来诘问国民党代表，我们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不知中央准备的方案如何？

国民党根本没有准备方案，经周恩来这一问，国民党代表个个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由于国民党毫无诚意，谈判从5日起中断了三天。

8日，国共双方代表恢复商谈。周恩来理直气壮地说，依据我方建议，我党的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亦退出一半，政府既提不出方案，又不同意我方的方案，总不能要求我方一概让步，一概退出吧？

最后，在周恩来一再催问下，国民党代表张群才尴尬地拿出一份国民党方面拟定的《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

在这个答复案中，国民党政府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这是我党努力斗争的结果，是广大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自由的结果，也是我们在谈判桌上初步取得的胜利。然而依据蒋介石的调子，答复案中既否定解放区这个既成事实，又要把人民军队缩编为十个至十二个师，而且十二个师是最高限额。

蒋介石这是痴心妄想。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武装和政权岂能交出去？！这样，解放区问题和军队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尖锐激烈的斗争随之展开。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周恩来和王若飞在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中，针锋相对，毫不妥协。

与此同时，为了推迟内战的发生，缓和紧张局势，毛泽东又指示：“在

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取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为此，在军队数量上、解放区名额上，我党又作了一次次让步。

军队数量问题是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我党先后作出三次让步。第一次：国民党军队准备缩编为 263 个师，我们为 48 个师，尚不足 1 / 6；第二次：国民党军队 263 个师，我军为 43 个师，只占 1 / 7；第三次：即 9 月 19 日，国共第七次会谈中，周恩来又代表我党提出，如中央军队缩编为 120 个师，中共应为 20 个师。

这是很大的让步。这里说明一点，缩编并非裁减，我们还是 120 万军队，只不过是编制少了，一枪一卒也没有动，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对于我们的三次让步，尤其最后一次缩编为 20 个师的让步，国民党方面还是不同意。在军队驻地问题上，解放区人选问题上，竟让我们开出名单，由国民党政府量才任用，真是无理之极。

让步是有一定限度的，是有原则的。

在 9 月 21 日第八次谈判中，周恩来气愤地说：国民党的观念是自大的，不平等地对待中共，必将引起我党的愤怒。今日商谈，应取和平态度。如果成立联合政府，我党一切军队皆可交出。

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有的国民党代表理屈词穷就耍起无赖，拍桌子恫吓，软硬兼施，明目张胆地向我党要枪杆子。然而，他们这些伎俩怎能奈何得了顶天立地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不屈不挠与之针锋相对。

蒋泽民老人回忆了这样一个片断：

记得一次在半山新村谈判，我们的代表有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有白崇禧、王世杰、吴铁城。我在外屋坐着，听见里面争执得很激烈，吵了起来。

吴铁城把桌子拍得呼呼直响，歇斯底里地喊着：“只要你们把军队交出来，什么官都给你们当！”

王若飞也火了，忽地站起，也拍着桌子说：“我们共产党什么官也不要，只要求国民党把军队交给人民，国家政府主席都由你们当！”

毛主席平静地说：“不要吵了，下次再谈。”一句话使争吵之声嘎然而止，屋内安静了。

听了吴铁城的喊叫，我的肺都要气炸了，他一语道破天机，什么军令政令统一，纯粹是借口，要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才是国民党政府的根本目的。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我又恨又急，要不是副官重任在肩，我真想冲进去，告诉吴铁城，解放区的每一寸土地，我们手里的每件武器，你们都得不去，别白日作梦啦！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红岩村办事处。同往日一样，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等人在胡乔木的屋子里，分析当天谈判之事。王若飞白天谈判时的怒气尚未消，气呼呼地说：“国民党的一些代表大不像样子了，耍起了无赖，要与他们针锋相对，他们用什么方式攻击，我们也用什么方式回击，他们吵，我们也吵，对着干！”

周副主席微笑着说：“针锋相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不讲理耍无赖，咱们要讲理，不管他们怎样吵闹，咱们心中要有一定之规，要沉住气，不要发火。”

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

听着周副主席和王若飞的谈话，我想起一件事。那是日军投降前夕，我在下土湾油库工作。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让我们散发《新华日报》，我们与之针锋相对。我把一张印有重要社论的《新华日报》贴到附近茶馆的墙上，并把社论用红笔圈上，很快招来许多群众观看，边看边议论，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投降行为。

这个茶馆是特务的暗哨，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黑粗汉子，两把就把报纸撕烂。我和他吵了起来，他要伸手掏家伙，我也不示弱，摆出决斗架式。在群众的怒视下和一些人的相劝中，这个家伙软下来，气哼哼地进了屋，我又在墙上贴了一张《新华日报》。

我回到办事处，向王若飞作了汇报，他赞许地说：“打得好，就应该和他们对着干！”

坐在一旁的周副主席发话了：“若飞呀，你这是与泽民两人合起来打架呀，这可不好。”

周副主席总是这样，无论遇到多大的烦事、乱事、棘手之事，他总沉得住气，既让人把话讲完，又一条条加以解释，必要时加以驳斥，说得人心服口服，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吧。在这场关系到祖国命运的两党谈判中，他更是如此，连有的国民党代表也佩服他。

由于国民党坚持顽固立场，这场中外瞩目的谈判于9月21日完全停顿下来。善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蒋介石竟反咬一口，造谣说共产党没有诚意，来重庆就是争枪杆子、争地盘，把破坏谈判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的头上。在他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开动宣传机器，一时舆论纷纷。

暗地里，蒋介石扔掉和平外衣，露出刽子手的狰狞面目，拿出他在上党地区押的那笔赌注，密令阎锡山集中三个师的兵力，向我上党解放区进犯。重庆谈判停下来了，可是上党地区的枪声却响得正酣。蒋介石以打压谈，妄图在战场上得到他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逼迫我党把军队交出来。蒋介石在桌上、桌下一齐下手了。

此时，以调停人身份往来于国共两党之间的赫尔利，见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处于被动局面，恼羞成怒，摘下了调停人的面具，指责我党在谈判中提的“具体问题”过多，把谈判停顿的责任推给我们，并放出回国之风，向我党施加压力。

一股股腥风扑来，一个个恶浪打来，谈判处于风紧云沉之中。

重庆谈判能否取得成功，已成为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最为关切的问题。

针对赫尔利的恫吓，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管！”

为了澄清事实，戳穿蒋介石的谣言，让人们了解谈判真相，毛泽东和周恩来广泛地接见、拜访了民主人士、各界知名人士、国民党元老、外国使节和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谈判进展情况，宣传我党的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指出谈判尚未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

9月18日，周恩来在参政会的茶会上介绍了谈判情况，他的结束语是：“有些已有了结果，有些已有了原则的决定，有些则尚待商谈。总之，在一个方针、一个方案之下，求得合理解决，不但是诸位关心、诸位期待的，同时也是世界所注意的，我们每天都希望很快就能共同发表一个公报，使大家安心。”

最后，他语气坚决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必定能解决！我们

的一个信念——和平建国。”

周恩来的讲话，充分表达了我党争取和平建国的决心，深受大家欢迎，被视为茶会上最有分量最有内容的讲话。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一旦剥去真相就会大白。通过我们的宣传，广大群众看清了，破坏谈判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国内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及国际友人，纷纷发表声明，希望国共两党谈判成功，国家和平统一。

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对蒋介石也不满意，认为他太蠢了，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毛泽东没有机会来的。这次是国民党把毛泽东请来的，到重庆做红色宣传，争夺人心，蒋介石把毛泽东拖在重庆是没有好处的。

我党赢得了广大群众和国际舆论的大力支持。在正义的呼声下，从 25 日以后，国民党代表的态度有点儿缓和。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最后的较量还是在战场上，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

针对蒋介石玩弄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党中央在确定毛泽东赴渝谈判时就作了一系列部署，电令有丰富作战经验和卓越指挥才能的刘伯承、邓小平到延安，进行军事部署，重点放到上党解放区。

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受党中央的任务后，立即乘飞机离开延安，回到赤岸驻地，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时局的估计和指示，指出蒋介石内战方针已定，内战危险十分严重，要有充分准备，争取和，准备打。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刘邓两位首长在会上对晋、冀、鲁、豫地区的斗争进行了详细部署，号召广大指战员，不信敌人的“好话”，不怕敌人的恫吓，要坚决、大胆、迅速进攻，勇敢、勇敢、再勇敢。

果不出我所料，阎锡山在蒋介石的密令下，集中三个师，在日寇第十四独立旅团掩护下，从临汾、浮山、翼城等地向我上党地区大举进攻，从我军手中夺去了已被我们解放的潞城、襄垣两地。这时候，国共两党谈判已经开始了。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犯，粉碎蒋介石以打压谈的阴谋，刘伯承和邓小平准确地制定了“上党战役”计划，迅速报请在重庆的毛泽东。经毛泽东批准后，9月2日，上党战役打响了。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英明指挥下，我军开始了英勇反击，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敲碎了上党平原长治城周围的屯留和长子两颗“硬核桃”，活捉敌纵司令，完成战役中的逐城攻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长治，把阎锡山派来增援的八个师和炮兵部队诱在“口袋”里，来个瓮中捉鳖。10月2日夜间发起总攻，经过三个小时激烈的浴血奋战，攻下了长治城，全歼敌人十三个师，近万名官兵当了俘虏，阎锡山多年的“家当”几乎一顷而光，国民党军队遭到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用生动的比喻对上党战役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蒋介石在上党地区押的这笔军事赌注输光了，他的以打压谈的阴谋破产

了，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同样没有得到。正如毛泽东所说：“把他打痛了，他也就老实了。”蒋介石被迫承认商谈条件。

10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交换了意见。10月10日，双方代表在《会谈纪要》上签了字。这个《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至此，长达43天的国共两党谈判结束了。

《会谈纪要》发表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且，我党力争和平的真诚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各阶层人士，也感动了国民党的一些官员，连他们的代表对共产党所作的让步也深表钦佩。

国民党参加谈判的主力代表张治中在《回顾重庆谈判》一文中写道：“从这个协定可以看出几点：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国民党内大多数人满意的。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四十个师减少到二十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商谈中始终没有得到协议。这次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来，凡是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自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衷，舌干唇焦，好不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28 周恩来秘书遇难

1945年10月8日，国共两党谈判已经进行40天了，许多问题经过商谈有了眉目，有的达成了协议，谈判接近尾声。唇干舌燥的代表们可以轻轻地舒口气了。然而就在这天傍晚，发生了一起震撼山城的事件，周恩来的秘书李少石遇难！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当时许多中外人士都认为是政治谋杀。

8日这天，国共双方代表就《会谈纪要》交换了意见，决定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字。此时来重庆已经40天的毛泽东，也准备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

始终坚持和平建国信念的张治中，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敬重，决定晚6时在通远门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宴会，欢送毛泽东，表达他的盛情。

傍晚，关心时局的柳亚子先生来到曾家岩周公馆，拜见周恩来，了解谈判情况。为了不影响周恩来参加宴会，柳亚子和周恩来畅谈一会儿后就起身告辞。周恩来派他的秘书李少石把柳先生送回沙坪坝住宅。

李少石立即把司机熊国华叫来，出车起程。熊国华是新来的司机，原是当地市民。

柳亚子离去后，蒋泽民、陈龙、龙飞虎、颜泰龙保卫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军委礼堂。

李少石把柳亚子安全送回家后往回返。司机熊国华把车开得较快，行到下土湾时，适有国民党军队迫击炮团的一名排长率领五六名带枪的班长和三十名新兵，向壁山方向前进。有两个新兵在路上不好好走，打着玩。汽车开到跟前时，其中一个躲闪不及，撞到汽车门上后摔倒在地，头部负伤。

熊国华没有停车，继续前行。后面的士兵大喊大叫，一个班长竟向汽车开了枪，子弹穿进车箱后从工具箱射出，又穿进李少石右肩胛进入肺部。

熊国华听见枪声，加大油门向前开，跑过一段路后，回头一看，李少石已身负重伤，鲜血正从伤口往外涌，他急忙呼叫，然而李少石已昏迷不醒。

他急速开车把李少石送到市民医院抢救，然后把车开回车库，他有些恐惧，怕此事连累自己，悄悄把车钥匙放下就匆匆跑了。

大约晚6点半左右，市民医院把电话打到桂园，接电话的是负责值班的朱友学。医院人员急切告诉他，八路军办事处有个人被枪杀，被一个司机开车送来，他伤势很重，正在抢救。

朱友学放下电话，立即带一个同志到车库取车，他看见熊国华开的那辆车停在库里，车上有血，判断可能是李少石秘书遇害了，因为他看见李少石是坐这辆车送柳亚子回去的，那么，熊国华呢？朱友学顾不上多问，立即驱车前往医院。

朱友学赶到医院时，医护人员正在抢救李少石。

李少石是被炸子打中的，这种子弹进入人体就爆炸，李少石的肺和肝都被炸坏了。这无疑是谋杀，而且是政治谋杀！前几天国民党反动派们就放出风，要刺杀中共代表，莫非……朱友学不敢想下去，必须立即向周副主席汇报。

朱友学飞一般地把车开到军委礼堂，通过卫兵把龙飞虎找出来，三言两语讲了情况，让他马上报告周副主席。

龙飞虎转身回到军委礼堂，附在周恩来耳旁急切地悄悄说：“李少石秘书遇难，生命垂危！”

周恩来听后脸色变了，浓重的双眉蹙在一起，但是瞬间又恢复了平静。他放下手中的酒杯走到毛泽东面前，轻声说：“主席，我有事，先出去一会儿。”说完，他用机警的目光看了蒋泽民两眼，又望了望毛泽东，然后带着龙飞虎和颜泰龙急速走了出去。

刚才发生的一切，机智的蒋泽民全看到了，也听到了。他对周恩来的目光心领神会，那就是一定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周恩来等人离去后，蒋泽民和陈龙更加提高警惕，一面作为随从副官跟在毛泽东左右，应付场面；一面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时候，酒会接近高潮，各方人士把一杯杯盛满真情厚谊的醇酒捧到毛泽东面前，祝他身体臆康，祝他一路平安，也祝贺国共两党谈判成功！

然而周恩来离去后，无人替毛泽东饮酒。为预防万一，这个时候更不能让他多喝。于是，蒋泽民和陈龙手脚麻利地搞了个小动作。他俩把凉白开水悄悄地倒入酒瓶，待毛泽东饮完一杯酒后，再将这“酒”倒入他的酒杯，以水代酒。

周恩来心急如焚地直奔市民医院，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他心里痛啊！到了医院门口，周恩来第一个跳下车，急匆匆走在前面，奔向急救室。

李少石躺在抢救室的病床上，面无血色，双目紧闭。周恩来一步抢上去握住李少石的手泪如泉涌，他轻轻地呼唤着：“少石，少石！我是周恩来，我来了！”

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亲切的话语，冥冥之中的李少石觉得有股轻风飘进嘴里，流入胸内，胸前压着的那块大石头掉了，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觉得有缕阳光透了进来，黑暗没有了，眼前亮堂了。他努力睁开眼睛，他想说话，那没有血色的嘴唇微微地启动了几下，却发不出声音。

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悲痛得嗓子有些嘶哑地说：“少石同志，我来晚了！是你替我遭受这场不幸，你是个好同志，好党员！……在二十一“前，你的岳父遭到暗杀，我也是在这样的时刻赶到的，没想到二十一年后你又遭到同样的毒手！”（李少石的岳父是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于国共第一次分裂前夕，被蒋介石派人刺杀于广州。）

握在周恩来手里的李少石的手渐渐变凉变硬，垂了下去，李少石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周恩来抚尸痛哭，朱友学、龙飞虎、颜泰龙及在场的人都泪湿衣襟。

周恩来流着泪命令身旁工作人员：“快把少石的爱人廖梦醒和他们的女儿李梅接来！”

廖梦醒闻知噩耗后悲痛欲绝，她领着女儿赶来，已经哭成了泪人。周恩来握住她的手声音哽咽地安慰着，劝她坚强些，化悲痛为力量。

周恩来擦干泪水，走出医院，找到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弄清真相，追查凶手，并且要求，在目前情况下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今晚要派车护送毛主席回红岩办事处。

大约晚9点多，军委礼堂的宴会结束了，蒋泽民和陈龙保卫着毛泽东回到桂园。李少石突然遇害，使蒋泽民对毛泽东的安全非常担心，着急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今晚就别回办事处了。”

“怎么？害怕了？不要紧张嘛！办事处还是要回去的，周副主席回来咱们就走。”

那辆被打坏的小车已停在车库外，两位缺乏经验的同志正在冲洗，一道

道血水流到地上。王若飞见后急切地说：“快停下，不要冲了，你们把现场破坏啦！你们做保卫工作的同志，怎么连这些常识都不知道呢？”

他俩立即停下，后悔地你望望我，我看看你。

这时候，周恩来和宪兵司令张镇驱车赶来。张镇跳下车，领着几个宪兵来到这辆被打坏的车里检查。

周恩来下了车，望着地上的血水满脸怒容，严肃地对张镇说：“你们要认真检查，迅速破案，必须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自知事态严重的张镇，连声说：“是，是！”

蒋泽民、龙飞虎、陈龙、颜泰龙保卫着毛泽东、周恩来驶往办事处。张镇也遵照周恩来的要求，亲自跟车护送。

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传到办事处后，人们心里笼罩着一层阴影，在悲痛之中，更为尚没有回来的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危担忧。大家沉不住气了，纷纷跑到大门外等候。为预防万一，大门内外全设置了岗哨。

人们悄悄地议论着，是谁杀害了李少石？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现在在哪里？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

大家翘首相待，望着黑洞洞的夜空，一个个忧心如焚。

汽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人们惊喜地跑上去，毛泽东的老警卫员贺清华跑在最前面。

汽车刚刚停下，人们纷纷围上去，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安然无恙，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来。有的人眼里含着泪说：“毛主席，您可回来啦！”

已经凌晨2点多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没有休息。关于李少石遇难的事，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一定要开好追悼会，声势要大些。然后，毛泽东又给桂园的朱友学挂电话，让他到办事处，毛泽东要亲自了解李少石遇难的情况。

朱友学立即赶到办事处，把所知道的情况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完怒容满面，倏地站了起来，双手插腰，气愤地说：“这是暗杀，是威胁，是恐怖！我们不怕！！”

毛泽东和朱友学谈完话后已经清晨4点了，周恩来又把所有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会，重新研究部署了保卫工作，要确保毛泽东的安全。

11日上午，天阴雾浓，千百人聚集在市立医院门前广场，参加李少石同志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送了花圈，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都来哀悼，宋庆龄等国民党元老、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也前来吊唁。会上，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讲了话，要求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

追悼大会后，周恩来和宋庆龄等人跟随灵车行了十余里地，来到小龙坎墓地，为李少石送葬。周恩来亲手动了第一锹土，其他人也都含着泪把一锹锹土轻轻地放在李少石墓上，让他静静地安息在嘉陵江畔，眺望东方红日，迎接和平建国那一天！

处理完李少石的丧事后，我们也查清了事件真相。《新华日报》首先发表了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关于事情经过的讲话，接着又发表了钱之光处长的讲话。钱之光在讲话中实事求是，对撞伤的国民党士兵表示慰问，他的全部医疗费由中共承担；对国民党抓紧调查表示感谢。

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传出后，震动山城，许多人士皆认为是政治谋杀，一时舆论纷纷。国民党当局害怕事态扩大，竟不顾这位伤兵的痛苦，把他从高滩岩的中央医院转到金汤街市民医院，住在李少石原住的病房对面，任人参观，存心扯皮。

周恩来得知后，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亲自到医院看望这位伤兵，嘱咐他安心治疗，并重申医疗费由我们共产党承担。

对李少石遇难事件，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有的人说：“共产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世界上最讲认真的党。”

为了中华民族，毛泽东是冒着危险赴渝谈判的。尽管党中央做了全面部署，重庆办事处做了充分准备，国民党当局也再三表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但是，作为国民党陪都的重庆特务多如蚂蚁，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因此，在那紧张的43天中，周恩来每天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老同志们回忆说：“周副主席不仅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更是毛主席的最忠诚的卫士。”

他这个“卫士”在延安就负起了重任。

党中央决定毛泽东赴渝后，周恩来马上通过无线电波向重庆办事处进行全面部署，大到谈判期间的保卫工作，小到毛泽东去后穿的鞋、用的脸盆，连毛泽东喜欢吃的辣椒都要嘱咐。

毛泽东到重庆后，他更是形影不离。谈判桌上，他是我党的主力代表，根据党中央的既定方针，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谈判桌下，他配合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凡是毛泽东去过的地方都留下他忠诚的足迹。

毛泽东曾经在蒋泽民等工作人员面前夸奖周恩来：“恩来一个人顶几百个人哟！”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他的别墅——山洞林园宴请中共代表。宴会结束后，蒋介石挽留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他们安排在林森公馆。

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在毛泽东还没有到房间休息之前，周恩来就安排龙飞虎、颜泰龙到房间检查，一再叮嘱，要认真检查，不能有半点儿马虎。

龙飞虎、颜泰龙检查完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可是周恩来还是不放心，怕这些年轻人粗心，又亲自到房间检查。他把各个角落检查一遍后，又蹲到床下看看，在床上拍拍，把枕头拿过来摸摸，再到椅子上坐坐。直到认为万无一失，他才让毛泽东进来。毛泽东住下后，他立即指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屋内不准离开人，外人也不准进来。

这一遍遍检查，一句句交待叮咛，凝结着周恩来的一片深情。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由林园回到红岩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们举办了热情洋溢的欢迎晚会。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晚会结束时，天已经很晚了，周副主席和毛主席研究完明日的工作，安排完毛主席休息后，立即召集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开会。

他说：“毛主席已经来两天了，你们准备工作做得不错，但是还要仔细考虑一下，有许多问题值得注意。

“毛主席接见的人很多，来往的人又很频繁，有的我们认识，有的我们不认识。外边有公开看着我们的人，桂园门口交给人家不行，不让人家管也不行。来人就不要到传达室里登记了，要登记在会客室登一下就行。门口传达室有宪兵，他们每天就是观察来往行人的，还要天天向宪兵司令部汇报。

“我们外出时间要掌握好，不能过早地告诉去哪儿，只说出门就行，临走时再说去什么地方。”

讲到此，周副主席把话顿了顿，用明亮的大眼睛环视一下每个人的脸，又接着说：“要多同宪兵及蒋介石派来的司机接触，了解他们有什么规定。行车时都是根据路况决定车速的，这些都有规定，要先听听他们意见，把情况了解清楚再和他们商量，不要咱们先作决定。既要安全又要让每个人心情

愉快，不要让人家把我们看成是硬梆梆的土八路，让人家心情不愉快，那就不好了。他们也是来做我们工作的，从原则讲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不能轻易地把他们全看成敌人。我们是做人的工作，不接近人又怎么能做人的工作呢？”

周副主席最后强调：“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要让毛主席吃好，睡好，有个安定的环境，同时要做好宪兵和国民党派来的司机的工作，要团结他们。”

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及随从人员都住在红岩办事处。

据蒋泽民老人回忆，他们住在办事处二楼东侧，这是两排门基本对着的房间，中间是一条走廊。毛泽东住在北面最里头一个较大的房间，旁边是秘书胡乔木的房间，然后是蒋泽民和陈龙的房间；周恩来的房间基本与毛泽东的房间对着，旁边是王若飞的房间和龙飞虎、颜泰龙的房间。这样，四位副官蒋泽民、陈龙、龙飞虎、颜泰龙守着楼梯口，便于警卫。

每天晚上，周恩来陪着毛泽东回到办事处，他先向毛泽东汇报当日谈判情况，然后与毛泽东一起分析研究谈判中的问题，预示时局的发展，制定有关方针政策。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电文，再把电文交给负责机要的童小鹏，发往延安和各解放区。最后，他还要在灯下安排好毛泽东翌日的活动，接见谁，拜访谁，参加什么座谈会，谁陪同，谁警卫等，都详细列出。

为了让毛泽东吃好，睡好，休息好，周恩来指示办事处作了周密安排。

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办事处把副官李泽纯抽出来，专门负责毛泽东的饮食。毛泽东喜欢吃辣椒，李泽纯让食堂工作人员每天给毛泽东做一个可口的辣椒菜。

按照医生嘱咐，毛泽东临睡前要洗一个热水澡，李泽纯准备了一个铁皮做的澡盆，专供毛泽东用。

毛泽东尚未到重庆前，周恩来就在电报中指示钱之光，要为毛泽东准备好衣服和鞋。毛泽东到重庆后，钱之光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负责照顾毛泽东生活的刘昂。刘昂是蔡和森的外甥女，也是钱之光的爱人。

刘昂怕俭朴惯了的毛泽东拒绝添置衣服，就趁毛泽东睡熟后，让工作人员悄悄取出衣服和鞋，量好尺寸，然后送到服装店，给毛泽东做了一套合身的衣服，她又亲自到商店给毛泽东买了一双轻便的布鞋。

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三楼值班的机要人员都脱去皮鞋，穿上布鞋，或者打赤脚。周恩来和大家一样脱掉鞋，仅穿着袜子走路。

重庆蚊子多，臭虫也多。周恩来多次指示工作人员，为毛泽东铺床时要多注意，认真检查，别让被里爬进臭虫，影响主席睡眠。

多么细心的照顾！多么体贴的关怀！这里有同志之情，更有战友之爱。

桂园——张治中公馆，是谈判期间我党对外的办公点，亦是国民党明保暗监的地方，毛泽东白天活动时间大部分在这里，这里的保卫工作更重要。

负责桂园保卫工作的朱友学老人回忆说：

桂园的保卫工作由国共两党共同负责，以院墙为界。院墙以内由我们负责；院墙以外由国民党派来的宪兵负责，称为特别警卫班，带队的是个营长，叫李介新。这些宪兵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务，归重庆市直属特高组领导。

院门口左侧有个传达室，里面设有登记簿，外来客人都要登记。第一天，我就看见一个宪兵抄登记簿，急忙问他抄这个干什么？

他答：“写情报日报，每天一份，这是任务。”

情报日报？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于是我耐着性子和颜悦色地问：“这情报日报送给谁呀？”

“送给宪兵司令部，蒋委员长还看呢。”这个宪兵顺口说出，看样子是个心直嘴快的人。

我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立即指示：“那不行！必须取消。”

这样，传达室里的登记簿就被取消了，外来人进院不登记，但在我们会客室里设了登记簿，由我们自己掌握。

谈判期间到桂园看望毛泽东的人，多是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和我们党内同志，为监视毛泽东和这些人的交往，宪兵们每天必须完成“情报日报”，在上面逐一填写这些客人的姓名、年龄、职业、性别、体形、容貌等，然后，这个“情报”每天由单线交通经过宪兵司令部，直接送给蒋介石。

由于取消了登记簿，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无法获得有关的“情报”，对我们的同志和朋友则增加了安全系数。

当年在桂园担任特别警卫班长的李介新在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为了想得到每天来会见毛泽东的客人的具体姓名，从中捞到一点东西，曾经在传达室设一个会客登记簿，朱副官（朱友学）知道了，立即指示：“外来客人不要登记。”这样一来有许多来会见毛主席的客人，我们并不认识，也无法知道姓名，在填写情报日报时只能写上来访时间、客人面貌、体形高矮、大概年岁和显著特征。游动宪兵经常借机靠近楼房，很想听到点房内的讲话内容，但毛主席会客、办公都在楼上，讲话很难听到。

情报日报是每天一份，在下午规定时间内写好，由特高组派穿军装的传达兵到桂园来取。填日报时约定的暗号是：称毛主席为“何先生”，称朱副官为“老吴”。报告内容事无巨细，有闻必录。

从李介新这段回忆，可以看到国民党派来的宪兵们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登记簿”取消得可谓非常及时。

朱友学老人说：

一般情况下，每天下午毛主席部到桂园办公。毛主席到来之前，周副主席总要先检查一遍，认真询问我们，保卫工作怎样，卫生打扫如何，主席要喝的水，吸的烟准备了没有？待一切完好后，他才去接毛主席。临行前他经常叮嘱我们，除了毛主席随身的警卫外，你们几个不得离开房间，一定要注意主席的安全。

在桂园，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还负责毛主席的吸烟、喝水、招待客人等事。周副主席一再告诉我们，要安全，要卫生，要细心，要认真。为此，王东森专门负责毛主席和客人们的饮水。

一天下午，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到桂园拜访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与他们畅谈目前时局和谈判情况，最后又热情地留他们共进晚餐，沈钧儒和章伯钧欣然答应。

由于事先没有做准备，因此我们马上去请示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说：“你们可以到外面去做，但必须安全。”

我们立即派人到冠生园，亲自看着大师傅洗菜、切菜、炒菜、做饭，不放过任何一道环节。

我们把做好的饭菜端回桂园，周副主席不放心，轻声说：“你们先不要给主席端去，放这里让我尝尝，这可非同小可，别说意外，就是主席吃了消化不好也不行啊！”

说完，他拿起筷子，把菜夹起一点儿放进嘴里细细品尝，味道正不正，咸不咸，淡不淡，几道菜都这样品尝完了，他又夹起一点儿饭放到嘴里嚼嚼，看看饭硬不硬。最后他认为满意，才准许我们把饭菜端给毛主席和客人。

站在一旁的我望着周副主席这一举一动，听着他发自肺腑的话语，心弦震颤了，周副主席对毛主席真是无比忠诚啊！

还有一次，毛主席要理发，桂园没有理发师，周副主席征询我的意见。

我说：“外请理发师，都不是我们自己人，刀举在头上，这……”

周副主席沉吟片刻说：“得想想办法，既要理发，还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我们把理发师请来。我们三人站在旁边，看着理发师给毛主席理发。虽然表情依旧，但是那六只眼睛紧紧盯着理发师的手和他手里的剃头刀。

毛主席坐在那里谈笑风声，和蔼地询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什么时候出来的，念过书没有，和我们拉着家常。

我们一面简单地回答着，一面关注着理发师的一举一动，紧张得每个毛孔都扩张起来，待毛主席理完发，汗水几乎把衬衣都湿透了。

在桂园，毛主席接待了大量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有时候一天多达二十多人。为防止坏人乘机钻空子，周副主席指示我们，凡是有人要见毛主席，无论是谁，都要先报告给他，由他详细审查。具体安排，不能有任何疏忽。

在那40多天里，周副主席每天不知要处理多少大事、小事，常常通宵达旦。我们当时既受感动又着急不安，感动的是周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赤诚之心；着急的是怕这样下去把周副主席累坏了；不安的是自己插不上手。毛主席忙，周副主席更累，事无巨细，件件都得操心。

毛主席到重庆后，山城人民闻讯都想见他，看看他的风采，向他问声好。桂园是我们的对外办公点，是毛主席会客的地方。因此，每天佳园外想见毛主席的人络绎不绝，有时候十几个人在门口等候。

负责警卫的宪兵要通知警察局，把这些人抓起来。我立即报告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说：“不能盲目抓人，你们要和宪兵商量，认真询问一下，弄清情况。如果是群众，要理解他们想见毛主席的心情，要耐心地做工作，劝他们回去。不要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抓人，那样就不好了。”

我们向宪兵做工作，制止了乱抓人。

这期间，有一个人连续四五天蹲在桂园门外，宪兵们注意到了，我们也注意到了。宪兵们说他行迹可疑，要抓起来。

我想起周副主席的指示，急忙说：“先别抓，让我问问再说。”

我来到他的面前，和蔼地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的？蹲在这里有什么事吗？

他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一遍，站起身，憨厚地笑笑，说：“你是八路军吧？我是这儿附近乡下的农民，不瞒你说，我已经来了五天了，我在这儿等着，就是想见见毛主席，向他问声好！我们老百姓被战争害苦了，盼望过安宁日

子，毛主席就是为这个从延安来的，我们感谢他啊！”

听了这位农民发自肺腑的话，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头，我对他说：“这位大哥，我一定把你的心愿告诉毛主席。但是毛主席忙啊，您还是先回家吧，出来几天了，家里人也惦着你呀！”

他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转而又笑了笑，说：“好吧，我听你的，回家去。这次虽然没有看见毛主席，但是看见你们这些呆在毛主席身边的人，和和和气、实实在在的，我也没白等五天。”

重庆多是山路，有的路又陡又弯，稍有疏忽就容易出事故。为此，周恩来多次指示随从人员，行车路上一定要提高警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由于司机是国民党方面派来的，因此有开车经验的蒋泽民或颜泰龙总是坐在司机旁边，以便于一旦发生事故，立即采取措施。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我们跟随毛主席出去前，必须先弄清去什么地方，有多远，途经何处，路况如何，走哪条路线。在临出发前几分钟才通知司机和“警卫班”，并根据路况与司机商定车速。

通常情况下，有三辆三轮摩托车在前边开道，随后是四辆小车，至于毛主席坐哪辆车，哪辆车在前，哪辆车在后，我们随时随地改变，外人根本无法得知毛主席的乘车规律。

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行车时毛主席部坐车后排，我们工作人员坐在司机旁边，一是监视司机，二是一旦有事故便于排除，另外从正面驶过来的车，不容易发现毛主席。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先后参加了两次规模较大的鸡尾酒会。一次是1945年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举行的招待会；另一次是10月8日张治中将军为欢送毛主席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的宴会。

在两次酒会上，各方人士欢聚一堂，有国民党的党、政、军界要人，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民主人士、知名人士，也有苏联大使和武官。他们当中，有毛泽东昔日的老友，分别数载，今朝相逢，万分激动，把盛满深情厚谊的酒敬给毛泽东，共叙衷肠；有初次见到毛泽东的，被毛泽东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谦逊朴实的作风所感动，把盛满崇敬之情的酒举到他的面前，向他间声好！更多的人盼望和平统一，把象征和平友谊的酒献给毛泽东，祝愿谈判成功！

周恩来替毛泽东饮了这一杯又一杯的酒。虽说他有酒量，但是这一杯杯酒入胃也够承受的，然而为了毛泽东的健康他必须这样做。

每次赴宴前，周恩来都先派警卫人员去察看会场，认为万无一失，才陪毛泽东前往。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在参加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酒会前，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我带一名警卫员和两名宪兵乘车来到黄家垭口会所。我们把周围环境和宴会厅都认真检查了一遍，返回后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会所门口下车时，被几个群众看见了，这样消息传开了，许多群众纷纷赶来，站在濛濛细雨中，等着看一眼毛主席。

酒会快结束时，外面的警卫人员和宪兵跑来报告，说院内院外挤满了人。我告诉陈龙一声后马上走了出去，此时外面已人山人海，我领着几个宪兵挤进人群，让司机把车调过来，开到十几米以外的高坡上。这样，毛主席出来

上车容易些，也安全些。待我费九牛二虎之力挤回来时，已是汗流浃背。

今天群众如此之多，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为了保卫好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我和王炳南、陈龙、龙飞虎、颜泰龙商量，我们几个人一定要围在他们身边，千万不能挤散。我们又进行了安排，派两名宪兵看车子，两名宪兵在大门口警卫，两名宪兵在展览馆门口警卫。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走出来时我布置四名宪兵在前面开路，王炳南在前，我在王炳南后，我身后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其他几位副官在后面。我们排成一队走出展览馆门口。

这时候，等待的群众欢呼着潮水般地涌过来，前面几个宪兵被挤散了，王炳南也被挤得站立不稳。我身高体魁，把所有力气全拼出来，和王炳南等人一起在这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硬挤出一小块空隙。我们几个人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围起来向外挤，终于挤出大门，保护着他们上了车，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离开了黄家垭口。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保卫工作由我们和国民党联防。为此，周恩来经常嘱咐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要做好国民党宪兵和司机的工作，只有做好他们的工作，才能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待宪兵和国民党的司机一到，就主动去接近他们，团结他们，争取他们。

蒋泽民、陈龙、龙飞虎、颜泰龙主动接近国民党派来的司机，从开车技术谈起到拉些家常，尽量多找话题，打开他们那紧闭的双唇，遇事又主动和他们商量，尊重他们的意见，以诚相待。

通过工作，几天功夫大家就相互熟悉了。那个给毛泽东开车的精明寡言的少校司机终于开口讲话了，目光也不再冷冰冰的，有时变得很温和，并介绍了自己的开车经历。那几个开摩托车的宪兵也不像刚来时那样机械地一问一答，木然的毫无表情的脸上有了笑容。蒋泽民、龙飞虎等人与他们个别交谈时，他们也能说些心里话，诉些苦衷和怨愤。

在桂园担任“警卫”任务的宪兵们，在朱友学、伍全奎、宋福生潜移默化的工作下，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平易近人的领袖，也没有见过这样热情、朴实的八路军工作人员，这与蒋介石独裁专横的法西斯统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尽管他们要天天奉行特务的宗旨，但是心里的天平已经不平衡了。

宪兵们这些细微的变化，被他们的上司发现了，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担心自己精心培养的卒子被共产党赤化，决定换人，五天换一次，甚至一周换两次。

这样，使我们工作人员刚刚熟悉的宪兵又被调走，再来一批新的，如此循环，大家感到工作难做，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周恩来马上出面同国民党方面交涉，要求尽量别换人，经常换人不利于保卫工作。通过交涉，国民党方面最后同意少换人。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耐心地做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的工作，让大家沉住气，国民党换一批人，我们就做一批人的工作。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我们向周副主席“诉完苦”，他竟爽朗地笑了。我被笑懵了，心想，人家都快急死了，您怎么还笑呢？我抬头望去，只见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眨了两下，又亲切地望了我们几眼，似乎在问：“同志，你深入思考了吗？”

他收敛了笑容，认真他说：“你们说工作难做，我看这是难得的好机会。这些人的心情，我们应当理解，他们早就想见毛主席了，但是出不来，见不着，这样一调换不是都见着了吗？这可是送上大门里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啊！我们要深入广泛地做宪兵的工作，不管他们来的时间长短，都要接近他们，他们生活上有困难，你们去找钱处长，立即解决。”

周副主席这番教导，使我们顿开茅塞。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去办，国民党换一批人，我们就做一批人的思想工作，把我党的政治主张及和平建国方针广泛宣传出去。

在紧张的谈判中，中秋佳节到了，这是亲人团聚之日，也是思乡之时。然而，这些宪兵们重任在身，回不去家。

对此，周恩来早想到了，他把朱友学叫去，向他交待：“今天是中秋节，你给宪兵班送些月饼、糖果去，多尽安慰之情，让他们过一个愉快的佳节。”

朱友学接受任务后，带着其他同志，把月饼、糖果、烟酒一样样送到宪兵班。朱友学热情他说：“今天过节了，周副主席派我看望大家，大家这些天辛苦啦！这些东西也是周副主席派我送给你们的，祝你们节日快乐！”

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有的宪兵把月饼拿起来放到嘴边，可是又舍不得吃，细心包好，留着带回家与亲人共享；有的仰望明月，慢慢嚼着月饼，品味着这些天来共产党对自己的关怀；也有的把月饼捧到手中，凝神深思，眼里噙满了泪水。

由于我们思想工作深入扎实，这些宪兵和司机们尽职尽责，在保卫工作上与我们配合得当，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毛泽东离渝返延时，临上飞机前还拨开众人，亲自到担任警卫任务的几个宪兵面前，握住他们的手，感情真挚他说：“你们辛苦啦，谢谢你们！”

毛泽东离开重庆后，这些宪兵也完成了任务，准备撤离桂园。

10月11日晚上，朱友学组织大家在桂园开了欢送会。周恩来亲自到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宪兵们对我们的支持。

周恩来讲完话，亲手把从延安带来的大红枣、毛线、呢子、皮筒等一一发给他们。宪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10月8日，在谈判接近尾声，毛泽东准备回延安时，张治中前来告诉周恩来，蒋委员长已同意毛先生签字后回延安，并派专机护送。并说，待毛先生走后他要去新疆执行公务。

周恩来灵机一动，他想，没有国民党官方陪送毛泽东是不行的，而张治中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办事认真，他去新疆途经陕北，请他陪送毛泽东最合适，也最放心。于是对张治中说：“您能不能送毛主席回延安呢？”

张治中欣然接受，立即请示蒋介石，经蒋介石同意后，他亲自把毛泽东送回延安。

毛泽东乘飞机离去后，周恩来一直等着延安的消息。待报务员送来“毛主席安全返延”的电文后，他才回去休息。

在那历史性的43天中，周恩来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在工作上，他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在生活上，他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在安全上，他是毛泽东最忠诚的卫士。他对毛泽东的感情，可谓一腔赤诚可对天！

《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于10月11日在张治中的护送下，乘飞机回到延安，与毛泽东同机回延安的还有胡乔木、陈龙、蒋泽民等人。蒋泽民是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决定让他跟随毛泽东一同回延安的。

那是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和他这位保卫参谋拉家常，问他东北解放了，想不想回家？想不想家乡的大豆高粱？

已经离家十几年的蒋泽民当然很希望回东北老家。

毛泽东临离开重庆前和周恩来商量，说蒋泽民是东北人，回东北工作方便，并问办事处情况怎样，蒋泽民能否离开？

周恩来表示同意。这样，蒋泽民告别了红岩办事处，离开了敬爱的周副主席和朝夕相处的战友，跟随毛泽东回到了延安，以后奔赴东北。

在《双十协定》中，虽然国共两党在许多问题上乃至关键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但是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二是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国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目；三是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双十协定》签字后，一些问题还要继续商谈。为此，周恩来和王若飞留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备政治协商会议。

这次谈判从10月20日开始至11月下旬结束，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先后进行了十次商谈。

这时期的蒋介石早已不唱和平赞歌了，开始点燃内战之火，国内形势也急转直下，火药味弥漫长城内外。

早在8月29日，即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第二天，何应钦就下令各战区大量印发蒋介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编写的《剿匪手册》，并用美军飞机把国民党军队从大西南运往内地。

9月中旬，尚在谈判期间，蒋介石命令绥远傅作义部队，沿平绥路进攻柴沟堡，企图夺取已被我军解放的张家口；并命令阎锡山部队进攻上党解放区。

《双十协定》刚一公布，蒋介石就命令胡宗南和孙连仲部队，沿平汉路北进，向晋冀豫三角地区进犯，进占我解放军已从日军手中收复的豫北、冀南各地区，并逼进邯郸。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还向我山东解放区和广东的东江解放区进犯。

据统计，从10月初到11月9日一个多月时间内，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达到一百多万人。

解放区军民英勇还击。除上党战役外，解放军还击退了沿平绥东进之敌，夺回被侵占的十多个县城，粉碎了傅作义部队进犯张家口的计划；10月末，解放军又全歼沿平汉路北进之敌7万多人，在我党政策感召下，国民党将领高树勋又率万名官兵起义，反对内战。

在这一个多月内，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万多人。我们的自卫战争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

这阶段，国共两党的谈判是在打中进行的。因此，谈判的主题就是停止进兵，避免内战。

周恩来和王若飞首先揭露了国民党军队侵犯解放区的严重事实。周恩来严正指出，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已达70万人，再前进，必引起内战。停止

进兵、重划受降区、恢复交通、解散伪军这四者是相互关联的，必须先解决，办法是承认各边区政府。

然而，国民党根本不承认边区政府，也不想解决这四个问题。

在第三、第四次商谈中，周恩来针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事实，又进一步指出，孙连仲部向河北，阎锡山部向大同，胡宗南部向石家庄前进，抗战初期，这些地区早已划归第十八集团军。现在国民党进兵，使冲突无法避免。接着，周恩来针对目前局势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规定双方停止攻击，各自守原防地不动；二是规定受降区，各自执行，不得相犯。

然而，国民党政府不愿意规定受降区，也避口不谈受降区的问题。

10月26日，国民党代表奉蒋介石旨意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二是中共军队撤退到铁路线以外；三是叶剑英早日来渝出席军事小组会议。

这三点意见极为荒谬，国民党军队尚在继续进兵，受降区又没有重划，何谈恢复交通？因此遭到周恩来严词拒绝，他指出，在解放区问题尚未解决、受降区没有重划以前，国民党进兵即为进犯，必须停止进兵，才能恢复交通。

当天，周恩来和王若飞致电党中央，把国民党提出的这三点意见作了汇报。电文指出，我方仍强调必须停止向解放区进兵方能恢复交通，内战如不能避免，政治协商会议很难开好。并把准备向国民党提出的四点主张在电文中作了汇报。

这四点主张是：（一）为避免内战，恢复交通，立即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大、平汉北段、龙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西段）上双方都不驻兵；政府方面如向北平、天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二）军事小组只能在上述问题有原则决定后，才可拟定具体办法。（三）如不能事先取得协议，中共方面不反对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开会时必须先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四）周恩来回延安前须向政府问明关于国民大会的意见。

10月29日，党中央复电，同意上述意见。

在10月30日第六次谈判中，周恩来针对国民党代表在10月26日所提的三点意见，提出了上述四点主张。然而在10月31日第七次谈判时，国民党的代表在答复中却避而不答，避开停止进兵这最关键的一条，提出由铁路警察维持铁路秩序，以此抵制中共提出的双方都不驻兵的主张。

11月8日进行第八次谈判。周恩来针对国民党代表的答复指出，为了停止内战，国民党应该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侵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保证再不进攻各解放区。

然而，面对我党的强烈要求，蒋介石熟视无睹，继续调兵前进，为内战之火准备“燃料”。

在这一个多月的谈判中，周恩来和王若飞虽然多次强调提出停止进兵、重划受降区等问题，但是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挠，这些实质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谈判为借口拖延时间，进行内战部署。党中央在10月8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

尽管如此，通过这一次次谈判，通过广泛宣传，我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国统区的人民掀起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民主运动。

11月19日，重庆市各界代表500多人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了重庆各界人民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国统区人民用罢工、罢课、罢市和拒绝纳税等行动来制止内战，并且抗议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各大城市人民的响应。

11月下旬，昆明学生开始联合罢课，国统区人民反内战运动达到高潮。然而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竟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

血的事实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昆明学生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支援，更多的群众投入到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中去。

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十次唇枪舌剑的谈判后，于11月25日由重庆回到延安。

周恩来到延安后，把七周谈判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目前局势，指出，反对内战求和平的方针深得人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征候现在还看不出来，美国在抗战时是扶蒋用共，现在是扶蒋压共。要蒋介石放弃灭共企图不可能，但目前下讨伐决心也不可能，国共关系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和中酝酿战，战中酝酿和，斗争是严重的复杂的。

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心理分析得非常透彻，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洞察得十分准确。

12月8日，周恩来给延安干部作目前时局的报告。他把这时期国共两党的谈判情况进行了归纳，指出，国共谈判可以分两个阶段，前五十天，毛主席在重庆，国民党偏向于和。后五十天，国民党偏向于战。它沿铁路线前进，分割华北、华中解放区、“清剿”华中、华南解放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边打边谈”。我们的方针仍是：团结、和平、民主、统一，用自卫力量挡住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用和平力量作政治进攻。美国是扶蒋压共，我们的对策是使美国知难而退。

周恩来在向党中央作的书面汇报和给干部作的形势报告中，都明确指出中国将面临着极其复杂严重的局势，内战之火已被蒋介石点燃，我们共产党人将继续作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

第四部分 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打打谈谈

五个决议的取胜

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国统区人民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也使他们如卧针毡。经过一番较量，蒋介石集团感到暂时还不能全面挑起内战，还需要一段“和平”时间进行部署。

扶蒋压共的美国政府，在我党有力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守势下开始知难而退了。

1945年12月20日，在赫尔利辞职后，美国政府又派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到中国。马歇尔在中国呆过三年，了解许多情况，他又是现实主义者史迪威的好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地位显赫。因此，他的到来，令国人也令世界瞩目。

此时，国际形势有一股细小的和平暖流，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于12月27日在莫斯科召开，讨论中国问题。善于随机应变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意有关协议内容。这样，三国外长在会议公报中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美外长也一致同意尽早把两国军队撤离中国。

在这种形势下，尽管马歇尔仍然执行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但是在一些具体做法上与昔日相比有所改变。于是，中国形势有了微妙的变化。

在这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再次披上和平外衣，按照《双十协定》，决定于1945年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于是，国共两党又由打走向谈。

12月15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一方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代表团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吴王章、陆定一组成。同时将南方局改称重庆局，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亦是重庆局的领导。

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除王若飞、董必武在重庆外，其他人都在延安。12月16日，周恩来率领在延安的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来到重庆。

中共代表团驻地在重庆市中山三路263号中央银行的一座四栋小楼，外有院墙，有一个大铁门，便于警卫，交通也方便。

代表团下设秘书处，齐燕铭为秘书长，童小鹏为副秘书长；行政管理工工作由钱之光负责，下面设有行政组、总务科、会计科、警且班等，行政组组长是龙飞虎，副组长是朱友学。

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后，首先呼吁的就是全面停止内战，这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先决条件，亦是中共代表团的主张。

12月22日，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拜见了从美国来到重庆的马歇尔。周恩来诚恳他说，中国人民整整抗战八年了，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十四年了，牺牲重大，中国不能再有内战。

12月27日，周恩来又把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建议书交给国民党代表。

想打内战的蒋介石当然不愿意停火，然而，政治协商会议的预定召开日期已迫在眉睫，作为调停人的马歇尔完全明白，如果此时不停战，政协会议就不能按期召开，即使召开也是开门两党就打架，这样对他面子不利，于是他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如果下停战，政治协商会议开不成，那么，下一步就

是苏、美、英三国来干涉。

蒋介石被逼无奈，只好接受中共代表团的停战建议。

这样，1946年1月10日，周恩来和张群分别代表国共双方，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上签了字。命令规定，从1月13日起，所有中国境内的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北地区除外，同时还签订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由周恩来、张群、马歇尔三人组成的停战委员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各出一人参加。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也由这三方面人员组成，简称三人小组，分别奔赴各冲突地进行调解。

“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上午10时，政治协商会议就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参加会议代表共38人，其中，中共代表7人，国民党代表8人，民盟代表9人，社会贤达9人，青年党5人。

有关代表资格和名额分配问题，会前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为了控制这次会议，蒋介石指使御用工具组织一些所谓“政党”，如特务刘野樵的中国农民党、洋奴于斌的天主教民主党、流氓张沆的和平党等，妄图欺骗群众，混入政治协商会议，遭到共产党和民盟的反对。

周恩来在与国民党代表商谈时多次指出，他们这些所谓政党没有参加过抗战，有什么资格参加政协会议呢？

斗争结果是，不参加抗日战争的党派，没有资格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的阴谋破产了。

蒋介石不甘心，又采取分化手段拆散民盟，企图使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中压倒多数。原定除青年党外，四方面代表各9人，共36人。蒋介石将附庸青年党从民盟中拉出，以独立政党资格参加会议。为了顾全大局，使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我党主动让出两个名额，并劝说民盟让步，又迫使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再增加两个名额，这五个名额给青年党。这样，参加会议的代表由这五方面38人组成。尽管五方面代表人数不一，但各方代表仅有一票权，会议决议案须五方面同意才能通过。

在代表资格和名额问题上的斗争，充分表现了我党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诚意，也反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深得民盟和社会贤达人士的敬重。

这五方面代表可分为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作为左派的共产党，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主张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有派的国民党，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间派代表主要是民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实行旧民主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这三种政治势力、三条政治道路激烈斗争的场所。我党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中间派，揭露孤立反动的右派，力争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议。

开幕式上，蒋介石假惺惺地宣布了四项诺言，即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

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致词，对蒋介石这四项诺言表示欢迎，他声音宏亮他说：“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于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

周恩来的致词极富感染性和鼓动性。他的发言道出了大部分与会代表的心声，同时也对蒋介石的诺言产生一种约束力。众目之下，蒋介石到底能否

实现他自己的诺言？

抓住这个开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开展了一系列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斗争。

1月12日，周恩来在大会上报告了国共两党会谈的经过，在回顾了1936年以来的谈判历史后，他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四点经验教训，即：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1月14日，在讨论人民基本自由权力时，周恩来激动他说：“蒋主席在本会上宣布的四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办起来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应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九年前的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们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

周恩来这一席话语惊四座，落地有声，深受大家赞扬。当然也出其不意地将了国民党一军。

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要求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迅速结束训政，将现政府改组为容纳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联合的国民政府；改组后的政府要负责协同政协来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以及国民大会的选举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实行地方自治，凡是实行普选的地方，政府应承认其合法。

在这个方案中，我代表团把一直没有解决的解放区问题放到一般自治问题中去。如果解放区实行了普选，那么就on应该承认它的合法地位，这样就打破了国民党的割据之说，这种提法是我党高超艺术斗争的体现，得到社会各界支持，这个《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也得到会议的通过。

1月25日，重庆大中学生万余人游行，向政协提出永远停止内战、实践“四项诺言”的要求。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学生们讲话，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要求。他说政协会议“开头就做了一件很大的事，就是停战，不过要使内战完全停止，还要靠大家努力监督，使内战永绝”。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会议期间，对国民党政府的监督，对蒋介石“四项诺言”的监督，由与会政协代表迅速扩展到人民大众。为此，重庆成立了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

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始终是复杂的，讨论一系列实质问题时就更为激烈，其斗争焦点仍是政权和军队问题。

关于政权问题，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了《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作了四点说明：一是增加国府委员12名，国府委员要由主席提请党外人士任之；二是国府委员的权力只限于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大计等，以及主席交办的事项，但无任何用人之权；三是主席有指定权、相对否定权及紧急处理权；四是国民党在委员名额中要占特定多数。

这方案实质就是吸收几个由蒋介石提名的国民党党外人士；给群众摆摆样子罢了。所谓最高权力机关——国民政府委员会无非是一个无事可做、无权可行的空架子。国民党的这种扩大政府方案，仍然是继续执行一党专政。

董必武代表中共作了《关于改组政府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从五个方面驳斥了国民党的方案。

一是改组政府应有一个共同纲领；二是结束训政，国府委员即是决策机关，有权决定人选；三是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但政府主要职员，大党所占位置不得超过 1/3；四是国府委员人选由主席提名，由国民党中央执委或中常委通过，这样做，国民党中央直接干预了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人选，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五是要防止国民党政府的“手令制”，主席命令要经会议通过，有人副署。除此之外，政府改组，应包括国民政府下设的各院、部、会的改组，使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都有广泛机会参加政府工作。

中共代表的发言，得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支持。罗隆基代表民盟提出了改组政府的三条原则：一、必须有共同纲领作为施政的共同准绳；二、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三、各方人士参加执行机关也赞成，但要使它真能执行。要是既不能决策，又不能执行，那就违背了我们改组政府的原意。

经过激烈争论，国民党代表无法从正面反驳。最后在《政府改组案》中，明确写出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基本否定了国民党代表提的无理要求，但在委员分配名额上没有达成协议。

关于军队问题，国民党和青年党代表提出了先要“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的荒谬主张。这个主张是国民党政府一贯唱的老调，即你先把军队交出来，我再给你民主，在重庆谈判时已经喊过多遍了。

中间派竟也主张先军队国家化，希望共产党在军事上做些让步，国民党在政治上做些让步，并幻想聘美国人作顾问，帮助中国实现军队国家化。中间派的主张与国民党右派的主张尽管在本质上不同，但在方法上相似。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左派的中共代表团成了少数力量，但是，我们没有让步。周恩来明确指出，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但不能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进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只有是人民的子弟兵，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为此，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案。

根本原则是：首先必须实现国家民主化，然后再把军队化于这个民主国家里。如果不是先有国家民主化，还是国民党一党法西斯专政，抽象地先实行军队国家化，那等于把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反动派。所以，军队国家化必须以国家民主化为前提。

根本方案是：如果建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和统帅部，中国人民的军队即交给它，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同时交给它。而且，首先必须整编国民党的庞大的党军，化国民党一党及少数人的私兵为全国人民的公兵，使之为全国人民服务，这种改变，不但是中国军队国家化、军事民主化的关键，也是中国国家民主化的关键。

为了争取中间派，我党代表团又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可同时进行，以此抵制国民党的先军队国家化、后国家民主化的论调。

通过激烈斗争，中间派逐渐转变过来，拥护我党提出的国家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平行解决的主张，从而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要取消人民军队的阴谋。

最后，会议通过了“军事问题方案”，方案中规定了建军和整军原则。

建军原则是：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整军原则是：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军党分立”，即任何党派或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军民分治”，即现役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员，不准干涉政治。

在紧张的会议期间，周恩来会上为人民力争和平、民主、自由，会下继

续同国民党交涉，要求释放叶挺和廖承志，并以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所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为交换条件。在我党一再要求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将两人释放，廖承志于1月22日出狱，叶挺也于3月4日恢复自由。叶挺出狱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发报，申请加入共产党。三日后党中央复电，接受叶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通过半个多月的激烈争论，会议就一些基本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协议，各方代表酝酿签字。这样，周恩来和陆定一于1月27日飞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党中央同意代表团商定的政协各项文件，授权代表团签字。

此时，叶挺的女儿叶扬眉正在延安念书。1942年，她跟随母亲李秀文从澳门来到重庆，看望狱中的父亲，然而叶挺没有被营救出来，李秀文只好先回去，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叶扬眉送到延安上学。

周恩来估计叶挺将很快获释，于是在1月29日由延安返回重庆时，他把扬眉也带上，让他们父女早日团聚。周恩来一行人乘机起飞后，天气恶劣，飞机只好在西安降落，停留一夜，翌日继续启程。然而，当飞机飞到秦岭上空时，遇到了强大的冷气团，机壳上结了冰，越积越厚，压得飞机直往下沉……

曾经跟随周恩来同机而行的何谦老人回忆说：此时，人们有些紧张，周副主席却十分镇静，他找机组人员了解情况，鼓励大家安心，又温和地鼓励驾驶员：“飞不过秦岭就返回西安，要沉着冷静，克服困难，渡过险关。”

为了减轻飞机重量，我们把机梯、小桶、行李、物件等全扔下去了，可是飞机仍旧下沉，下沉。机组人员只好通知大家准备跳伞。周副主席平静地背上伞包。突然，小扬眉哇地一声哭了，她没有伞包。周副主席赶紧走过去，马上解下自己的伞包，给扬眉背上，并把她抱在怀里，安慰说：“扬眉不要哭，要像爸爸一样坚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副主席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大家深受感动。

在周副主席的鼓励下，机组人员全力以赴，终于使飞机避开了冷气团，天黑后飞到重庆上空。可是大雾茫茫，辨不清方向，难以降落。机长向周副主席报告：“降落很危险，飞往成都吧，汽油也不多了。”

周副主席果断他说：“还是争取在重庆降落，我相信你们的技术一定能战胜困难，安全降落下去。”

飞行员都是美国人，他们看到周副主席这样沉着冷静，又这样热情鼓励，深受感动，全神贯注地盘旋着试降，一次，二次，第三次终于成功了，飞机安全地降落在白市驿机场。

1月31日上午，周恩来准时参加了政协第十次全体会议，中共代表团分别在五个协议上签了字。五个协议通过后，立即召开闭幕式，周恩来致了闭幕词。

历时22天的政治协商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问题、政府组织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国民代表大会问题和军事问题五项决议。这些决议虽然与我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不同，但是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这是人民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我党紧密团结中间势力的结果，亦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政协会议进行22天，周恩来夜以继日工作22个昼夜。白天，他按时参加会议，会上据理力争，与反动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利用会议空隙之际，与各党派代表交换意见，沟通思想。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晚上，他要赶回中共代表团驻地，主持会议，研究会议进展情况。

朱友学老人回忆说：

周副主席每天深夜 11 点多钟赶回代表团驻地，召开汇报工作会议，并经常吸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参加。他说：“党中央虽然派我们 7 人参加会议，实际上我们代表团的同志都要参加。吸收你们来有许多好处，你们当中有军队来的，有地方来的，也有从学校来的。你们的意见能代表不同阶层，代表广大群众，这样能启发我们多多思考，考虑得更全面些。”

汇报会常常开到后半夜二三点钟。散会后，我们回去休息，周副主席还要把大家的意见归纳整理，准备第二天发言。他桌子上的灯夜夜长明。

龙飞虎在《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汇报会每天要开到深夜一二点钟，对各项问题研究得非常详细，对会议拟定的文字材料都一字一句地再三推敲。周副主席说：‘我们决不能有丝毫马虎，如果一句话错了，一个字错了，都有关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

当时我们还不十分理解这些话的深刻意义，甚至还内心问自己，呀！有这么严重吗？过后想想，对啊！假使我们稍有疏忽大意，给敌人钻了空子，岂不有害于国家的和平民主？岂不危害到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吗？”

从政协会议的筹备到闭幕，其间，每斗争一步，都留下周恩来奋斗的足迹；每一个协议的达成，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政治协商会议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势所趋下召开的，而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又是其始料未及的，这就使国民党反动派既恼羞成怒又恐慌不迭，于是在会议期间就刮起阴风，会议结束后又掀起恶浪。

会议期间，关心时局的各界人士，在政协会议协进会的组织下，每天晚上都到沧白堂集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了解会议进展情况。

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进行破坏，从1月15日至24日9天中，特务们先后五次到沧白堂会场捣乱，侮辱、谩骂、殴打正在演讲的政协代表。会场被搅散后，这帮歹徒还不甘心，又继续追踪政协代表，进行恐吓、威胁。

1月26日深夜，国民党当局竟指使军警人员非法闯入政协代表黄炎培的家，强行搜查。

政协会议尚在进行，蒋介石的“四项诺言”余音还在，可是，政协代表却失去了人身安全保障。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保证人民自由！

政协会议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恶浪。那些由国民党豢养的特务接受上次教训，不再赤膊上阵，而是以群众面孔出现，进行大肆破坏活动。

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在较场口广场前隆重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中共重庆局也去了不少同志。广场上彩旗飞扬，人声鼎沸，群众情绪激昂，“永远停止内战”、“迅速实现政协会议五项决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古老的山城。

九时，大会开始。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李德全、李公朴、施复亮等人走上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

这时，主席台四周突然响起狼嚎般的怪叫声，随后，一个自称是“市农会代表”、名叫刘野樵的人爬上主席台，霸占了扩音器，他阴阳怪气地自称总主席，狂妄地宣布开会。

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立即冲向前去制止。台下特务则蜂拥而上，一个个爬上主席台，抡起棍棒劈头就打，李公朴头部被打伤，鲜血直流，被推到台下。郭沫若急忙上前制止，也同样遭到毒打。

顿时会场秩序大乱，台下特务也大打出手，他们闯入劳动协会等群众组织中进行殴打。台上打手们又把桌椅、条凳抛向台下群众，桌椅条凳在人们头上横飞，劳协职工陈培志等四人当场被砸伤。施复亮腿部被打伤，马寅初先生穿的西服也被特务剥去。据统计，有60多人被打伤，众多人失踪，许多工人遭到宪兵逮捕。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

事件发生后，前来开会的重庆局的同志立即跑回去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赶到会场，与暴徒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朱友学老人回忆说：

2月10日上午，我们许多同志都到较场口参加大会。周副主席因为会客没有去，我因值班也没有去。

会开不多一会儿，我们的同志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周副主席，特务们把主席台砸了，把郭沫若、李公朴打伤，还打伤不少群众。”

“好，我马上去！”周副主席说完就要动身。

我急忙劝阻：“周副主席，不行啊！特务们还在打，很危险，等一会儿再去吧。”

“怕什么？去了就是要和国民党特务斗争。”周副主席严肃他说完，起身就走。我知道他发火了，不敢再劝，随他前往。

较场口前的广场已被特务折腾得乌烟瘴气，那些打手们一个个杀气腾腾，正抡着棍棒在群众中飞舞，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周副主席的车刚刚停下，特务们就像一帮疯子似地围过来。周副主席跳下车，威严地怒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特务们不但不回答，反而蠢蠢欲动，有几个亡命徒竟掏出了手枪。敌人亮了家伙，我和龙飞虎等人也急速地掏出了手枪，我们的枪口对着特务的枪口。

周副主席回过头，对我们严肃而又冷静地制止道：“谁叫你们这样做的？他们不讲理，我们要讲理！”

特务们见势不妙，把手枪缩了回去，然后一声长哨，这帮暴徒们就一窝蜂似地逃走了。

特务散去，周副主席立即驱车到宪兵司令部、国民党宣传部，提出强烈抗议。周副主席义正词严地指出，政协会议是双方商量好的，我们开会，你们捣乱，这是对政协会议的破坏！一定要严惩凶手。

周副主席又驱车赶到医院看望伤员，他认真询问了每个人的伤情，与他们逐个握手表示慰问。伤员们深受感动。

李公朴忍着伤痛坚定地说：“为了和平民主，我受点儿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自由和民主。”

翌日，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等人，带着中共代表团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慰问信再次来到医院，看望受伤的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陈培志等人。

制造较场口血案的特务们并不甘心事件到此结束，又使出最卑鄙的流氓手段，给周恩来寄去恐吓信。

2月12日清晨，朱友学和龙飞虎收到传达室送来的一封信，是写给周恩来的，信封上打有三个“十”号，沉甸甸的。他俩用手一摸，里面有子弹，立即交给秘书处。

秘书处的同志拆开信，上面写道：“如果你向蒋主席报告星期日早晨群众大会被捣毁的事，请你先看看这两枚子弹……”署名是冠英。信写得非常猖狂。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幽默他说：“好啊，我们就不客气地收下吧。”然后，他把此信交给《新华日报》发表，公布于众。周恩来没有理会这无耻的恐吓，于13日上午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吴铁城交涉，要求严惩刘野樵、吴人初、周德候等要犯，追查幕后指使者及其他凶手，并要求吴铁城转告已去上海的蒋介石。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强烈要求下，在广大群众的呼声中，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应允惩办凶手。然而，较场口血案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手策划的，他们怎么能惩办自己的打手呢？凶手不但没有受到制裁，不久还都提了官。

较场口的血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又导演了一幕反苏反共的丑剧。

苏联红军为打败日军，于1945年8月出兵东北，原拟定于12月3日撤军回国，由于国民党两次请求，才延缓了撤军日期。

国民党反动派出尔反尔，并以此为借口，造谣惑众，说苏联红军没有从东北撤出就是要占领东北，中共阻挠接受自己的国家主权等，从而制造反苏反共舆论。

1946年2月16日上午，在重庆的特务王塞生、齐世英的把持下，召开了所谓的“东北旅渝还乡”大会，要求苏联立即撤兵，政府要加强接收，一派胡言，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国内和平。

大部分与会者听到这些胡言后，发觉自己受骗了，纷纷退出会场。参加会的700多人，到游行时连临时加入的东北籍特务在内还不足300人。这支参差不齐的队伍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这股反苏反共恶浪没有形成。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又策划了一起更大的反苏反共游行。

2月22日，重庆的国民党特务纠集许多暴徒，并煽动、诱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再次举行反苏反共游行。他们大喊大叫，直冲中共代表团驻地。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与这些暴徒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劝海、教育那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彻底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参加过这次斗争的朱友学老人回忆说：

那天早晨，浓雾弥漫，寒气袭人。

早餐后，听说国民党特务煽动一些人举行反苏反共游行，还要冲击我们代表团驻地，大家非常气愤，一个个鼓足了劲，要教训教训这帮亡命徒。

龙飞虎想出一个办法，如果游行的人冲进来，就把开水或者石灰粉洒向他们，让他们抬不起头，睁不开眼，冲不进来。他这个想法不知怎么的让周副主席知道了，周副主席批评了他，又耐心地劝导我们：“你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心里何尝不痛恨这些特务？但是要知道，参加游行的人除少数特务分子外，大多数是受了骗的青年学生。因此，我们要忍耐，决不能造成流血事件，否则就上了敌人的当！”

将近中午，特务们组织的游行队伍举着五花八门的旗子，喊着反苏反共的口号，在几辆装有大喇叭的广播车的开道下，涌到我们代表团驻地，他们在院外大铁门前吵吵嚷嚷，乱喊乱叫，乒乒乓乓地敲着大铁门，大有破门而入的架势。

在这紧急情况下，周副主席指示我们：“要沉住气，千万不要动手，一定要讲道理，这是原则。同时我们还要作最坏打算，暴徒们可能冲进来，抓走我们代表团的入，我们要有准备。”

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代表团的同志分成三线，一线直接和游行人员打交道，有齐燕铭、龙飞虎。我和警卫班的同志；二线有邓发、陆定一、何思敬、何其君等；三线有周副主席、董老、邓大姐和廖承志等。

大家各就各位，各尽其责。龙飞虎等人死死守住院门，竭力劝阻，让他们不要乱喊乱叫，不要往里冲，有什么要求派代表进去谈。

在我方竭力劝阻下，从游行队伍里走出十几个代表，一个个趾高气扬地进了院。

周副主席和三线同志出面接待，亲切而又严肃地向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周副主席语重心长他说：“你们这种爱国热情是好的，但显然是受了坏人的欺骗和蒙蔽，不明白中苏关系和东北问题的真相。你们应该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时，中国处在非常危机的关头，是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们联合起来抗日的，共产党是最爱国的。你们要明辨是非，不能轻易听信别人挑唆……”

在周副主席的劝说下，在事实面前，代表们一个个低下了头。

这时候，外面竟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龚澎气愤地站起来说：“不客气地讲，你们这些青年学生不知天高地厚，唱义勇军进行曲向我们共产党示威，你们知道这支歌是谁写的吗？是共产党员写的！国民党骂我们卖国汉奸好，请问，这种歌国民党能写出来吗？”

龚澎这番辣味十足的话，呛得代表们哑口无言。

周副主席等人分别和这些代表谈了一下午，无论是谁最后都无言可辩，似有所悟，无精打采地离去。最后，广播车上的大喇叭也不响了，游行队伍渐渐散去。

组织反苏反共游行的特务们见冲闹中共代表团驻地的阴谋没有得逞，便使出暴力手段。待游行队伍散去，又指使一群暴徒闯进《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砸碎门窗，打伤工作人员多人。

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首光由《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谈了营业部被特务捣毁的经过。接着，周恩来发表谈话，他气愤地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指出，这次事件与沧白堂、较场口的捣乱都是国民党法西斯分子制造和策划的，而政府对这一系列事件，事先没有防范，事后也未采取措施。

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共始终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的神圣事业奋斗，决不会因这类反动分子的挑衅而就此退怯。

当天，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凶手，解散特务机关，赔偿《新华日报》和《民主报》营业部所受的损失。

事后，民盟主席张澜也就《民主报》营业部被破坏之事，向蒋介石提出抗议。

善要反革命两面派并正积极推进内战部署的蒋介石，在南京、上海、北平作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后，于2月24日飞回重庆，听完他的侍从室主任汇报的反苏反共游行后，高兴得差点把一口假牙笑掉了。

事隔不足十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是政协会议后国民党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因此，中外各界人士都以目相待。然而，此会根本没有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决议，而是一片反共叫嚣。蒋介石首先撕毁协议，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手下的反动分子也狂言，“不能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于是，此会撕毁了政协会议所定的宪法原则决议、改组国民政府决议、同民大会决议。

为了实现六届二中全会的反动方针，蒋介石又强奸民意，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牌子，一手包办，于3月20日召开了四届二次政协会议。中共参政员拒绝参加，以此抗议。

会上，蒋介石背信弃义，公开撕毁了政协决议和有关东北停战协议。他再次撕下和平面具，挑起全面内战。

政协决议和有关东北停战协议被国民党撕毁后，塞外烽烟四起，全国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紧急形势下，中共代表团决定派王若飞和博古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

重庆谈判结束后，王若飞就一直留在重庆，配合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博古是政协会议召开后由延安来到重庆的。与他们同行的还有邓发、叶挺夫妇和子女，以及教育家黄齐生与他的侄子黄晓庄。

邓发回延安是向党中央请示汇报职工联合筹备会的工作，并准备去莫斯科参加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叶挺则是代表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军会议。

周恩来对叶挺非常关心。叶挺一出狱，就见到了周恩来从延安给他带回的女儿扬眉，父女相见，悲喜交加，女儿喊着爸爸投入父亲的怀里，热泪也从铁骨铮铮的将军眼里夺眶而出。当日，周恩来又给远在澳门的李秀文发报，告诉她叶挺获释，让她带着幼子速来重庆团聚。

几天后，李秀文带着幼子小九和保姆赶到重庆，与分离五年的夫君团圆，红岩办事处为他们安排了一个较大的房间，让饱受牢狱磨难的叶挺尽快恢复健康。此时春意盎然，红岩小楼周围的桃花竞相开放，粉红一片。回到党的怀抱的叶挺心情非常好，带着一双儿女爬到桃树上玩耍，秀丽端庄的李秀文则靠在树干上，笑望他们父子。善长摄影的童小鹏抢拍了这张“半家福”（另几个孩子在外地）。然而遗憾的是，一月之余这张照片竟成了遗照。如今。这幅照片收集在童小鹏摄影资料选辑《历史的脚印》大型画册里。

4月8日上午，王若飞、叶挺等一行13人乘美军飞机起程。飞行途中遇到恶劣天气，飞机冲不出去，又降不下来，盘旋之中迷失了方向，于半日下午在山西省兴县东南的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就是“四·八”烈士事件。

周恩来把叶挺、王若飞等人送走后，就指示电台与延安保持联系，然而等到晚上，延安方面也没有他们到达的消息。周恩来与同志们顶感到不祥，有些坐不住了，心里沉甸甸的，他们期盼着，希望延安方面能传来他们平安的消息，但是没有……

翌日早上，延安就派出人员沿途寻找，大约11日，在山西黑茶山附近发现了飞机残骸，也找到烈士遗体的残物，经鉴定是王若飞和叶挺他们。

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心如刀扎，悲痛万分。12日，周恩来等人联名发出讣电，电文说：“他们正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不遗余力，竟以飞机遇难，一时俱丧，不仅为本党之重大损失，实亦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不幸。”

讣电发出后震动山城，人们为之悲痛。19日上午，重庆各界人士6000多人在青年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内外摆满了花圈、挽联，其中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冯玉祥、李德全、何香凝、陈铭枢以及民盟中央等送的。追悼会由郭沫若主持，周恩来、孙科、邵力子、罗隆基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追悼会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代写了题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社论。社论写道：“烈士们，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烈士们，同志们，你们的责任已尽。我敢向你们保证：有中国人民在，有中国共产党在，有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力量在，

我们决不让反动派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破坏整军的阴谋活动成功。你们坚持的方针，是全国人民的方针。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

21日，中共代表团、四川省委、重庆办事处和新华社的全体同志，在红岩小楼为殉难的烈士举行悼念大会，这是十分哀痛的大会，也是化悲痛为力量的大会。在自己同志面前，周恩来再也控制不住压抑了几天的悲痛之情，失声痛哭。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那天上午，天气阴沉沉的，我们办事处、新华社和四川省委的同志一共100多人，眼含热泪默默地来到办事处礼堂，参加纪念“四八”殉难烈士大会。董老、邓大姐、吴玉章、陆定一等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也都来了。大会由周副主席主持。

周副主席先沉痛地介绍了这13位烈士遇难的情况，他眼里噙着泪，眼圈红红的，但还能控制住感情。然而，当讲到遇难的烈士中还有叶扬眉和黄晓庄两个尚未成人的孩子时，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一串串往外涌，他使劲想咽回去，可是咽不下，竟轻轻地抽泣起来。我们大家都泪流满面。

顿了一会儿，周副主席又一句一泪地介绍博古、邓发、叶挺、王若飞的生平。介绍到叶挺时，他几乎哭着说：“叶挺同志才恢复自由一个多月啊！……”就再也讲不下去了。会场一片哭声。

停了片刻，周副主席擦去脸上的泪水，又接着介绍王若飞的生平，可是刚讲两句泪水又夺眶而出。他强忍着，说：“若飞同志，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是党的一位好同志……”感情的闸门再也挡不住了，悲痛之情如潮水一般向外涌，冲垮了理智之堤，他失声痛哭！这是男子汉的哭声啊，声声震颤着我们的心弦！我们的心都快痛碎了，有的同志竟哭得喘不过气来。

周副主席慢慢平静下来，鼓励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去完成烈士未尽的事业。我们渐渐止住了哭泣，人人心里燃起一把火，那就是向反动派斗争的革命烈火。

袁超俊老人说：“我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十年，这是他哭得最厉害的一次。他非常刚强，很少落泪，除此之外，仅哭过两次，一次是孩子剧团演出，另一次是周老太爷病故。”

那是在武汉，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中，有两个少年剧团。一个是1935年10月由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新安旅行团”，这是由江苏省淮安县河下镇新安小学一部分学生组成的抗日宣传队，他们从河下镇出发开始旅行，沿途宣传抗日救国，经过上海、北平、绥远、宁夏、兰州，到达西安，以后又到武汉。另一个是“孩子剧团”，有30多人，大部分是上海杨树浦临清小学的学生，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8岁，他们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唱歌演戏。

周恩来对这两个少年剧团非常关心。1938年2月初，上海孩子剧团来到了武汉。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我在上海抗日救国会时，就经常与孩子剧团打交道，相互熟悉。因此，他们到武汉办事处先找到了我，这个拉着我的手，那个拽着衣服角，亲热地喊着袁叔叔，共叙别后之情。

我把他们介绍给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很喜欢他们，摸摸这个的头，拍拍那个的肩，看衣服穿得薄不薄，鞋子跟不跟脚，与他们拉

着家常，问寒问暖。孩子们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围在周副主席和大姐身边笑着、跳着，诉说着自己的所见所闻。

9日，八路军办事处为孩子们举行了招待会，周副主席、邓大姐及长江局的领导都去参加，我也跟随前往。会上，孩子剧团作了汇报演出，小指挥站在椅子上，指挥大家唱自编的歌：“我们都是没有家的孩子，穷孩子，一朵一枝莲花，爸爸妈妈都被杀……鬼子毁掉我们的家……”孩子们神情严肃，小脸涨得红红的，眼里含着泪水。

这童声稚气的歌声充满了悲愤，也含着深深的哀思，每一句都震颤着人们的心，大家默默地低下了头，许多人悄悄擦去眼泪。这时候，我看见周副主席离开了座位，轻轻走出会场。我也跟了出去。

周副主席站在走廊里，身依栏杆，两串热泪夺眶而出，扑簌簌滚落下来，晶莹的泪珠挂在面颊上。我有些惊呆了，我从未见过周副主席流泪啊！他平时给我的印象是刚毅、坚强，他就是力量的化身，然而，他的感情竟是如此丰富，他的爱心竟是如此强烈。我深深地理解，周副主席是为沦陷区的孩子们那不幸的遭遇而流泪啊！我也泪流满面。

周副主席掏出手帕，擦去脸上的泪水，稳了稳情绪，又回到会场坐好。待孩子们演出结束后，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鼓励孩子们要有“救国、革命、创造”的精神，一手打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

散会后，周副主席把孩子们带到办事处四楼的平台，与孩子们合影留念。

周恩来的父亲是位深明大义、忠厚善良的老人，一生坎坷，饱受战争之苦，周恩来非常孝敬他。

周恩来于1898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一个绅士家庭。他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虽然饱读诗书，但为人老实，不善交际，只能谋点文书之类的小差事。母亲冬凡是淮阳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她容貌出众，挺直的鼻梁，大大的眼睛，周恩来的眼睛很像他母亲。万氏性格开朗，办事精明，又宽容大度，全力操持着家务。

周恩来是长孙，他这一代排名为恩字，所以父母给他起名“恩来”，又起一个幼名“大鸾”，并起“翔宇”为号，希望他心灵能添双翼，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智慧。

周恩来尚不足半岁时，他的叔叔周贻淦病人膏肓。相信神明的亲戚告诉他的婶母陈氏说：“你们膝下无子，如果能把大鸾过继来，能冲喜消灾，你丈夫的病也能好。”于是，周家开了一个会，贤慧的万氏为救小叔子。毅然地把儿子过继过去。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出身贫寒的书香门第，她性格文静，才学出众。周恩来刚学走路时，她就教他识字，待他6岁时已经能背古诗词了。陈氏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还生动地讲韩信受胯下之辱的事。若干年后，周恩来忍辱为国，大概就是当年陈氏启蒙教育打的基础吧：

随着家境逐渐变坏，万氏患了肺结核，在周恩来9岁时去世。翌年，陈氏也病故，仅一年时间，周恩来就失去了两位亲人。

为处理丧事，周贻能债台高筑，为了还债谋生，他只好离开儿子去湖北做事。这时，周恩来由他第三位“母亲”——奶妈蒋江氏照顾，奶妈竭尽全力，像待亲生儿子一样照顾他。

周恩来就是在这样坎坷的命运中度过自己的童年的。他后来在回忆童年

生活时，曾提到过这三位“母亲”。他说：“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不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我与世无争。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的父母很开明。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奶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南进，踏向了周恩来的家乡，1938年5月，他的父亲被迫离开江北，奔向武汉。

是日，周恩来出席文协第二次理事会，他发表完讲话后，说：“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周贻能老人来武汉仅仅3个月，又随着八路军办事处家属转移，一直过着动荡艰苦的转战生活，直至1940年到达重庆才算安定下来。老人虽然生活在儿子身边，但是，肩负着领导国统区人民团结抗战的周恩来，在那风紧云沉的日子里却没有时间陪伴老人。

1942年6月下旬，因过度的劳累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周恩来患了小肠疝气，被送进重庆中央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手术。

周恩来住院期间，南方局工作由董必武主持，他把周恩来住院手术情况电告党中央，并告之术后效果很好。

毛泽东非常关心周恩来的身体，立即复电：“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为了能让周恩来在医院静养，董老特意做了规定：任何人不准打扰周恩来，如果去探视，必须他批准，但去后不准谈工作。

然而就在此时，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大约7月初，周老先生患了恶性痢疾，上吐下泻，病情危急。我们立即把他送人医院，虽经医生全力抢救，但终无效，周老先生于10日逝世。

周老先生病故，我们十分悲痛，尤其是我，从1938年秋天以后基本和他在一起，在那艰苦的转移中他总是全力以赴地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到了贵阳后，我们一家人都和他建立了友谊。到重庆后，不仅我、可玉经常去看他，我的老父亲也特意去看望他，老哥俩在一起唠贵阳的事，一唠就是大半天。

我含着热泪，和邓大姐、钱之光他们，把周老先生的灵柩暂停放在红岩沟内。

此时，周副主席刚作完手术，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孝敬老人，而且很重感情，所以，周老太爷逝世的事谁也不敢告诉他，怕他承受下住这沉重的感情打击。为此，董老还召集邓大姐、吴克坚、钱之光、童小鹏开了一次会，决定先下告诉周副主席，待他出院后再报告，再出殡。

13日，周副主席因惦记南方局的工作回到红岩小楼。当时我和邓大姐在他的办公室，见周副主席进来，既高兴又有些紧张。

周副主席问了一些南方局的情况后，又问大姐：“父亲怎么样？”

再也不能瞒着了，大姐流着泪说：“老人病故了！”

“什么时候？”

“10日那天。”

“啊！爸爸啊！……”周副主席一声长叹，放声大哭，随即摔倒在地。这噩耗如同晴天打的霹雷，几乎震碎肝肠。老父亲已经离开人世3天啦！作为一个儿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打击更大的呢？他那虚弱的身子再也承受不住了。

我和大姐吓坏了，急忙把周副主席从地上扶起，搀扶到床上，他双手发凉，浑身发抖，泪水打湿了衣襟。

钱之光、童小鹏、董老等都来了，大家劝慰着。周副主席仍痛哭不止，一边哭一边责怪大姐：“小超呀，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怎么连你也瞒着我啊？”

“恩来，我错了，我不该瞒你，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大姐一面哭着一面认错。

当时我们略知一些周副主席的童年，他很早就失去了母亲，如今父亲又不在了，怎么能不悲痛欲绝呢？而且老太爷在战乱中跟着我们遭了多少罪啊！他才过上两年安定生活呀，可是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走的这么快，又这么急……我们深深理解周副主席，也怀念周老先生，个个都哭红了眼睛。

这天晚上，周副主席怀着无限的哀痛，拖着虚弱的身子，为父亲守灵到天明。

翌日，周副主席和我们大家一起把周老大爷安葬。

周恩来处理完丧事后，于17日电告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毛泽东马上回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这两位伟人在工作中是那样密切配合，被西方人称为海洋与海岸，在感情上又这样亲密，至深至诚。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铮铮铁骨的周恩来从心里流出的泪，那是他对孩子的爱，对父亲的孝，对战友的情。

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政府返都南京。为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5月3日赴宁。

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后，原重庆局改为南京局，与中共代表团仍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总负责人是周恩来。下设外事委员会、地下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军事组、资料组、党派组、政策研究室和办公厅等部门。

中共代表团（南京局）不仅领导谈判斗争，而且领导四川、湖南、上海、武汉、广东、香港、广西、云南、西康、贵州等地的统战工作和地下党组织工作。至此，党领导国统区斗争的指挥中心，由重庆移到南京。

中共代表团驻地在梅园新村，分别在17号、30号、35号，这凡幢房子是中共代表团多次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费尽周折才得训的。

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后，原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改为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处长仍是钱之光。

同年6月，根据斗争需要，成立了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对内称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工委）。书记是华岗。从此，周恩来奔走在沪、宁之间。

随着中共代表团的迁移，原工作在重庆办事处和新华社的同志，大部分去了南京。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周恩来做了全面安排。早在4月初，周恩来就着手筹建四川省委，报请中央批准后，4月22日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待中共代表团东移后，四川省委成为西南地区党的工作中心，并成立了中共代表团重庆办事处，负责对外联络。

5月下旬，搬迁工作大致告一段落。钱之光率领最后一批人离开重庆之前，将原重庆办事处一些遗留问题，交给留在四川省委工作的袁超俊、牟爱牧和杨汉章，主要是处理带不走的财产。

按照钱之光临行前的交待，红岩办事处的房子交给育才小学用，图书馆连同里面的图书也留给育才小学；曾家岩五十号的房子交给四川省委用。最后，袁超俊等人把带不走的武器涂好油，埋藏在后山菜地里。至此，重庆的善后工作结束。

1946年6月，袁超俊被周恩来调到上海办事处。他到上海不久又被董必武派往青岛，建立秘密交通线。

为了把我党的主张宣传出去，争取同盟者，团结教育广大群众，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共代表团赴宁后首先抓了宣传工作。

周恩来先派已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和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到上海，与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交涉，准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但遭到吴国桢的拒绝，使出版工作受挫。于是，周恩来又亲自领导，在南京出版了《新华周刊》和《群众》杂志。《新华周刊》是英文版，于5月17日创刊。《群众》杂志如前所提之，早在武汉就创刊，于6月2日在上海出版。

此时，蒋介石已彻底撕下了“言论自由”的面纱，指使南京当局对这两个刊物下毒手。6月4日，仅出版两期的《新华周刊》就被查禁。9月12日，《群众》也被查封，为了继续斗争，《群众》转入地下出版。

尽管这两份杂志出版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但是，她以顽强不

息的战斗精神呼唤着人民，教育了人民，她们的名字连同所刊登的文章深深地印在广大群众心里，曾似两把火炬在黑暗的国统区熊熊燃烧过。

1946年是中国内战全面爆发的一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把内战之火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法西斯统治，国民党反动派在大打内战的同时，对国统区人民的民主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之针锋相对。一方面为推迟内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不屈不挠的谈判；另一方面领导地下党组织，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进行英勇斗争。谈判斗争、统战工作、地下党组织工作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6月初，周恩来参加上海工委领导成员会议，华岗向他建议，目前群众士气比较高，是否组织上海人民选出代表，到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周恩来觉得建议可行，征求与会同志意见，大家也都赞同。于是周恩来要求，一定组织好，上层统战工作要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公开工作与保密工作结合起来，但两者又要严格区分。组织这场请愿活动，必须以广大群众为基础，而我们上海工委统战工作对象仅限于工商界、文化界的上层人物。鉴于此，请愿活动要由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但必须保密，不能暴露他们。

会后，刘少文和潘悛年秘密通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通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动群众推选代表，并决定组织群众示威游行。与此同时，上海办事处的同志又出面做马叙伦、张纲伯等上层人物工作，得到他们大力支持。

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上海市选出马叙伦、盛丕华，张纲伯、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陈震中、陈立复等十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

23日上午，上海各界群众五万多人云集火车站广场，欢送代表团赴南京。在群众一阵阵热烈掌声中，代表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表示一定完成任务，坚决要求政府停止内战，然后迈着坚定的步伐登车而行。

送走代表团后，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进入市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十里洋场、大街小巷，震动了上海城。反动派吓坏了，立即向南京报信。

当天晚上，代表团来到下关车站。民盟派出人员前去迎接，《大公报》、《新民报》也派出记者到车站采访。然而，代表们尚未完全走出车站时，埋伏的大批国民党特务立即蜂拥而上，把代表们团团围住，叫嚣谩骂，百般侮辱，随之，这帮暴徒又大打出手。而这时，在车站上维持秩序的警察竟视若罔闻，袖手旁观，这就更助长了暴徒的淫威，许多人被打成重伤。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下关惨案。

朱友学老人回忆说：

23日晚，上海代表团在下关车站被打的消息传到南京局，周副主席立即给国民党政府的邵力子打电话，要求他们马上出面制止，保护代表。放下电话后，周副主席气得手都有些哆嗦，他要亲自到下关去。

这时天已经黑了，车站又是人多混乱的地方，为了周副主席的安全，我们坚决不让他去，我们几个人把他挡住，硬是不让走，决定先派人去弄明情况。

这样，南京局几位同志急速赶到下关车站，此时暴徒们还在殴打，有的

代表衣服被扯破，有的头上流着血，也有的腿部被打伤，瘫坐在地上，可是惨无人道的暴徒仍是下放过。我们同志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把代表和负伤的群众救出。这时候，民盟一些人也赶到了，大家一起把特务赶走。在我们和民盟一再呼吁下，午夜 12 点左右，受伤的代表才被送进医院。

随后，周副主席立即和邓大姐、董老、李维汉、滕代远等领导驱车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代表和群众。周副主席逐个走到他们的床前，认真询问伤情，亲切鼓励安慰，又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周副主席的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们一定要讨还这笔血债！目前的斗争如这黎明前的黑暗，黑暗过去就是光明。

翌日，周恩来就下关惨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抗议他们放纵暴行。并提出六项善后处理办法，以备忘录形式分别送给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俞大维。

6 月 25、28 日，周恩来两次宴请上海代表，高度赞扬了他们反对内战独裁、追求和平民主的行动；向他们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的诚意和追求和平的奋斗；并揭露了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阴谋。在这情融融意深深的交谈中，代表们深受鼓舞和教育，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和平主张，把反内战独裁斗争进行到底。

鉴于国民党政府两面派的阴险和南京的恐怖，考虑到代表的安全，周恩来建议代表团撤回。他向代表团秘书长罗叔章指出，代表团在南京产生很大影响，不能久留。代表团临行时，周恩来和董必武重申中共主张，指出目前仍应为和平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上海代表团的举动对国民党当局是一个很大抨击，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因此，国民党特务必然会像狗一样嗅寻上海地下党组织。为此，周恩来指示上海工委，询问上海地下党的情况，有没有暴露的同志，如果有立即撤离。并强调上海地下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注意隐蔽，注意积蓄力量，切忌犯急性病。

由于周恩来的周密部署，上海地下党组织既成功地领导了这场请愿运动，又没有受任何损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民党当局为了给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在下关惨案的第三天又导演了一幕苏北“难民”请愿的丑剧。国民党特务网罗了一批苏北逃亡的地主和流氓，准备在 6 月 26 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和民盟总部请愿，并要采取暴力行动。

中共代表团于 25 日获知消息，立即开会研究。大家认为这帮特务和亡命徒们胆大妄为，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我们不能吃眼前亏，应该避免冲突，遂决定翌日回避。

当晚，大家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领导下做了准备，把文件、资料隐藏好。办事处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民盟的朋友们，让他们做好准备。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要求给予保护。

第二天，梅园新村只留少数人坚守，大部分人去了玄武湖和灵谷寺。上午，周恩来带着龙飞虎去了莫愁湖，下午拜访了马歇尔。

上午 9 时，所谓的苏北“难民”将近 500 人在南京国府路东方中学集会，狂呼乱叫，喊着反动口号。国民党政府则假仁假意，派了一些军队到梅园新村和兰家庄民盟总部进行“保护”。一些外同记者闻讯后也带着照相机、小型摄影机匆匆赶来。

阴谋挑起事端的国民党当局见事情闹大了，新闻媒介也在关注，害怕控制不了局面，造成严重后果，那样，不仅负有破坏和谈之责，而且会在国内外搞得臭名昭著，于是又悄悄地将之压下去。

这样，这群“难民”吵吵一会儿就蔫头缩脑地解散了。国民党导演的这幕丑剧刚刚开场就自己落下了帷幕。

随着人民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也更变本加厉了。1946年7月11日晚10时，民主人士、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在昆明大街公共汽车站附近，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杀害。

这天深夜，周恩来正在周公馆主持会议。他闻之噩耗脸色刷的变了，悲痛之情如潮水一般漫过心头，泪水盈满了眼窝，随即义愤填膺，大声斥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接着，眼含热泪赞扬李公朴为民主而献身的精神，称他是“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

翌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等人，给李公朴夫人张曼鹗发去唁电：“公朴的牺牲必然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敝代表团誓为后援。”

李公朴的遇害，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更多的人走向争取民主和平的战斗行列。7月15日在云南大礼堂的报告会上，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拍案而起，怒斥国民党特务的反动罪行。他充满激情地讲：“争取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李先生那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回来。”

就在这天晚上，闻一多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使用的仍是美制的冲锋枪。短短五天内，就有两位民主人士被国民党暗杀。

17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给闻一多夫人发去唁电：“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消灭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

当天，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中国目前最严重的，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内战已从局部向全面发展。昆明两次政治暗杀，足以从根本动摇全国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当局团结合作的大局。

中共代表团也于同日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法西斯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重申四项诺言；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安全；彻查各地惨案，严惩凶手；取消一切特务组织及释放政治犯。

李、闻烈士的鲜血洗亮了群众的眼睛。在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下，云南、重庆、成都等地开展了悼念烈士、声讨法西斯暴行的活动，各界人士纷纷集会，要求停止暗杀，停止内战。紧接着，上海市的追悼大会把悼念活动推向高峰。

1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天蟾舞台（今劳动剧场）举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派来警察“保卫”，两步一岗，三步一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而且廉价收买了地痞、流氓和一些无知的孩子，混入会场，破坏捣乱。在这白色恐怖下，追求和平民主的志士们无所畏惧，面对敌人的枪口昂首挺胸地进入会场。会场外面悬挂着的“民主死不了！”的大幅张贴画，是那样醒目，那样攸人心，给人信心和力量。

会上，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代表纷纷登台发言。就在郭沫若发言刚刚

结束时，邓颖超出现在大家面前，她那庄严镇定的神态一下子把大家的目光吸引过去。她从容地走向主席台，明亮的大眼睛环视一下台下，就用清晰宏亮的声音说：我谨宣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周恩来

正义的声音震颤着人们的心魄，邓颖超每念一句，台下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待她念完，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许多民主人士热泪盈眶。

那些被国民党特务雇来的“群众”，不知是被邓颖超的发言打动了良心还是被气氛感染，竟也随着鼓起掌来。特务明白过来后急喊错了错啦！然而被掌声淹没了，人们的掌声更响了。

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运动，冲击着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蒋介石为了使自己的主座不被群众的怒涛吞没，更加紧了血腥镇压。他豢养的特务们死死盯住了中共代表团。这时的上海和南京，比抗战时的重庆还恐怖，除了暗杀，逮捕外，国民党特务又翻了花样。如果在大街上发现中共人员单人行动，特务立即跟踪，跟到偏僻处突然绑架。有时特务还佯装车祸，在众目睽睽之下驾驶汽车向中共人员撞去，轧死街头。在这里，共产党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

周恩来从南京来到上海，特务也从宁跟踪到沪。

坐落在上海马思南路 17 号的周公馆，是一个一底三楼独立式花园洋房。这里过去是法国租界，高级住宅区，非常安静，连个小摊小贩也没有，可是周公馆的牌子挂出后，周围的房子被特务租下了，作为监视点。周公馆门前又摆了修鞋摊、香烟摊，这是特务的岗哨，还有几个化装成三轮车夫的特务，整天在大门前游动，监视每一个进出的人。周公馆被特务一层又一层地包围着。

10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带副官何谦去外白渡桥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汽车刚刚驶出周公馆，特务的汽车就跟上了。何谦发现后，让司机多绕几条马路，以甩掉这个“尾巴”，然而绕完之后，“尾巴”还在后面跟着，他们的车不得不停下，特务的车也停在了后面。

周恩来跳下车，怒斥这个特务，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这个特务倒也老实，说他是卢家湾警察分局的。

周恩来打电话给卢家湾警察分局，进行质问。警察分局说是奉命而行。那么，这个“上命”来自何方呢？不言而喻。

周恩来经常在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一次，来的记者很多，一楼客厅装不下，许多人就坐到廊厅里。为了让记者们提问方便，周恩来站到客厅通往廊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另一半身子在廊厅。为了欢迎中外记者，大门也敞开着，这样从大门外就可以望见讲话的周恩来。

记行们来了，几个特务也来了，而已带着武器，站在大门口贼头贼脑地向里面偷视。

负责警卫的同志发现后，立即进来，悄悄地告诉周恩来，“周副主席，门口有特务，请您站到客厅里吧。”

周恩来非常气愤，不但没进客厅，反而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向那几

个家伙大声呵斥：“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种卑鄙手段！”

这两句严厉的责问，把这几个特务吓坏了，像过街的老鼠掉头就逃。

周恩来就是这样正义凛然无所畏惧地斗争着，周公馆被大家称为白色恐怖中的“红色堡垒”。

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周恩来把每个同志的安危挂在心头。为防止特务暗杀、绑架，他为外出执行任务的同志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要求认真执行。如果有地下党的同志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他总强调安全，详细交待躲避特务盯梢的方法。在他亲切关怀严格要求下，同志们出生入死，与明敌暗特进行机智灵活的斗争。

曾经在周公馆工作过的于土、许真两位老人，在他们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个“小广东”的事。

小广东是一位广东籍的年青干部，叫关振群。一天，他单独外出执行任务，到了晚上10点还没有回来，已经超过了预定归来的时间。周恩来非常着急，把周公馆的同志召集在廊厅开会，部署大家分头去找。然后，他批评有关负责人：环境这么险恶，怎么能派刚来上海不久的年青同志单独外出呢？即使必须去，也应派个同志陪伴啊！

周恩来一面说着，一面焦急地在廊厅里来回踱着。就在这时，小广东摆脱了盯梢的特务，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望着周恩来那焦急的目光，感动得热泪簌簌而下。

在这红色堡垒里，周恩来就是这样带领大家舍生忘死全力以赴地工作着。他举办了一次又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把我党的和平主张宣传出去，把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揭露出来。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把“第三方面”人士争取过来，团结过来，把反动派孤立起来。上海、南京留下他一串串奋斗的足迹。

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以谈拖打，以打压谈，这是蒋介石在国共合作期间惯用的伎俩。政治协商会议后，蒋介石是以谈拖打，以谈判为烟幕进行内战部署。为推迟内战，为和平民主，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竭尽全力，披肝沥胆。因此，这段谈判非常艰难，这亦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谈判。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的一段讲话道出了谈判之艰难。他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延渝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进程多么艰难啊！”

这阶段，谈判桌上不仅是国共双方代表，还有“盟国”的美国。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用谈判拖延时间，抓紧运兵，关外大打，关内小打，待到内战之火燃遍华夏大地时，则推翻了谈判桌，关闭了和谈大门，赶走了中共代表。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扶蒋压共，扶蒋反共，并采取两面派手段。他们一方面派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到华调停，名曰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另一方面又给国民党军队大量军事援助，为其内战输血打气。“调停人”一面劝共产党让步，另一方面则放手让蒋介石大打，待到后期，调停人宣布调停失败，美蒋公开站在一起。

在这错综复杂而又日趋危机的形势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充分利用美蒋之间的矛盾和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弱点，分别击之。前期避开美，斗争矛头指向蒋，狠狠打击其反动一面，推迟内战，为我军争取时间反击。待到后期美蒋公然合为一体时，斗争中心指向美，揭露美蒋和平骗局，争取第三方面力量。

谈判斗争是尖锐激烈的。斗争形式主要是国、共、美三人小组会谈。斗争焦点是东北问题、中原问题、美国最后否定权问题和“国大”问题，这些问题相互联系，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东北，这片辽阔肥沃的土地，在蒋介石下抵抗政策下葬送给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十四年之久。日本投降前，东北没有国民党兵一卒，只有坚持抗战的东北抗日联军。

抗战胜利后至1945年11月，东北也没有国民党军队。而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迅速，加之奉命开往东北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的八路军部队，组成近三十万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消灭日伪残余，建立了各级民主政府。因此，1945年11月以前，东北不存在军事冲突问题。

然而，蒋介石为抢占东北，实行关外大打的内战政策，在美国政府授意下，以“接收主权”为借口，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内，派兵向东北抗日联军大举进攻，陆续占领锦州、山海关、黑山、义县、朝阳、阜新、凌原等地，挑起东北内战。

为避免内战，194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东北问题力求和平解决，力求与国民党合作，在重庆的同志作原则谈判，具体谈判可在东北进行。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与美蒋在谈判桌上进行了一系列斗争。

2月25日，周恩来和马歇尔商谈，表示中共在东北问题上是要和平的，批评国民党军队大肆进攻解放区。

3月9日，周恩来又和马歇尔商谈。马歇尔说他即日将回国述职。周恩来表示，希望东北问题解决后他再回国。

马歇尔走后，由美国中将吉伦为代表。3月26日，周恩来又和吉伦商谈，指出国民党政府在东北不断增兵，扩大内战，要求马歇尔在美交涉借款一事时，最好在改组政府、修改好宪草方案后实现，否则，现在借款会使顽固分子更嚣张，政府改组更困难，必将影响整军进行。推迟美国对蒋借款的目的是遏制蒋介石的内战升级。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商谈，向他说明中共军队在东北的事实性、合法性，在东北所占的地方不能让。张治中表示谅解，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位。

周恩来奔走于美蒋代表之间，经过多次商谈，终于在1946年3月27日，三人小组签定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

签字后，周恩来发表了三项声明：一是国民党军委会人说东北无内战，完全不合事实；二是政府军去东北接收，五个军兵力已足，希望政府不要破坏协议，再运兵去东北；三是执行小组以沈阳为中心，分往各地。

然而对于反革命两面派，任何协定都是一纸空文。《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墨迹未干，美国就暗中允诺为国民党军队运兵五万到东北；国民党军队又要侵占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等地。

为此，周恩来对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对东北停战是个威胁。

鉴于形势急变，周恩来致电党中央，指出：“东北情况已变，许多问题必须重新估计。”“东北应准备大打，决勿幻想国方让步。”

随着东北战火的蔓延，长春成为东北问题的焦点。国民党准备大动干戈，进攻长春。

为熄灭东北内战之火，民盟于4月10日向国共两党建议：在东北的中共军队让出铁路沿线，停战五天，国民党军队和平进入长春，然后国共谈判，全盘解决东北问题。

周恩来当即表示接受，并说停战不应是暂时的，而是全面永久的。

国民党代表、接替张治中的陈诚则拒绝民盟建议，认为东北下能停战。然而第二天，他又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表示愿意停战。其原因是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四千，15日之前到不了长春，故虚晃一招以待援兵。

周恩来审时度势，立即电告党中央，建议派兵进入长春。于是，党中央即电告东北局，按周电办。

4月19日，我民主联军进入长春，4月下旬又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到5月初，苏军基本撤出东北。

事后，周恩来和马歇尔商谈，说明中共愿意执行3月27日指令，而国民党违背指令，武力占领我方7个城市，我方遂也进占长春。他们既然不遵守这项条款，我们也只能被迫采取自卫行动。苏军既将撤完，东北已无接收问题，因此不应再有军队调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

面对周恩来有理有据的雄辩，马歇尔无言以对，但他从心里佩服才华出众、机敏过人的周恩来。会谈后，马歇尔对张君勱、罗隆基说：他从未遇到

过像周恩来这样的对手。

执意全面内战的蒋介石集团，不仅顽固坚持进攻长春，而且把战火由东北燃向关内，从5月初起向苏北、皖北、山东等地我解放区大举进攻。而作为调停人的马歇尔则不主持召开三人小组会议，放手让蒋介石大打。中国形势岌岌可危。

为制止这不断扩大的内战，5月20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等人联名致信张君勱、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陶行知等第三方面人士，信中写道：“东北已演成规模空前之大战，大江以北亦烽烟四起。政府当局，决心内战。三人会议迄未举行。政治协商尤属遥遥无期。当前局势严重如此，吾辈惟有披发缨冠之心，为奔走和平之举。亟盼民盟方面，速有代表来京，共同努力。”

张君勱等人接到信的第二天就分别致电毛泽东和蒋介石，提出停止东北内战的三种办法：（一）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长春，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国民党不进攻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重新组织。

毛泽东回电表示赞成。

为推迟内战，我党决定再让一步，东北民主联军于5月22日主动退出长春。

然而，蒋介石集团得寸进尺，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更加积极备战，并提出凡是苏军驻过、现在是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地方，都必须退出来才能停战的无理要求。

周恩来严辞驳斥，指出这是办不到的，这是东北问题的关键！

根据党中央关于“目前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和平，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的基本方针，周恩来继续多次和马歇尔商谈。马歇尔迫不得已致电蒋介石，说国民党军队在满洲继续前进，使他的工作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民盟代表也一致认为东北已无主权问题，应立即停战，并于5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请他返南京进行和平商谈。中共代表也致函蒋介石，指出，内战大火有一发难收之势，提出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

此时，蒋管区也呼声四起。在我党的领导下，以上海为主的国统区人民举行大规模游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

在多方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6月6日宣布停战。经过周恩来等人的斗争，停战期由15天延长到23天，至6月30日止。

蒋介石集团在关外大打的同时又实行关内小打，把内战之火烧到中原。

中原解放区的部队由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和王树声率领的部队组成（简称五师），抗战胜利后已发展到六万多人，在鄂豫皖建立了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根据地。

《双十协定》签字后，国民党政府不履行诺言，多次派出重兵进犯我中原解放区。5月初，蒋介石又密令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

5月1日，周恩来和接替陈诚的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会谈，声明：如果政府军队进攻五师，其全部责任由国民党负责之。

5月4日，周恩来再次和马歇尔会谈，指出，政府军队将于5月4日至9日期间向中原解放区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我方将进行自卫还击。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转移问题。

在周恩来的强烈要求下，马歇尔和徐永昌被迫同意派代表去中原调处。

5月5日，周恩来和徐永昌从南京乘飞机到武汉，与美方代表白鲁德一

起举行三人会谈。周恩来要求尽快将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我六万部队撤出来，这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并提议三方代表到中共指挥部宣化店巡视，然后制定解决办法。

白鲁德和徐永昌只好同意。徐永昌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作为他的代表。

5月6日，周恩来和白鲁德、王天鸣及第九、十一执行小组，离开武汉，冒着大雨乘汽车去宣化店。途中山洪爆发，他们行到黄陂县慑河时，猛涨的河水冲毁了大桥。奔腾咆哮的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当年跟随周恩来去宣化店的何谦老人回忆说：

我们跟着周副主席乘车来到淝水河边，大家都下了车，美蒋代表也下了车。他们望着冲毁的大桥，有的皱起眉头，想打道回府；有的则露出幸灾乐祸的样子。

周副主席望着波浪滔滔的河水心急如焚。他先让美蒋人员去休息，派我们去了解水情，然后亲自去做群众工作。他让随同来的原黄陂县委书记任士舜找来几个当地群众，亲切地同他们商量：“老乡们，我们有急事去宣化店，您们能想办法帮助我们过河吗？”

“能，能啊！”老乡们七嘴八舌他说着，可以用绳子把汽车捆起来，几个壮年汉子用杠子抬过去。

商量完，老乡们回去准备了，周副主席那紧皱的双眉也舒展开了。

我们了解水情回来已是深夜，周副主席高兴地说：“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明天早晨就过河！”说完让我们去休息，而他则坐在小油灯前，取出文件，办起公事。

翌日清晨过河。白鲁德、王天鸣坐进吉普车，老乡们用绳子把车绑好，连人带车一起抬过去。周副主席脱掉长裤，赤着脚，指挥大家涉水过河。河水有半人多深，水流湍急，我扶着他，走得靠前些，试探着一步步往对岸走。他望我一眼笑着说：“这种情况在长征时常见，可对他们就难啦！”

我向美蒋人员望去，好家伙，当官的让老百姓背着走，其余的人在河里东倒西歪，一个个咧着嘴，一副狼狈像。

周副主席带着我们蹚过这一百多米宽的河。

8日上午，三方代表赶到宣化店。下车后，周恩来先安排国民党和美方人员休息，他顾不上旅途疲劳，立即听取李先念、王震、郑位三的汇报，并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区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

下午，三方代表会谈，许多中外记者赶来参加。李先念首先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军队对五师的围攻。在铁的事实面前，白鲁德、王天鸣无言可驳。

当晚，周恩来和白鲁德、王天鸣初步商定了解决冲突的四项决议。然后，周恩来又与中原部队领导一起研究了突围方案，从部队的给养到伤员的护理、转移，都一一安排好。

在紧张的一天中，周恩来还挤出时间到附近军区机关看望了广大指战员，热情鼓励他们：“你们拖住了十几万蒋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指战员们深受鼓舞。

5月9日，周恩来和白鲁德、王天鸣回到武汉。10日，周恩来同白鲁德、徐永昌正式签定停止中原战事的协议。为贯彻执行协议，又增设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驻宣化店。

然而，一心内战的蒋介石月余就撕毁了停止中原战事的协议，于6月26日拂晓调集二十五个正规军和保安团等反动武装，总计三十多万人，再次向中原解放区猖狂进攻，挑起全面内战。

当天，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要求让第五师从湖北撤走。6月28日，周恩来又和马歇尔会谈，指出，6月26日国方已开始进攻，迫我起而自卫。如果蒋愿意和平处理，应立即电鄂豫部队停止进攻。

6月29日，周恩来再次和马歇尔会谈，严正指出：该让的我们都让了，不知政府是破裂呢？还是一面打一面谈？我们愿意和平，但不能接受蒋的这一套。

周恩来对蒋介石大耍反革命两面派进攻中原罪行的指控，得到舆论的支持和同情，为中原解放军转移创造了时机。由于已经做了转移准备，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树声、王震带领下，给敌人狠命打击后，很快于26日向西突围。

突围后，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向北挺进，进入陕甘宁边区。其余主力，一部分由李先念率领，越过平汉路向陕南、鄂西北前进，建立了陕南游击根据地；另一部分由王树声率领，创立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游击根据地。中原解放军完成了战略转移，国民党的“围歼”毒计破产。

美方享有最后否决权，是马歇尔在1946年5月上旬提出来的，企图在三人小组会上以最后否决权遏制中共，这是美国扶蒋反共的策略。

5月12日，白鲁德把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共同签字的有关美国享有最后否决权的提案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拒绝签字，认为这破坏了三人协商一致的原则。

以后，马歇尔又多次提及，均遭到周恩来的拒绝。这样，“最后否决权”问题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一个焦点。

一心想投靠美国的国民党，一方面逼我让步，让我们承认美同享有最后否决权；另一方面则是转移目标，避开停战这个关键问题，无休止地争论“最后否决权”问题，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内战部署。

周恩来敏锐地洞察后，决定利用美蒋矛盾，避开美对准蒋，展开反击。6月3日，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时指出，把停战问题看成争论最后否决权问题，这是蒋介石在转移目标。国民党在用各种办法欺骗美国，把美国推到与中共对立的地位。

6月18日，在讨论整军方案时，国民党代表再次提及“最后否决权”的问题。周恩来怒不可遏，说：中共是爱国主义者，不能承认丧权辱国的办法。

在周恩来的坚决反对下，美国想享有最后否决权的企图始终没能实现。

“国大”问题如一根线贯穿谈判始终，它与东北问题、停战问题、改组政府问题等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国民大会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负责召开。但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这项决议，通过了由国民党政府主席去指导国民大会的荒谬决议案。以后，随着蒋介石内战独裁的升级，有关国民大会的政协决议就更被其肆无忌惮地践踏。

蒋介石在挑起东北内战的同时，又擅自决定于5月5日召开国大，并在4月15日举办茶会，召集政协综合小组成员，要求各方在20日前提交国大代表和政府委员的名单。

周恩来作为政协综合小组成员出席了茶会。他郑重指出，两个月来侵犯

人权的事层出不穷，政府又不同意给中共和民盟有支配否决权之政府委员名额，修改宪草发生修改原则的争论，整军方案和停战协定在执行中也发生不少问题，希望政府在 20 日前将上述问题全盘迅速解决。

周恩来的陈同意思很清楚，就是说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开国大。

面对诸位政协综合小组成员，蒋介石只好表示接受周恩来的意见，当场指派张群、邵力子、张厉生为代表，雷震襄助，负责备方商谈。但这只是个形式而已，实际上政协决议还在被践踏，内战之火还在蔓延。

4 月 20 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代表团声明，指出，中共从不认为可以孤立地解决参加国民政府及国民大会人员名单问题，而置政协决议、停战协议、整军方案任人破坏于不顾，尤其是在内战重新扩大、民主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国大不能召开。

此项声明于次日递交国民党代表。

国民党代表于 22 日回函，对中共代表团所提的各项要求没有具体答复，似在卸脱责任。

周恩来于 23 日致函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和张厉生，指出：给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按八四四四分配政府委员名额，动摇了三分之一否决权（即十四名），我方绝对不能考虑；东北内战又在扩大，何能改组政府？宪草争议未决，何能先开国大？如政府径自召开国大，则违反政协决议，破坏团结，造成分裂局面。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斗争下，蒋介石被迫让步，在 4 月 24 日召集政协综合小组、各方代表的茶会上，表示国民大会延期召开。这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台。

在蒋介石集团四处点火下，1946 年 6 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分裂。在政治上继续践踏政协决议，在未经任何商量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就于 7 月 3 日擅自宣布 11 月 12 日召开国大。在军事上，蒋介石提出整军方案补充法，让我军让出安东、胶济线、苏北、承德、张家口以南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驻。并要求我党先接受他这无理军事要求，然后再开会解决政治问题。

这些无理要求和做法均遭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坚决反对，予以严辞驳击。谈判进入激烈的旋涡，然而，由于国民党代表的顽固坚持，旋涡很快变成死水，国共两党谈判于 7 月 10 日停顿下来。以后谈判之事均由马歇尔等人来回转达。

7 月初，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亦是调停人。司徒雷登和马歇尔一个立场，借调停袒护国民党。他的到来，使蒋介石又多了一个撑腰的人。

司徒雷登参加调停后，首先提出成立一个非正式五人小组，讨论改组政府问题。五人小组由国共双方各派两名代表，加上司徒雷登组成。

这个提议对在军事上已占优势的国民党非常有力，于是蒋介石加大了胃口，马上提出了比整军方案补充法还猖狂的五个条件，以此作为商谈的前提。五个条件是：（一）让出苏皖地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和承德以南地区；（四）15 日以前在东北让出除黑龙江、兴安省、嫩江、延吉以外的地区；（五）在山东、山西让出 6 月、7 月后占领的地区。

这是蒋介石的内战路线。他明白，中共是不会接受的，那样就可以把和谈不能进行的责任推给共产党，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大打下去。因此，这五

个条件也是美蒋勾结的阴谋。

8月6日，司徒雷登把成立五人小组的建议和国民党提出的这五个条件一并转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眼识破其阴险目的，严辞拒绝后，又一针见血指出：蒋如此无理，应负内战责任；美国实际上驻兵助械借款，也不能卸脱参加内战的责任。

周恩来于当日电告党中央，指出，蒋为大打，必先多方要求，而美亦有可能让蒋大打一阵再谈。如此，我们必须一面在准备大打的基础上，打二三个月再谈，也可能谈不成，而全面大打下去；另一面在大打的情况下，要准备蒋把问题提到联合国。

8月8日，党中央复电：蒋的五条绝对不能接受，你的答复很对，各解放区正动员全力粉碎蒋的进攻。

这时候，往来于国共之间的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觉得双方所提的条件差距太大，很难调和一致，不得不于8月10日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战争日益扩大，且有席卷全国之势，国人双方所谈问题似无获得解决可能。马、司两人承认调处失败，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实际上和谈已经破裂，但国共双方都不宣布停止谈判。国民党想用谈判作烟幕，抓紧扩大内战，光在军事上压倒中共，然后在政治上压倒中共。于是，他在继续扩大苏北和山东内战的同时，部署进攻张家口。

我党是想通过谈判揭露美蒋勾结、大扫内战的阴谋。周恩来于8月31日电告党中央和叶剑英、李克农，指出：现实斗争已临最后一幕，中心对美，只要美、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无话可说，则一切责任自明，美国的骗局也就继续不了了。

为了揭穿美、蒋阴谋，周恩来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10月1日，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讲，政府使用9个军的兵力，由冀、热、绥三路向张家口进攻，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最后决心使和谈破裂，要在内战炮火中召开国大，不仅中共不参加，政协中的其他民主分子也无法参加。中共决不屈服于国民党内战与奴役之下，将依靠四亿五千万人民进行全面抵抗，并坚信能从黑暗中奋斗出来，达到中国的真正和平及中美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真正合作。

周恩来的慷慨陈词既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又给人鼓舞和力量。在上海，为时局忧虑的民盟朋友们决定赴京劝柬，劝国民党政府停止进攻张家口，按政协决议和程序召开综合小组会议。他们选出9人作为第三方面人士代表，准备10月12日由沪去京。

然而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了张家口。当天晚上，国民党政府再次片面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蒋介石要撤谈判桌了，发出了关闭和谈大门的信号。

第三方面人士代表闻之既愤怒又失望，如同一盆冷水迎面泼来，个个心灰意冷，遂决定不去南京。于12日凌晨提前赶到南京的梁漱溟，看到报纸上登的这个消息，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后，马上转为政治攻势，想在内战的大火中如期召开国大。为重开南京谈判，蒋介石于10月16日发表声明，提出八项条件。前七条谈了恢复交通、改组政府、地方政权、宪法草案和军事等问题，似乎很全面，但是都有利于国民党。而实质问题是第八条：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条后，即下停止冲突令，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代表名单。蒋介石逼迫我方交名单，如果交了，国大便合法化了。

国民党代表吴铁城、邵力子等人拿着这八条意见面见周恩来。周恩来气愤他说：你们是拿袁的美敦书来的。他表示这八条决不能接受，并明确提出恢复谈判的两个条件：（一）军事方面应恢复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驻守的位置；（二）政治上按政协决议办。国民党代表不同意，于是，围绕着“八条”和“两条”展开了争执。

蒋介石见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参加国大，于是又拉第三方面人士进国大，企图孤立共产党。

作为中间力量的第三方面人士，是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谁争取了他们，谁就扩大了自己的同盟军。国共合作以来，周恩来一直注重团结中间力量，与他们广交朋友。他电告党中央：现在斗争的中心环节就是争取第三方面力量，如果能争取民盟全部或大部分不参加国大，就是胜利。

为了这个中心环节，周恩来做了一系列工作。

第三方面人士中有一些人对美蒋真实面目认识不清，仍抱有幻想，积极主张谈判。然而继续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为了教育争取他们，也为了进一步揭露美蒋勾结、假谈真打的阴谋，周恩来还是决定把谈判斗争进行下去。10月21日，他和李维汉同第三方面人士黄炎培、张君勱、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李璜、左舜生等人，由上海回到南京，然而，蒋介石仅与他们见一面就立即飞往台湾，他要求谈判的虚伪性暴露给第三方面人士，他们很失望。

四天后的晚上，梁漱溟、黄炎培、罗隆基等人到周恩来那里交谈情况，他们告诉周恩来，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已经占领了安东。

正在喝茶的周恩来听后气得把茶杯摔碎，大声说：共产党是不怕压的！

这一件件事实给了他们很好的教育，他们表示，第三方面人士要和共产党加强合作，如有重要主张和行动，必先和共产党协商，并征得意见。翌日，他们再次向周恩来表明上述态度，并约定：中共、民盟如有重要主张和行动，必先协商。

时间一天天过去，召开国大的日期已临近，可是谈判毫无进展，有些人又动摇了，违背前约，背着我党搞了个折衷方案，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具体有三条意见：（一）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二）在东北，中共军队仅驻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沿长春铁路各县政权除中共已接收者外应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

这个方案迎合了蒋介石的八条无理要求，将使我们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方案拟定后，他们派人分别送给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孙科，然后又送到周公馆。

李维汉写的《在周公馆谈判的日日夜夜》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这个方案是第三方面集会后，推黄炎培、梁漱溟、莫德惠起草的，他们签了字以后，派代表分途送往国民党政府及我方，我方是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个人送来的，由梁漱溟读给我们听，旋又加以解释。对于这个方案和第三方面的这种表现，我们感到十分气愤。周恩来以非常沉痛的语气痛斥梁漱溟等不守信义，落井下石。并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多一块地方少一块地方的问题，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要踩上一只脚！

董必武说这是政府凭以摧残人民的根据，问他们何以交待国人。我对梁说，这个方案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生命的大事。

在我方严正指斥下，他们都觉得错了，便赶快找来黄炎培、罗隆基、章

伯钧。黄等来后，周恩来、董必武又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指出这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何去何从，请他们自己选择。他们商量后，由黄炎培、莫德惠、罗隆基、李璜跑到孙科那里，佯称方案里漏抄了一条，要拿回去补上。随后又到马歇尔处收回这个方案。事后，恩来对我说，对中间分子，平日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在他们严重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决态度纠正他们的动摇。

10月28日，蒋介石从台湾飞回重庆，听取国民党代表汇报后，派孙科和邵力子去通知民盟，要求他们交出参加国大代表的名单，这是停战的条件，并让他们转告中共。

10月30日，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出席了第三方面会议。周恩来再次表明我党的态度：不应把国大代表名单作为停战条件，且国大代表名单更不能引为停战之保证。要保证停战，必须实现政协决议和1月停战协议。

周恩来的讲话给第三方面人士以启迪和力量。会后，他们向孙科表示：中共不交国大代表名单，我们也不交名单。

周恩来得知后，对章伯钧、李璜、胡政之讲，蒋介石是拿停战作为交换名单的诱饵，是假停战。希望第三方面人士团结，这次谈不成，将来还有机会，要保持自己的立场和信誉。

为欺骗公众，同时也为了再拉拢几个代表，蒋介石又宣布国大延期三天召开。

中共代表团明确表示，国大开会日期是国民党政府片面规定的，现在延期三天，也还是片面的，仍然违反政协决议，中共当然不能同意。

在这三天内，国民党政府加紧活动，想方设法拉拢第三方面人上。在他们的拉拢下，有少数人动摇了，给蒋介石写信，要交出国大名单。

周恩来得知，立即和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人出席第三方面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我们二十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现在有人要去跳火坑，进“国大”。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希望有一天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

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等听了周恩来的忠告，主动勾去自己的名字。

当天，即11月12日，民盟发表声明：除非按照政协决议完成国大开会以前的各项手续，否则决不参加国大。

1947年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召开了，除了少数的青年党、民社党参加外，第三方面人士基本都没参加。这是中共代表团取得的一大胜利！

第二天，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及讲话。他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蒋内战依然未变。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而奋斗到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合国成立了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负责战灾救济，帮助在二战中受害国家安置难民和战俘，复兴紧迫需要的工农业生产，使人民尽快地得到衣、食、住的资助，防止瘟疫，恢复健康。

这些救济物资由联合国中未受战争蹂躏的会员国捐献，总计约有 20 亿美元。分配原则是：“救济物资无论何时不得用作政治武器”，“应依各该区域中人民之相对需要而公平分配，不得因任何理由对任何人有所歧视，不得有政治信仰之歧视。”

中国是较重的战害国，联总分配给中国 5 亿美元。为此，联总在中国成立了分署，国民党当局也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

中国解放区在二战中遭受破坏最严重，是重点援助地区。为做好这方面工作，1945 年 7 月 21 日，成立了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解总），由周恩来、董必武、李富春、伍云甫等 15 人组成，主任是董必武，总部设在延安。

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到南京后，解总在国统区的工作纳入南京局，由周恩来和董必武亲自领导。此时，联总、行总已由重庆迁到上海，为联络方便，1946 年 7 月成立了解总驻沪办事处，直接归南京局领导，主任是伍云甫。

联总、行总、解总同居一地，其间斗争错综复杂，为了争取人民应得的利益，周恩来带领解总人员与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其焦点是物资分配问题、黄河复堤问题。

在美国控制下的联总，在物资分配上偏袒国民党，把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将之独吞，并用来作内战给养。这完全违背了联总制定的分配原则。为此，周恩来和董必武据理力争。

1946 年 7 月 5 日，董必武致函联总署长拉瓜地亚，要求公平分配救济物资。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和损失：伤亡和被俘人员约六百万人；造成鳏寡孤独和病残者近三百万人；损失耕畜牛羊五千四百多万头；房屋近二千万间；粮食五千五百多万吨；衣服农具和家具备二千万件。在日本占领区的二亿六千六百万人口中，解放区人口就有一亿五千万人；在四千二百万难民中，解放区难民就有二千六百六十万。

按照联总分配原则，解放区应获得联总救济物资的五分之三，但迄今只得到百分之一一点五。

随后，周恩来于 7 月 12 日又致函联总总部，指出，解放区难民占全国难民的百分之六十，而所获得的救济物资却只占联总运华物资的千分之六，这种现象极不合理。

为了把美蒋勾结、国民党政府独吞救济物资的阴谋揭露出去，周恩来又多次在记者会上发表演讲。7 月 25 日，他在周公馆的记者会上说：关于救济问题，我们有权利要求参加行总。过去救济物资分配给解放区的数量太少，而且如何分配，我们不知道。不要事情发生以后，再来找我们。所以我们要求参加行总各部门及有关地方的实际工作。

一封封信函，一次次交涉，一件件铁的事实，似落地的狂飙，揭去联总所谓公正分配的伪装，国民党政府独吞各国人民捐献的救济物资进行内战的丑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国际、国内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联总和行总，就连美国控制的联总内部也掀起声讨之浪。

1947年4月，联总中国分署的六十多名外国高级职员集会，通过决议，向联总和美国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对解放区的歧视，把联合国援华物资公平分给解放区人民。

经过斗争，联总迫于各方压力，表面上不得不公正一些，我方得以参加分配工作，为解放区争取到数以万吨计的联合国救济工作。据有关资料记载，截止1947年11月，解总帐户上收到联总救济物资价值约一千亿元（法币），占联总对华救济总额百分之二。从1946年7月至1947年10月，仅通过山东沿海港口收到的物资就达八万多吨。增强了解放区人民医治战争创伤的能力。

奔腾咆哮的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水利资源，她温顺时给人们造福谋利，可发起野性时就会泛滥成灾。抗战初期，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进犯，炸了花园口的大堤，使黄河改道，流经淮河后入海，造成了大片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要堵口复堤，使黄河重归故道。这似乎是一件造福百姓的事，但蒋介石的目的不在于此，他要借机施行军事诡计，因为黄河的故道绝大部分在解放区。

周恩来看穿了蒋介石的目的，然而考虑到黄泛区群众的利益，他还是同意了，但是，必须保证解放区群众的生命财产。于是，1946年4月中旬，周恩来同联总、行总、国民政府黄委会、晋冀鲁豫地方政府代表签订了《开封协定》、《菏泽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先复堤后堵口，给河床居民每人发迁移费法币15万元；救济问题由联总、行总负责；施工机构由双方派人合组，负责修复有关交通，保证不作军用。

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两个协定，5月18日，周恩来同联总中国分署代理署长福兰克·雷、联总工程师顾问塔德谈判，达成六条口头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下游复堤、浚河从速开工；花园口合龙要视下游工程的进度而定。

然后，周恩来又致马歇尔备忘录：前已商定黄河堵口之前应疏浚复堤，给黄河河道内的居民拨款救济，这一点应在汛期前办到。

然而这一条条协定对于包藏祸心的蒋介石只是废纸一张。7月初，黄河下游尚未复堤时，国民党当局就要在花园口合龙，向下游放水，企图以水伐兵，淹没两岸解放区，配合其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于7月14日得知这一消息，忧心如焚，这将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啊！他马上与联总、行总交涉，竭尽全力加以制止。翌日，他就和联总、行总人员商谈，要求制止堵口放水。

16日，周恩来由上海飞到南京，会见马歇尔，要求在下流尚未复堤时，决不能放水，并指出，黄河治理问题应脱离政治、军事来解决。

22日，周恩来又同联总、行总有关人员一起由南京赶到开封视察，他强调应立即制止堵口立即制止向下游放水，立即给解放区拨付粮款。

22日，周恩来返回上海，再次与联总、行总有关人员商谈，最终达成协议，决定先复堤待9月汛期过后再堵口。并决定，修复黄河故道堤坝的费用由国民党政府支付，救济故道居民款一百五十亿元，也由政府支付。

由于周恩来多次交涉和及时制止，使蒋介石的阴谋没有得逞，使黄河下游的群众免遭反动派的毒手。然而，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8月末，黄河、淮河、沂河、沐河等河水上涨，冲破堤岸多处。周恩来立即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要求江北运河工程局立即开放沿江各坝，

以免苏北人民遭受水灾浩劫。可是，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开放江坝，反而借机用轰炸机把重磅炸弹投到高邮附近堤身，并扫射修堤群众。

周恩来闻之怒火中烧，再次致函宋子文。函文如下：

“由于淮黄沂沭河水同时告涨，苏北千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岌岌可危，前曾一再电请宋子文先生吁请开放沿江各坝，但政府仅在报端宣布，实际至今并未开放。政府不但不开放江坝，近且不断以重轰炸机以重磅炸弹轰炸高邮附近堤身，并扫射修堤人民，阻挠修堤工程，致使沂沭漏水，今堤岸又告溃决，竟演成宿沭灌各县水灾。运河入江各坝政府既以不开放，复加以飞机不断轰炸河堤，致运河有决堤之极大可能。如因此而造成苏北重大水灾，国民党及政府要负完全责任。特再急电请即转行政院及水利委员会转飭江苏省府立即开放归江各坝，并制止轰炸和阻挠运河修堤工程等语。”

由于周恩来强烈要求，紧急呼吁，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革命行动，使解放区人民又免于一大灾难。

从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在那危机险恶的形势下，在与美蒋进行艰苦复杂的谈判斗争中，为了人民的权益，周恩来和董必武先后六次奔走在上海与南京之间，与行总、联总进行多次商谈，发表多项声明，举办多次记者招待会。

为了处理好联总救济物资的分配、运输、散发等项事宜，也为了黄河归故复堤工程的进行，在周恩来的力争和协调下，联总、行总、解总共同在国统区的天津、开封，解放区的烟台、临沂、淮阴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由这三方面人员组成，这是一个成份非常复杂的工作机构。我方人员不仅要完成物资运输、发放的任务，而且要做大量的统战工作。

烟台办事处于1946年7月末成立，解总代表李澄之；行总代表王思亮；联总派出专家组，成员来自美国、捷克、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组长是美国人李甫曼。

办事处的负责人也是由三方面推举产生。办事处主任由王思亮担任。他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在大革命后去了海外，归国后到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参加过早期抗日。以后又去了菲律宾，在二战中由于向美军司令部提供情报有功，被麦克阿瑟授予少将。他当主任，我方同意，行总同意，联总也欢迎。

副主任张沈川，是我方推荐的。他虽是行总人员，但是中共地下党员。

为了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完成运输发放任务，中共代表团派出联络员。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朱友学。

朱友学老人回忆说：

1946年7月末8月初，我已来到上海办事处。这时候国共关系基本破裂，国民党正大举进攻解放区。

一天，周副主席把我叫去，董老也在。

周副主席热情地让我坐下，然后说：“友学呀，国共谈判濒于破裂，不久代表团要回延安了，准备把你留在上海，有什么意见没有？”

“不！我要回延安。”我脱口而出，这是心里话，我从延安出来已经几年了，有时做梦都梦见延安的窑洞、宝塔山，如今大家都准备回去，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周副主席慈祥地看我一眼，略微严肃地说：“留你在上海，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作为一名党员，党需要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要服从分配。代

代表团虽然回去，但是我们在国统区能坚持一天合法斗争，我们就不放弃这个斗争！把你留下是有重要任务的。”

听了周副主席这番教诲，我内疚地低下头，脸也红了。

周副主席冲我笑了笑，语气温和地说：“为了把救济物资尽快送到解放区，由联总、行总、解总三家在烟台建个办事处，代表团派你去当联络员，主要任务是做好统战工作，揭露美蒋阴谋，团结大家，完成救济物资的运送、分发任务。你的担子可不轻啊！”

周副主席末了这句话说得深沉有力，我深感任务艰巨，不免抬起头，睁大眼睛望着他。

董老在旁边插话说：“这是件好事，可以借此机会宣传党的方针，扩大党的影响嘛。”

周副主席接着说：“王恩亮是办事处主任，他原在十九路军呆过，抗过日，你应该团结他。副主任叫张沈川，是位老同志，你应该依靠他。”

周副主席认真交待完，又语重心长地重复道：“记住，要广交朋友，做好统战工作，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

朱友学受命而行。他与办事处的人员一起乘着载有救济物资的轮船离开黄浦江，直奔胶州半岛。

同船而行的，有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国人，有国民党人员，也有我们自己的同志。行总、解总人员，虽然都是同一种族的华人，但分坐两舱，泾渭分明，似相互对垒的两军。

“周副主席让我做好统战工作，这样的局面我该从何做起呢？”朱友学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脑海里也激烈地翻腾着。

对，就从这里做起，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做起！

朱友学把解总中一位会英语的干部找来，他原在东江纵队工作过，知道一些抗战时期美军飞行员在华之事。

朱友学和他来到联总人员中间，他满怀深情地用英语讲了一件感人肺腑的事。

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一次空战中，美军的一架飞机被日军击中起火，驾驶员只好跳伞逃生。降落伞带着他飘啊飘，飘到了一个山区，那是解放区。然而，昏迷不醒的飞行员全然不知。

当地百姓发现了这位飞行员后，没有因为他是大鼻子蓝眼睛的洋人而置之不理，而是把他背到家里，为他包扎伤口，为他煎汤熬药。为防汉奸发现，又给他换上当地庄稼汉的衣服。

日军搜山了，要搜出这位美军飞行员。当地百姓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他藏起来。这样的搜山进行了三次，在日军明晃晃的刺刀下，解放区人民一次次勇敢地保护着他。他伤愈后，解放区人民又把他安全送回美军空军基地。

轮船在波涛中颠簸着，人们的心也在激烈地跳动着。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每一个人，也拨动了他们的心弦。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参加过二战，这个飞行员的经历使他们想起昔日的战场，想起风雨同舟的战友，而解放区人民的深精厚谊更如一把火，燃化了胸中的那块冰。美国大副汤姆当下就表态：“让社鲁门、蒋介石见鬼去吧！我们是朋友。”

船靠岸了，大家的心也在往一起靠拢。

行总中有一些进步青年，他们怀着追求光明前途的信念，想通过办事处到解放区去。

朱友学与张沈川商量，决定由张沈川负责，把这些青年秘密组织起来学习，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并要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注意保密，防止特务刺探。

在张沈川的组织下，这些青年通过学习进步很快，成为一支骨干力量。至办事处撤离时，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一加入了共产党，有三分之二的人走向革命道路。

在把这些青年组织起来的同时，朱友学的目光又落在中间分子身上，开展了交友活动。

行总人事秘书丁世权，曾参加过国民党新一军，后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而自动退出。他为人正直，但自命清高，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采取中立态度。

朱友学主动团结他，关心他。他被朱友学的热情和真诚感动了，从朱友学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胸怀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品格，开始从心里暗暗佩服共产党，原来的中立态度渐渐转变，并向朱友学汇报了丘某的可疑行为。

丘某是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经常打听进步青年情况，想方设法了解他们的背景，并在群众中挑拨离间，破坏团结。

这无疑是混进来的坏分子乃至特务。朱友学得知这一情况后，开始注意他，不久便以他经常夜不归宿为由把他送回上海。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朱友学把工作重点放到王思亮身上，他不急不躁，顺应时机，把工作做在潜移默化的团结批评上。

一天，行总的吕鹏举被当地公安局扣起来。王思亮听到后火冒三丈，大喊大叫：“吕某，一个商人，凭什么抓他？”

朱友学善意地批评他：“王主任，你太感情用事了，你才认识他多久，就这么血肉相联？”

张沈川也以同学身份批评他：“你了解行总每一个人吗？你能为吕某打保票吗？快去照照镜子吧，你都快变成一头犟牛了！”

这时候，公安局来人了，说明了扣留吕某的原因。吕鹏举原是山东人，因此当地有的群众认识他，他这次改名换姓回来，四处乱窜，打听这个，又刺探那个，群众觉得可疑，检举了他。公安局的同志说：“我们正在审理，如果纯属经商，不牵涉政治活动，我们会把他放回来。”

在事实面前，王思亮冷静了，他不好意思地检查了自己。

潮起潮落，船去船归，一批批救济物资运到解放区。蒋介石闻之眼睛都气红了，于是下令大轰炸。

1946年11月13日，万慈、万敬两艘载有救济物资的轮船驶向烟台。几架蒋军飞机从青岛方向尾随而至，投下一串串炸弹，轮船只好折回。然而蒋军飞机并不善罢甘休，又沿公路扫射，物资被炸毁，装卸工倒在血泊里。

敌机刚刚飞走，硝烟还在弥漫，烟台办事处的人员立即投入到抢救物资的战斗中。血与火的战斗把三方面人员的心连在一起，三方达成协议：为躲避敌机轰炸，决定夜间抢运。

美蒋的炸弹也彻底把王思亮炸醒了，他一把拉住朱友学的手说：“这次，我们随同救济物资的船回上海吧，但愿能见到周恩来，我要好好和他谈一谈！”

统战工作不是无原则的，首先要有民族自尊。

1947年上半年，烟台发生了两起事件。

4月29日下午，联总的巴尔格和卢布利克驾驶拖拉机在烟台二中门前闲逛，招惹许多人围观。他俩竟挥拳打伤了学生党湖忠和工友李振喜。

群众激怒了，告到市政府。姚仲明市长亲自受理，他向联总提出抗议，指出：巴氏和卢氏的粗暴行为已涉及到主权原则及平等关系，此事若不严肃处理，解放区人民难以容忍。

5月1日，烟台二中广场上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大会。联总代表汤浮德向被打伤的党湖忠和李振喜陪礼道歉，对姚市长的调查处理表示感谢，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5月23日，联总的史鲁城琪驾驶汽车给友人送一条洋狗。汽车在狂奔中把人力车工人杨禄奎撞成重伤，医治无效身亡。群众怒火冲天，纷纷要求严惩凶手。

鉴于群众的强烈要求，首先于6月12日召开了别开生面的追悼大会。联总小组组长李普曼亲临吊唁，肇事者披麻带孝。出灵时，市长亲手执佛。

烟台市临时法庭受理了此案，根据史鲁城滇较好的悔过态度，加之照顾中外友谊，判处他有期徒刑两年。

此事轰动了山东，也轰动了国统区。国统区人民无限感慨地说：“解放区的人真正挺起了脊梁！”

暑去寒来，纷纷扬扬的大雪落满了山山岭岭。朱友学领着摄影记者随储运大军而行，到县城，到乡村，每到一地，他就组织记者抢拍发放物资的场面。

有人不理解，你们翻山越岭费这个劲儿干啥？

时间不长，国民党当局放出谣言，共产党把救济物资移作军用。行总三海总署也前来干预。

朱友学拿出了所拍的一张照片。在事实面前，谣言被揭穿，谣言背后的阴谋也随之破产。

潮起潮落，船来船去，烟台办事处完成了她短暂而又辉煌的使命。三方人员各奔东西。联总的专家们要告别解放区人民，回到自己的国家；行总的有志青年们也即将奔赴新的战场；解总人员则待命启航。在这分别之际，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愿望，那就是：让这友谊之花从山东开遍全世界！

37 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由蒋介石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召开了，至此，他也就最后关上了和谈大门，把和平民主关在了门外。

和谈之桥已断，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也即将返回延安。

远见卓识的周恩来早有预料，还在8、9月间，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布调停失败前后，周恩来就着手准备我方人员的疏散转移，以免谈判破裂时被国民党当局扣留。

周恩来和南京局有关领导商定，采取三种措施：一是疏散，把一批干部疏散到香港、两广等地，使香港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香港本身也要建立三线工作；二是隐蔽，决定南京局组织部长钱瑛带上南京局所属地下党的关系和部分平、津学生中的党员关系，转移到上海隐蔽。并决定南京局和上海工委同秘密组织完全分开，一旦公开机关撤退，由秘密组织继续领导斗争；三是把一批公开活动而又无法隐蔽的同志撤回解放区。

这些措施制定后，周恩来又亲自落实。每一个同志的去留，他都要同有关领导反复研究，既考虑工作的需要，又照顾他们的身体和生活，倾注了无限关心爱护之情。

在代表团外联组工作的于土和许真是一对年轻夫妻。40年后，他们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蒋介石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我代表团人员被迫作紧急撤退时，哪些同志回解放区，哪些同志去香港工作，哪些同志留在上海转入地下，周副主席都是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和有关同志一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亲自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1946年10月14日晚上，外联组长陈家康同志叫我们两人不要睡觉，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出发。半夜里，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去香港。我们马上把箱子里所有‘土’的东西拣出来，只剩些‘洋’的。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有变动，要回解放区。于是我们又把‘洋’的全倒出，箱千里全装些‘土’的。又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还是要去香港，又把箱子倒腾了一番。到天已蒙蒙亮时，才最后通知我们：立即上船出发回解放区。这时，家康同志郑重告诉我们，这是周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按我们的专业，理应去香港工作，但周副主席考虑我们即将有一个小宝宝出世，怕在香港万一有危险不好办，才最后下决心安排我们到去解放区的行列中。当我们得知敬爱的周副主席在这样危急的时刻，竟为未来的一个小生命而通宵考虑再三，我们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感到浑身是力量？”

中共代表团临离开之前，我党干部的疏散转移工作全部结束，上海、南京两个办事处仅留下74人。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周恩来也系挂着民主人士的安危。他多次接待他们，分析目前形势，嘱咐他们必要时作转移准备。

离别的日子临近了，周恩来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善后工作。

11月16日上午，周恩来拜访了马歇尔。尽管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执行扶蒋反共政策，在谈判桌上设置了许多障碍，周恩来还是把他同美国政府区分开来，对马歇尔个人是尊重的。马歇尔也非常钦佩周恩来的才华。周恩来告诉他，由于国大的召开，国民党已经关上谈判大门了，中共代表团将不得不返回延安。董必武留在南京，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均留一些工作人员，便于今晨一旦重开谈判能够有人出面。

马歇尔也觉得国大已经召开，没有理由挽留周恩来了，只好表示愿意为

周恩来回延安提供飞机，并答应负责把以上各地中共人员送回解放区。

当天下午，在梅园新村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把代表团即将回延安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并指出：今后革命的任务仍是独立、民主……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记者们一边飞快地记着，一边望着周恩来那刚毅的表情，依依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17日中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梅园宴请民盟领导人，并摄影留念，留下珍贵的记忆，也留下战斗的友情。

当天晚上，奔波一天的周恩来又伏案给郭沫若夫妇写信。这是一封言简意深、有理有情的书信。信中首先对第三方面作了正确估计，“青年党混入混出，助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舞之。”接着，指出我们对中间派的工作方针：“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然后，对今后形势作了分析：“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方针也。”信中最后写道：“弟等19日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流露出惜别之情。这不仅是对郭沫若夫妇的惜别之情，也是对上海人民，对国统区人民的深深留恋。

11月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余入返延。董必武率领部分办事处的同志前来送行，国民党官员邵力子及吴铁城的代表、马歇尔的代表也到机场相送。临上飞机前，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您什么时候回南京呢？”

周恩来望望蔚蓝的天空，坚定地回答：“总有一天要回南京来的！”

飞机滑向跑道，载着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徐徐起飞了，直冲云霄，波涛滚滚的长江渐渐远去了。机上阳光灿烂，机下白云缭绕。灿烂的阳光如五彩缤纷的花环，那是延安的党中央在欢迎她凯旋归来的勇士；机下的祥云如飘逸的绸带，这是国统区人民欢送和平使者的心心结，由千万颗心结所系而成。

从西安事变到伪国大召开，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在虎穴龙潭的国统区战斗了十年，与国民党谈判了十个春秋、十个酷暑、十个寒冬，他为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光辉业绩，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不朽贡献，为世界和平所尽的不懈努力将永载史册。

周恩来一行人平安地到达了延安，朱德总司令和党中央的其他负责人亲自到机场迎接，许多群众也纷纷前来欢迎周副主席。

这一天，李维汉在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

周恩来到延安后，马上向党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党中央进一步制定了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斗争方针。

中共代表团离去后，南京办事处改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由董必武负责；上海办事处改为中共上海联络处，由钱之光负责。留下来的同志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战斗。

中共代表团的撤回，无疑不啻一发重型炮弹在美蒋首脑人物中间爆炸，引起剧烈震动。

12月1日，蒋介石和马歇尔、司徒雷登会晤，蒋介石问他的美国高参：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我们应该怎样行动？

比蒋介石聪明的马歇尔告诉他，共产党已经是一支大得不可忽视的军事

和政治力量，靠军事行动消灭他们多半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是努力争取他们参加政府。

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说，必须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如能够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就不会有多大困难了。我有信心，能在八到十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

马歇尔则告诫他，这样大的一个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其摧毁，而且将面临着经济彻底崩溃的危险。

马歇尔的忠告如一盆冷水浇在蒋介石的头上，他被浇得心里打着寒战，但还是硬着头皮说，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和平谈判使共产党参加政府。

于是乎，已经关上和谈大门的蒋介石又放出和谈烟雾。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他指使部下接二连三发表谈话，要求与共产党商谈。最后，他使出假戏真做的伎俩，于1947年1月15日约司徒雷登谈话，拿出四点方案。

面临1947年3月莫斯科会议的召开，美国政府也同意蒋介石的“和谈”，以便参加会议时有个交待。

这样，1月16日，司徒雷登受蒋介石之托，把国民党政府要重开谈判，并派张治中去延安的决定，通知中共南京办事处。

接到通知的王炳南，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董必武，董必武马上电告党中央。

17日，党中央致电董必武，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应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让蒋彻底暴露原形，以便我们在这半年内外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从而有力地推动蒋管区的人民斗争。对司徒雷登通知的回答，仍是坚持恢复1月13日双方军事位置及取消蒋宪另开制宪会议这两个条件。

董必武把党中央的方针电告在南京的王炳南。18日，王炳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当面通知司徒雷登。

由于我党坚持这两条原则，国民党政府想恢复谈判的阴谋不揭自穿，“和谈”烟雾也就自消自散。想借机捞取稻草在莫斯科会议上有所交待的美国，也竹篮打水一场空。

此时，国统区人民越来越看清美国政府扶蒋纵容内战的真面目，特别是1946年12月下旬，北平一名中国女学生惨遭美国兵强奸之事，更使人们怒火中烧，“美国佬从中国滚出去”的吼声在各大城市响起。

这种情况下，马歇尔等人在中国处境不佳，因此，美国政府于1947年1月6日宣布马歇尔调回美国。

马歇尔于8日回到美国，当天就发表一篇有关中国时局的声明。他在声明中避开美蒋在中国内战的责任，却说中国和平的最大障碍是国共双方彼此猜疑相对，而且把谈判破裂责任完全推到中共身上。声明中讲：“中共现已提出最后要求，而促使谈判中断。彼等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并恢复1月13日之军事位置，此为政府所不能接受者。”

这是一份颠倒黑白的声明，是马歇尔为推卸扶蒋内战责任所发表的狡辩书。

1月10日，延安各界群众举行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协一周年大会，周恩来针对马歇尔的声明，在会上发表了《评马歇尔离华声明》的演说。

周恩来严正驳斥了马歇尔对我党的攻击和污蔑。他说：恢复1月13日双方军事位置，取消蒋宪重开党派会议，这是最公允的妥协，也是最低限度的

和平民主要求。最后，他希望马歇尔回国后，为了中美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和利益，检讨美国政府的政策，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

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美国政府已决定终止对三人小组和军调部的关系，美方人员尽速撤退。

美国政府决定撤出三人小组和军调部，这虽然是我们的一大胜利，中国的问题将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美方最后破坏了停战协定，不受其约束，支持蒋介石全面内战。

阴风后面必是恶浪。紧接着，美蒋密谋，向我党公开办事机关开刀。2月6日，美国大使馆再次发表声明：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本日已通知中国政府及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谓美国政府将协助受委任之中共人员，返回可能通行之共党区域，并协助国民政府执行小组人员，返回原来之站头，直至3月5日止。

美蒋合谋，逼迫我公开办事机关自动退出。

蒋介石关上了和谈之门，但他还不甘心，还要将之关死，再贴上封条。然而，阴险的蒋介石害怕这一举措遭天下人唾骂，因此他并不自己动手，而是逼迫中共人员自动退出。

针对美蒋阴谋，党中央于2月20日以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指出：京、沪、渝三地中共联络处之设立与存在，以前为国美双方所请，国方所许可。其任务为与中外各方联络。除非国方决心从此以后不再谈判，正式通知中共撤退此等机关，或中共方面自行决定撤回，则决无取消之理。如果国方既不正式通知中共方面撤退，还要阴谋扣捕中共人员，则一切后果自应由国方负责。21日，党中央致电董必武和王炳南，指出：美蒋逼我们自动撤退京、沪、渝联络机关，是想从反面证明我们关死谈判之门。因此，我们的方针是，坚持保留京、沪、渝联络机关，表示决不由我关死谈判之门，但谈判先决条件，必须实行两项最低要求，断无价钱可讲。

26日，党中央再电驻京、沪、渝联络处，指示一定坚持非赶不走的方针，并抓紧建立秘密据点。

形势岌岌可危，斗争异常紧张。京、沪、渝办事处人员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大家一面抓紧撤退准备，一面加强气节教育，做好可能被扣留、进集中营的准备。

在我党坚决斗争下，蒋介石的阴谋破产了，于是露出狰狞面目，于2月27日下了“逐客令”，国民党地方当局马上采取行动。

首先是重庆。28日凌晨3时左右，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出两千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宪、特，把中共驻渝联络处、新华社、四川省委及原红岩办事处紧紧包围起来，进行大搜查，把中共在渝所有工作人员249人分散软禁起来，其中还有国民参政员吴玉章老人。

恐怖，阴森的恐怖，笼罩着黎明前的山城。被软禁的同志们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四川省委书记张友渔和吴玉章的领导下与反动派作坚决斗争，大家心里有一个坚定信念，那就是冲出去，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

28日当天，南京、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也下了毒手。

南京是首都，也是中国对外最大的窗口，外国使馆、使团大部分在这里，尤其是那些敏感的记者，更把眼睛紧紧盯在破裂的国共关系上。自周恩来等人返回延安后，他们经常到梅园新村打听消息。国民党当局害怕他们，害怕

国际舆论的谴责，因此未敢大动干戈，只是派出军警宪特把梅园包围监视起来，没有闯进办事处院内。

在延安的周恩来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国统区的势态。28日清晨，在他还未收到我方电报时，先从国民党中央电台听到这个消息，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京、沪、渝的同志怎么办？他忧心如焚，马上给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童小鹏发去急电，做了详细指示。

一、顷据蒋方广播渝宁两地均已下逐客令，估计上海必跟着来，剩下解总联络处，为此必不会久。

二、蒋此次逐客，系用地方当局出面，以保护安全的形式，但我们须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办法有五：甲、由周电蒋。乙、由董（必武）、王（炳南）在沪、宁分别以口头及书面询问吴铁城、吴鼎昌或宋子文，国民党及政府是否知道京渝两地方当局此种行动。如知道，则请以正式公文通知中央驻京代表董必武，我联络机关自当撤退，但必须限期延长。丙、蒋若对甲、乙两项不答复，我则向中外公布。丁、动员京、沪中外记者质询蒋方人员，逼其回答，以明责任。戊、董在撤退前发表谈话，并宣布交涉经过。

三、王炳南立即向美方说明经过，交涉撤退所需全部飞机。

四、渝方撤退计划已告，如不可能疏散隐蔽，只有全部回延。

五、京、沪两处除解总联络处外，可否分别疏散隐蔽，凡无法疏散隐蔽者，均撤延。一切均请董依情况决定。

六、解总人员将来撤退，应要求联总、行总的海陆送烟台或其它口岸。

当天，周恩来得知我方电告后，立即致电蒋介石，对国民党限令我京、沪、渝办事人员撤退之事，提出严厉责问和强烈抗议，指出，为判明谈判破裂的责任及手续起见，要蒋介石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并须延长撤退时限至3月底。

红色电波把周恩来的指示传到南京，传到上海，然而在沪的董必武和钱之光没有收到，此时的周公馆已被反动派侵占，同志们完全失去了自由。

28日黄昏，上海的军、警、宪、特包围了周公馆，冲进办公楼，切断电话线，占据了地下室，把工作人员全部赶到楼上监视起来。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国民党军官怪叫着，要找负责人。钱之光从容不迫地走过去。这个军官自称是淞沪警备区所派，把一份快邮代电交给钱之光。

这是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下的通牒令。内容大意是：本部为确保治安，兹通知该党在沪人员，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所有撤退人员及其眷属，限于3月3日前开具名单，送部核办。

钱之光阅后提出抗议：你们这样无理赶走中共谈判代表，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是要负全部责任的！我们的人员名单，没有我党的上级指示是不能交的。你们这样限制我们自由，我们如何安排撤退？你们这样粗暴的做法，我们不能接受！

这个军官翘着二郎腿，傲慢他说：“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我们是奉命而来。”

钱之光见和他讲不出个所以然，气愤地回到楼上，组织同志们清理文件。

午夜时分，董必武开会回来，随同者有刘昂。他们的车刚停到周公馆门前，一群特务就疯子般地围过来，拉开车门，阴阳怪气他说：“你们被包围了！”

董必武和刘昂从容地下了车。望着周公馆周围密密麻麻的军警宪特，董

必武轻蔑地撇撇嘴，然后厉声喝道：“闪开！让我进去！”

董必武在敌人的监视下进入楼内。他听完钱之光的报告后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夜空，把八字胡左右抹了一下，坚定有力他说：“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与反动派斗争到最后。现在急待做两件事：一是迅速烧毁文件、资料，不能让任何一点秘密落入敌人手里；二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这里的情况通知外界，并要向党中央汇报。”

在董必武的指挥下，同志们把窗户遮严，开始销毁文件，望着炉火中化为灰烬的一张张照片、一份份材料，大家心疼得发颤！但是，这是党的机密，决不能落入敌人手里。随后，大家又把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的金条藏起来。

紧张的忙碌送走了恐怖之夜，黎明的曙光透进窗棂。在这黎明的曙光中，周公馆召开了最后一次支部会。

原党支部书记刘昂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作了如下记述：

“会前，董老对我说：这个会，主要是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会上，董老对形势发展作了估计：认为一种可能是国民党政府迫于我们的强大和我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不敢对我们下毒手，把我们押送回延安；一种可能是把我们长期软禁，或关进集中营；还有可能把我们的人一个个抓走，分而治之，使我们死活不知。董老针对各种可能，又同大家一起研究了具体措施。一方面，要想尽一切办法跟中央取得联系，跟上海的我们其他的同志取得联系，跟友好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向外界揭露国民党包围、监禁我们的暴行，戳穿他们和谈的假面具；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革命气节，宁死不向敌人屈服，不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同敌人斗争到底，接着，董老给大家讲了革命先烈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事迹。……”

“他嘱咐大家，不要对反动派抱任何幻想，他们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干出来的。董老说：事态的发展还要看我们的斗争。但现在要作最坏的打算。要准备进集中营，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大家表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进了集中营，就坚决同敌人斗，要公开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的阴谋。’”

“会后，办事处给每人发了一套内衣、两把牙刷、一支牙膏和一双鞋，从物资上作了进集中营的准备……”

在敌人水泄不通的包围中，怎样才能把这里的情况透露出去呢？

周公馆被包围的第二天晚上，地下室的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楼上的同志们知道这是记者们打来的，他们天天在这时与代表团通话，于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情况渗透出去。但是，地下室被敌人占据着，有的同志前去交涉，却被敌人野蛮地拒绝，双方争执起来。

董必武怒气冲冲来到地下室，大声责问：“我是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是你们蒋委员长请来谈判的，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们接电话？”

几个特务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同意，但规定莫谈国事，如果谈，立即卡断电话。

接电话的同志机敏而风趣他说：“马思南路现在的保安人员是足尺加三，我们不能出去拜访你们了。通电话规定莫谈国事，只好在这里向你们表示问候吧！”

记者心领神会，马上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时间不长，周公馆门前就围了一些人，有民主人士、进步群众，大家要进去见见中共代表团的人，但是全被特务挡在了门外，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过往行人也围观过来，人越来越多，吵嚷声一片。被软禁在楼上的同志，望着这个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

人民，多么好的人民啊！有他们为后盾还怕什么呢？

暮色苍茫时，柳亚子和马寅初闻讯后急匆匆赶来，被特务拒之门外，并威胁说：“你们进去，就别准备出来！”

马寅初冷笑一声说：“蒋介石把我关了这么长时间，无非再把我关起来吧，我不怕你们这一套！”

特务被马寅初这句骨气十足的话噎得直瞪眼睛，只好开门放行，并派两个特务监视一位老先生。

董必武在客厅里接待了他们。特务们如临大敌，几个特务监视董老，又有几个特务分别看着马老、柳老。这三位老人视若无人，谈笑风生，董老把周公馆遭到包围和监视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要求他们向舆论界说明真相。马老和柳老听后非常气愤，表示立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谈话结束后，马老、柳老起身告辞，特务们立刻围上前不让走。马老振振有词他说：“你们不是奉命监视共产党吗？我又不是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走？”

柳老则理直气壮地问：“我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员，你们有什么资格限制我的行动？”

两位老人终于冲破敌特的阻拦，平安而归，即刻告之新闻界。

翌日（周公馆被围的第三天），一些外国记者赶来采访，被特务们挡住不让进来。董必武在楼上见之气愤他说：“你们不让采访，我们也要发言！”于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在这“红色堡垒”中召开了。外联组长陈家康作为新闻发言人打开窗户站到阳台上，向楼下的记者和群众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他大声他说：“蒋介石最后关死谈判大门，决心全面内战，要把我们赶回延安去，我们就要同上海的朋友们分别了，但是我们坚信，胜利最后是属于我们的！”

正义的声音吸引了来来往往的人，国民党的内战丑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记者们很快就把国民党政府包围周公馆的情况向全世界报导了。

与此同时，在董必武的领导下，被软禁的同志们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这些特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他们的工作，分化瓦解他们。这些人也并非铁板一块，有的人看到蒋家王朝不会横行太久了，也想给自己找个出路，在我方的工作下很快靠拢过来，改变了监视方式，明紧暗松。这样，周公馆人员终于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立即把情况报告党中央。

3月2日，党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指出：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大门。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下立即改变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由他负责。

这里插入一笔，此时，由青岛回到上海的袁超俊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1947年初，我从青岛回到上海，董老把一个秘密情报组交给我领导。大约2月末，董老让我到一个预定地点与钱之光接头。

“我按时赴约，化好装，扮作一个小职员，拿本杂志一边看一边等候。然而，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钱处长一直没有来。按地下工作纪律，接头时间最多不得超过十分钟，我预感到发生了意外，但还是又坚持了十分钟，钱处长仍没有到，肯定出事了！”

“这突变的情况不允许我再等下去，我环视一下周围，尚未发现可疑之

人，立即离开。为了弄明时局变化，我在报摊买了一张《大美晚报》，上面刊登说：国民党政府下令赶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人员。果然不出所料，随即我很快得知，上海联络处已被国民党军、警、宪、特包围了。

“我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我掌握一些秘密交通线，但是决不能与他们发生横的关系，这是党的纪律。我找到一位地下党的同志，通过他找到刘少文，刘少文处有电台，负责与延安秘密联系。他在给延安发报时，把我的情况汇报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回电指示，派我去香港，与博古的弟弟、地下党员杨林一起到联合公司（华润公司）。于是，我从上海辗转去了香港。”

3月3日，董必武终于冲出反动派的包围，驱车来到上海市政府，找市长吴国桢，吴国桢作贼心虚，推脱不见。于是董必武又来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找到宣铁吾，气愤地质问：“我们中共代表团是你们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为什么下令包围我们？为什么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

宣铁吾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

董必武义正辞严地告诉他：我要立即去南京，联络处其他人员随后离沪。在此期间，他们的安全你要负全部责任！

理屈词穷的宣铁吾只好点头答应。

董必武带着家眷与随从人员于3日赶到南京，一下车就被包围了，被强制到一个小站房里。董必武气愤地质问：“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这么无理？”

一个特务小头目说：“这是上级的命令！”

“哪个上级？我去找他！”

这个家伙慌了，忙说：“是这样，你们的车还没来，咱们先谈谈。”

董必武火了，说：“跟你们有什么可谈的，我有事要找你们蒋委员长谈，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你们蒋委员长请来的。”

特务们怕事情闹大了，只得收敛一些，监视着董必武一行人去梅园新村。

董必武先后找了张治中、邵力子和司徒雷登，谴责国民党关闭和谈大门的无理暴行，与他们交涉京沪渝三地人员撤退之事，要求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保证我方人员回延安的飞机，并义正辞严地提出：上海联络处的人员不到南京，不保证重庆中共人员回延安的飞机，我就不走！

5日下午，上海联络处13位同志在钱之光的带领下，终于冲出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包围来到南京，并把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的金条秘密缝在衣服里，随身带出。

与此同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京、沪、渝三地的中共办事处的财产移交民盟保管。

7日上午9时，董必武带领京、沪两地70多名工作人员来到机场，准备返延。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叶笃义，美方代表柯义上校以及中外记者数十人，前来机场送行。

在人们的注目下，德高望重的董老发表了慷慨激昂的书面讲话，他说：“十年来从未断的国共关系，从此断矣！”“目前虽战火蔓延，中共党员仍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终必失败，好战分子将自食恶果。发表完讲话，董老一步步登上飞机的舷梯，而后回转身，深情地望着送行的人们，挥动着手臂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8、9两日，在重庆被软禁的我党人员也冲破特务的包围，乘美军飞机全部回到延安。

京，沪、渝人员撤走后，我党在国统区的公开人员只剩下解总驻上海、天津、开封的少数同志，他们根据党中央的非赶不走的指示继续战斗。10月10日，朱友学护送完最后一批物资，回到了山东解放区，以后去了西柏坡。11月中旬，联总宣布停止在华工作，斗争更艰难了。这几位同志在林仲、成润领导下战斗到12月12日，后返回解放区。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终止。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她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受任何邪恶势力所左右。仅仅两年，蒋家王朝就在历史车轮下倒塌了，南京这个虎踞龙盘的石头城又回到人民手里。

历史的主人是人民，历史的列车向着人民的心愿前进，人民是要求和平的。25年后的早春，和煦的春风掀开中美关系新的一页。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初访中国。从纽约飞来的客机徐徐停在了北京国际机场，尼克松走下舷梯，迎接他的是红色中国总理周恩来。尼克松把手伸了过去。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此时的美国总统是反思过去，还是展望未来？

后 记

这部书的后面不仅是辛勤的耕耘，还有无私的帮助，无价的情谊。

1993年末，我接受四位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人的委托，撰写回忆录。黑龙江省社科联、省科研规划办对此也很重视，将其纳入省社科研究“八五”规划。齐齐哈尔市政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拨出2000元专款资助采访工作。

我从1994年元月开始收集资料，三去北京，四到沈阳。

在那大雪纷飞的寒冬，原北京市公用管理局局长朱友学和老伴把我接到家里，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满含深情他说：“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多吃点儿吧！”

在酷热的夏季，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袁超俊老人，拖着病重之躯亲自为我复印资料，并一字一句地校对。

原总后勤部的蒋泽民老人，早已把我视为女儿，每次去沈阳，他的家人必到车站去接。他的老伴文平阿姨早早为我把床铺好，把饭做熟，心疼他说：“姑娘回门了，好好休息几天。”

老人们的深情厚爱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的心田，给了我采访和写作的勇气和动力。

老人们的回忆虽然真实详细，但毕竟军事已高，时间久远，不可能那么系统。要将这种单纯的回忆写成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作品，还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庆幸的是，我及时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刘溢涛、乔东光的帮助，他们帮助我查阅资料，采购书籍。为了弄准某个历史细节，他们顶着烈日陪我拜访有关人士，又在选材立意上给予指导。这无私的帮助使我在耕耘小路上又辟捷径。

经过10个月的努力，在收集和考证资料的基础上，我开始笔耕。然而，随着寒冬的到来，我生活出现了急转弯，住在市委党校的集体宿舍里，常常是泪水打湿了稿纸。我犹豫过，彷徨过，但是一想到老人们那期待的目光，想到组织的支持、同志们的帮助，放下的笔又重新拾起。

有困难的地方就有相助之手，市委党校的领导和有关同志，把会议室清给我，尽管冷些，但有了耕耘的空间。他们还默许我接通电源，这样，在那漫漫的冬夜里，爬格子的我可以支上电炉子，烤烤馒头片，煮碗热汤面。

初稿完成后，我又有幸得到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支持与帮助。责任编辑曲炜在审读书稿中做了许多工作，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我据此三易其稿，尽量把同志们的意见吸收到这本书中。

经过两年多的耕耘，我终于向这几位老人和广大读者交了这份“答卷”。由于水平有限，定有不足之处，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会，沈阳军区第六干休所，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社科联、社科院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原周恩来的秘书何谦、原国家旅游局老干部司司长张天忠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感谢！

吕荣斌

1996年元旦于齐齐哈尔

